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一 2022.09

# 小鸟

山中的希特勒

杨潇

王宇 《忧郁的人口学家》 | 专题

曾梦龙 《历史上的小人物》 | 小鸟访谈

海伦·加纳 《来自冲浪者的明信片》 | 故事群岛







##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5 天鹅 堆积  
故事群岛 | P9 幸福的秋日田野 伊丽莎白·鲍恩  
P15 来自冲浪者的明信片 海伦·加纳  
发现经典 | P21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  
P25 猫和侏儒 赫塔·米勒

##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29 山中的希特勒 /  
P37 北川中学：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了鲜花 /  
P45 蚁居 杨潇  
长乐路百业指南 | P51 高松 杨樱  
发现经典 | P57 赫塔·米勒：我们的沉默也一样具有毁灭性 巴黎评论

## 档 案

Newsletter | P61 为终结“经期贫困”，苏格兰通过里程碑式立法 Snufkin  
P65 当只有仇恨和指控是被记住的 曾梦龙  
P69 遥远的星光，和试图拦住邪恶的手 杨樱  
P73 “是时候让你们与我们站到一起，成为我们的声音。” 张依依  
小鸟访谈 | P77 罗新和他的新书：何为普通人的历史 /  
P85 罗新：我的“反叛”历程 曾梦龙

## 专 栏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 P89 要是能这样该有多好 伊险峰



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2009）剧照

# 小鸟问答 Vol.21

小鸟 | 小鸟问答

请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以及，周末来看书。

两个重要的栏目，在这一卷与大家见面。

九月了。秋天。非虚构图书馆遵守约定，与大家见面。

第一期作者是杨潇。

杨潇 2021 年出版的《重走》获得多个出版奖项，对于非虚构写作是一次拓展，是他从媒体记者向作家转型的开始。

他在 2019 年年末环绕德国进行了一次旅行，探访这个“记忆冠军”之国如何通过博物馆面对自己 20 世纪的棘手历史。这是他旅行的结果之一，也是他最新的一部作品。

《小鸟文学》这次刊登的是其中一篇：《山中的希特勒》，写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上萨尔茨堡是希特勒写《我的奋斗》的地方。杨潇在上一本书里把历史作为背景，一个旅行者始终处在前景——这是一个旅行作家的本分。这一本似乎尝试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历史摆在前面。

留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风景与记忆》中，西蒙·沙玛说先有文化，后有自然。这就像文化不认可“山是美的”，山那时就被看作大地丑陋的伤疤。当文化赋予山崇高一类的概念，山作为自然景观才有了美的含义。当山被视为丑陋伤疤的时候，山里的人或者与山有密切关联的人，如何看待这伤疤？还有，山之美与美的欣赏主体有什么关联？

上萨尔茨堡的自然风光与历史、政治和文化纠缠在一起，人们来到此处，看的究竟是什么？你和希特勒一样会认可阿尔卑斯的风光之美，但你们他又截然不同。

杨潇提到一个细节，一位有机会接近希特勒的人：

她向希特勒提到自己在阿姆斯特丹亲眼所见的犹太人的遭遇，结果遭到元首痛斥：“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关你什么事？犹太人关你什么事？……这都是完完全全的多愁善感！妄议人性（tittle-tattle about humanity）！”

你在阿尔卑斯、在上萨尔茨堡的多愁善感与斯蒂芬·茨威格的多愁善感可能是一回事，但同样热爱这景色的希特勒又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问题，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如何处理记忆？公众的态度，知识分子的态度，历史研究者的态度都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大家在争议什么。杨潇用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写了他看到的和他了解到的各种东西，它比我想得要复杂。以前我看过一则消息说，关押纳粹要犯的斯潘道监狱，在它唯一的在押犯赫斯去世后，立刻被下令拆除——为了避免这里成为纪念纳粹的圣地。杨潇在书中引用了马蒂亚斯的话，“假装无事发生”——“就成了处理不愉快记忆的一种选择。更多的纳粹高官使用过的建筑，要么被遗弃，任由荒草和灌木接管，要么改头换面，令其‘正常化’——同样都是‘假装无事发生’。”第三个问题，对历史的态度，总是很容易让人想到我们自身的境况。这个还是请读者各自感受。

按我们的规矩，杨潇还拿了两篇代表作。

他选了两篇《北川中学 如今这里废墟丛生再没有了鲜花》和《蚁居》前者实际上是两篇，一篇写于汶川地震之后一周，以及半年之后的追访。后者写北京唐家岭“蚁族”聚居地。这是杨潇转型作家之前作为媒体记者的作品。它有媒体非虚构写作的特点，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与其说是某位记者的代表作，不如说是时代的代表作。它总是会与那个时代里最重要的事件相关。

一位投资界人士说，2008 年之后，在中国各地，建得最好的楼，还真是学校。他因为投资的关系，经常考察各低线城市、县城、乡镇的商业和社会形态，算是一手观察信息。我们相信这一点，在后人们以为学校就该天经地义的结实、建结实的学校就是天经地义的举措的时候——我们得知道，这与当年的媒体记者为我们记录了这样的悲剧，引起全社会特别是权力部门对此的反思，继而产生敬畏有关。我们轻飘飘地说“时代进步”的时候，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几百人上千人的生命。

还有“蚁族”。在唐家岭人们感慨“蚁族”命运不久，“土绅化”开始了；在汶川地震之后，不计成本一定要给学校用最好的料盖最好的楼，成了很多地方的共识。这些被大多数人所淡忘，但它被保存下来，成为文献，成为档案，成为某些事情以同样的轨迹发生的一种阻力，这是杨潇代表作的意义。

当然，这更多的是从文字所传递的社会意义上来说它的价值。只要我们说到非虚构，似乎总要板出一个现实主义的面孔，仿佛文学此刻成了配角，可有可无。

但你知道，不是这样，至少对于杨潇不是这样。他有能力拖着一个行李箱，带着你从贝希特斯加登爬到上萨尔茨堡，并带着你东转西转，与各种人交流，看到那些中学生，感受阿尔卑斯晨间的一点寒意。如果我们硬要拿旅行文学来标记杨潇的话，他是中文写作里难得能把你带着到处跑的人。

但是你见过拖着行李箱的旅行文学作家？哈哈，那个走在湘黔路上拿着形色识花软件认稻谷的杨潇还在，他总是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喜悦。

i

## 小鸟专题，第一期

上面提到 2008 年之后，学校成为中国质量最好的建筑物之一。看到一条微博，配图乍看平平无奇，文字亦短：“村里的小学早就因为学生少，荒废了，今年利用率超高，天天在这做核酸。”

用户的 IP 所在地是——河南。

引用这条微博的原因是想说，恰好小鸟专题第一期的主题是人口。而这条微博像一个综合隐喻，把让人感觉糟糕的很多事情连在了一起。

8 月 18 日有一条消息，“华人社会学家王丰当选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丰是第 5 位入选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华人科学家，也是首位入选该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华人学者。

王丰研究全球的人口流动和中国的政策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教授、系主任 David John Frank 评价说：“王丰的研究跨越了从人口学到社会变革的桥梁，他的工作中最突出部分是推动改变了中国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工作。”

王丰和更多的中国同行都出现在《忧郁的人口学家》这篇文章里。作者王宇用四个月的时间和这些专业人士交谈，看起来在谈人口问题的变化，实际上写的是在一个复杂然而单一的权力结构里，专业人士与公权力之间的博弈——如果有些东西还能称得上“博弈”的话。

我们把这篇文章作为第一期小鸟专题的主文。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人口问题背后的复杂因素，王宇的另外两篇文章，《翼城实验》和对王丰老师的访谈会一并刊发。

ii

## 本卷封面。

美洲黑羽掠鸟，也叫“普通拟八哥”。

iii

## 本卷内容。

8 月已经在微博和大家说了“王伯伯脑保健操”这个栏目的消失。喜欢这个栏目的读者需要去每月的 PDF 里找一找。

长乐路的更新可能还会持续一到两期。曾梦龙会在本卷的小鸟访谈里采访历史学家罗新。

本卷“再读经典”的作家是赫塔·米勒。《巴黎评论》有一次访问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解释了她和语言之间纠缠不休的关系，这构成了她的写作的底色。只要去读她的作品，你很快就会发现她和词语之间的角力。当然，最好的了解她的办法，还是去读一读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和那些名字都很让人很难忘的作品。另外，我们降低了“24 小时文学聚会”和“小说家”等虚构栏目的比例，以及，每周二暂停更新。

iv

我们在 8 月 29 日的 [newsletter](#) 里写了一件事：

极端的干旱侵袭了全球……[中欧多国河岸底部的“饥饿石”](#)因为河流水位降低露出，其中最古老的一些石刻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分别是 1417 年、1473 年、1616 年、1630 年、1654 年和 1666 年。[上面记录了王皇给当时的社会带来的灾难](#)，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价格高企，穷人挨饿……当水位下降，时空发生了奇妙的汇集，先人的残酷的警示露出水面。“当石头消失时，生命才会重新绽放。”一块石碑上写道。而另一块写着：“如果你看见我，请哭泣。”

2022 这个年份也将纳入这个阵列。具体到我们这里, 或许还得补上一张照片:



贵州山火下, 核酸站点前。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 或邮件至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



####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 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 并呈现出来。

####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 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 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 小说

# 天鹅

堆积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我怀着要为你制造湖水的决心，  
让词语从唇齿间源源不绝地流淌出来。

团里找的导演越来越年轻，今天这个是 96 年的。

96 年，十二生肖轮转一周重新开始，眼前这批演员在艺校腾挪四年刚好毕业。三十六个生瓜蛋子在端午节前一天被拉到排练场来接受分配——有渊源和专业好的上话剧院，个子矮的进儿童团，手臂有力气的去举木偶，剩下的就弄皮影。上午彼此确定完，一起鼓了掌，傍晚就说话剧院名额不够了，得把“那几个好的”拉下来，塞进儿童团里面儿，所以派我去通知。

太阳要烧光了，我在摩托上沿着江找，果然看见这一批三十六个人，有几个拎着啤酒肉串，有几个围着碳烤炉子，有几个蹲在地上拆烟花，还有几个正把小船往江里推。90 年代人们还会热闹地过端午，吹着风能醒一宿，披着朝阳过江桥，去北边薅一把粘着露水的艾草。1996 年的那一宿，我跟他们三十六个人不分彼此地坐在岸上，四喇叭磁带录音机里播着我随身携带的一盒《天鹅湖》。云上勾着新月，这是 1996 年 6 月 20 日，民进党的李登辉就职满一个月，柴可夫斯基把江水变成湖，我还是没能掂起脚尖。96 年出生的导演看不到当年，摆在她面前是已经面皮黄软，骨质疏松的中年人——四十多了还在演儿童剧的十七个中年人。加上五十五岁的我，就有十八个了。说也奇怪，前几年团里来过不少导演——省歌舞剧院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俄罗斯回来的——都是男的，但今年来的两个都是女孩儿，都长得年轻，都年纪不小。比如说这个，26 岁，真是不年轻了。我们团里十三个女演员里有十二个都在 26 岁前后有了孩子。她的腰扁扁的，肯定还没孩子。

“之前来了个导演，比你大几岁，挺胖，见完演员后一声不吭。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咋了，他就用筷子戳起一个肉丸，举起来比划说这么圆的腰，怎么还能演小孩子，年轻人的腰是扁的！是扁的！”，我跟女导演学起来，她却皱起眉头：“成年人演小孩投射出的是体制问题，演小孩不是她自己选的，导演要将小孩从成年人的身体里面发掘出来，鹅（而）不是在那里 judge 别人的身材。我要去下洗手间。”

“鹅不是”——我听懂这个了，她是个广东人。

广东人是我们最熟悉。我们在游戏里的队友都是广东人，你听过他们说话的，记得吗？那些南方人有不一样的舌头，发音的时候唇齿也放错位置，他们自己不愿意改，却嫌我们的名字发音麻烦，所以就是要起“花名”——“阿 tin”。

阿 tin 在吗？阿 tin 玩吗？阿 tin 白天都不看手机哦？阿 tin，撑住，我去下洗手间；阿 tin 开麦，阿 tin 开麦，阿 tin 几时来广东啊？广东比北方热，裙子要短，鞋子要好脱哦。

全球变暖，这几天冲到了 34 度，北方成了南方，空调依然温吞，女导演热得不行，终于脱下大 T 恤，只剩下背心和短裤，露出手臂上的书本，脖后的子弹和小腿上的刺刀，还换上了芭蕾舞鞋型的平底鞋。

她脚背光滑，筋脉清晰，刺刀是沿着小腿肌肉文的，走出去的时候阳光落在刺刀上，刀被开了刃。我盯着她的腿，刺刀落，刺刀没，刺刀现，刺刀再见，她走出去，我人生中的第一段记忆闯入脑海。

1970 年，全国放映现代芭蕾舞电影《红色娘子军》，二舅带我去看。

二舅把我举起来，我看见女主角吴琼花宛如一柄刺刀。她搭住一个男人的肩膀，场子里骚动起来，二舅猛地一抡我，把我当步枪一样夹住，我的世界瞬间缩小，变成前面那人的胳膊窝那么小的一方天地。但我仍然看见吴琼花。她的左脚立了起来，像旗杆一样插在地上。二舅发现我整个人都快掉下去了，赶紧把我放到肩膀上扛着，于是我俯视那架黑白电视，那个通向新世界的漩涡。

吴琼花继续抬起右腿，将自己展成一面旗帜，并以旗杆为轴开始旋转，像在抵抗风暴。场子里出现欢呼，也有人喊“把孩子放下信不信我把你孩子扔出去”，我便从二舅的肩膀上滚进他的臂弯里。不行，我还没看够，所以我踩着他的手掌往上爬，用我的脸贴着他的脸，找到前面那人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缝隙，精准地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脚背和小腿上。

那一晚，二舅是一个很不安定的支架，我拼了命才能捉住一点碎片，但我原谅他，毕竟他也被震住了，所以一回家才会嘟囔“洪常青那小子还没我好，吴琼花凭什么在他面前踢大腿啊？”，我妈打他：“以后少带你侄子去看那些脏东西。”

可那不是脏东西，那甚至成了样板戏，那是伟大领袖为我们精选的好东西。每次《红色娘子军》演出，只要来得及，我就会换上最干净的衣服，跟二舅一起用水把头发往后抹，要显得比洪常青更精神。

看的次数越多我的年纪也跟着越大，越大我越明白《红色娘子军》在讲什么，越明白我哭得越厉害，越哭我就越骄傲，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教育就可以跟伟大领袖在审美上保持完全一致。

看，看镜子里，我的脖子怎么又那样昂起来了，真是改不掉，芭蕾里不需要那么僵硬的昂起，可我就是改不掉。但这是我们的民族特色啊。是民族特色啊。我的脸在镜子里变得越来越红，我盯着我自己，就要被别人发现。

“张哥，喝茶？”

“不用不用，你们喝，我去……我把这……弄一下，你们在排练场喝这奶茶，洒一地，都招蚊子了。”

我把颈椎一截一截放下来，狠狠地把脚踩实了去门后面拿拖把。不能踮起来。我不能踮起来。文革让很多人类变得不可理喻，可我就是在那个年代疯狂地爱上了芭蕾，你让我上哪儿说理去。

红小兵热烈地折磨人——剃阴阳头、坐土飞机、游街示众，我热烈地观察人——脖颈子，小腿肚子，手腕和脚脖子。我想，中华民族的芭蕾舞让我学会了一种很纯粹的爱，不带任何欲望（这种爱的方式有可能是我天生就会的吗？我不知道）。我也听过，我听过他们叫我小强奸犯，小阴阳人，“等你长大斗死你”。

我没罪，你明白吧，我没有罪。如果我有罪的话，怎么能 15 岁就穿上军装呢。就现在拖这门技术，还是我们班长教我的。

别人穿军装是为人民服务，我是为了练足尖工夫，“脚背要像刺刀一样，这是我们民族芭蕾的特色！”。但我们只在排练厅跳《红色娘子军》。江青已经被打垮了，她说好的东西都不好了，哪怕 72 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看的就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也算不上是好东西了。

芭蕾变得面目模糊，我被其他人裹进了绿色军营的晨操晚练里，把更多时间花在唱歌、踢正步、打鼓、打靶子、吹小号还有负重跑上，我学习揣摩人的眼睛，看着人的帽檐说话，当然也要学习被打。

这样到了 18 岁，我的躁动归于平静，变成石头，芭蕾舞成了我心脏旁边蔓生的芦苇。也是这一年，舞蹈老师从北京出差回来，带来一盒 VHS 格式的录像带。她把我們所有人聚在一起，要放给我们看。这是中国彩电的历史性年份，生产量到了全球第二，质量喜人，而我们连队终于拥有一台 20 寸的牡丹牌大彩电。

音乐和画面同时出现，那个瞬间，狂风吹过芦苇荡，拂过石头般的心脏，我像是回到了三岁那年，躁动重新活了过来。我迫切地想要记住这个彩色漩涡里的一切，记住它，吸收它，变成它。一曲终了，老师说：“这就是著名的《天鹅湖》。”

“我想做白天鹅！”

我的声音震天，所有人都能听到，你应该能想象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吧？你？

我又熬了 8 年，也上过舞台，在《天鹅湖》里扮演宾客，还跳了一些其他东西，我不太记得了。1992 年，中央芭蕾舞团重排了《红色娘子军》，有人开始叫我吴琼花。吴琼花。我又听到这个名字。吴琼花。

可我已经 26 岁了，我知道他们这么叫我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在一次给中央领导的演出里摔倒。我们政委人挺好，他提醒我：“你也不小了，办转业得了。”去交军官证的时候，对方说：“儿童剧团也会演天鹅湖吧，看他们能不能让你当一次白天鹅？”

天鹅，我就是从那天开始看见你的。

我演下蛋的大野鸭，鼻子喷气，扇了两下翅膀，你在观众席里和着节拍，像要飞翔；我演匹诺曹的爷爷，数落孙子撒谎，顺着他的长鼻子望过去，我看见你在侧台梳毛；我演日本大佐，鼻孔朝天，指挥大兵砍杀八路，你溜到我眼前，把奥杰塔死亡的那场戏演一遍，我一下就哭了，导演大怒：“鬼子怎么还有感情了！鬼子就他妈不是人！再来！”我解释不清，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鼻涕浸湿了人中处的假胡子。

天鹅，你为什么会出现啊，你想干什么啊，你怎么总顶我的脚底，逼我踮起来啊。你还记得那次吗？云上勾着新月，那是 1996 年 6 月 20 日，民进党的李登辉就任职一个月，柴可夫斯基把江水变成湖，你在湖中央制造漩涡，我还是没跟你一起掂起脚尖。也是那天，你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脸埋进羽毛里，进入漫长梦乡。

我居然想要唤醒你。天鹅。

所以，三十六个生瓜蛋子，十一个来了儿童团，我决定教他们跳芭蕾，却没一个爱学的；所以，新一届艺校又毕业了，演员更多了，我就开始编舞，但没人会芭蕾，我只能编

其他东西；所以，我自己对着镜子，从基本手位开始，让芭蕾在我身上恢复。年轻人总爱凑在一处，他们的声音扎向我的脑子，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我就买了 32kg 配重，在两个哑铃杆子上平均分配，双手握着，从手位一做到手位七，发出雄壮的呼吸声，雄壮到要让所有人都能听见。他们开始向外人介绍我：“张哥，部队转业来的，不愧是部队里出来的，对自己要求就是高，铁血真男人！”。

天鹅，就这一刻，你望向我，一双眼睛里存着两个阴天，酝酿着闪电。于是，我躲到门后面，就是现在我在的这里，放拖把的这个地方。我在这里第一次跟你说说话。

“我要过日子你懂吗？”

你拍拍翅膀，乌云在眼睛里拧出水来。

你能听懂。你能听懂我。我在你的眼睛里面存在着。

于是我怀着要为你制造湖水的决心，让词语从唇齿间源源不绝地流淌出来。

“我现在是个剧务。”

“你看我的肌肉都没了。”

“我今天要染头发，你要染吗，变成黑天鹅？”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结婚，我俩谁都没看上谁啊。”

“我居然有孩子了，就弄了一次就怀上了，男孩儿，男孩儿这年头能学芭蕾了吗？”

“我今天发火不是因为孩子，是因为她，她在菜市场那么张着腿说话，太不体面。”

“现在的年轻导演，排的东西一点都不美，人都耷拉着脑袋，塌着腰，声音全往里头收，说这是自然派。自然的东西怎么会好看呢，我们要对抗身体的惯性，对抗这个普通的身体，把神圣的东西招出来，是不是，你看这个男导演，洒了一地的烟灰。”

“我今天不跟你多说了，我又听见有人说我有病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其他人见见你。”

“我的足弓力气越来越小了。”

“我又不是变态，你知道的。”

“你会一直在这里吗？”

我们说了好多年话，直到 2020 年，剧院关门，我在家封闭，你留在排练场，复工时间不定。没有你，我觉得自己都要消失了，我必须找点事情做，所以就下载了那个游戏，点进去，“建立一个新角色”。我开始打扮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细致地打扮她，眉毛，眼睛，嘴巴，脸型，身材，肤色，衣服，裤子，帽子，配饰，武器，“她”被我发掘出来了。

是吴琼花。《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

“请输入一个昵称”

屏幕上出现这句话。

“T-I-A-N-E”

拼音输入法果然快，我都没反应过来，“她”就变成了你，你变成了人，出现在屏幕上，端着枪，冲我挑眉。天鹅。

手机是一个更绚烂，更玲珑，引力更强的漩涡。它把你从排练场吸出来，让你能开启另一种生活。你的名字都变了。阿 Tin。他们叫你阿 Tin。

阿 Tin，哩度；阿 Tin，唔好乱走；阿 Tin，嚟紧没啊；阿 Tin，你是不是听不懂白话；阿 Tin，劲哦，“劲”就是厉害的意思；阿 Tin，好想听下你把声啊。

天鹅，你不是来找我的吗，为什么我好像永远都抓不住你，无论我送你多少礼物——新的枪，新的衣服，新的动作和表情——都不够，我还能给你什么呢？

门在此刻被推开，拖把掉在地上，导演走了进来，笑着说五分钟后我们开始。

天鹅，我知道了。声音。用来沟通。

十七个演员已经各自分散，三俩聊天，像在比嗓门。

天鹅，我要给你一把声音。女性的，南方的，年轻的声音。

导演坐下来，拧开一瓶水，仰头喝下。

天鹅，矿泉水在她的喉头化成湖水。她在准备声音了。

于是我走向她。

“你是广东人吧？”

“您听出来啦？”

“你会粤语吗？”

“会啊。”

“你帮我说话呗。”

她看着我。停顿了一下。

“说话？”

“对，就是说句话。”

“用粤语？”

“对，粤语。”

“怎么说？”

我把手机递到她嘴边。

“就说：你才厉害呢，多亏你带我啊。用粤语。”

她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我的手机。

我确定她看到游戏群的名字了。

天鹅，你了解我的。

天鹅，我不是个变态。

天鹅，真希望你此刻就在——

她的右手大拇指摁住录音按钮，她的下颌凑近手机。

她看着这个 QQ 群，说了一句话。

用我听不懂的语言。

“好短啊。”

“粤语偏古音，省字。”

她又晃了一下手机，页面缩小，回到桌面，我没有把手机拿回来。

“手机桌面上这个跳芭蕾的是你吗？”

“嗯？”

“真的是你！你的脸都没怎么变过！”

“嗯？”

“他们说你是跳芭蕾的我还不信呢。”

“嗯？”

“你会跳天鹅湖吗？天鹅湖里的 solo？”

“嗯。”

“你能帮我教教其他人吗？几个动作就行。”

“嗯？”

“我放音乐，您先跳一下，我们一起看看。”

“我……”

前，前，左，左，右，撞门，拿钥匙，开门，跳到桌子上，我操纵自己闯入道具库，翻出四喇叭录音机，换上新的电池，确认，磁带还在里面，确认。转身，穿过门，左，右，右，前，前，我操纵自己回到排练场，确认，磁带还在里面，确认，按下播放键，闭上眼睛。

寒冷的，带着冰渣、石子和树枝的湖水涌来，我感到自己高了一截。低头，我看见自己的左脚立了起来，像旗杆一样插在地上。侧头，我看见自己张开右腿，将自己展成一面旗帜。头回正，盯着一个点，镜子里有一个五十五岁的男性秃头。盯着他。我开始旋转。一下，两下，三下，我制造风暴，变成漩涡的中心。快了快了，我就快要被吸入另一个世界了。我立在这个排练场上！

“这个就很好啊。”

湖面猛然结冰。

“您这个年纪了还能这么转。”

十七个演员的烟味扑面而来。

“我就要这个转，她能学会吗？意思一下也行。”

阳光落在导演的小腿肚上，刺刀开刃，没入我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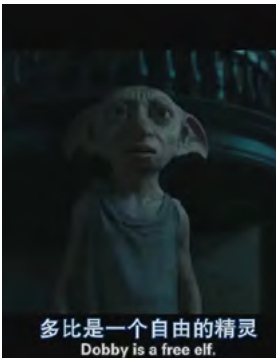
“你不是要白天鹅奥杰塔的舞步吗？”

“没事儿，这个就挺好看的。”

“挥鞭转是黑天鹅奥吉莉亚的，我跳了黑天鹅，我跳错了。”

“没关系，这个就行，只要她能做出来。”

天鹅，你看，我的脚背像刺刀一样，湖水变成了红色，冲破冰层，击穿我。



堆积

刚开始写小说，这是第一篇，想暂时匿名，等文字开始堆积。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Laura Fuhrman](#) on Unsplash

## 小说

# 幸福的秋日田野

伊丽莎白·鲍恩 | 故事群岛

从人们身上流逝了那么多的东西，  
而在人们之间流动的却少之又少。

全家人的散步队伍，虽然人数众多，却并未散布在麦茬地里，而是保持着三三两两的队形。爸爸拄着他的登山杖，在前面领路，两侧是康斯坦丝和小阿瑟。罗伯特正和西奥多表哥聊得热烈，艾米莉紧跟着他们，不过并没有和他们并肩。随后是迪格比和卢修斯，正朝着左右假装瞄准黑鸦。亨丽埃塔和萨拉殿后。

金色的麦茬地里，萨拉看着走在前面的那些人。她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彼此关系，知道他们以及自己的名字。她感受着脚下的麦茬，听到远处麦茬在那些人的脚下持续发出不同的细微吱吱声。这片田地，以及目力所及的所有这些田地，都和她一样知道它们属于爸爸。今年的收成很好并且已经收割完毕：他很满意。今天下午，他本能地选择了 he 最接近成年的女儿和最稚龄的儿子陪伴左右。阿瑟被爸爸牵着手，为了赶上大人的脚步焦急地蹦蹦跳跳。至于康斯坦丝，萨拉能够时常看到她帽子上的羽毛一闪而过，以及她转身时紧身连衣裙的曲线。康斯坦丝只把注意力放在爸爸身上，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因为她已经被求过婚了。

这些田地的拥有者的女儿们，从康斯坦丝起，都在行走时将她们的甲壳虫绿、黑棕或紫褐色的裙摆撩起来，提离地面，只有亨丽埃塔例外，她还小，裙子还不及脚踝。她们行走时发出一种持续的、沉闷的声音，身后却留下一片沉寂。升腾而起在空中盘旋的黑鸦，蓝黑色的翅膀在阳光照耀下锃亮发光。他们经过之后，黑鸦又一只接一只降落到地面，开始啄食。爸爸和男孩子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除了白色的衣领，看起来跟黑鸦一样，却没有黑鸦的锃亮光泽。

萨拉知道康斯坦丝的思路飘向哪里，也明白阿瑟的手在爸爸手中扭来扭去，宛如囚犯。她还注意到艾米莉对西奥多表哥不关注自己是多么怨恼，也曾和迪格比、卢修斯一起兴高采烈地想象黑鸦纷纷掉落的样子。不过罗伯特和西奥多表哥的谈话却让她心生怯意，就像眼前的山脊一样令她望而却步。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她的心中翻腾着对亨丽埃塔的爱意，亨丽埃塔就在身边，她的脸庞年轻而机敏，眼神炯炯地映射出蓝天，探寻着这个午后的一切。她辨认出告别的色彩，品尝到甜蜜的忧伤。与此同时，从被树木掩映的那个农舍里升起袅袅青烟，木头燃烧的刺激味道。明天，她的兄弟们就要返回学校。就像星期天一样。爸爸把傍晚空出来，所有人（除了一位）簇拥着罗伯特、迪格比和卢修斯一起在庄园里散步，他们要有一阵子见不到庄园了。可以感觉的到，罗伯特并不是不情愿回去读书。明年，他就要像西奥多一样上大学了；而且，他并不是眼前这一切的继承人。但是，迪格比和卢修斯在他们瞄准和射击的玩闹中却流露出一种隐藏的悲伤、受害者的反感情绪，尽管他们继承庄园的可能性还排在罗伯特后面。

萨拉对亨丽埃塔说：“想想看，他们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你脑海中想的就是这个吗？”亨丽埃塔问道，她对真理有着微妙的执着。

“不止，我还想你和我会回到餐桌旁坐在一起……”

“你知道，兄弟们要走时我们总是很难过，不过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从没伤心过。”略带愧疚、心照不宣的甜甜微笑先在亨丽埃塔的唇上绽放，旋即开放于萨拉的唇角。而且，妹妹说道：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去年发生过，明年还会发生。但是，哦，假如它以前从未发生过，那么我该感受如何，你又会感受如何？”

“比如，康斯坦丝的婚礼？”

“哦，我不是说康斯坦丝啦！”亨丽埃塔说道。

萨拉想了想说，“你是指发生在我我身上的事，管它是什么？”她再不会在清晨醒来，除非亨丽埃塔也像小鸟般地苏醒；她再也不会让枕头的褶边掠过她的脸庞，除非亨丽埃塔的脸庞栖息在同一个枕头上。她祈祷的内容将不再是她们不再睡在同一个床上，而是她们会躺进同一个坟墓里。“你我会永远像现在这样，”她说，“没有什么能触及你我中的一人却略过另一个！”

“你说的啊，我听见你说了啊！”亨丽埃塔欢呼出声，随后她却微启双唇，给了萨拉一个最折磨人的表情。“但是我没办法忘记你出生时没有我，你不愿意等……”她戛然而止，放声大笑，喊着“哦，瞧啊！”

她们前方出现了混乱。艾米莉趁着已经翻过了山脊弯腰去系靴带，事起突然，迪格比几乎绊倒在她身上，大叫出声。西奥多表哥礼貌地在艾米莉身旁停下脚步，罗伯特却低着头大步疾行，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中，完全没注意到周围的情形，差一点就撞上了驻足回望的爸爸和康斯坦丝。爸爸在震惊之下松开了阿瑟的手，阿瑟直接摔倒在麦茬上。“天啊”，受到冒犯的康斯坦丝对罗伯特说道。

爸爸说，“出了什么事？请允许我问一下，罗伯特，你这是要去哪，先生？迪格比，别忘了那是你姐姐艾米莉。”

“艾米莉表妹遇到了麻烦，”西奥多表哥说。

可怜的艾米莉！她的裙子压成了一团，帽檐下脸色涨红，支支吾吾地说“是我的靴带，爸爸。”

“你的靴带，艾米莉？”

“我刚才在系靴带。”

“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系上吧。——看来，”爸爸环顾四周，“就因为艾米莉需要弯弯腰，你们就得像九柱戏的木柱一样全部倒下？”听到这个，亨丽埃塔尖叫一声，伸手搂住萨拉，把脸埋在姐姐怀里，几乎难以抑制住笑声。她再也忍不住了，浑身乱颤。爸爸一向觉得亨丽埃塔完全没有规矩，除了就餐平时就不理会她。现在，他仍然选择无视，简单示意其他人收拾起来，继续前进。西奥多表哥扶艾米莉站起来，可以看得出来，他觉得脸色绯红的她十分可人，可是她却冷淡地放开了他的手，目视别处，摸了摸颈前的领针说，“谢谢，我没事”。迪格比向艾米莉道了歉，罗伯特则给爸爸和康斯坦丝道了歉。康斯坦丝扶起阿瑟，用自己的手帕拂了拂他的短裤。所有人又各自迈开步子，继续向前。

萨拉不知道该怎么安抚大笑不止的亨丽埃塔，只好在她耳边轻哄“好了，好了，好了”。两个女孩和前面人的距离逐渐拉开，看起来似乎她们俩要落单了。

“落单不好吗？”亨丽埃塔抬头说道，回应了萨拉没说出口的想法。

她们用相同的眼光四顾张望。修剪整齐的高地似乎就飘浮在远方，令人目眩地一直延伸，通向那些低矮的、青草遍布的蓝色小丘。这个午后似乎没有尽头，尽管麦子已经收完，午后的阳光仍在继续催熟一切。光填补了沉寂，现在爸爸和其他人都已经远得听不到声音，四周完全沉寂下来。只有树木织成的屏障交叉排列，低矮的小丘在巨大的田野里形成一个个小岛。家宅及其附近的农场已经永远地淹没于下方层层叠叠的树林中，从女孩们站立的位置来看几乎见不到一丝涟漪。正在盘旋的同一只黑鸦的影子越过萨拉，接着又越过亨丽埃塔，而她们两人也依次在麦茬上投下一片影子。“可是，亨丽埃塔，我们不能永远待在这里”。

亨丽埃塔立即将眼睛转向那仅剩的一缕孤独的炊烟，从农舍飘出的炊烟。“那我们就去拜访那个可怜的老人吧。其他人都很幸福，只有他要死了。我们改天再路过时可能就不会再看到炊烟了，很快他的房顶就会坍塌，我们就会后悔今天没有去看他。”

“可是，他都已经不认得我们了。”

“无所谓了，我们站在门口，他会感觉到的。”

“可是，别忘了这是罗伯特、迪格比和卢修斯的告别散步。我们两个要是不理他们，那可太无情了。”

“要是那样，菲茨乔治该有多无情啊！”亨丽埃塔笑道。

“菲茨乔治是菲茨乔治，他最年长，还在部队里。我恐怕菲茨乔治并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一声无奈的叹息，或者假装的一声无奈叹息，从亨丽埃塔尚未发育的胸膛里发出。为了再多待哪怕一分钟，她只手遮在眼前向远方眺望，就像水手搜寻海上的船帆一样。她带着希望和热情朝各个方向都凝视了一番，只除了那个她和萨拉必须要前进的方向。接着——“哦，可是萨拉，他们来啦，来了——他们！”她喊道。她掏出手帕开始挥舞，在没有一丝风的空气中来回摇摆着手帕。远方，两个骑着马的人出现在视野中，沿着田地之间的一条青草覆盖的小径慢跑。小径向下通往一处谷地，他们也随之消失不见，不过这时已经能够听到马蹄的声音。回声扫过土地、四周的沉寂以及萨拉本人。她不再等着看骑士们再次出现，而是把目光转向妹妹的手帕。手帕软软地垂着，露出一角有咬过的痕迹，还有染上的李子渍，手帕的主人则专心地等待着。突然它又变成了一面旗帜，疯狂地摇动着。——“你也招手啊，萨拉，招呼！让你的手镯一闪一闪！”“他们要是能看到我们，就该已经看到我们了”，萨拉说道，像块石头一样安静地站着。

亨丽埃塔立即停止了挥手。她转过来面对姐姐，使劲咬着手帕，好像这样就能阻止它成为谎言。“我明白你害羞，她用冷漠的语气说“太害羞了，甚至连菲茨乔治你也不愿意挥手招呼？”她不提另一个人的名字的做法蕴含了一百种深义：她故意不看萨拉的脸，以便强迫她领会所有那些含义。她冲动之下屏住的那口气又悄悄地呼了出来。她的眼睛，刚刚还是最明亮、最生动的状态，现在黯淡了下来，浮现出别人难以理解的独自担心。等待尤金靠近的艰难过程因此变得，对萨拉而言，时时刻刻都是折磨。

菲茨乔治是爸爸的继承人，他的朋友尤金是邻近庄园的乡绅。两人离开小径，缓步驰来，同时摘下了帽子。西斜的阳光将菲茨乔治的皮肤变成了珊瑚色，并迫使尤金眯了眯他那深色的眼睛。两位年轻绅士勒缰停步，女孩子们抬头看向马上。“我父亲、康斯坦丝，还有其他人呢？”菲茨乔治质问道，就仿佛他们被麦茬吞掉了似的。

“前面，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山那边。”

“我们还以为你们全在一起散步，”菲茨乔治说道，似乎不是很满意。

“我们跟着呢。”

“怎么，落单了吗？”尤金问道，头一次开口说话。

“被抛弃了，”亨丽埃塔两眼发光，嘲弄地举起了双手。

菲茨乔治思考了一阵，严肃地说了声“好”，然后向尤金示意他们接着骑马前行。但是太晚了：尤金已经下了马。菲茨乔治看见后耸了耸肩，让他的马小跑起来。但是，尤金却牵着他的马在两姐妹之间慢慢步行。或者更准确些说，萨拉走在他的左手边，他的马在右手边，而亨丽埃塔则在马的另一侧。亨丽埃塔表现得像一个独处的人一样，抬头看看天，懒散地抓着那边的空马镫。萨拉却低头看着地面，身边的尤金倾身过来，似乎要说话却没有开口。她如同被挟裹进了浪潮里，浑身僵硬，头晕目眩。她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面庞剪映在上方的明亮之中。伴着他的马的细微脚步声，尤金调整了他天生的随意大步来适应她的步伐。他用时穿过缰绳，拿手指将他因为倾向萨拉而垂落到前额的一缕头发向后拨去。她牢牢地记下了这个令人赞叹的动作，也清楚他的唇上正挂着怎样的笑容。所以两个人并没有瞧对方，却都因为某种意象而微微颤抖，慢慢地色彩升腾在她脸颊的线条上。他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将会一切圆满。

在马的另一侧，亨丽埃塔开始歌唱。突然之间，她的痛苦，就像科学射线一样，穿过马匹和尤金，射穿了萨拉的心脏。我们到达山脊线的顶端：一家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也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停在那里，等着，在下去采石场的路上。在明亮的黄色阳光映衬下，一群人宛如雕塑般俊美，因为爸爸而排列整齐，因为菲茨乔治而变得完美。他们转过头，审视着掉队的人，等待着亨丽埃塔、萨拉和尤金加入他们的队伍。再过一分钟，一切都会太晚；再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交流。停下，哦，停止亨丽埃塔那令人心碎的歌唱！再次拥抱她！说出那唯一可能的词汇！说——哦，说什么？哦，那个词已经逝去！

“亨丽埃塔……”

一阵巨痛从伸出去的那只手的指关节处传来——萨拉的手？眼睛睁开了，看清楚那只手不是被打，而是撞上了桌子的一角。桌面上灰尘遍布，白色的，夹杂着沙砾的灰尘，电话上也有。不甚明亮却很刺眼的白色光线充斥着房间，照亮了残存的天花板。她的第一反应是肯定下雪了。那么，现在是冬天。

透过蒙在窗户上钉死的那层厚棉布传来钢琴的声音：有人在某个没有门和窗的房间里弹柴可夫斯基，弹得很糟糕，看不见的下方某处传过来一阵霹雳乓啷的敲击声，近处，一个声音喂，醒了吗玛丽？”声音来自打开的门的另一侧，门矗立着，把她和说话者隔开——他在门口而她躺在屋里没铺床单的床垫上。说话人又加了句，“我刚离开了一阵。”她勉强找回了声音，问“为什么？我不知道你来了。”“显然——说说看，谁是‘亨丽埃塔’？”

绝望的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她缩回碰伤的手，吮吮着指关节呜咽道，“我碰伤了。”

一个男人绕过门进了屋，她知道他叫“特拉维斯”却没设法清晰地看清他。“是吗，我可不吃惊。”

他在床垫边坐下，把她的手从她嘴里拿开握在手中：这个举动本身很温柔，但伴随着它的关注目光却几乎怀有敌意。“听着，玛丽，”他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又把这房子转了个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满意它的安全性。用正常理智判断的话，你是不会企图住在这里的。一整天都有警报，而且不仅是警报。附近某处一旦爆炸，这个随时可能发生，就会把这个房子残存的部分震塌。你总是跟我讲你有事要处理——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些房间已经一团糟？如果不等他们先清理一下，你能从哪儿开始着手呢？而且，即使你能做些什么，你也做不了。别不承认，你自己的精神是知道情况的。我刚才往里看，看你睡觉的样子，简直觉得恐怖——你完全不省人事。”

她躺在那里，眼光越过他的肩膀盯在那个蒙着棉布的窗户上。他接着说道，“你不喜欢这里。你的内心不喜欢这里。你只是强迫自己，但是你不能强迫它坚持到底——你的内心会自己找到逃避的办法：睡眠。好了，我愿意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但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在酒店给你定了个房间，我现在就去找出租车，你不用醒来就能搬过去。”

“不可能，我不醒过来就没法上出租车。”

“你知不知道你是这条街上唯一还留在这的人？”

“那是谁在弹钢琴呢？”

“哦，六号里一个搬家具的。我没有算那些暴民；当然了他们占领了一切——没人监管、照熙攘攘、随心所欲。我十分钟前来找你的时候，他们正在街那头砸那个玻璃暖房。玻璃被无情地砸烂——太粗暴了。你对这种事从来都不眨一下眼睛；事实上，我觉得你在笑。”他听了听“是的，钢琴——他们还是挺高雅的。你知道吗，楼下有个工人正躺在你的蓝沙发上，翻看你的某本法语书的图片？”

“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是谁在那儿。”

“显然不知道。你的前门锁被炸掉之后，什么人都能进进出出。”

“包括你。”

“是的。我找了个人，要他今晚之前把那个锁装好。至于你，你不明白周围正在发生什么。”

“我明白，”她说，把手指交叉挡在眼前。

这个房间的不真实感，以及特拉维斯的存在，令她恍惚，如在梦中，就像那种明知是梦还无力自拔的状态。周围的环境已经处于半废墟的状态，她并不以为意，更多地将其视为某种设施或陷阱，而且它的衰败，如果还能引起她的情感波动的话，只会令她高兴。至于特拉维斯，他是那个阴谋的一部分，要将她与她心爱的两个人分隔开来。她感觉到他开始觉得自己毫无意义。她克制着自己不去嘲弄他，不因为他不知道亨丽埃塔和尤金，她失去的挚爱，而嘲笑他。他的占有性的、怒气冲冲的关怀，当然了，是他与玛丽的故事的一部分，而对于那个故事，她记得很清楚却毫不在意，就像对待她读完的书一样。她因为被困在这里而内心抓狂，麦田的时光还在等待着她。对于被迫与玛丽的身体以及情人拴在一起的怪诞现实，她只能勉强报以一笑。她从没有枕套的枕头上抬起头来，沿着身体向下望去，一直看到交叉叠放的双脚，感觉自己被困在了这具躯体中。玛丽的无关紧要的身体沉重地压在床上，穿着一件短短的黑色现代裙，上面沾染了不少石膏片。黑色的绒面皮鞋的鞋头上染着难看的白色，说明玛丽肯定在塌落的天花板上爬过。灰泥还嵌进了玛丽掌心的命运线。

这给了她鼓舞，她说，“但我还是动手开始了：我从废墟里扒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或者我想找的东西。”

作为回应，特拉维斯低下了头，表情复杂地看向某个她视线外的东西，就在床边的地板上。“瞧啊，”他说，“一个散发着霉味的老旧皮匣子，天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垃圾、字迹模糊的信件、日记、发黄的照片，主要还是石膏和灰土。真是想不到，玛丽！——找丢失的遗嘱吗？”

“扒出来的这些东西看着都是一个年代的。”

“这些到底是什么，从哪儿来的——家族物件？”

“不知道，”她打着呵欠，用玛丽的手掩住了嘴。“它们或许甚至不是我的。拥有这样大的一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空房间，这些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储存了什么。我无意中翻出来的，所以很好奇。你要想看就看看吧。”

他弯下腰，开始翻看匣子。在她看来，他的表情并非毫不起疑。他把一些小包上的沙粒吹掉，笨拙地翻看那些磁带。与此同时，她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板条，心里盘算着。随后她开了口，“抱歉我刚才举止怪异，关于酒店和其他事情。你先离开，两小时后带着出租车回来，我就安静地离开。这可以吗？”

“好——不过，为什么不现在就走？”

“特拉维斯……”

“抱歉。那就按你说的。……这匣子里有些挺好的古怪玩艺，玛丽——我粗略地看了看。这些照片你可能会喜欢。很搞笑，而且是田园风光范的。都是同一组人——有大胡子，有枪和礼帽，有一个留着八字须的学生，一辆四轮马车停靠在大房子门前，一群人在楼梯上摆拍，一张名片上面有两个年轻女士手拉手站在一幅田野油画前……”

“把那个给我！”

她本能地试图去解胸口处的扣子，但玛丽的裙子在那里没有扣子，它不欢迎那张照片。所以，她只好把自己扔在了床上，远离特拉维斯，用她的身体盖住那两张脸。亨丽埃塔斜射过来的目光令她痛苦不堪，同时她也因为头一次看到萨拉而经历了某种震惊。

特拉维斯的手抚过她，她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感觉受了伤害，说道“玛丽……”。

“你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她一动不动，直到他说着“好吧，两小时”离开。因此，她并没有看到他捡起那个危险的匣子，夹在胳膊下面带走了。

他们回来了。现在太阳已经落到树丛后面，但光线还透过树枝炫目地照进这间美丽温暖的红色房间。装饰华丽的花盆里种着蕨类植物，蜷曲的顶端泛着金色。萨拉就站在花盆旁，伸指轻掐香叶天竺葵的一片叶子。地毯的图案是由石榴组成的一个巨大的中心花环，其上没有放置桌椅，整个中心花环将她和其他人隔开。

火还没有生，但他们扎堆站立的地方有一个壁炉。亨丽埃塔坐在一个小矮凳上，将她的胳膊肘举过头部放在妈妈椅子的扶手上。她扭着头，专注地好像在着火，无所事事，妈妈在刺绣，她的针因为思绪而慢了下来。长长的织物和上面已经绣好的玫瑰僵硬地垂落在她柔软的裙子上。阿瑟趴在妈妈脚边的小地毯上，翻看瑞士风光的图册，他并不喜欢它们，不过答应过要保持安静。可怜的阿瑟不断地翻动书页，萨拉从她站立的位置能看见升腾着白雾的瀑布和茫茫的终年积雪，书页之间还夹有薄纸。

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旁边站着尤金。随着树丛淹没越来越多的太阳，客厅里形成了巨大的红色阴影，这个阴影最后才能到达他那个位置，或许永久不会到达：在萨拉看来，他的脸庞明亮，宛如附近亮着一盏灯。他是唯一留下陪伴女士们的男士：菲茨乔治去了马厩，爸爸去安排事情，西奥多表哥在查字典，罗伯特·卢修斯和迪格比在枪械室完成那悲伤的仪式，将他们的枪收起来。她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不过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在萨拉看来，这个光线微妙的特殊时刻——它无法用时钟固定，因为它冬天早些，夏天晚些，现在的春秋天则大约在阿瑟上床的时间——一直是属于亨丽埃塔的时刻。和她在一起，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楼上还是楼下，都是分享同样的震动。她的灵魂伴着你的灵魂飞驰，大笑的悸动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树叶、树枝和空旷房屋里的镜子因而生动起来。姐妹俩在没有旁人的地方玩耍、嬉戏、躲藏，玩闹中充斥着恐惧，恐惧里满满的玩闹。直到两人互相吓得对方心脏狂跳，亨丽埃塔完全丧失理智而萨拉也几乎要失去理智，坐在平静的琥珀色灯光中准备迎接傍晚职责的妈妈就会狐疑地紧盯着她俩打量。

但现在，亨丽埃塔已经将那个时刻紧紧地锁在了胸膛里。她坐在妈妈身旁，青涩地模仿康斯坦斯的大家闺秀举止，完全拒绝考虑其他事情。正是她，总是用狂暴的举动一下子摧毁任何她已经超龄的玩具。她坐在那里，脊背挺直，手指遥遥虚点着脸颊。她拒绝看向萨拉，只有这样做她才能接受她们永远的损失。

尤金最近刚从国外旅行回来，他谈起旅行，说话的对象是妈妈。妈妈想到了她的结婚旅行，但并没有说出口。不过时不时地，她会让亨丽埃塔把剪刀或者粗梳羊毛的线盘拿过来，这时尤金就会抓住机会看向萨拉。他不敢让那一向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除了忧郁之外的其他表情。但这一举动本身就暴露了秘密：那尚未宣之于口的爱情。就她而言，她看向他，就仿佛他真的被那奇怪的光线转变成了一幅画似的，一幅无法看见她的画。在他的肩膀后方，墙纸现在被照耀成红通通的颜色。妈妈、亨丽埃塔，甚至什么都不知道的阿瑟都不急于把头抬起来。

亨丽埃塔说，“如果我是个男人，我就把我的新娘带到意大利去。”

“瑞士有骡子。”阿瑟说道。

“萨拉，”妈妈说，在椅子上稍稍转了转身，“你在哪里，亲爱的。你打算永远不坐下来吗？”

“去那不勒斯，”亨丽埃塔说。

“你难道不想去威尼斯？”尤金问。

“不，亨丽埃塔还嚷道：为什么去那？我想爬上火山。不过我不是个男人，更不太可能成个新娘。”

“亚瑟……”妈妈说。

“妈妈？”

“看看表。”

阿瑟礼貌地叹了口气，站起来，将画册放回圆形桌子上，摆在其他书的顶端。他向尤金伸出了手，又把脸颊凑向亨丽埃塔和妈妈，接着他向萨拉走去，萨拉走过来迎他。“告诉我，阿瑟，”她边说边拥住他，“你今天干什么啦？”

阿瑟只是瞪着他的圆圆的蓝眼睛。“你也在场啊；我们去麦地里散步了，还有菲茨乔治骑着他的马，还有我摔倒了。”他她从怀里挣脱出来，说“我必须去看看我的甲壳虫。”像以往一样，他转动红木门的把手时遇到些困难。妈妈一直等到他离开了房间才说“阿瑟快长成人了；



他受伤后不跑来找我了。唉呀，我都不知道他今天摔倒了。不知不觉，他很快也会离开去学校了。”她叹了口气，抬眼望向尤金。“明天会是难过的一天。”

尤金打了个手势说明他的难过。妈妈的感情只能在客厅这里得以表达。尽管客厅很大而且很正式，它还是充满了田园色彩，甚至颇有异国情调。空中的暗影有一种丝绒的感觉；暗沉的窗帘布露出后面层层叠叠的蕾丝；钢琴流淌出来的音乐有着温柔的题目：没有被弹奏的竖琴在角落里隐隐发光；沙发、扶手椅、零星的桌子、其他物件都有着纤细的腿，颤巍巍地站在地板上。灿烂白日的点滴光泽、乐器的震动、流苏和蕨草的微微颤动，似乎随时都会让它们叮当作响。但是，支架上高耸的花瓶、桌子上摆得高高的画册、托架上摆放的贝壳和小雕像，它们，就像那个雪花石膏的比萨斜塔一样，都有着自己的平衡。没有什么会倒下或者改变。客厅的一切因为妈妈变得安静，具有了重要性和支点。她接着说“我们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了”，她的意思是，等会儿她在爸爸对面的餐桌位置就座后就不会再这样说话了。

“萨拉，”亨丽埃塔好奇地问，“你为什么问阿瑟他今天干了什么？你不可能已经忘了今天吧？”姐妹俩很少在公共场合与对方说话或者问对方问题；她们了解对方的思想。妈妈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但她来回看了两个人。亨丽埃塔接着说，“任何一天，尤其是今天，都不会和其他日子一样——这肯定没错吧？她转向尤金：‘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向你挥过手帕吧？’”在尤金回答之前，她又转向萨拉，“还有你，你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骑马穿过田野吧？”

尤金也慢慢地转过眼来看萨拉，似乎带着某种恐惧等待她的回答，对那个他没有问出口的问题的回答。她拉过一把轻便的金色小椅子，将它放置在地毯上花纹的正中心，从未有人坐过那里。她坐下，说道，“但从那之后我觉得我就一直昏昏沉沉的，好像睡着了。”

“查尔斯一世在被斩首后的半个小时内还能走路和说话，”亨丽埃塔嘲弄道。痛苦的萨拉用她的两个手掌紧紧地挤压那片天竺葵叶子的残片。

“不然的话，”她说，“我怎么能做那么糟糕的一个梦呢？”

“这解释真不错！”亨丽埃塔说道。

“有点异想天开，”妈妈说。

尽管说出来可能会有些鲁莽，萨拉还是希望自己知道如何能更清楚地表达出来。她的遭遇无可名状，令她感到极大的孤独感，这令她难以忍受。她怎么才能说的清楚，她自从发现自己身处客厅之后所感受到的那种混乱感、那种无形的恐惧感？造成这些感受的源头，她只能称之为“梦”。她怎么才能告诉其他人，她费了多大的劲去努力抓住每一秒来体验自己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每一秒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这个房间的爱之迷雾里浓缩出的一滴，而是因为她担心良辰美景已经屈指可数？她希望其他人至少能理解一半就不错了。亨丽埃塔和尤金能否明白，她一度完完全全被从他们身边剥离，几乎一去不复返？他们两个可否总能每人牢牢抓住她的一只手？——惊慌中她甚至把她的双手举了起来，就仿佛被一只黄蜂吓到了一样。天竺葵的残叶落到了地毯上。

妈妈将萨拉的古怪行为归结于一个原因，忍不住在心里责备尤金。尽管他的谈吐令人愉快，但他这次拜访的目的要是去跟爸爸谈谈，那就更好了。她转向亨丽埃塔，请她打铃叫点灯，因为太阳已经落山。

尤金没有举手示意铃索的方向，他此时不在刚才站立的地方。他的黑色的头颈被黄昏的潮汐淹没，因为他正单膝跪在花坛的边缘，在地毯上摸索着寻找刚才从萨拉手中掉落的残叶。在不可避免的一片沉寂里，可以听到那些从田野归来的黑鸦正飞过房子。它们的叫声响彻天空，甚至回荡在这个房间里。看来打铃也没有用，亨丽埃塔就待在妈妈的椅子旁轻轻颤抖。尤金站了起来，拿出精美的白手帕，在她们的瞩目之下将他找到的东西仔细地包裹起来，接着把手帕放回他胸前的口袋。伴随这一切的是一种深深的幻梦感，就像任何最终行动所伴随的那种幻梦感，以至于妈妈本能地对亨丽埃塔低语喃喃：“等阿瑟长大之后，你就是我的宝宝。”

门开了，康斯坦丝出现在门口。她女王般的身影背后，一些圆球正在靠近，它们在各自的光线里游泳：亨丽埃塔没有打铃召唤的灯。不过，这头一批灯被放在了大厅的桌子上。“怎么啦，妈妈，”康斯坦丝大声说，“我看不清你跟谁在一起！”

“尤金和我们一起，”亨丽埃塔说，“不过，他正在问可否让人牵他的马来。”

“是吗？”康斯坦丝转向尤金。“菲茨乔治一直在找你，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埃米莉、卢修斯和西奥多表哥的身影穿过大厅里的灯光，聚集到客厅门口的康斯坦丝身后。埃米莉越过姐姐的肩膀说，“妈妈，卢修斯想问问您，他可否把他的吉他带到学校去，就这一次。”——“不过，一个不利因素是，”西奥多表哥说道，“卢修斯的箱子已经上锁捆好了。”

卢修斯说，“罗伯特连墨水箱都带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带着我的吉他。”——“可是，”康斯坦丝说，“罗伯特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卢修斯挤过一群人进入客厅，以便让妈妈看见他焦急的样子。妈妈说，“你这想法有些晚，我们必须得去看看情况再说。”大家让开路，让妈妈，和紧随其后的卢修斯，出了门。之后，康斯坦丝、埃米莉和西奥多表哥行动起来，在客厅的不同位置坐了下来，等着灯光到来。“我很高兴黑鸦们已经飞过去了，”埃米莉说，“它们总让我紧张。”

“为什么？”康斯坦丝目中无人地打了个呵欠，“你觉得能发生什么事情？”罗伯特和迪格比安静地走了进来。

尤金对萨拉说，“我明天会再来。”

“不过，哦——”她开了口，接着转身喊道，“亨丽埃塔！”

“怎么啦，什么事？”亨丽埃塔问，隐身在金色椅子的后面。

“还有比明天更近的时间吗？”

“可是或许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明天一定会有的”，尤金严肃地说。

“我保证一定有明天，”亨丽埃塔说。

“你永远不会让我离开你的视线？”

尤金对亨丽埃塔说，“是的，向她保证她想要的”。

亨丽埃塔尖叫道，“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你凭什么这么要求我，你，尤金？不论什么试图插在我 and 萨拉之间，最终都会烟消云散。是的，明天再来，比明天还早一些来，来吧——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行，但是谁也不会真能和萨拉单独相处。你甚至不知道你在试图做什么。正是你才使得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萨拉，告诉他这是真的！萨拉——”

其他人，散布在黑暗中的椅子和沙发上，可以感觉到正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萨拉，而萨拉，又像前一次那样，无法开口说话——

——整个房子震动了。与此同时，蒙着棉布的窗户裂开，更多的天花板掉了下来，不过没有掉到床上。爆炸造成的巨大的、沉闷的响声平息了，留下一连串低低的房屋解体的声音，还能在房子的各处听到。她躺着，屏住呼吸，嘴唇紧闭，直到那令人窒息的刺激泥灰慢慢沉淀下来。玛丽想起来那个匣子，不知道它是不是又被埋住了。她看向床侧，发现，不，不可能埋住，因为盒子不见了。特拉维斯肯定把它带走了，等他回来时肯定会解释原因的。她看了看手表，已经停了，这毫不意外：过去两天她不记得给表上过发条，不过她记得的东西也不多。透过撕裂的窗户望去是夏天的晚上，乌云压顶，看不出时间。既然没有什么剩下了，她希望他能回来把她接去酒店。唯一回到田野的途径被堵住了，因为玛丽从天花板坍塌中幸存了下来。萨拉是对的，她质疑是否还有明天：对于那个躺在床上哭泣、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人来说，尤金，还有亨丽埃塔，都消失在时间里。

最终，她听到了出租车的声音，接着特拉维斯匆忙地走过散乱的台阶。“玛丽，你还好吧，玛丽——又一个炸弹？”一张惨白的、无助的脸绕过了门，她只能伸出双手说，“是的，不过你去哪儿了？”

“你说的两小时。不过我真希望——”

“我很想你。”

“是吗？你知道你在哭吗？”

“知道。没有了天性我们可怎么活？我们现在只知道不方便，不知道悲伤。一切都那么容易破碎因为它早已干枯；我们只会奇怪它怎么发出那么多噪音。源头的汁液肯定已经干涸，或者就是脉动已经停止，早在我你成形之前。从人们身上流逝了那么多的东西，而在人们之间流动的却少之又少，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模仿爱或者悲伤。——你干吗拿走了我的匣子？”他仅仅说，“放在我办公室。”

她接着说，“发生的事情太残酷了：我仅仅获得了某一天的部分残影。我甚至不知道何时何地的一天，而现在我要怎样才能忍住不把它，像花纹一样，嵌入在其他事情的糟糕材料里呢？——又或者，我是个被梦境抽干的人。我不可能忘记那些高光的时刻。也不能忘记那样强度的生活，多事之秋——并不幸福，不，但却像竖琴一样余音袅袅。我有过一个妹妹，叫亨丽埃塔。”

“我一直在翻你的匣子。你还能期待什么呢？——多亏了你，我的今天只能损失掉了，从工作的角度，所以我能否坐下来，在今天最后两个小时里什么也不做？我就随手翻了翻——不过，我认识那家人。”

“你说过那玩意挺古怪。”

“我说过吗？我仍然认为它揭示了某些东西。”

她说，“还有尤金。”

“或许吧。我没有找到太多他的东西，只除了一些笔记，他肯定是从某个关于科学种植的书里抄给菲茨乔治的。嗯，看这个：我把全部东西理了理，又都放回去了，只除了这缕头发。它不知道从哪封信里掉出来的，我找不到那封信了，只好把头发放到我口袋里。”

“什么颜色的？”

“灰褐色。当然，它已经有点——脱水了。你想要吗？”

“不，”她说着颤抖了一下。“真是的，特拉维斯，你这报复措施！”

“我不这么看，”他困惑了。

“出租车等着吗？”玛丽下了床，小心翼翼地走过房间，开始四处寻找她要带走的東西，时不时地停下来掸一掸她的裙子。她手提包里掏出镜子来看她的脸有多脏。“特拉维斯——”她突然说。

“玛丽？”

“我只是——”

“没关系。我们就别模仿什么了，至少在现在。”

在出租车里，她看着窗外，说，“看来我是萨拉的后代？”

## 伊丽莎白·鲍恩

英国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洞察入微，主要关注英格兰和爱尔兰中上阶层人们的情感和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

## 译者：陈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 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译有《图绘：女性主义和文化地理的相遇》。



《幸福的秋日田野》“The Happy Autumn Fields”，选自伊丽莎白·鲍恩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tories* (London: Vintage Classics, 2012). Copyright © Elizabeth Bowen, 1944.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Prescott Horn](#) on Unsplash

## 小说

# 来自冲浪者的明信片

海伦·加纳 | 故事群岛

他还站在草地的边缘，  
站在他的领地边缘，远远望着大海。

“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不再爱了，那一晚的我，摆脱了尘世间的种种羁绊，静静地躺着，仿佛生命就这样渐渐离我而去。”

——科莱特 [1]

我们开车从黄金海岸机场 [2] 出发，一路向北行驶。公路边，海水一浪接一浪，起伏不断。身穿黑色紧身潜水服的冲浪者点缀其间，就像一条条穿梭在浪语里的鲨鱼，勇猛异常。“看那些傻瓜。”父亲说。

“他们肯定冻僵了。”母亲说。

“湿式潜水服 [3] 不是可以保温吗？”我说。皮肤和潜水服之间不是应该有薄薄的一层水吗？如此一来，体温……”

“可能吧。”父亲说。

公路在岩石突起处突然转弯。前面几公里路在乳白色的空气里若隐若现，朦胧中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梦幻城市：一座座奶油色，银白色，蓝绿色的塔楼，横空插在建筑群中。

“那是……是布里斯班吗？”我问道。

“不是的，”母亲说道，“那是冲浪者天堂 [4]。”

父亲的车上装有车载电脑。如果超速了，仪表盘就会发出持续不断的警示音。超速报警灯闪烁，他这才右脚松掉油门。前排两个座位之间的中控台可以控制窗户开关。我们开车经过一辆停在州际公路边的“勇士”，后车窗上贴着一个“出售”标识牌。

“看那儿，”母亲说，“车上挂的是西澳大利亚的牌照。估计是颠簸穿越了整个纳拉伯平原，现在打算卖掉了。”

“八成儿是偷来的，”父亲说，“看到车上贴的东西了没？上面写着‘亲，无所作为才是真雏儿’。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个人，脑袋只有一颗豆子那么大。”

离城市越来越近了，很多蓝绿色的塔楼都还没有卖出去。售楼广告牌上写着“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每一座塔楼还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例如卡普里柯尼亚、比亚里茨、碎浪花、阿卡普尔科、里约。

我住在巴黎的时候，交了个巴西朋友。有一次，他给我看了张明信片，图片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里约。画面像是从空中拍摄的：壮观的热带沙滩，沿着海岸线曲折折叠蔓延开来，沙子洁白如雪，周围是一排棕榈树。

“如果巴西真这么漂亮，”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住在那儿？”

“因为，”我朋友回答说，“沙滩的正后方有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轮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看了张印有澳大利亚风景的明信片。那张明信片上印的是澳大利亚印象派画家斯特利通的名画《金羊毛之国》。我把它放在我卧室的加热器上，以慰我的思乡之情。他仔细端详这张明信片。最终，他用红栗色双眼看着我，问道，“这些树

都是红色的吗？”

几年过去了。六个月前，我在拉斯道恩大街的一家旧杂货店搜罗出一盒旧明信片。明信片上有的是戈尔韦潮湿的村舍，有的是泰姬陵酒店在自行车拥堵的科伦坡摇摇欲坠，还有的是明净如镜的加拿大湖被一叶独木舟尾流打破了平静。我找出两张买下，每张一元。一张是里约市区的黑白照片；另外一张是我出生的小镇——吉朗，着色甚是粗略。

摄影师肯定是站在草堤高处，可以俯瞰整个东海滩。拍摄时，他调准镜头，先是对准了一个从来没有水流喷出，拐角处还有一群涉水鸟的喷泉（是鹤还是鹤？我从来没问过父亲：它们的喙尖长，呈橘色，每只鸟都弯着一只腿，好像要向前迈步；穿过喷泉，他的镜头捕捉到了曲线木制步行道。夏天，我们都喜欢从步行道上跳到喷泉中那一泓静水里潜水嬉戏，没有大人监管。然后，镜头越过海湾，落在尤杨斯山上。那是双峰低矮的火山锥，也是耸立在吉朗和墨尔本之间的花岗岩 [5] 平原上唯一的障碍。这两张明信片居然放在同一个盒子里！而我竟然还找到了它们！太神奇了！“雪儿·鲁宾斯，”我写道，“我寄给你的这两张明信片，上面分别是我们的家乡……”

洛娜阿姨去沙滩上散步了。母亲打开大门，推开铁丝网栅栏。她出去告诉洛娜阿姨我回来了。大海就在单元楼的正前方，两者之间距离不到 140 米。人们是怎么确定大陆和海洋之间的界限的，就敢把房子建在海边？白色的浪潮一阵阵袭来。

“十二点整。”父亲说道。

“马上就是午饭时间了。”我说。

“走吧。午饭专门准备了鲜美的冷咸牛肉和新鲜的黑面包。我要尝尝佛手瓜酱汁。你吃过佛手瓜吗？”

“就算绊倒摔在它上面我也不认识。”我说。

“我也一样。”

父亲从厨房墙上的磁力厨具架里挑了一把有锯齿的刀，迅速娴熟地在岛台餐桌上给自己做了一个厚厚的三明治。他全程都全神贯注，一块肉从面包上掉了下来，他马上用一个很夸张的动作把它重新卷起来，下嘴唇还做出很同情的痛苦表情。他用双手拿住三明治，递到嘴边，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吃的时候，他的鼻子里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要不要给你自己弄点吃的？”父亲嘴里塞得满满地说。

我站起来。他用手背把面包片推向我，把剩下的一半三明治放在一个盛黄油和面包的绿色盘子里，拿到桌上。他坐下，双肘撑在松木桌上，双膝大开，全身放松，高高拱起的长脚安稳地放在瓷砖地板上。他一边吃东西，一边注视着外面的大海。整间房子都能听到他吃东西的声音。

母亲和洛娜阿姨从海滩上回来了。我站在玻璃门里面看着她们在水龙头边停下来，冲掉脚上的沙子，然后再穿过草坪，回到屋子。她们俩都有点老了：她们得一只手扶着水龙头，用来平衡左脚，然后冲洗右脚。我知道她们两个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她们看上去虽不年轻却也不显老。她们是我的母亲和洛娜阿姨，两个在我的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人。她们微笑着，推上铁丝网栅栏门。

“不要把沙子踩得到处都是，”父亲坐在桌边说道。

她们不理睬父亲。洛娜阿姨亲了我一下，保持距离抱了抱我，头朝一边。母亲准备了食物，我们边吃边看外面的大海。

“你错过大部队了父亲说，她们大概早上九点就去海滩上了，你肯定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来。她们走路的时候，胳膊甩得老高。”他眼睛朝下看，哈哈大笑起来。

“您也每天去散步吗？”我问。

“每天走六点六公里。”父亲说道。

“您还带着计步器呀？”

“我算出来的，”父亲说道，“朝着那个方向往下走，一直走到那栋白色建筑物那儿，然后调头回来。来回总共六点六公里。”

“我可能会跟您一起走走。”

“如果你愿意，没问题，”父亲说。他拿起盘子，放到洗涤槽里，“我们吃完早饭就走过了。今天你已经错过时间了。”

父亲走到沙发边，打开咖啡矮桌上的报纸。他把眼镜压得很低，双手悠闲地搭在摊开的双膝之间。母亲和洛娜阿姨在收拾盘子。

“附近有商店吗？”我问母亲，“我需要买些卫生棉条。”

“没有了吗？”母亲问道，“购物中心应该有卖的，就是松白特大道上那家，离保龄球俱乐部不远。要我和你一块儿去吗？”

“我自己可以找到。”

“我再也用不到这些东西了，”母亲说的时候压低声音，扫视了一眼房间另一边的父亲，“黑兹尔告诉了我一件可怕的事情，就发生在她本人身上。接连好几天，她身上都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她洗了一遍又一遍，却总也洗不净。最后，她打算去看医生，好在去之前她先蹲下来，对着镜子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下身。她看见一根细线，拉了一下，竟然拉出来一根绿色的卫生棉条。她肯定是忘记取出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搁在里面了。”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只得用茶巾捂住嘴。房间另一头的父亲听到我们的笑声，目光从报纸上挪开，抬头看着我们，脸上带着疑惑的笑容，完全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每次听到母亲说出“散发”这样高大上的词，我总是很讶异。我家有本书叫《英国诗歌概要》，是当年母亲大学入学考试用书。在史诗《夺发记》[6] 旁边的空白处，母亲写了批注：“运用了‘反高潮’的文学创作手法；回忆《荷马史诗》对维吉尔创作的影响；长篇讽刺诗，与《荷马史诗》一脉相承。”四十五年前，她用铅笔写下的简短的笔记手迹，如今仍清晰可见：这我不禁怀疑，我还没出生时，她是个隐姓埋名的天才。

有那么一两次，从家到购物中心的路上，我仿佛在一个篱笆上看到了玫瑰花，就特意跑过去确认，结果发现那只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香味，却开得很丰满的花，于是失望地折回。我又在一块黄色草地旁边，看到一排俊美的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微微垂下头来。但它们也不是玫瑰花，我不认识它们，花朵太大，枝干过于扁平。坐飞机让我还有些头晕目眩。墨尔本还是漫漫冬日，一切都是稀稀拉拉的。

买好卫生棉条之后，我又开始寻找明信片。找到了，摆在一个让人讨厌的高架子上。有好多是蓝色的，再走近一点，我看到五颜六色的照片，有白色的沙滩，沙滩上没有沙丘，



也没有棕榈树，身子半裸的人们惬意地躺在沙滩上，膝盖拱起来。这种姿势频繁出现，在人群里随处可见，看着让人忍俊不禁。大多数明信片上都有 GREETINGS FROM THE GOLD COAST OR BROAD BEACH OR SURFERS（来自黄金海岸或者布罗德沙滩或者冲浪者天堂的问候）字样，饰以金色的浮雕图案写在明信片的一角：我努力寻找不带文字的卡片。随后，我发现有好几张明信片虽然每张都略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上面展示的是一个姿态优雅，玉峰耸立的年轻女孩儿，性感地躺在岩石上：她穿着比基尼，整个头却恶作剧般被人从文创杂货铺买的乳胶面具给遮住了，像强盗在头上套了丝袜一样。这面具的形象是一个可恶狠毒的老巫婆，龇牙咧嘴。我盯着这张明信片看了很久。这张明信片上的图案真就这么简单吗？还是说它背后隐藏了些神秘的记号和标志？我买了十二张写有“GREETINGS FROM”的明信片，上面风景各异，有的是空中景象，有的是地上美景。每张二十五分。

“要信封吗？”那个女孩儿问我。她穿的衣服上有很多花饰，花饰部分一直拉到大腿处，就像一块尿布。

“要的，麻烦你了。”信封上布满彩色地图，还有标识语，和各种澳大利亚动物图片，都快找不到空余地方写地址了，但信封上某种东西吸引了我。我买了一包甘草咀嚼片，在回家路上吃了个精光：一次塞两片，嚼得满嘴都是唾沫。路上没有垃圾桶，我便把包装纸放在口袋里。既然我在这里花了钱，还产生了垃圾要处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已经不再是那个陌生人了。在巴黎，以前街道上常常有标识语这样写道：“生活离不开买卖。”这一点，旅行者都深有体会。

母亲和洛娜阿姨在做针织活。她们悄声说话，其实不过都是些漫无边际的闲聊。父亲用小折刀削尖了一支铅笔，然后把报纸叠成一个便签簿，有原来大幅报纸八分之一那么大。

“纵向第五个，辛辣的肉酱。ASPIC(花色肉冻)。横向第三个，冒牌货。BOGUS(赝品)！搞定！”

“您真厉害，”我说，“BOGUS 这个词我肯定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要不要再挑战一个更难的？”

“噢，那些我可做不来，捉摸不透。”

“做那些，得把《莎士比亚全集》和《圣经》都熟记于心。”我说。

“是的，必须的。如果推出答案，填出来，仔细琢磨，再加以反复训练，就能摸透他们的思维模式了。以前，他们在《周报》上刊登出来的填字游戏都很有挑战性，但也许是被那些做不出来又狂妄自大的人吐槽了吧，他们只得把题目的难度降了下来。”

我还没想好怎么写明信片，写得不好会很丢脸。于是我拿起母亲的毛衣图案样本翻看着。

“那边有几款挺好看的。”她说，“那个带蓬松领子的怎么样？”

“想买毛线织织看吗？”父亲问我。他把做完的纵横字谜扔在咖啡桌上，起身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呷呀，走……吧，小姐。我开车送你去太平洋购物中心。”

我选好毛线，并根据图案点清所需毛线的数量。父亲身子向后仰了仰，眼睛看着毛线：小时候每次看到父亲做这个动作都会把我吓得心惊胆战，但是现在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是远视眼。

“纯羊毛的，是吗？”父亲问道。他只要一摸，就知道是不是纯羊毛的。他一边用手摸着毛线，一边看着我。

“不是纯羊毛，”我答道，“里面掺了些人造纤维。图案书上说就是要用这种毛线。”

“你为什么不……”他不说了。要是以前，父亲肯定会阻止我买这样的毛线。他用粗笨的双手把还带着体温的羊毛远远地扔到油腻腻的桌子上。他双手放在羊毛上，看上去没感觉似的，其实只要他用手梳理一下羊毛，他就能准确地评判它，给羊毛分类，标记羊毛的纯度以及要发往的目的地：意大利、瑞士，或者日本。父亲到家时，手掌上深深地扎了几根刺。他耐心地站在那儿，等母亲用针把它们挑出来。每当到了该剪羊毛的时候，他就会开着一辆有脚踏板的黄色小轿车去乡下的大棚屋。我们踩在脚踏板上，他开车一直把我们带到街道的拐角处，然后我们蹦蹦跳跳回家去。他去墨尔本展会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休闲。有一次回家，父亲给我买了一只塑料小喇叭。“孩子，”他这样叫我，把我带到码头，说道，“看到那根绳子了吗？那不是绳子。那是系船索。”“系船索，”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想让他知道我认真听他说话了。我们手拉手，走在斯特罗恩大道上，在这一带逛游。“你听，”父亲说，“电线里有风的声音。”那时的我肯定还很小，电线那么高，我根本不记得看到过它们。

他目光移走，不再看那些蓬松的粉红色毛线团儿，双手插在口袋里等我结账。

“您在那儿待了一天都做什么了？”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

“唔，打了会儿保龄球，然后看了看房地产新闻。打电话给推销这些花里胡哨的房子的房产商，咨询了些问题。我让他们一再降低价格，想看看他们最低能降到多少，看看他们到底能给多少折扣。”他开车时就像开小卡车的农民一样，身体前倾，双臂弯曲，扶住方向盘，总是想要透过挡风玻璃斜视天空，看看天气情况。

“他们没问您的名字吗？”

“问了。”

“那您是怎么说的？”

“杰克逊，如此之类。”他看了我一眼。我们笑了起来，随即扭头看向别处。

“全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父亲说，“豆腐渣工程。可悲啊！‘极尽一切奢华之能！’他们只知道追求奢侈，真是无药可救了。走吧，我们上去，你可以自己看看。”

比亚里茨的电梯里铺着蘑菇色的地毯。我们背靠电梯壁，电梯带着我们迅速上升。样板房里的销售员嘴唇上有一撇小胡子，手腕上戴了好几个金手镯，穿着米黄色的西服，胸前抱着一个写字夹板。他正忙着给一对老夫妇介绍，我们就直接越过他，径直走向客厅。

“看到那个人了吗？”父亲嘘声说到。

“一个纨绔子弟。”我说，“他们目光迟钝，脑袋扁平，根本就不会用大脑思考。”

他看起来很吃惊，还以为这些话都是我现场编出来的呢。“那是《铁皮人》[7]中的诗句。”我赶紧补充道。

“我只记得他写的《吉邦马球俱乐部》。”父亲说。他模仿了一个斜靠在马背上和用力挥动球杆的动作。我们扑哧一声笑了。客厅门口矗立着五根爱奥尼亚柱，呈弯月形排列着。除了这些柱子，透过玻璃还可以看到一条小河和山峦。小河在平原上蜿蜒流淌，山峦连

绵起伏，层峰迭起。

“从另一边可以看到大海。”父亲说。

“您会在那儿享受余生吗？”

“绝不。我生活的地方不能有这些容易着火的柱子。”

透过卧室窗口，他指向另一处靠近大海的高楼。那栋楼叫切尔西。外形就像一艘战舰，带点儿红色饰边，窗户背对着大海。楼高大狭窄，但是外形长宽比例均匀，不过看上去有点儿像监狱。”我不介意住在那栋楼里。”父亲说。我默默地看着那栋楼。他特意选了那栋外形丑陋的大楼，我无话可说了。

现在是星期六下午。父亲正等着看维多利亚足球赛。他看了看报纸。

“你看，”父亲对母亲说道，“孩子妈妈，还记得我们去过的那个钻石投资研讨会吗？”

“在那儿？”我说，“研讨会？”

“说是只要投资，六天价值就会翻倍。一天下午我们去了。毋庸置疑，全是一帮骗子。呃，一看就知道是他们设的一个大骗局。他们还准备了雪利酒和三明治。”

“其实，我们也就是奔着雪利酒和三明治去的。”母亲说。

“都什么样的人去了？”我问。

“嗯……就像我们这样的。”父亲说。

“您觉得真有人会投资吗？”

“当然啦，都是些笨蛋。来看看今天《时代报》上是怎么说的。‘钻石梦幻时光。世界钻石市场遭遇滑铁卢。’嚯嚯嚯！”

父亲打开电视刚好赶上比赛开始。我也开始按照图案针法织起毛衣来。母亲和洛娜阿姨的编织技术早就炉火纯青了。她们替我姐姐那几个十几岁的孩子织的毛衣，图形可复杂了。她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自说自话，有时听上去像在一问一答，有时又像是各说各的。父亲则在一边喃喃自语，时而低声说着球员应该怎么踢，时而发出一阵阵轻蔑的笑声。

“真是十足的笨蛋。”他说。

现在我要和洛娜阿姨住一个房间。我走进房间，取出一包明信片。刚拿出笔和邮票，在桌子边坐下，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用比电视里球迷的欢呼声还响的声音，冲我大吼。

“这不织啦？”

“织啊，只是暂停一下，写几张明信片。朋友肯定都希望收到从昆士兰寄去的明信片。”

“你也该和你的老朋友多联系联系，孩子爸爸。”母亲说。

“我一会儿就织。”我说。

“织了多少了？”父亲问。

“这么多。”我边说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

“亲爱的菲利普，”我写道。我尽量写得简短一些：明信片的背面，是一种艺术形式。“猜猜我在哪儿。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作曲家，冲浪回来，浑身湿透，踉踉跄跄走在一栋楼房边的小路上，就像所有作曲家一样，看起来失落焦急。我父母含糊不清地咒骂着。回去整整齐装再出来吧！”

“亲爱的菲利普，识别鱼和鸟，我父亲是这样说的：‘看那些信天翁，它们的眼睛能看到百米之外。看它们潜水。砰！随着一声巨响向下俯冲！我说：‘它们潜水性能捉到什么样的鱼？’父亲说：‘牙鳐，它们只吃牙鳐。’我说：‘才不是呢！’父亲说：‘我怎么会知道它们吃什么样的鱼？’”

“亲爱的菲利普，我父亲说那些鸟是信天翁，但是后来我母亲（那会儿她在浴室）告诉我，信天翁的脖子要短些，并且常常缩着。”

“亲爱的菲利普，我和洛娜阿姨住一个房间。她也在写明信片，刚刚还问我怎么写呢。我非常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让雾弥朗朗局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去猜吧。洛娜阿姨说，‘我就不在信封背面写我的名字。’”

“亲爱的菲利普，（在邮局外面）母亲去信箱那儿取信了，父亲、洛娜阿姨和我在车里等她。父亲说：‘上帝啊，真令人吃惊，是不是？那些人都干什么的？看到那边的标识了没，上面写着入口，但是箭头却是向上指着的是？那是什么意思？搞笑的吗？还是某个傻瓜在那儿犯傻？我打赌那个女人已经在电话亭里待了半小时了。要是你，你会怎么样？干等在电话亭外，站在太阳里，眼睁睁看着一个傻瓜在里面跟人没完没了地侃大山？而你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急着要用电话。这事儿还真摊上过，有一次，在……母亲打开车门上车了。‘有三封信，’母亲说，‘都是寄给我的。’”

有时候我的小故事一张明信片写不下，还得再用一张。这就意味着我还得再想一个小故事，或者写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把第二张明信片填满。

“我（打开橱柜）：‘哈！拼音游戏！喝完茶，我们可以玩拼音游戏！’父亲（轻蔑地一笑）：‘我都快等不及了！’”

“亲爱的菲利普，我知道你不会回信。我甚至都不确定我写的这个地址你是否还能收到。”

“亲爱的菲利普，一个星期六早上，我去科尔买了条围巾，花了四先令六便士。我对这笔买卖相当满意。父亲从我手中一把拿过围巾，看了看标签，说道中国制造。是真丝的吗？我们来鉴定一下。”说着他轻轻打开打火机，我们顿时都尖叫起来。这时母亲说：‘没事儿，你父亲逗你玩儿呢！’”

“亲爱的菲利普，十四岁那年，有一次吃晚饭，我伸过头去等父亲亲一下我的脸颊，可是他却赤手打了我一巴掌。接下来就只有沉默。弟弟高声傻笑起来，我也笑了，满是震惊。他又打了我一巴掌。洗完餐盘后，父亲把我叫了过去。他坐在扶手椅里，眼睛朝下看着。我们之间再也处不来了，’父亲说，‘主要是因为我們太像了。’这些话让我感到厌恶，我把浮肿的脸转向一边。我的脸肿了是因为我伤心哭的，而不是他打的，心里头伤心比他实实在在的打我一巴掌带来的伤害更大。”

“亲爱的菲利普，几年后，他看了我的信，发现我买避孕药，就径直开车到墨尔本，找到我，并强行把我带回家。他说我应该去看精神病医生。当时我坐在车前排，母亲坐在后排。我心想，“如果我打开车门，跳下去，就再也不用听他的这些话了。”母亲竭力维护我，但他呵斥了母亲。“这都是你的错，”他说。“就是因为你对她太溺爱了。”

“亲爱的菲利普，我知道这些你之前都听过，我也知道还有其他人有比我更悲惨的经历。”

“亲爱的菲利普，几年后，他又问了我一个很私人的问题。那时他在开车，我仍然坐在前排那个随时可以跳车的位子上。‘发生什么事了，’他问我，‘你和菲利普之间？’我又一次把

脸转向一边。‘我不想说这件事。’我说。又是一阵沉默。后来，他再也没问过。又过了好多年，在巴黎上班路上的一家咖啡馆，距离父亲万里之遥的地方，我又想起了他问过我的那个问题，不禁哭了起来。亲爱的菲利普，我原谅你做过的一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母亲、洛娜阿姨和我沿沙滩漫步走到冲浪者天堂。退潮了：我们光脚踩在沙滩上，几乎看不到粗砂砾。母亲和洛娜阿姨的声音持续不断，一个高，一个低。我说话，她们就假装听听，就像我一样，也假装听她们无止境拉扯闲聊：这是我们的礼貌：这就是爱。什么都说，又什么都没说。回去的路上，我指着橙色烟雾状的云给她们看，大量云朵聚集向海上漫游，最后消失在海平线。她们很自然地停下来，看着海水。我们三个站成一排，洛娜阿姨穿着漂亮的连衣裙，手里拎着凉鞋晃来晃去，我和母亲则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有一次，我问了我那个巴西朋友一个愚蠢的问题。他当时正在听我跟一个法国男人聊我们国家各自的选举制度。他只听不发言，我想让他也加入进来，于是问他，“你家乡那里是怎么选举的，鲁宾斯？”他微笑着看了看我，答道，“我们压根儿没有选举这事儿。”里约在这儿的哪个方向？“快看那些云！”我说，“你肯定以为那里另外一个城市着火了，是不是？”

天快黑的时候，天空呈现出火红的颜色，还带着亚热带的湿气。我走出栅栏门，把杜松子酒放在篱笆桩上，倚靠着篱笆，远眺大海。再过一会儿，月亮的银辉就会洒向海平面。如果要我画一幅海平面的画，我想我会画一排摇曳的倒 V 形，因为这就是我眼中海平面的样子。平坦的海平面蕴含无穷智慧。突然，我身后二楼落地阳台上响起“砰”的一声开瓶塞声。我抬头瞥了一眼，在昏暗的夕阳下，两个唇上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正朝我微笑。“今晚喝香槟？”我说。

“听起来不错，不是吗？”其中一个拿着瓶子的男人说道。

我回过头继续看月光还没照到的海平面。去年，我去墨累河露营了。在世界滑翔机飞行爱好者的天堂——托克姆沃尔买了些明信片。我得快点儿写了，天色慢慢变暗，树上还时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敬爱的父亲，”我写道，“我在墨累河露营，现在坐在篝火边。天快黑了，但早些时候，这儿还是很美的，太阳西沉，露珠出现。”两个星期后，我在家收到了父亲费力、快速手写的字体倾斜的回信，每个字母都带一个向上的勾锋。回信中他挂念我钱够不够用，半张四开本纸上就写了两句话，但是在信封背面，父亲还匆匆写了一句话：“附：露水不会出现，露水形成。”

月亮从海面上升起，挂在单元楼正前方，和橙子一样圆滚滚的。楼上的一个小孩也看到了，发出一声长长的狼人嚎叫声。母亲做好饭，我们饱餐一顿。“帮你母亲刷刷盘子好吗，大小姐？”父亲坐在扶手椅里说道。我肩膀僵硬。的确如此，但我还是去了。我躺在沙发上，翻看过期的美国女性月刊《健康之友》[8]。摩纳哥公主卡罗琳身穿黑色晚礼服，头戴宽边白帽。编织针交叉发出轻微的响声。父亲和洛娜阿姨来自同一个小镇——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南马里地区的霍普敦。新闻结束后，他们又开始聊起来。

“我一直记得人们的车，”父亲说，“有一辆四缸道奇，是那个谁的来着。车子有……”

“那不是奥拉克伦家的车吗？”洛娜阿姨说道。

“对噢，是金奥拉克伦家的，车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排气筒，记得有一次我塞了个土豆到里面。”

“土豆？”我说。

“那家伙是政委会委员。”父亲说，“他走出会议厅大楼，上车，启动。开出去不到 50 米，只听哧的一声响，土豆从排气筒飞射出来——我记得车没坏，还能开！”他突然闭嘴，头后仰靠在沙发上，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我走过比亚里茨，灯光下灌木丛暗影浮动，半空的塔楼上，富人们从几个零星的阳台里探出头来，浸没在奶油色的空气里。一个赤脚男子从一个外卖店走出来，手上拿着汉堡包。他靠着墙，把汉堡的外包装纸撕开，刚好看到我在信箱那儿犹豫不决，手里拿着明信片，借着公共电话亭里微弱的灯光，读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再改来不及啦。”他冲我喊道。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咧嘴一笑，点点头，紧接着咬了一口汉堡。信箱旁边有一个很深的垃圾箱，垃圾箱上的盖子是活动的。我猛地打开垃圾箱，把明信片扔了进去。

整晚我睡得还算安稳。海浪咆哮嘶叫，砰砰撞击礁石。洛娜阿姨睡觉打鼾，我拽了一下她的毛毯角，她叹息了一声，翻了个身，鼾声变轻。早上，初升的太阳照到前窗，耀眼的阳光洒进来，白色的窗帘挡也挡不住。一切都是粉扑扑，金灿灿的。洗澡槽里潜伏着一只蟑螂。我试图用一杯水把它冲入下水道，但是它顽强抵抗。空气明媚，泛着奶白色的水雾。父亲已经起床了：壶里的水开始沸腾，他还站在草地的边缘，站在他的领地边缘，远远望着大海。



海伦·加纳

澳大利亚著名小说作家和非虚构作家。1942 年生于澳大利亚吉朗。她创作了多部小说，有《毒瘾难戒》《小天地中的大世界》《孩子们的巴赫》等，并为此斩获多个奖项。她还是澳大利亚最受赞誉的非小说创作作家之一，并于 1993 年获得沃克利新闻奖。2006 年，海伦·加纳获得墨尔本文学奖。她现居墨尔本。

译者：胡小兰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英语翻译硕士学位。热爱文学，曾在第二十六届“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汉译英比赛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来自冲浪者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Surfers”）选自海伦·加纳同名短篇小说集。  
Copyright © Helen Garner, 1985

###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1] 科莱特（1873—1954），法国女作家。其作品《吉吉》《花事》《谢里宝贝》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2] 黄金海岸机场位于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机场之一。成立之初，机场只提供布里斯班和悉尼之间的航班。

[3] 湿式潜水服由发泡橡胶或尼龙布制作，必须合身贴于皮肤，进入的少量水在潜水服与皮肤之间呈不流动状态以保持体温。

[4] 冲浪者天堂指的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濒临太平洋，拥有长 75 公里的海滩，是全世界最长的沙滩海岸。

[5] 尤杨斯（You Yangs）是一系列花岗岩山脊。此处原作有误（原作写的是玄武岩）。

[6] 《夺发记》是亚历山大·蒲柏 1712 年写的长篇讽刺诗。这首诗描写一家男孩偷剪了另一家女孩的一缕金发，此事引起两家的争执。蒲柏把此事描写得和《伊利亚特》中特洛伊战争一样壮观，成了一部英雄史诗。

[7] 《铁皮人》是澳大利亚丛林诗人班乔·帕特森的一首诗。于 1892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发表在《公报》上发表。《吉邦马球俱乐部》是他的另一首诗，于 1893 年首次发表在《对映》上发表。

[8] 《健康之友》（Woman’s Day）是一本美国女性月度杂志，内容涵盖家务，食品，营养，身体健康，身体吸引力和时尚等主题。





图片来自 [Dan Novac](#) on Unsplash

## 小说

#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赫塔·米勒 | 发现经典

瞧瞧我们吧，  
保罗说，别妄谈什么幸福。

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

我被传讯越发频繁：周二上午十点整，周六上午十点整，周三或者周一。仿佛几年就是一周似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夏末一过，冬天又即将来临。

在去有轨电车的路上，结着白色浆果的灌木丛又从篱笆上垂挂下来了。犹如下面被缝上的珠光纽扣，也许一直长到地里，或者犹如小馒头。对转动鸟嘴的白色鸟头来说，这些浆果太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到白色鸟头。想得人直犯晕。我宁愿去想草地上那点点积雪，可一想到积雪，人就无望了，而想到粉笔，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有轨电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刻表。

有轨电车尽管不是叶子质地很硬的杨树，但我还是觉得它在呼呼作响。车子驶近，今天它会马上把我带走。我本来打算让戴草帽的老人先上车。我到达车站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谁知道他究竟等了多久。虽然他并不显得老弱，但像影子一样瘦长，驼背而且有气无力。他的裤子里没有屁股，没有髋部，只有膝盖鼓起来了。可是，既然偏偏现在他在车门打开时往地上吐唾沫，我只好在他前面上车了。车里几乎所有的座位都空着，他的眼睛往车厢里扫视一遍，然后他就站住不动了。年龄这么大，却不觉得累，不是因为无法坐下来而站在那里。人们时而听到老人们说道：到了墓地，有你躺着的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死亡，他们说得也对。这种事永远不会跟着顺序走，也有年纪轻轻说走就走的。只要不必站着，我总是会坐着。坐在座位上行驶，仿佛坐着可以走路一样。那个人打量我，车厢里空荡荡的，你马上就会感觉得到。我没有空闲的脑袋可以说话，否则我倒要问问，我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才不会去想，是否他的观瞻打搅了我。外面，半座城市从我身旁走过，在树林和房屋之间不断地转换。有人说，老年人的感觉要比年轻人的更多。或许甚至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的手提包里放上了一条小毛巾、一支牙膏和一把牙刷。但我没带上手绢，因为我不想哭。保罗没有察觉到，当阿布今天有可能将我带到他办公室下面那个小房间时，我有多担心。我什么话也不跟他说，如果果真如此，恐怕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有轨电车开得很慢。老人的草帽上有一根脏兮兮的带子，可能是被汗渍或是雨水弄成这样的吧。阿布每次和我打招呼，总是用唾沫吻我的手。

阿布少校将我的手举到他的指尖处，压住我的指甲，差点儿让我大吼一声。他用下唇吻我的手指，留出上唇和我说话。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吻我的手，但说话时却总是说不同的话：啊哟，你的眼睛今天发炎了。我觉得你长胡子了，在你这个年纪有点早了。嘿，你的小手今天冰凉，但愿不是循环系统有问题。哎呀，你牙龈萎缩，好像你是你奶奶一样。我奶奶没有活到很老，我说，她还没到掉牙的年龄就走了。阿布想知道我奶奶的牙齿，所以才提及这个问题。

女人知道自己今天该有怎样的外表。而且行吻手礼的时候，第一不能痛，第二不能湿，第三应该吻在手背上。至于吻手礼如何做，男人比女人知道得更清楚，阿布当然也是。他的整个身体散发出“艾薇儿”香水的味道，这是一种法国香水，我的公公，那个香水共产党员也使用这种香水。可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并不会购买这种香水。这种香水在黑市上的价格要比商店里的一套西装还贵。或许它叫“九月”香水吧，这种树叶燃烧后带苦涩的有烟熏味的气味我可是不会搞混的。

我坐在小桌子旁的时候，阿布注意到我在裙子上擦手指，我不仅是为了重新感受这些手指，而且也是为了擦掉上面的唾沫。他转动他的印章戒指，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我也无所谓，唾沫是可以擦掉的，它们甚至还会自动晾干，而且没有毒。每个人的嘴里都有唾沫。其他人在人行道上吐唾沫，然后用鞋子踩掉，因为唾沫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人行道上。阿布当然不会往人行道上吐唾沫，在这个人们不认识他的城市里，他扮演的是谦谦君子的角色。我的指甲很疼，但他还从没有把它们压到发紫的程度。它们重新活跃起来了，好像冰冷的双手突然有了温暖一样。我觉得如果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脑子晕乎乎的，那才叫惨呢。假如感觉全身赤条条的，那就是耻辱啊，难道还能以别的言辞描述吗？只是，倘若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倘若最好的话也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

从今天凌晨三点开始，我就侧耳细听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保罗在睡梦中横踩整张床，突然抽搐了一下，动作迅猛至极，尽管没醒来，却把自己吓了一跳跳。这是一种不良习惯。我也睡意全无了。我醒着，知道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重新入睡。可我没有闭眼。我常常荒废了我的睡眠，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入睡。这个做起来轻而易举，或者根本做不到。凌晨时分，万物沉睡，连猫狗在垃圾桶周围也仅仅溜达至半夜就歇脚了。要是知道自己睡不着觉，那么与其徒劳地闭着眼睛，还不如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想着那些亮堂堂的事情来得更轻松些呢。想到大雪纷飞，白雪皑皑的树干，白色的屋子，许多的风沙——我很高兴盼望天明，就这样常常消磨了时光。今天早上，我照例可以想到向日葵，并且也如愿以偿了，可是忘记我上午十点整被传讯的事，对此我无能为力。自从闹钟响起“传讯”“传讯”“传讯”的嘀嗒声以来，我不得不首先想到阿布少校，之后才会想到保罗和我自己。今天，保罗抽搐的时候，我已经醒来。当窗户灰暗的时候，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阿布的大嘴巴，和下面那排牙齿后面的粉红色舌尖，听见了那个挖苦的声音：

为什么你要失去控制能力呢，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只有当我两三周不被传讯的时候，我才会被保罗的大腿弄醒。然后我就很高兴，证明我重新学会如何睡觉了。

我重新学会睡觉后，每天早上都要问保罗：你做过什么梦了。可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给他比画，他如何叉开脚趾乱踢乱蹬，然后迅速收回大腿，再弯曲脚趾。我把桌子跟前的椅子拖到厨房中央，坐下来，两条腿腾空，把整个动作演示一遍。保罗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说：

你在笑你自己呢？！

哦，是啊，可能我在梦中开着摩托车带你外出呢，他说。

抽搐像是向前飞奔然后中途逃跑一样，我自认为是他喝酒的缘故。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也不说黑夜带走了保罗大腿的摇摇晃晃。想必就是这样，黑夜抓住他的膝盖，首先拉住他的脚趾，然后走进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然后在凌晨，当城市完全为自己沉睡，并且踏进外面大街的黑色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醒来的时候不可能是笔直站着的。如果夜夺走了每个人的酒瘾，那么到凌晨时分，它肯定会酩酊大醉了。城里喝酒的人太多了。刚过四点，下面商业大街的送货车已经来了。它们打破了宁静，发出隆隆声响，这种小卡车装货不多，几个箱子里装着面包、牛奶和蔬菜，很多箱子里装着白酒。如果楼下那里没有饭菜，女人和孩子们还能够勉强接受，排的队伍顿时如鸟兽散，人们纷纷回家。可是，如果没有了酒，男人们便开始诅咒生活，拔出匕首。店员们尽管在劝说他们，可只有到了店门外，他们才肯罢手。他们四处寻找着，在城里游来荡去。由于找不到白酒喝，第一拨人开始斗殴起来，第二拨人因为烂醉如泥，也开始斗殴了。

这种白酒生长于喀尔巴阡山和丘陵地区贫瘠的平原之间。那里因为有李子树生长，那些小村庄几近被隐没了。森林葱茏，到了夏末成了一片蓝色，枝丫弯曲。白酒的名字和丘陵的名字一样，可没有人使用标签上的名字。它根本就不需要名字，当地就这一种白酒，大家都根据标签上的图片给它取名：两棵李子树。男人们对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的熟悉程度，正如女人们对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一样。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在我的眼里，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更多地像是结婚照，而不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教堂的任何照片中，孩子的头不可能和母亲的头一样高。孩子额头靠在圣母的脸颊上，他的脸颊靠在她的脖子上，他的下巴靠在她的胸脯上。此外，酒鬼和酒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

和保罗拍的结婚照上，我既没有佩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爱情在我的眼里重新闪闪发光，可这是我第二次嫁人的结婚照。我们的脸颊就像两棵李子树一样相依相偎。自从保罗开始酗酒以来，我们的结婚照就是预言。保罗在城里的各个酒馆里喝酒至深夜，我总是担心他再也回不了家，于是长久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直至目光开始迷离。我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脸颊的位置变了，我们的脸颊之间有了一点儿缝隙。绝大多数情况下，保罗的脸颊和我的脸颊分隔开，仿佛他是深夜回家的。可他回来了，保罗还依然回家，甚至在发生那次事故后同样如此。

有时候，送货车送来了波兰的野牛草伏特加，那种甜酸相加的黄色伏特加。这种酒总是最先被卖掉。每只酒瓶里都有一根长长的禾秆淹没在酒里，倒酒的时候禾秆会抖动不止，但从不会倒出来。酒鬼们说：

野牛草在酒瓶里，仿佛灵魂在身体里，所以它保护灵魂。

嘴巴里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和脑子里那种蠢蠢欲动的酒瘾，都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仰。酒鬼打开酒瓶，杯子里听到倒酒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第一口酒流进脖子里。灵魂始终在颤抖，它从不会倒下，也从不会离开身体，它开始受到保护。保罗也在保护自己的灵魂，随便哪一天都不必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法抓住的。或许没有我会过得很好，可我们喜欢在一起。白酒夺走白天的光阴，夜晚赶走酒瘾。当我大清早就不得不去服装厂时，我就知道工人们说过的话：人通过那些小轮子给缝纫机的传动装置加润滑油，通过脖子给人

的大腿加润滑油。

那时,我和保罗每天凌晨五点半整开着摩托车上班。我们看到商店前面的送货车,那些司机、箱子搬运工、店员和月亮。此刻,我听到的只有嘈杂的声响,我没有到窗口去看,也没有去看月亮。我还知道,月亮就像一只鹅蛋离开城市到天的一边去了,而在天的另外一边,太阳正冉冉升起。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认识保罗以及步行至有轨电车之前,也是如此。天上有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地上有没有禁止人们仰望的法律,我在人行道上不好说。应该允许人们从日子中找点乐子,免得日子在厂里变得令人生厌。因为我总是看也看不够,我冻得够呛,并非因为我穿得太单薄。月亮这时候不见踪影了,到了城市的尽头不知往哪儿去了。天亮的时候,天空必须放开大地。大街在地面上陡峭地跑上跑下。有轨电车间宛如灯火通明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行驶。

我对有轨电车间里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这时候上车的人,如果穿着短袖衣裳,带着一只破旧的皮包,两只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懒散的目光遭受了谴责。那是我们自己人,工人阶级。上档次的人都开着小车去上班。于是人们可以彼此比较了:这个上档次的,那个不上档次的。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是没有的。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工矿企业马上就到了,被打量的人依次下车。鞋子很干净或者有灰尘,鞋跟笔直或者磨斜了,领子刚熨烫过或者皱巴巴,指甲、表带、腰带的搭扣、头发的头路,一切印证的是妒忌或者蔑视。什么都逃不过那些睡眼惺忪的眼神,哪怕在拥挤的人群中也不会。工人阶级寻找差异,早上没有平等。太阳在车里和我们同行,外面正是中午时分,烈日暴晒,红白相间的云彩挂在天空的高处。没有人穿夹克衫,早上寒冷意味着空气清新,因为到了中午,就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时候。

如果我不被传讯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睡上几小时。白日觉是平淡而黄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我们烦躁不安地睡觉。太阳落到我们的枕头上,但人们也可以缩短白日的时光。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被人观察得够多了,白日不会离我们远去。就算我们差不多一直睡至中午时分,人家也总是可以指责我们什么。人家反正一直可以指责我们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人在睡觉,但日子在等待,一张床也不是另外一个国度。唯有我们躺在莉莉身边时,他们才会放过我们。

当然保罗也必须通过睡眠醒酒。一直到了中午,他的脑袋才能固定在脖子上,他的嘴巴才能重新说话——不是以一种酒醉的声音说话。只有他的呼吸还散发出味道,当保罗进厨房时,好像我不得不从下面敞开着的酒吧门口路过一样。从春天开始,法律对饮酒时间作了调整,十一点之后才允许饮酒。但酒吧总是在六点就开门迎客,而到十一点之前白酒放在咖啡杯里,过了十一点就用酒杯喝酒了。

保罗一喝酒,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用睡眠醒酒醒来后又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大约中午时分,一切将恢复如初,然后重新开始堕落。保罗保护自己的灵魂,直至酒瓶里只剩下野草,我也在苦思冥想,我们是谁,我和他,直至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们中午时分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那么谈论昨天的酗酒问题是错误的。然而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说上一两句话:白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你为何要让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呢。

昨天你的醉意比这里的厨房还大。

是啊,房间很小,我也不想躲开保罗,但如果待在家里,白天我们往往就会坐在厨房里。他到了下午就已经醉了,晚上醉得还要凶。他因为会生气,我推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我通宵达旦地等待他重新清醒地坐在厨房里,他的额头下面长着一双容易流泪的洋葱眼睛。我后来说过的话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我希望保罗会承认我说的话是对的。可酒鬼们是不会坦白的,不会默默地为他们自己坦白,也早已不会为等待的他人强作坦白了。保罗一醒来就会想到喝酒,但不承认这一点。因此没有任何真相可言。每当不是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时,他就会一整天地和我说道:

别担心,我喝酒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这酒对我的胃口。

可能是这样,我说,你用舌头思考。

保罗透过厨房窗子朝天空仰望,或者往杯子看去。他将桌上咖啡渍轻轻擦掉,好像必须确认滴出的咖啡很湿,一旦往上一涂抹,痕迹就会变得更大。他拿起我的手,我透过厨房窗子朝天空仰望往杯子看去,我也把桌上的所有咖啡渍轻轻擦掉。那只红色瓷釉盒看着我们,我报以回望。保罗没有去看,否则他今天一定会做些不同于昨天的其他事了。他此刻很强大还是很软弱,如果他沉默不语,就不会说今天我不喝酒之类的话了。昨天保罗又说:别担心,你老公喝酒,是因为这酒对他的胃口。

他拖着两条腿走过过道,声音时而太沉,时而太轻,仿佛泥沙和间隙混杂其间似的。我搂住他的脖子,抚摸他的短胡子,每当早上我最喜欢碰触他的胡子,因为它们在做梦中长长了。他将我的手拉到他的眼睛下面,我的手滑到他的脸颊直至下巴。我没有将我的手移走,我只是想到了这一句话:

你如果看到过两棵李子树的图片,那就不该相依相偎了。

我喜欢上午晚些时候听到保罗这么说,但这句话我不喜欢。如果我恰好挪动身子离开他,他就会把他的爱情虚掩着,它如此赤裸裸地出现,他根本不必再说些什么了。他用不着等待任何东西。我的赞同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嘴里再也不会冒出指责的话来。他的脑袋也马上变形了。我没有看到这个挺好,我想我的脸将会愚蠢而明亮。昨天早上,由于酩酊大醉后难受,一只猫鼻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保罗的脸上,并以柔软的爪子潜行。你的人,他只是如此说道,他脑子贫乏,唇角露出自豪的神色。尽管中午的温柔可以为夜晚的酗酒铺平道路,但我还是指望这一点,而我又不喜欢自己利用这种温柔。

阿布少校说:人们看得到你在想什么,你想要否认毫无意义,我们失去的只是时间。我,不是我们,他反正是在上班呢。他将起袖子,瞧瞧表几点了。时间,它在表上面,但我的所思所想并不在上面。如果保罗看不到我的所思所想,他早就不会去看时间了。保罗睡在床里面靠墙那一侧。我睡在外侧,因为我常常睡不着觉,可是他醒来后老是这么说你躺在床的中间,把我挤到墙上去了。

我于是说:

这个不可能,我外侧睡觉的地方像晾衣服的绳子那么细长,睡在中间的是你。

我们可以一个人睡在床上,另一个人睡在沙发上。我们尝试这么睡过。一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晚上保罗睡在沙发上,两个晚上我只是不停地辗转反侧。我在不断地思考问题,

到了早上在半睡半醒之间做了很多噩梦。两个晚上全是噩梦,整个白天我的脑子里还是被噩梦缠绕不休。我一躺到沙发上,我的第一任丈夫就把行李箱放在一座大桥上,然后抓住我的脖子哈哈大笑。接着,他朝河水望去,吹一首为爱心碎的小调,河水漆黑一片。其实河水并非漆黑一片,我看到过河水,看到过他的脸在水里,垂直倒置在砾石遍布的河底。然后,在茂密的树林之间,一匹白马在吃杏子。每吃一口杏子,白马都抬起头来,像人一样将石子吐出。当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有人从背后抓住我的肩膀说:

别回头看,我不在。

我并没有转过头去,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斜视。莉莉的手指抓住我,她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不是她的声音。我举起手来碰她。这时那个声音说:

你既然看不见,也就无法摸得到。

手指我看到了,那是她的手指,只是另有一个人抓住了她的手。但我看不到那个人。而在第二个梦里,我爷爷在给一棵被大雪覆盖的绣球花树修剪枝叶,对我嚷道:你快过来,我这里有一只绵羊。

雪花落在我的裤子上,爷爷那把剪刀将那些上面冻成棕色斑点的花朵剪下了。我说:

这又不是绵羊。

这也不是人呀,他说。

他的手指冻僵了,只能缓慢地打开和关上那把剪刀。我不敢肯定,究竟是那把剪刀还是他的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将剪刀扔到了雪地里。剪刀淹没了,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到了哪里。他满院子地搜寻,鼻子上全是厚厚的雪花。我在院门旁边踩到他的手了,于是他耸起鼻子,但并没有走出院门外,到白茫茫的整条大街上搜寻。我说:

你该住手了吧,那只绵羊被冻死了,羊毛都被冻僵了。

院子的篱笆边上还有一棵绣球花树,上面的枝叶已经被剪得光秃秃的了。我朝那边一指:那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糟的,他说,它春天就要生崽了,这可不行啊。

第二个晚上一过,保罗大清早就说:

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我们夜里应该一起睡觉。谁知道他做过什么梦,马上又把梦忘记得一干二净。他说这是睡觉,不是做梦。今天凌晨四点半,我看到保罗在灰蒙蒙的光线下睡觉,一张脸走样了,还有一只双下巴。下面的商业大街上有人在骂骂咧咧,大清早地发出大笑声。莉莉曾经说过:

咒骂把罪恶驱除。

傻瓜,把脚拿开。弯下身子,难道你鞋子里有大粪吗?张开你的狗耳朵,你听听,不过不要在起风的时候飞走。发型随它去吧,我们还在卸货呢。有一个女人像母鸡一样发出短促而嘶哑的咯咯声。车门发出砰砰声。抓住,蠢猪,如果你想偷懒不干活儿,去疗养院好了。保罗的衣服躺在地上。橱门的镜子上贴着今天的日子,是我被传讯的日子。我站在那里,右脚先着地,每次我被传讯的时候总是这样。我不知道是否我相信这一点,但肯定不会颠倒过来。

我很想知道的是,在其他人的那里,他们的脑子是否负责理智和幸福。在我这里,脑子只够用来创造幸福。用来创造生活是不够的。无论如何不是用来创造我的生活。我已经满足于这种幸福,尽管保罗说过,幸福是没有的。每隔几天我说:

我过得挺好。

保罗的脑袋无声而笔直地出现在我面前,它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们拥有彼此不再有效一样。他说:

你过得挺好,因为你忘记在其他人的那里它意味着什么。

其他人说他们过得挺好时,或许他们指的是生活。我指的只是幸福。保罗知道我并没有满足于生活,我也不想说,还不想这么说。

瞧瞧我们吧,保罗说,别妄谈什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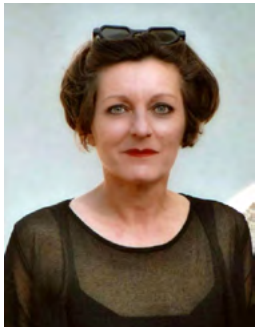
本文摘自《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德】赫塔·米勒  
沈锡良 译  
后浪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 赫塔·米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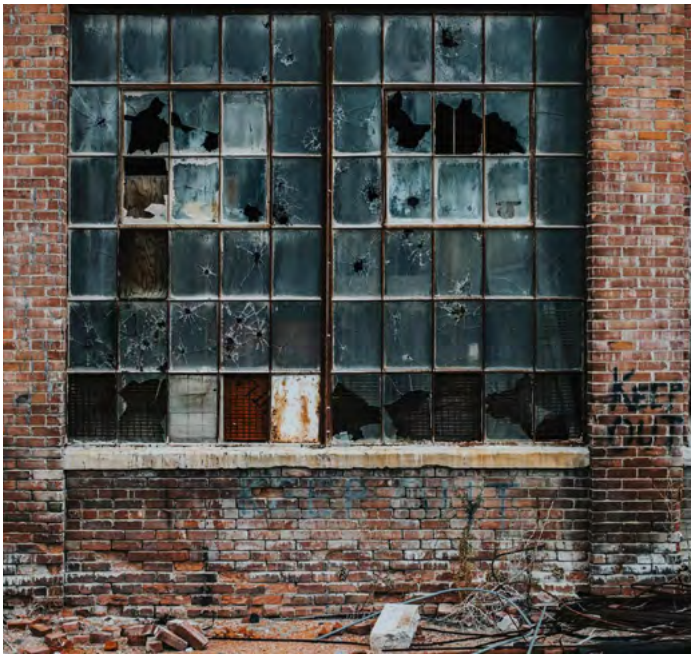
德国作家,生于罗马尼亚,1973年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器工厂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年,出版处女作《低地》,此后陆续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萊斯特奖。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Tara Evans](#) on Unsplash

小说

## 猫和侏儒

赫塔·米勒 | 发现经典

仓库保管员说，猫是从工厂的院子里，从慢慢渗透雨水的装铁屑的箱子里冒出来的。

一个个头在工厂院内生锈的铁丝卷之间走过。他们一个个先后走过。门卫在望着天空，他在看大门旁边的扩音器。

每天早晨从六点到六点半，扩音器都会放音乐。工人的歌曲。门卫称它是晨曲。对他来讲，这个音乐就是一个表。音乐停了走进大门，就算是上班迟到。凡是没有踩着音乐节拍走路的人，凡是在这个院子穿过寂静走向机器的人，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上报。

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风在房顶上撞击着瓦楞板，雨在下面拍打着沥青。女人们穿着被溅湿的长筒袜，男人们的帽舌成了雨檐。外面的街道要亮一些。铁丝卷因为夜晚而潮湿，它们黑乎乎的。即便是在夏天，白天降临在工厂院内也要比外面晚一些。门卫在下午吐出葵花子壳。瓜子壳落在地上和门槛上。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在钩毛衣，她的嘴里缺一颗牙齿，她穿一件红色的大褂。她透过牙缝大声地数着针数。她的鞋边坐着一只虎皮猫。

传达室的电话铃响了。门卫用太阳穴聆听铃声。他没有转头，而是看着行走在铁丝卷中的头。女门卫将钩针举到嘴巴的位置，将针头伸进牙缝，又将针顺着喉部探进大褂，在两个奶子之间挠痒。虎皮猫竖起耳朵看着。它的眼珠是黄色的葡萄。在数的过程中，针数停留在女门卫的牙缝中和猫的眼睛中。电话铃声很尖利。铃声悬浮在毛线中。毛线被拿到了女门卫的手中，铃声传到了猫的肚子里。猫爬过女门卫的鞋子，跑进工厂的院子。女门卫没有接电话。

在工厂的院子里，猫就是锈迹和铁丝卷。在工厂的房顶上，猫就是瓦楞板。在办公楼前，猫就是沥青。在盥洗室前，猫就是沙子。在车间，猫就是铁棍、轮子和机油。

在铁丝卷之间行走的头下面，门卫看见的是脖子。铁丝中呼啦啦飞出一群麻雀。门卫朝天上望去。如果麻雀是单个儿在阳光下飞，它们显得轻盈，如果是成群，则显得沉重。下午被瓦楞板裁剪成斜形。麻雀的叫声变得沙哑了。

工厂院子里的头一个个走近了，他们离开铁丝，离开工厂。门卫已经看见脖子了。他来回走动。他打哈欠，他的舌头厚厚的，压得他在太阳湿湿地停留在他的下巴上的那段空空荡荡的时间里闭上了眼睛。如果他站在太阳下，他一绺一绺头发下面的那个光秃秃的脑袋便会处于睡眠的状态，看不见走过的人的手和包。

打哈欠对门卫意味着等待。当工人离开铁丝厂的时候，他们的包就是他的包。他们的包要被逐个检查。包如果在手下晃荡，表明包是空的。只有在里面有铁的情况下，包才会僵直地垂着，门卫能看出来。如果里面有铁的话，就算拎包挂在肩上，也是僵直的。人们在工厂唯一能偷的东西就是铁。

门卫的手不会检查所有的包。到了该搜查哪个包的关键时刻，他的手自然就会知道。当一张张脸庞和一个个包从他身边走过时，那就是关键时刻。这个时候门卫脸上的空气同鼻子和嘴巴之间的空气会不一样。门卫会吸进这种空气。他会让自己的直觉在包和包之间做出决定。

决定的做出也取决于传达室的影子，取决于嘴巴里葵花子的味道。如果有瓜子走油了，他的舌头会感到苦涩，颧骨会变得坚硬，眼神会变得固执，指尖会颤抖。此时把手放进第一个包里去翻动，手指便会觉得安全。用手按住陌生的物体，这种抓的动作是贪婪的。用手在包里翻动，对门卫来讲是在抽每个人的脸。他能让这些脸在惨白和羞红之间变化。它们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当他做了一个指向大门的手势时，这些脸会离开工厂大门，或深陷，或鼓胀，即便已经到了外面的街道上，它们仍然神情恍惚。视觉和听觉变得模糊，太阳在他们看来宛如一只大手。鼻子已经不够用了，在有轨电车上，它们用嘴巴和眼睛在别人的脸上大口吸气。

搜包时，门卫能听到嗓子里干干的吞咽声。喉头干得如同老虎钳，恐惧在胃里翻腾。门卫闻到了恐惧的气味，它如同一种腐臭的空气从男人和女人的体内冒出来，停留在膝盖窝的高度。如果门卫在一个包里翻弄的时间长一些，许多人会在恐惧中放出一个，然后又是一个无声的屁。

门卫有严格的信仰，这是女门卫告诉克拉拉的。因此他不爱人。他会惩罚所有没有信仰的人。他会欣赏所有有信仰的人。他并不爱所有有信仰的人，而是敬重他们。他敬重党委书记，因为他的信仰是党。他敬重厂长，因为他的信仰是权力。

女门卫从头发里抽出发卡，塞进牙缝，然后把头发紧紧盘在一起。大部分有点信仰的人，克拉拉说过，都是高高在上的同志，他们不需要这个门卫。

女门卫把发卡深深插入头发。还有其他人，她说。克拉拉站在门口，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你信仰上帝吗？女门卫问。克拉拉的目光越过她的头，落在她的发髻上，落在用铁丝做成的弯弯的发卡上。发卡的齿尖已经没有了，它朝上弯曲，细细的像头发一样，如同孤零零的一根线，但是要亮一些。我有的时候有信仰，有的时候没信仰，克拉拉说，如果我没烦恼，我就会忘掉信仰。女门卫用窗帘角擦去电话上的灰尘。门卫说信仰是一种能力，她说。工人不信仰上帝，不信仰他们的工作。门卫说上帝对工人来说不过是不上班的一天，在这一天，只要上帝高兴，工人们的餐桌上就会有一只炸鸡。门卫不吃飞禽，她说。她在说话的时候在窗玻璃上看自己的眼睛，还有自己的大褂。大褂在玻璃里显得颜色深一些。门卫说，工人在周末用吃肚子里塞鸡肝的炸鸡来取代信仰上帝。

麻雀群散开了，车间的窗玻璃是破的，麻雀在玻璃里寻找洞。它们飞进车间的速度比门卫的眼神要快。女门卫笑着说，不要看，否则麻雀会穿过你的额头。门卫看自己的手，手指上的黑毛，手指的关节。下午的阴影斜裁了他膝盖下面的裤子。铁丝卷前，灰尘在打着滚地飞扬。

一把刀，一个脏兮兮的一次性杯子，一张报纸，一块面包皮。报纸下有一把螺丝。哼，哼，门卫说。男人合上包。

一封信，一小瓶指甲油，一个塑料袋，一本书，放在购物袋里的衣服。一支口红从衣服口袋里掉到地上。门卫弯下身。他打开口红，在手指关节上画出一条红线，他用舌头舔了一下红线。呸，他说，烂覆盆子和蚊子。

男人的大拇指上有一道伤口，他的包搭扣生锈了。门卫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刀，刀下面有一顶帽子，帽子下面有一个熨斗。看，这是什么？门卫说。我只是修了插头，男人说。上班时间，门卫说。他把熨斗放进门房，把所有插头的娘都骂了个遍。身穿绿色大褂的女门卫把熨斗放在手上，她伸开手指，凉凉地熨了一遍自己的手掌。

一个手提包。一个棉花团落在地上。大拇指有伤的男人弯下身。一个女人把一绺头发擦到耳后，从男人受伤的手里抽出棉花团。棉花里有一颗葵花子壳和一只蚂蚁。

克拉拉笑了，太阳在她的牙齿上闪着白光。门卫挥手让她过去。女门卫的牙缝在笑。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从包里拿出帽子，把帽子盖在拳头上，然后伸出食指，让深色的帽子在手指上转动，如同一个轮子。女门卫笑了，她的牙缝是一个漏斗，她的笑声在变尖。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一边看着帽子转出的圈，一边唱道：

还欠着房租

已经有一个月没付

他的拳头是一个轮子，他肘窝处的一根血管时粗时细。他的眼睛在注视着女门卫的钩针。房子的主人啊，主人啊，

把我们扔到了街上

他的嘴在唱，他的眼睛在眯缝，他的拳头在飞舞。另外一只手，那只空的手，大拇指有伤的手没有去关包上面那个生锈的搭扣。男人的歌声在等着熨斗。

一片金合欢的叶子在门缝里晃动，挣脱了以后，开始飞呀飞呀。女门卫的目光追随着叶子。叶子是黄色的，如同猫的眼睛。大拇指有伤的男人看着手表。

那只猫每年都下崽。小猫和它一样都是虎皮纹的。它总是趁着小猫还是湿叽叽的还没有睁眼的时候，把它们吃掉。把幼崽吃掉后，老猫会伤心一个星期。它会在院子里来回溜达。它的肚子平了，溜达的圈子很小，能穿过和经过所有的东西。猫在伤心的这段时间不吃肉，只吃刚长出来的草尖和后院台阶边上的盐渍。编织机的女工们都认为，猫是从城郊跑来的。仓库保管员说，猫是从工厂的院子里，从慢慢渗透雨水的装铁屑的箱子里冒出来的。他在从仓库到办公室的路上，在装铁屑的箱子中间发现它的时候，它浑身湿漉漉的，满是锈色，还不如一个苹果大。它的眼睛还没睁开。保管员把它放在一只皮手套上，送到大门口的门卫那儿。

门卫把猫放在了一只皮帽子里。

我用一根麦管给它喂奶，喂了有三十天，女门卫说。因为没人要它，女门卫说，于是我就把它养大了。过了一个星期，门卫说，它能睁眼了。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在它的眼睛里，在它的两只眼睛里，都有保管员的身影。直到今天，每当猫舒服得打呼噜时，都能在它的两只眼睛里看见保管员的影子。

对猫来讲，工厂和它的鼻子一样大。它什么都闻。在车间间，在最后面的充斥着汗水、挨冻、叫喊、哭泣和偷窃的角落间。在院子里的铁丝卷之间，在那里，草儿被闷死，被站着踩得稀烂，那里有喘息，那里有做爱。在那里，受孕和偷窃一样，是贪婪的和隐藏的。后门只有卡车驶进驶出，房顶是油毛毡的，雨檐是剖开的橡胶轮胎，栅栏是变形的汽车门和柳条。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街道，它的名字叫凯旋大街。雨檐把雨水排到凯旋大

街上。后门旁边的小窗户是仓库。保管员就在那儿上班，他的名字叫格里高。

在仓库，劳保服装是堆成小山的灰棉衣、灰皮围裙、灰皮手套和灰胶靴。在这座灰色的小山前有一个倒放的大箱子，这是桌子，还有一个倒过来放的小箱子，这是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份写有所有工人姓名的花名册。在椅子上坐着的是格里高。

格里高卖金子，女门卫说，金项链，还有金戒指。东西都是从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老吉卜赛人那儿收来的。老人住在城边，在英雄墓地的边上。老人的金子又是从一个塞尔维亚年轻人那儿买来的，年轻人住在边界，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交界的地方。他在塞尔维亚有亲戚，到那儿做一些小边贸。边境海关有他的表亲。

格里高有时还有俄罗斯的东西。那些粗的金项链是俄罗斯的，细的是塞尔维亚的。粗的是冲压成心形，细的是冲压成骰子形。婚戒是匈牙利的。

如果格里高握紧手，然后慢慢松开手指，项链会像金丝一样滑过他的手指。他让项链垂挂着晃悠，然后把它对着窗户放到光线中。

锈铁丝在双手上来来回回拉了有半年。然后工资袋被送到了格里高的手中。一根金项链围在了脖子上。过了几天，天色已晚，当项链在睡衣上闪亮，脚赤裸地站在地毯上时，有人敲门。一个身穿西服的人站在前面，一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后面。过道上的灯光昏暗。橡皮棍在裤腿上晃荡。句子很简短，陌生人的脸颊在闪光，一块光滑的光亮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声音保持低沉，几乎是平平的，但是却是冷冷的。陌生的鞋子站在地毯边。脖子上的项链被没收了。

第二天早晨，第一班有轨电车上，格里高重又得回了自己的项链，当时车厢里没什么人，灯光因晃动而忽明忽灭。那个穿西服的人在啤酒厂旁边的车站上车，一言不发地交给他一个火药盒。

格里高这几天一直是第一个到工厂，桥下的水流动得还很平缓，天空因黑暗而呈拱形。他冷得发抖，他抽烟。他拿着他的项链，跟在香烟的烟雾后面，走过铁丝卷，这时扩音器还没有声音。过了几个小时，他再次拎着项链晃悠，在凯旋广场的小窗户前让项链滑过手指。同样的，但不是同一张的钞票又来了，如同同样的，但不是同一个的画面会再次出现在猫的眼睛中。

门卫说，仓库保管员在早晨买了项链后，经常会在晚上向警察报告。但是戒指他不报告。门卫敬重格里高，因为格里高信仰的是钱。

黑市是黑色的，女门卫说，不要去买，黑色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门卫说，有人有，有人要，世界就转起来了，大家都在凭本事干事。

当保管员把那些女人放倒在左面的角落时，猫也在闻。小山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和通道。通道的上方就是窗户。格里高解开裤子时，那些女人会把腿高高地跷到他的头上。猫从房顶爬进来，坐在缺口上方的小山顶上。猫是为这些女人而坐在这里的，因为女人腿上胶靴的位置高过了眼睛，跷在了头上。女人的目光会越过胶靴和对面的额头，向上一直通向猫的眼睛。把它赶走，那些女人说，把它赶走。格里高说，没关系，它看不见的，没关系。猫则在竖着耳朵看着。

完后那些女人会浑身是汗地站在桌前，手臂上搭着一件灰棉衣。她们在保管员的花名册上找自己的名字签上字。猫从不等到女人们的手签完字，它从房顶爬出去，穿过院子的铁丝卷跑进车间。

猫的眼睛里有一幅画面。所有人都能看见所发生的事。大家都在谈论，谈论刚刚在工厂里匆匆进行的站着插进去的和躺着插进去的爱。就连谈论这个爱也是匆匆进行的。所有人的手都放在猫走过来时摆放的铁丝上没有动。因为没有一幅画会长时间地待在猫眼睛里。很快就会有另一幅画面进入猫的眼睛。在下一幅画面中，每一个嫉妒都知道，每一个女人脸上的油斑都知道，出现在猫眼睛里的将会是她们自己。春天或秋天，当棉衣破了线，当时子的部位绽开了口子，当风要么冷要么热地掠过油毛毡顶，穿过栅栏吹到凯旋广场上，其他人就会盯着看，因为猫会带着那些此刻站在编织机前的大褂下的大腿，赤条条地、又得很开地、位置比腿还要高地穿过工厂的院子。

每年只有一个星期，猫的眼睛里不会携带画面，那是它为被自己吃掉的幼崽伤心的时候。女人们说，谁如果走运，能在这个盲目和转瞬即逝的星期被匆匆的爱迷住心窍，就不会在工厂里被人发现。

只有贿赂女门卫才能知道，这个星期出现在什么时候。贿赂她的人很多。所有的人，女门卫说。而且我会在日历上做标记，她说，其实我对每个女人完全是随口瞎说的。

女人们蜂拥而至，急忙地插入队伍抢先进入那个虚假的伤心之周。

然而由于在真正的伤心之周，车间、院子、盥洗室、办公室之间的爱如同一团乱麻，因此，苟合的男女们便纷纷落入门卫、清洁女工、工段长、锅炉工的视线中。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在真正的伤心之周，由于猫的眼睛里没有画面，因此每一场爱都是一个谣言。

女人们的孩子长得都像格里高，女门卫说。谢天谢地女人们不带她们的孩子到工厂，我从来没有看见她们的孩子同时出现过，都是先后看见的，有高有矮，有瘦有胖，有黑有金黄，有男孩有女孩。如果他们都站在一起，人们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兄弟姐妹。长得完全不一样，女门卫说，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

女人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患上失眠症了。医生都说是机油造成的。这些孩子们开始长大，他们之后将会离开工厂。

但是总有一个时间，女门卫说，他们会来传达室找他们的妈妈。很少有什么非找不可的理由，大部分没有理由。

这些孩子们会站在那里，女门卫说，紧靠着传达室，告诉他们是谁，好让门卫喊他们的母亲。他们站在那里，胆怯地把指尖放在脸颊上，既不看男门卫也不看女门卫。当他们说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捕捉到的唯有这些铁丝和铭刻在心中的院子。他们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们站在那里时间越长，脸上那块巴掌大的格里高的影子就越加从脸上显现出来。

在大汗衫和小汗衫上，在大裙子和小裙子上，在及膝盖的袜子上，女门卫看到了锈斑。当这些小的、长高的或者几乎已经成人的孩子们紧挨着传达室站着，等候着，女门卫看到了长成齿形的锈斑——每个孩子 in 衣服的某个地方都有一块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

弄出锈斑的母亲们的手，也就是吃饭前给男人的汤里搅拌进西瓜血的那双手。黑色的指甲圈在洗衣服时溶化了。衣服洗完后，锈迹不是在水里，也不是在泡沫里，而是在布料里。女门卫说，在风里晾干也好，熨烫也好，去污盐也好，都不管用。

那些无辜的兄弟姐妹们，那些格里高的孩子们，即便过了十年，女门卫也仍然能认出他们。然后数吨的铁锈和铁丝网从大门运了出去。然后又有数吨的铁锈和铁丝被重新编织成网，在青草还没有寻找到生长所需要的阳光之前，在同样的地方堆积起来。那个时候这些孩子也会在这个工厂工作，尽管他们从来不希望这样。他们到这儿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因为没有路，他们在贫困中得到的只有穷困潦倒，毫无出路，只有母亲对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厌恶。他们每次来总是带着那种虽是一成不变但却总是出乎意料的强迫：开始的时候他们动不动就发怒，大声吵吵，后来则变得软弱，默不作声，独自闷头劳动。机油的味道依旧刺激，他们的手早已有了那道黑黑的圈。他们结婚，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用有高低差的体位，将已经干瘪的爱插进对方的肚子，然后有了孩子。孩子带着锈斑躺在襁褓里。他们长大，穿上小的，然后是大的汗衫、裙子、袜子。他们也将带着干巴巴的破碎的叶子形状的锈斑站在传达室旁，等候。也同样不知道，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今后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

格里高的母亲也是工厂的女工，和女门卫的母亲一样。

钩针放在桌子上。工厂的院子静悄悄的，风有一股麦芽的味道。那边房顶的后面矗立着啤酒厂的冷却塔。塔里有包裹着保温层的粗管子通出来，经过街道的上方，直通河里。管子里有蒸汽冒出来，在白天撕扯着街上行驶的有轨电车。在夜里，它是一道白色的帷幔。有人说，蒸汽有一股老鼠的气味，因为有河鼠在啤酒厂那些比传达室还要大的铁罐里狂饮啤酒，然后便淹死在啤酒中。

在第八天，门卫说，上帝造亚当和夏娃后还剩下一络毛发，于是使用它造了长羽毛的动物。第九天，上帝面对空旷的世界打了一个隔儿，于是便造出了啤酒。

传达室的影子逐渐拉长。太阳在凯旋大道和院子里的铁丝卷之间找寻最短的途径。太阳有棱有角，边上被压瘪了进去。在中间，太阳有一个灰色的斑块。

每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总有那么几天，传达室上面的扩音器会发出沙沙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门卫会朝天上望去，然后说，瓦楞板上面的、城市所有屋顶上面的、啤酒厂冷却塔上面的太阳是一个生锈的水龙头。

大门口的路上有一个坑，麻雀在里面扑腾着灰尘。它们中间有一个螺丝。

男门卫和女门卫坐在传达室里打扑克。熨斗摆放在桌子的边上。门卫向领导报告了那个大拇指有伤的男人，他没收了她的熨斗。大拇指有伤的男人明天会得到一份书面批评。

麻雀在车间里蹦蹦跳跳。它们的脚和嘴被机油弄得黑乎乎的。它们在啄食葵花子壳、西瓜子和面包渣。当车间空无一人，口号上的字母便会显得特别大。工人，光荣，党。光线会在更衣室的门上伸出长长的脖子。身穿红色汗衫、脚穿厚跟鞋的侏儒用一把满是油污的扫帚在满是油污的地面扫地。他身旁的编织机上有一个西瓜。西瓜比他的头大，瓜皮是深色的，有浅色的条纹。

光线横着照在通往工厂院子的门上。猫坐在门旁边，在吃一块肥猪肉。侏儒透过大门朝院子里望去。

灰尘在无缘无故地飞舞。门发出咯吱的声响。



本文摘自《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德】赫塔·米勒  
刘海宁 译  
后浪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4 月

#### 赫塔·米勒

德国作家，生于罗马尼亚，1973 年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器工厂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 年，出版处女作《低地》，此后陆续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萊斯特奖。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1942 年，希特勒在住所和他的伴侣爱娃查看霍夫曼带来的照片。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 山中的希特勒

杨潇 | 非虚构图书馆

权力留下的气场还留在这里，  
这是风景当中的意义之重

01

下午 4 点多就天黑了。我 8 点半到达贝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时，感觉已是深夜。零星的旅客很快消失在夜色里，出站后我沿公路走了小一段，左转上山，行李箱在碎石渣路上嘎嘎直响。上一次到阿尔卑斯山脚下这座德国小城还是 2012 年，记得城中有清浊河流交汇，浊的那条翻滚着从冰川带下来的白色粉末，山坡上有连绵的草地，还有清冽的夏日空气，我一路用手机看伦敦奥运会，天慢慢黑了下去。而今这一切毫无踪影，这条山道如此陌生，手机导航的光标在黑暗里摇晃，我跟着它到了一家屋舍门口，屋里有温暖的黄色灯光，我绕着它转了半天找不到门，隔着窗户能看见窗里头站着个老爷子，但他听不见我敲击窗玻璃的响声。我感到自己在做梦，一个险恶的童话的梦。不知过了多久，上来一位老太太，可能是女主人，她用英文告诉我，我要找到的客栈在更上面，她指着似在天上的一排灯光，于是我又拖着箱子，穿过刚刚被我私闯的花园和田地，折回山道继续往上，行李箱在碎石渣路上嘎嘎直响。天上的客栈毫不温馨，长得像谢耳朵的前台与第二天早餐的鸡蛋都冷冰冰的，但白天至少能帮你辨清方向，一早，我顺利找到 838 路公交车的站牌，它将带我前往对面山上海拔更高处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巴士准点发出，盘山而下，穿贝希特斯加登城而过，我终于又看到了其中一条河流，初冬季节河水有迷人的宝蓝色。一个急转弯，巴士开始上山，远处阿尔卑斯山景迅速拉开。雪峰，蓝天，腰带一样的云，黄的岩壁，沉默的黑的松杉，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阴霾情绪一扫而光。此时是 2019 年 11 月 19 日，山上两周前开始下雪，连着下了三四天才晴，再过一个多月，阿尔卑斯山就将迎来热闹的滑雪季——上萨尔茨堡一年有五个月都在下雪。这里是德国地图伸进奥地利的一角，1860 年，慕尼黑—萨尔茨堡—维也纳铁路线通车，1888 年，支线修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到 1920 年代，上萨尔茨堡已经成为魏玛德国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作家来到这里，寻找田园生活和一种“volkisch（民众的、白话的）”灵感，据说这种感觉在魏玛繁忙而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已荡然无存——试看社会学家 Siegfried Kracauer 当时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巴黎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 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1930 年，魏玛共和国灭亡前三年，从贝希特斯加登开往上萨尔茨堡的巴士线路开始运行，时隔 90 年，料想我们的巴士使用的仍是这条山间公路。车越往上，道旁积雪越多，我和一群中学生在凯宾斯基酒店前一站下车。空气冷冽，风景甚好，如洗的蓝天偶有喷气式飞机留下的划痕，不远处塔吊作响。跟着孩子们下坡，右拐，便看到了“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Dokumentation Obersalzberg, “Dokumentation”是

一个非常德国的表达，与博物馆有着细微但重要的区分，暂且按下不表）的玻璃坡顶石头房子，一侧的荒草坡上覆着白霜，透过林木可以俯瞰谷底的贝希特斯加登和德奥边境的群山，天空越来越澄澈了。

02

“我们这儿天气好，因为海拔高，通常都在云雾的上头。有时候（贝希特斯加登）城里云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们这儿却阳光充足。”文献中心的研究员马蒂亚斯·林格（Mathias Irlinger）笑着告诉我。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友好的微笑。马蒂亚斯 1984 年出生，贝希特斯加登本地人，在慕尼黑读完博士学位后回到家乡工作。我羡慕他的办公环境如此之好，窗外就是连绵的群山，他又笑了，给我指点方向：这扇窗朝向西北，我们被奥地利包围着，挂着云的那座山峰有一个很好的名字，horn 再加上 old coaches, “德语就是这样可以任何复合……”，那么萨尔茨堡呢？“就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么说，茨威格住过的房子就在那边的山里头？没错，没错。“我买的那栋房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上，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有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回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岁月，“当你从山岗的平台上鸟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顶和山墙门窗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山岗后面是绵延不断气势磅礴的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希特勒现在住在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他左手握拳，右手高举纳粹万字旗，一只鹰从他头顶俯冲下来，鹰的背后烈日灼目。参观者交 3 欧元的门票，进入展厅第一眼会看到这幅图。图调得锐度很高，连同希特勒瞪着你的眼神，凶煞翻倍。在他两侧是狂热的人群，每个人都高抬右臂 45 度，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再外面则是四幅黑白照片：集中营的尸骨、被吊死的游击队员、战死的士兵、被炸成废墟的城市——狂热的代价。希特勒最早“发现”上萨尔茨堡是 1923 年 5 月，他来这里拜访民粹作家（也是一度是他的精神导师）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半年后，当时羽翼未丰的纳粹党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政变失败后希特勒短暂入狱，在狱中完成了《我的奋斗》。出狱后希特勒首先来的地方就是上萨尔茨堡，“我必须获得平静与安宁。”他宣布。此后几年，他不断回到这里，利用这里避世的环境重组纳粹党，并住在风景如画的度假酒店或小木屋里，续写《我的奋斗》，“在这里我真的被惯坏了。他说，“我每天都会散步到上萨尔茨堡和哈利茨凯尔（Scharitzkehl），然后走回来，花费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是在那儿，我写下了第二本书。”《我的自传》可被视作充满仇恨的自传，而它的续篇则是纯粹的政治评论，探讨了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血与土”不容分割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强调犹太人的威胁，“真希望早在战争爆发时或者在打仗的过程中，能有 1.2 万或 1.5 万个倒霉的希伯来人事前便被毒气熏死，就像数百万优秀的德国工人死在田地里那样。”希特勒写道。不过，就像茨威格说的，希特勒当时还只是个无名之辈，他的第二本书只卖出不超过 700 本。1928 年，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租下一栋房子，此后几年，他依靠狂暴的褐衫军（冲锋队）和群众运动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角色。“希特勒一开始的形象是非常激进和咄咄逼人的，”马蒂亚斯说，当纳粹走向更主流人群时，他们意识到德国社会中的许多人并不接受这种形象，并不喜欢那些攻击性很强的仇恨言论，“人们喜欢一个普通一点的好人。”于是希特勒开始了一场化妆术。我在文献中心看到了大量希特勒的“亲民”照片，大多出自其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之手，有着绝妙田园风光的上萨尔茨堡正是这类照片的主要背景。在这些照片里，希特勒观山，希特勒散步，希特勒遛狗，希特勒读报，希特勒躺在沙滩椅上休息，希特勒与邻居们拉家常，希特勒俯身与一个漂亮的金发小女孩亲切地握手（“一个真正的雅利安女孩”，他表扬道）——一个如此喜欢孩子、宠物、大自然的人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此时正是影像走向大众媒体的时代，经过霍夫曼把关的照片铺天盖地出现在报纸和图书市场，最受欢迎的两本影集，一本名叫《希特勒在他的山中》，一本叫《日常生活之外的希特勒》，“以往的报纸只刊登政客在大桌子前正襟危坐，现在有一位政客通过报纸展现他的私生活……他被塑造成一个社区中的人，正常的人，友好的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人人都可以经过他家并跟他聊会儿……（他）不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而是一个亲切的大叔。”马蒂亚斯说。他给我展示了一本影集的原版，当年在纳粹德国卖了 220 万本，“所以，有 220 万德国人曾收藏这位亲切的大叔的照片”。可以想见，如今仍有大量影集沉淀在民间，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获得了其中的 15 本，是民众捐出来供他们研究使用的。马蒂亚斯一边翻看影集一边给我讲解，“你看这张，说的是这个小女孩递给希特勒她病中母亲写的信。旁边讲了更详细的故事，当时这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被劳作中的希特勒看到了，希特勒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哭，说不出话来，后来她给了希特勒一封信，希特勒才知道她母亲生病了，而她们家很贫穷，于是希特勒出手相助……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事，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假的，因为在另一张未发表的照片里，一个男孩正在拿走那封信。但如果你生活在 1936 或者 1937 年，你没有办法得到不一样的信息，媒体毫无批判性，你看到这个故事，还有照片‘佐证’，所以很多人会相信，会觉得他是个好人。所以上萨尔茨堡就成了一个宣传之地，成了展示希特勒私生活的特殊之地，这里的希特勒不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我们中间的人。”当然，人们选择相信希特勒有许多因素，譬如经济上的好处（瞧，我们可以买收音机了，就好像今天某个独裁者说，哦，我的人民每人可以获得一部最新的 iPhone），还有一个，“你得记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怎么思考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可能会感到哪里不对劲，有人被辞退了等等，但他们忙于应付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我得忙着洗衣服呢……”马蒂亚斯又笑了，“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对那些视而不见。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希特勒）就赢得了支持。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

支持他，在他掌权前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他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后来自由选举不存在了，结果就也不可信了。”

### 03

1933 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他买下了在上萨尔茨堡租的房子，将其改造成度假别墅，名曰“山宫（Berghof，中文往往直接音译为‘伯格霍夫’）”，戈林、鲍曼、施皮尔等纳粹高层也陆续在附近建起自己的度假屋——顺便说一句，现在的凯宾斯基酒店所在地，从前就是戈林的别墅——最高峰时，这里的综合体可以容纳一万多人。上任头几年，希特勒在这里呆的时间很多，有时候一年中有半年都住在这里，吸引了大量纳粹朝圣者，文献中心也展示了不少这类照片，人们在山道上排起长队，只为看一眼这位“人民的元首”。1937 年，希特勒的秘书鲍曼担心希特勒的安全问题，命令在这一地区加装安全隔离带，次年，鲍曼又在更高处建造了鹰巢作为山间茶舍（希特勒并不喜欢那里），上萨尔茨堡由此被戏称为“元首地”（Führergebiet），这些限制性设置反而给上萨尔茨堡增加了更多的神秘性。

这种神秘也来自希特勒的伴侣爱娃和上萨尔茨堡的一座山峰，前者 1936 年起就在此深居简出，后者则与德国一个流传甚广的民族神话有关：曾经领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巴巴罗萨皇帝并没有死去，他沉睡在一座山里，等待有一天被唤醒，王者归来，重建帝国的荣光。按德国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的说法，德国是政治神话学的天堂，这与德国较其他国家建国较晚有关，“直到 1871 年之前，唯有神话和象征能够代表这个民族。”而民族神话一方面简化了历史，一方面消除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民族神话变成了对历史的解释和对未来的规划。”

希特勒显然被巴巴罗萨的神话所吸引（后来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被命名为“巴巴罗萨行动”），相信自己就是那位令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王者，他在改建度假别墅时，设法让山宫的巨大的落地窗直接朝向那座据说内部有宫殿、教堂、回廊和取之不尽的金银（1816 年出版的格林童话如此描述）的山峰。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是一个喜欢亲力亲为的人，哪怕改建别墅也是如此，结果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改建后的山宫出了不少问题，比如管道侵入有着无敌全景玻璃窗的起居室，导致这里不时充斥着汽油味儿。“当我去上萨尔茨堡时，吸引我的不只是那里的美景。我能感到自己脱离了琐碎小事，我的想象力得到了激发，”希特勒后来说，“……到了夜里，在山宫，我往往坐在床上，睁眼凝视被月光点亮的山头，长达几个小时。就是这种时刻，清明（brightness）进入了我的思绪……我最重大的决定都是在上萨尔茨堡做出的。”

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纳粹德国后来的装备部部长施佩尔回忆，“希特勒的山居为他提供了内在平静，也为他做出惊人决定提供了自信。那些最重要的讲话他也是在这儿写的。……在纽伦堡党代会游行之前，他经常会退到上萨尔茨堡几周，以写出他长篇讲话的基本原则。”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上萨尔茨堡是元首的“思考之地”，1933 年 3 月 26 日，戈培尔写道，“在群山的孤寂之中”，元首决定，德国犹太人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战争爆发前两年，希特勒选择在山宫会见许多外国贵客，最有名的一次应该是 1938 年 9 月 15 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到访。此时，第三帝国已经合并了奥地利，正对捷克斯洛伐克虎视眈眈。希特勒在山宫的台阶上迎接了张伯伦，并展现了自己的说服力，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成为他表演的背景板。他声称苏台德地区是德国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最终张伯伦选择相信希特勒是一个重承诺的人，事后他给妹妹写信：“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严厉与无情，但我还是有个印象，这个人言出必行。”和英法对纳粹德国的绥靖一样，张伯伦对希特勒的个人印象也是一个巨大的误判。这次会见导致了《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割让苏台德地区。

没有贵客到访时，希特勒起得很晚，往往 11 点才会出现，然后吃一顿时间很长的午饭，饭后他会散步去附近的一个茶室，那里提供浓咖啡，希特勒会在咖啡桌旁开启一场关于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德意志荣耀的自言自语的演讲，讲话枯燥而重复，往往讲着讲着自己就睡着了，周围的人得假装这没有发生，并在他醒来时立刻接上他睡着前的话头——事后追忆此景的施佩尔开玩笑说这是一种“山地病”，他说自己“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总是在浪费时间而感到怅然若失”。吃过晚饭后，希特勒和身边的人往往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偶有讨论，但讨论从来不会超越最琐碎的层面。

文献中心摘录了施佩尔的部分回忆，又配了两张被审查掉的希特勒的照片：一张是希特勒戴着眼镜读报（元首不希望民众知道他视力不佳），一张是希特勒与爱娃在餐桌边吃饭（出现了爱娃，但希特勒吃相不佳，看起来像是被噎着了）。这是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不会展现给外部世界的画面，恰如笼罩在层层神秘云雾中的上萨尔茨堡。1954 年，霍夫曼的女儿 Henriette von Schirach 与父亲重返这里，参观山宫遗迹，她在回忆录里提起这次旅行，并回忆了 1943 年 6 月 24 日在山宫与希特勒的一次痛苦对话。她向希特勒提到自己在阿姆斯特丹亲眼所见的犹太人的遭遇，结果遭到元首痛斥：“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关你什么事？犹太人关你什么事？……这都是完完全全的多愁善感！议题人性（tittle-tattle about humanity）！”美国学者布雷特·阿什利·卡普兰（Brett Ashley Kaplan）在她的《犹太人屠杀后的记忆风景》（Landscapes of Holocaust Postmemory）一书中说，这正是纳粹一直在试图制造的上萨尔茨堡假象：这里的时间与外面的时间不同，这里只有审美，没有外部世界的战争与暴力。

1941 年 3 月 16 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在希特勒的小木屋》（In Hitler’s Chalet）的特写，向美国读者介绍贝希特斯加登与上萨尔茨堡的风景。希特勒及纳粹高官如何发现此地并在这里密会以及山宫的设计与风格，“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此刻的大事记时，毫无疑问会检视贝希特斯加登、上萨尔茨堡的来来往往，还有山宫，元首的私人领地，这里距离战争前线 and 帝国首都的外交喧闹很远，他会牵着他的三只牧羊犬在壮丽的山间小道上散步，或者与他最亲近的顾问坐在户外篝火前，讨论大事直到深夜。”这样的口吻在当时或许最多算是猎奇，但却很难不被坐拥后见之明的后世书写者指责为“对暴力只字未提”，以及成为纳粹终极神话的共谋者。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的后三年（1942-1945），外国人对纳粹德国的记录才完全聚

焦在“轰炸”这个主题上，在此之前，尤其是战争爆发前，哪怕纳粹对犹太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迫害已非常明显，但因为种种原因，一些有机会揭露真相的外国人仍然选择视而不见。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曾经数次访问德国，非常喜欢德国迷人的田园风光，1935 年，他的《时间与河流》在德国一纸风行，他被奉为上宾，虽然朋友们尽全力试图让他看清现实，但他觉得街头丑陋的景象和“真正的德国”没什么关系，在他眼中，“真正的德国”是一片浪漫的美丽土地，“这里的绿色是地球上最绿的绿色，所有的树叶把森林染成了暗绿色，这是一种传奇般的魔力和时间感”。

1936 年，沃尔夫又一次来到德国，此时德国已经开始外汇管制，他无法将大版税带出这个国家，便决定在那儿消费，度个长假。长假结束后，沃尔夫搭乘火车从柏林去巴黎。整个上午他都和同行的一位乘客交谈，那是个神情紧张的小人物，沃尔夫给他取了个绰号“无事自扰”，直到火车抵达边境小镇亚琛，沃尔夫才意识到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无事自扰”先生是犹太人，试图带着巨额资金离开德国，他被逮捕了，逮捕他的官员“颧骨高，气色好，留着黄褐色小胡子……剃成光头，脑袋下面、脖子周围有肥厚的褶皱”，沃尔夫“随着不可思议的凶残的愤怒情绪而颤抖。我真想恨恨拳打那根粗大的脖子……但我知道我很无奈，我们大家都很无奈……面对墙壁般不可动摇的可怕的权威，感到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返回美国几个月后，沃尔夫在《新共和》杂志（1937 年 3 月 10 日）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件事要说出来》的文章，这是一篇有力的作品，沃尔夫知道这篇文章发表后他的书将在德国遭到禁止，他将永远无法再访问这个令自己崇拜的国家，在文章的结尾，沃尔夫写道：“对那片古老的德国土地，对它的真诚荣耀、美丽、魅力和遗迹，对那片黑森林，对那片我长久以来一直热爱的古老土地，我要说——别了。”

### 04

2012 年夏天初访贝希特斯加登时，我脑中只有湖光山色四字，山当然是阿尔卑斯山，从慕尼黑出发，沿着 1860 年就存在的线路，经萨尔茨堡转车，沿途雪峰绵延，炊烟袅袅，梳着分头的奥地利列车员端着一串倒立的酒杯经过，茨威格笔下那阶级差异巨大但似乎美好仁慈的帝国时代瞬间闪回：湖是国王湖，Lonely Planet 说它“或许是德国最美丽的湖泊”，我记得湖水碧绿冰凉，极深的样子，游船上工作人员吹起难听的小号，又用扩音器跟我们讲冷笑话：“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得很好！船上一共有三个救生圈，工作人员要用两个。”船抵红顶教堂，花个把小时跨越溪流与沟壑，抵达冰川，踩上冰雪，感受陡然降温的小气候，欣赏悬崖上的瀑布，再回望远处大大小小的冰川湖，惬意无比。

七年多后拜访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马蒂亚斯·林格告诉我，他们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摧毁纳粹宣传围绕此地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山区田园风光的形象——湖光山色古已有之，但关于无忧无虑天堂的想象属于第三帝国，“我们希望解构掉它。”

“上萨尔茨堡的问题是，当你想到奥斯维辛或其他集中营所在地时，你想到的是大规模杀戮，是受害者，但当人们想到这里，许多人想到的是令人愉快的天气，希特勒与他的狗儿玩耍，或者和孩子们亲切地交谈。”

“这个画面到现在还存在于集体记忆中吗？”我吃惊。

“因为那些（田园风光的）照片通过电视、纪录片、报纸被不断地重新发表，当然，是在一个批判的语境中，可是，你看一部二战纪录片，你看到遥远的被毁灭的城市，比如斯大林格勒，等镜头切回上萨尔茨堡，你看着那些美妙的群山和田园风光，你会想起什么呢？你会想起这些漂亮的图像。我不是说当人们想到上萨尔茨堡就会觉得希特勒是一个好人，但或多或少，他们不会把这里和大屠杀联系起来，他们会想到这是希特勒度假的地方，是他和农民，孩子交谈的地方。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展示这里不只是一个度假胜地，也是希特勒做出一系列决定的地方，他在这里决定要占领波兰，占领苏联，把所有的匈牙利犹太人都送去奥斯维辛。他在这里做了许多决定，但照片不会告诉你这些。比如，当你看到德国士兵在波兰的街头巡逻时，你不会想到这个决定是在这里做出的，所以你必须告诉人们这一重联系。”

这种“田园”的形象就算对本地人来说也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马蒂亚斯给我翻出一张照片，“这是我们未来新展览要用的，”他又笑了，但语气里带着义愤，“这位女士有一半血统是犹太人，之前在国王湖边经营一个浴场，向游泳的人出租各种设备，她被迫搬走了，先是搬到荷兰，然后荷兰被德国占领，她又一次被驱逐。”在文献中心内也有类似提醒，在希特勒把上萨尔茨堡改造成神秘的“元首地”的过程中，几乎所有本地居民都被迫卖掉了他们的房子，一些人获得了好价钱，一些不愿意卖的则受到非常野蛮和暴力的对待，还有人被送去了集中营。

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内部是原木结构，外面是玻璃幕墙，阳光洒进来，色调非常温暖，某个时刻我产生了一种身处桑拿房的错觉。这里甚至还有一个露台，我推开门出去，对着 180 度无遮挡的阿尔卑斯山景拍了两张照片，吸几口清冽的冷空气，好为接下来更黑暗的历史做好心理准备。今天访客多是同车的中学生，我置身他们中间，再看历史照片里那些年轻的脸，就格外难受：那些希特勒的追随者看起来多阳光多有朝气啊，而比这更难受的，是你知道那些表情都是真实的发自内心。

我跟马蒂亚斯表达了这种感受，他回答说，这些积极正面的影像正是他们策展的难题之一。“比如我们想展示一段纽伦堡纳粹党代会游行，就基本上只有当时宣传的素材，你就得展现当时那些宣传者希望展示的，如同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电影《意志的胜利》，她和霍夫曼一样，只选择最好最有力量的一面。”那么怎么办呢？一方面你得尽力寻找影像中的漏洞之鱼，比如那些被忽略但得以保留的另类照片——纽伦堡人满为患，许多外地来的参观者只能睡大街等等。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你得时刻意识到，往往只有加害者视角的记录保存下来，这在集中营影像上最为明显：那些留下的照片都是党卫军拍摄的，而他们希望展示的是什么都很干净，一切都很有秩序，人们甚至会排着队去给自己挖坟墓，再排着队非常规矩地五人一排站着等着送死，“你看到照片会想，为什么他们就老老实实去送死？但你看不到那些秩序之外的照片，比如有人试图逃跑，有人试图反抗，各种尝试你都不会看到。”可是，“如今我们办展览仍然只能用他们（加害者）的照片，时隔多年，他们的照片仍然闪亮如新……”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听到“闪亮如新”这样的描述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是理解马蒂亚斯所说“解构天堂”与“阐明联系”之意义的又一维度，也足以展示历史之冷酷的冰山一角——我想起普里莫·莱维在他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里转述一个幸存者的回忆，说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做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当然，历史的走向并未让疯子如愿，但我仍然忍不住想到那些被淹没而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人与事（就像《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一书中的：“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以及，文字与影像，到底谁更容易被人玩弄和操控呢？

## 05

那群年轻的中学生在展区只逗留了一会儿，就直奔希特勒的地堡而去。1943 年，希特勒下令在综合体下面修建地堡，但从未真正完工——如今的地堡多数穹顶铺着灰色水泥，少数露出红砖，还有的保留着大约炸山时留下的破碎岩体。游客在穹顶和墙壁留下各种划痕及涂鸦：乌克兰、秘鲁、波多黎各、1999 年 12 月 24 日、1995 年 9 月 25 日、来自德州 Laredo 的科林斯一家、美国人都是 gay……不知是不是有意，地堡照明很差，有的地方得借助手机灯光，我边看介绍，边似懂非懂地寻找空气阀门（防毒气攻击）、钢筋混凝土缓冲层（防爆炸冲击波）、以及安装机关枪的位置（由于担心盟军空降兵，所有入口都保证火力三重覆盖），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内部竖井。这里原本用作地堡上下层升降电梯，介绍说有 15 米之深，从地底直通山宫，我隔着铁栅栏探头一望，黑不见底。井壁上部垂下许多细长的冰柱子，细看才知是矿物结晶体，此处空气潮湿，水滴顺着“冰柱子”留下来，再落入看不见的黑暗里，听不到回响。后来马蒂亚斯告诉我，他们一直在抽水，但设施太昂贵了，很难保证整个系统不再渗水，这也是他们不再开放更多区域让游客参观的原因，至于那些结晶体，“从 1945 年开始生长的，大概才 70 多岁吧。”

在战争末期，关于上萨尔茨堡有极多传闻，盟军猜测希特勒在建造一个巨型“阿尔卑斯要塞”，作为他的最后阵地。实际上，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东普鲁士的军事基地，来上萨尔茨堡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最后一次到山宫是 1944 年 7 月 14 日（六天以后的 7 月 20 日，就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刺杀行动，希特勒侥幸躲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此时，他在阿尔卑斯山间塑造的亲民形象已经成了他的麻烦，“当一个国家里许多人的儿子和丈夫们战死沙场时，你是没法让你的人民看这些散步照片的。”马蒂亚斯说。

第三帝国末日临近之际，希特勒的党羽纷纷乘飞机从柏林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戈林把他的老婆孩子送往贝希特斯加登，往他在那里的银行账户转了 100 万马克，还把他掠夺来的艺术品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往贝希特斯加登，而鲍曼则在上萨尔茨堡剥夺了戈林的权力，并将其软禁。施皮尔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记述了他冒险飞回柏林同希特勒道别的情景。他留意到，希特勒对是否要撤到贝希特斯加登还在摇摆，希特勒问他的意见，施皮尔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他应该留在柏林，而不要撤到他的“周末屋”里。希特勒最终决定留在柏林，而不要当一个“可耻的难民”，“坐在贝希特斯加登发布没用的命令”。有趣的是，此时，纳粹开始贬低这座山的意义，倒是盟军还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决定摧毁山宫。

1945 年 4 月 25 日，盟军飞机轰炸了山宫和上萨尔茨堡的其它目标，4 月 30 日，希特勒和爱娃在柏林地堡内自杀，5 月 4 日，纳粹残余党羽在被炸过的山宫内洒满汽油，点火焚烧，随美军进入上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Lee Miller 拍下了她的同事兼男友 David Scherman 看到山宫燃烧时目瞪口呆的表情。

为 Vogue 杂志供职的 Lee Miller 是最早一批到达山宫遗址的记者之一，在此之前，她去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在那里，她脱下军装，坐进了希特勒的浴缸，David Scherman 快门一按，摄影史上著名的《希特勒浴缸中的女人》就此诞生——此举不乏争议，一种正面解读是，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侵入了受害者最私密的空间，打破了纳粹加诸这些地方的神秘氛围。Miller 还试用了一下希特勒的私人电话，那部电话标记着柏林、贝希特斯加登、山宫等地点的号码，她甚至还在爱娃的床上打了个盹，“那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睡在已经死掉的一对男女的枕头上……如果他们的死讯为真的话。”

空袭过后，美国空军 101 部队、其他士兵还有本地掠夺者带走了山宫与鹰巢中的许多宝贝，这些东西由此流入世界各地藏家之手，直到今日，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还在自己的网站向人们征集相关藏品。101 部队的一位成员回忆起那次“合法劫掠”，说

美国大兵都盼着它呢，“我们后来重聚时听到一些故事，譬如一些低军衔士兵在贝希特斯加登发现了无价之宝，埋在某个地方，打算将来去挖出来之类的。”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一年 8 月也随军参观了山宫，在为《生活》杂志所写的报道里，她说，“这儿有三百万美军，每一个人得有至少六个纪念品。我的天，他们说解放了这些东西。这是一台被解放了的相机。他们自己倒是解放得很。”和 Lee Miller 一样，斯泰因也来了一次戏仿：与美国大兵站在希特勒的阳台，集体做了一个“胜利万岁”（Sieg Heil）的纳粹手势，背景是山宫的废墟和上头英文的涂鸦，照片也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上。

战后，战胜国英美法与苏联分别占领德国，建在上萨尔茨堡的纳粹综合体被改造成成为美军疗养中心（Armed Forces Recreation Center, AFRC）——根据记录，截至 1945 年 9 月 6 日，美军在此地一共收缴了纳粹留下的 15000 对滑雪板和 12000 双溜冰鞋。这里的所有体育运动都向美军开放，极受欢迎，一到周末就满员。“关于巴伐利亚奇妙仙境的故事在驻欧美军中飞快地流传”。

曾经的“山宫”被划在疗养中心范围之外，仅余残破建筑，但一直有参观者来寻，有的只是好奇纳粹曾经的“精神家园”，但亦有新老纳粹混迹其中，人们开始担心上萨尔茨堡成为某种危险思想的朝圣地，于是，在 1952 年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七周年之际，美军当局决定将其彻底夷平，然后在遗址上栽种树木。“从今天看，我觉得你能做的最坏的决定就是把一切都给炸飞。”马蒂亚斯说，“但（当年）这个决定也受到了巴伐利亚州许多党派的支持，算是有广泛的共识。”

## 06

整个 1950 年代，联邦德国对历史的态度颇为暧昧：不否认，但往往扭过头去。炸飞山宫，“假装无事发生”（马蒂亚斯语）的做法，就成了处理不愉快记忆的一种选择。更多的纳粹高官使用过的建筑，要么被遗弃，任由荒草和灌木接管，要么改头换面，令其“正常化”——同样都是“假装无事发生”。1960 年代末以后，尤其是 1980 年代以来，西德日益直面自身黑暗历史，在柏林，公民组织开始推动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但在遥远的上萨尔茨堡，一切都要慢一些。

“一直有各种团体来到这里，说为什么直到现在这儿也没有一座博物馆？为什么你们一直在忽视希特勒在这里的历史？为什么这里不提供历史的信息？”马蒂亚斯说。1990 年代之前，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推脱说，美军仍然控制着这一地区，他们能做的有限。马蒂亚斯在贝希特斯加登出生长大，他记得小时候不时会看到来这里度假的美国大兵，个个强壮，还有他从未见过的黑人，“非常稀奇”。比他大一些的孩子会给这些美国大兵当导游，带他们徒步或者漂流，赚上一笔外快。更多人则通过售卖各种纪念品挣游客的钱，马蒂亚斯给我展示了好几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画册，颜色鲜艳，标题抓人（比如其中一本封面印着“希特勒与爱娃：在上萨尔茨堡的记录”），看起来像是中国人熟悉的地摊文学。他告诉我，这些画册都是本地卖家或者地方旅游部门自己印刷的，有的一年能卖三千本，还有德语、英语、波兰语等等不同版本，“他们没做任何历史研究，只是堆砌图片……对过去不加批判地呈现，比如讲述希特勒的受欢迎程度，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他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比如这张照片里头是巴伐利亚州州旗，但在第三帝国时期，不可能出现州旗，所以肯定是他们 PS 掉了纳粹的万字旗，用州旗替换了，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人们购买时不会感到不舒服……现在这种画册在二手书店也可以买到，当店主把画册摆在书架上的时候，他们会在封面的万字旗上贴一枚硬币（德国法律不允许正面展示纳粹的意识形态标志），这样就合法了，而人们也都知道硬币下面是什么。”

1996 年，美军撤离上萨尔茨堡，将疗养中心归还巴伐利亚地方政府——现在，后者终于不得不认真面对上萨尔茨堡及其背后整个纳粹历史了。和那些过去的集中营所在地（譬如达豪、布痕瓦德尔）不同，上萨尔茨堡、纽伦堡、慕尼黑这样的城市，更多与受害者历史有关。在受害者的城市，建起一座博物馆或者纪念碑是相对容易的，在加害者的城市，你该如何“纪念”呢？一直到 1990 年代乃至世纪之交，德国人都为此感到棘手（我曾看到资料说，当美军撤离时，州官员甚至感到害怕，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本地的历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迟至 2001 年，纽伦堡的文献中心才建成开放，而慕尼黑，这座孕育纳粹之地，直到 2015 年才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文献中心，比较起来，1999 年落成的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已经算是先行者了。

其实“文献中心”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这一棘手问题的部分回答。在“文献中心”，你可以以文本和图像为主，而在“博物馆”，你无法回避物件。文本和图像大体是安全可控的，但物件则有某种难以消弭的实感，哪怕被批判性文本环伺，仍然散发出某种可疑的蛊惑力。想象一下，一个展览里不但有恩斯特·罗姆（Ernst Roehm）用过的匕首、纳粹冲锋队的制服，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艺术品——这是真事儿，2002 年 8 月，慕尼黑城市博物馆（Stadtmuseum）计划举行一个名为“慕尼黑：1933–1945”的展览，被市长 Ude 紧急叫停。Ude 提前参观了布展，发现里头满是纳粹物件，且缺乏批判语境，几乎成了“冲锋队的传奇秀”，而同样提前参观布展的媒体也批评说，这是与纳粹崇拜之物的危险调情。另一方面，极右翼与新纳粹在巴伐利亚地区的日趋活跃，避免“物件”成为他们新的邪教崇拜也是现实考虑，所以有人会说，去神圣化是任何文献中心的重要使命。

马蒂亚斯告诉我，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也不时会有新纳粹参观者，“你能从他们 T 恤、衬衫上的宣言或者他们的文身看出来。”文献中心的政策是，你可以进来，但不能露出任何极右翼的标志，否则就会被请走，“我们不希望这里出现任何右翼的宣传。我们也不想他们吓着其他客人。”有一次，文献中心进来了 7 个光头党，前台有点害怕，就给马蒂亚斯打电话，马蒂亚斯从办公室上到展厅，跟对方解释，你们露出了标志，得离开这里，不然我就只能报警了。好在，7 个人没说什么就走了。

文献中心内部有过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把 3 欧元门票给人家退了，虽然按照法律，不必退票。同事们讨论的结果是，不与极右翼分子争论，“所以如果他们要求退票，我们就会退。”他说，一年下来，文献中心会请出去大约三四十个人，到目前位置，还没有人要求退票。

前台的留言簿上，有时可以看到新纳粹分子画的万字旗，不过不算常见，而且通常问题会自行解决。马蒂亚斯给我看了留言簿上的一次“对话”：一个参观者写道：“真相被毁灭了”，“第三帝国好，现在一切都不行了。”有人回复：“真够笨的。”第二个人回复：“再也不要希特勒了。”第三个人回复：“你都学了些什么啊？”也许应该提及的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误会：在当今德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不允许出版的。马蒂亚斯告诉我，1945 年，希特勒被宣布为纳粹首要战犯之一，他的所有财产都被剥夺，归属巴伐利亚州，“所以，从上萨尔茨堡的土地到希特勒的著作权都转移给了州政府，州政府对出版《我的奋斗》没有兴趣。”根据著作权法，作者死去 70 年后，著作进入公版领域，到 2016 年 1 月，德国才第一次出版了《我的奋斗》，不是原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原版”），而是附带了专业学者评述的，厚厚的核实点评版，点评者就是马蒂亚斯在慕尼黑当代政治研究所的同事——时隔多年，巴伐利亚人终于处理好了土地与书本这两个截然不同又同时承载着狂热的纳粹遗产。

07

在上萨尔茨堡文献中心开放之前，本地曾有人担心，这么沉重黑暗的历史是否会吓退游客？毕竟，旅游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二十多年后，事实证明这是多虑了。许多来此远足或者滑雪的游客，都愿意花一两个小时来文献中心转转，了解当年的历史，还有许多人会从慕尼黑或者萨尔茨堡专程赶来。而本地居民也越来越认同这个文献中心，马蒂亚斯颇自豪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有时会有晚间讲座，在慕尼黑，如果你办一个历史讲座，可能只有 60 或 80 个人参加，但在这里，通常都能有 150 个人。”关于旅游业，更敏感的地方是文献中心下一站的凯宾斯基酒店。这座建立在戈林别墅旧址上的五星级酒店，前身是洲际酒店，当初建立时争议不断，甚至被媒体冠以“希特勒酒店”之名，酒店内的各项细节也被媒体与公众事无巨细加以审视：整体设计有“不恰当的德国性”、卫生间的淋浴龙头被指疑似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的假水龙头、员工制服被指像是纳粹时期褐衫军的制服……不客气的批评者用几近玄学的语气描述置身此间的感受：“此地的历史正发出无声的吼叫，这是权力之地的象征，权力留下的气场还留在这里，这是风景当中的意义之重……”本地历史学家谈起人们想在这里休闲度假的想法，干脆说，“这就是我们的这座山。它不可能得到休息，也不允许休息。”当你把所有这些——对一座度假酒店的“苛责”、对右翼标志的“严防死守”、对“文献中心”与“博物馆”堪称龟毛的区分——联系在一起，恐怕也会像我一样发出疑问：至于吗？是不是有一点儿……神经过敏了？甚至，这是否构成对某种价值（譬如，言论自由）的侵犯？我问了马蒂亚斯一个更直白的问题：你们这么多年来致力于提醒人们风景与暴力的联系，是否可以这么说：你们就是希望人们在道德上感到不舒服？这是他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你是完全正确的。当你来这里度假，你知道希特勒也曾在这里度假……他在这里做了许多决定，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些事情发生过，就发生在德国……这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悲剧，这是逐步发生的一个过程，人们得知道民主和人权是怎么一点点被拿走的，得知道这一切可以走得多么远。”他又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清晰，都非黑即白。我们希望人们认识到，许多事情发生在黑与白之间，事情是一步步发生的，你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走到了哪一步，如果你决定参与某个进程，你得知道它会通往某一个结果，或者你决定置身事外，不参与某个进程。所以我们不会提醒游客你有可能被赶入毒气室，或者被大规模屠杀，而是会提醒，你处在某一个进程中。”

处在某一个进程中。

我想我是后来才对这句话有了自己的理解：政治讨论往往也是历史讨论，因为只有回看历史，才会看清许多事情，看清什么因导致了什么果，但反过来，这种基于历史的神经过敏和道德上不舒服的感觉又会帮助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少犯错，所以，最终，它指向的是“责任”二字。这也许是理解德国许多事情的起点，哪怕有时候你觉得“太过了”，那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失责导致不可控的后果，一如 1933 年到 1945 年间发生的那些事情。

08

趁着天光尚在，马蒂亚斯带我走出文献中心，沿积雪未消的小径而下，去看山宫遗址。那是一片铺满落叶的林中空地，因为几十年来泥土和腐殖质的堆积，我们此刻站的位置比当年山宫的一楼要高出四米左右。按 1952 年美军计划，这里本应彻底夷为平地，不知为何并没有清理干净，留下了一些残破的墙体，如今它们与树木暴露在外的根系混在一起，突起于腐殖质和落叶间，又被岁月抹上了苔藓的绿与风化的白。马蒂亚斯指着一处新近被挖出的砖石，“这里总能见到来访者，有时候冬天积雪一米厚时也不例外，你能看到有人在转悠，在雪地留下一长串脚印。”他不时会来这里看看，总体印象是，多数人只是好奇，但也能见到一些想要挖出点东西的人，有人甚至还会带上金属探测仪。他给我指点当年通往山宫的公路，山宫主入口的位置，车库的位置，当然还有希特勒引以为豪的全景落地窗的位置——从这里望下去是比文献中心露台还要壮观（胜在峰峦更为参差）的阿尔卑斯山景，近处有起伏的高尔夫球场绿地，冬天则是个小型滑雪场——这片土地，二战前属于三户经营了上百年的家庭农场，1937 年被迫卖给希特勒，加以清理，以便给元首留出绝佳视野。战后人们在山宫遗址种植树木，等它们长大后多少遮挡了一点从前的视野，马尔蒂斯说，五个月前，有人砍掉了一批树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要给希特勒更好的视野吗？”他开玩笑。常有电视纪录片团队来此拍摄，德国的，波兰的，俄罗斯的，日本的，他们对此倒是很高兴：少些树木遮挡，镜头看起来更美。编导们总是喜欢在“山宫”废墟上采访马尔蒂斯，让他对着镜头告诉观众，这里就是希特勒曾经站着的地方，“好吧，这可不是我乐意的介绍的方式。”关于这片林中空地如何处理，德国国内有许多声音。有人觉得应该封闭不让人进来（听起来像 1952 年炸飞一切方案的变体），有人觉得不但应该开放，还应该在这里建一

座犹太教堂，还有人说，不如在这里开一个麦当劳餐厅吧，把这里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劳永逸解决极右翼来访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用商业和流行来表达对纳粹的轻视。马尔蒂斯说：“是啊，表达了‘我们不在乎你’，如果希特勒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到羞耻吧！哈哈。”直到 2004 到 2005 年间，这里才立了一个信息牌，上面用德英双语简要介绍了山宫地区的历史，告知参观者残迹是山宫南坡的承重墙，并特别提醒，“上萨尔茨堡不仅是希特勒的私人乡野度假地，也是德国国内仅次于首都柏林的第二大权力中心。希特勒掌权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此度过。重要的政治决定与谈判曾在此进行，由此做出了一些断然决定，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和犹太人大屠杀，以及数百万人死亡。”

显然，一些右翼参观者对介绍牌上的一些字眼不满，德语部分有三处划痕，分别是悲剧”和“犹太人大屠杀”，还有一处是“奢侈的”——原文用来形容山宫，为什么右翼人士不喜欢这个形容词呢？“因为他们想要相信他们的领袖只是一个普通人。”马尔蒂斯说。他告诉我，因为经常被人划掉字词，介绍牌每隔两三年就要更换一次。他又让我看旁边的树干，有游客留下的划痕，W、保罗什么的，一棵树上的“HH”和“SS”异常刺目，“我们相信 HH 指的就是 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而 SS 指的当然是党卫军。”他记得 2017 年 10 月那次来的时候，还发现有人在树干上刻了 7 个纳粹万字旗，刻得很深，但没过几星期，又有人把这些纳粹标记给划掉了，“用的也许是小刀，也许是钥匙。”

已是黄昏，浓重的云层下出现了玫瑰色的晚霞，远山的颜色迅速变幻着，加深着，我脑中突然冒一句英文：memory is a battlefield（记忆乃战场），它盘旋着，回荡着，久久不曾离去。



杨潇

记者，作家，哈佛尼曼学者。特稿写作从业十余年，获奖若干，出版有作品集《子弟》，非虚构新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2008年5月19日，北川中学的复课仪式后合影时，同学们都不约而同靠得更紧。  
这张照片后来被国家档案馆永久收藏。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非虚构

# 北川中学： 如今这里废墟丛生 再没了鲜花

杨潇 | 非虚构图书馆

2008年5月12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北川中学最后一次出现“生命迹象”是在5月18日下午，日本救援队的生命探测仪接收到了这个微弱的信号，有人还试着去敲击石板，似有回应。当晚11点，信号消失，正在艰难进行的营救活动被迫中止。大雨随后下了起来。

## 01

北川中学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唯一的高中，这里的“学习生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高中并无二致——也许还要更紧张些。

6点半，起床，洗漱，早饭；7点进教室，早自习前的“早早自习”，7点35分，早自习，然后是第一二节课；9点55分，课间操；10点25分起，第三四节课。11点55分下课，午饭，午觉；14点15分开始上课，一二三四节过后，17点55分吃晚饭；18点30分必须回教室，19点10分准时开始晚自习，一二三四节，直到22点20分；22点45分左右，寝室熄灯，一天结束。

如果把这个时间表延伸到周日，那就适用于5月1日以后的高三。如果让晚自习在21点30分结束，那就是初一和初二。

5月12日这一天，11点55分下课铃响过，高二（3）班的王建照例快步走出教室，拿起摆在窗台上的饭盒，就向几十米外的新食堂跑去。大眼睛，黝黑，勒布朗·詹姆斯的球迷，新食堂能看电视，当天的体坛快讯，有NBA季后赛骑士队扳回一场的新闻。同学陈淋富和熊强落在后面，他们用一张饭卡，总是结伴而行。在北川中学的食堂，红烧肉2.9元，素菜0.9元，米饭0.25元一两，如果以4两计，大约花4.8元可以吃得不错。不过陈熊二人在班里以节俭出名，他们通常是两人合吃一份菜，这样，每个人每顿可以省1.9元。

12点35分到1点55分是午休时间，高二（1）班的王玉回寝室时，听到高一的师妹抱怨自来水时而断流，时而冲力很大。她没放在心上，“平常每周一三卫生检查，用水用得，水也会变混，或者变成乳白色。”

有人说，5月12日那天太阳特别特别地白，还有人说，那其实是个多云的阴天，太阳只是偶尔往下面看一眼。

## 02

5月12日正是星期一。由于有升旗仪式，这一天从北川老县城开往北川中学的班车比平常早5分钟发车。早晨7点50分，李佳萍在翻水桥上上车。

1966年出生的李佳萍留长发，穿一件有老虎斑纹的上衣，扣子错开，款式别致，在这座不大的县城里，她总是尽量让自己的穿着不显落伍。5月11日，她在老城买了一双标价280元的凉鞋，回家后往沙发上一摆，就喜滋滋地让丈夫刘全猜她“划到多少”。

李佳萍调到北川中学教政治不到一年，之前一直在山里教乡村小学。从民主小学，到解放小学，再到大包小学，总的轨迹是由远及近，最后由民族中学入北川中学，结束了和丈夫7年的两地分居。

14岁的徐梦涛是学校为数不多的通校生，他的家紧邻马路，是南方国道边常见的那种贴着白瓷砖的二层小楼，由门口的马路一直往北，步行十几分钟即是北川中学。

徐梦涛的父亲在北川县城做泥水匠，母亲帮工，中午匆匆赶回家来做饭，通常没时间买菜，就随手在自家菜地里拔了点青菜炒炒，在徐家，只有晚餐可以吃上肉。

母亲记得，12日中午徐梦涛没睡觉，吃完饭就一直“在家里耍”。玩到1点半多，母亲把他送出门。

徐梦涛所在的初二（2）班，位于旧教学楼一层。关于这栋楼的建成年月，几乎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版本。相对统一的说法是，1992年开始挖地基，修到二层时因为资金问题停工，此后修修停停，直到1997年才告竣工。

北川中学的老教师记得，1995年前后，北川中学最早的一批教学楼之一，一栋三层的老砖房曾发生瓦片掉落砸伤学生的事故，一度引起了当时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李忠平的关注。此后，建房速度有所加快。

建成后的教学楼共五层，呈L形。L较短的一翼，作为办公楼使用，较长的一翼，则在1998年接纳了从两栋老砖房搬来的大量学生。10年后的今天，以19个班的在籍学生统计，在最高峰时期，这个巨大的L要吞吐1134名学生。

## 03

接近下午2点的时候，李佳萍走向初二（4）班，这个巨大L的一楼内角。和她同一层，徐梦涛进了校园，朝着初二（2）班走去，年轻的物理老师张家春则拿着指南针和教案，走向了旁边的初二（1）班。

北川中学西面临山，沿山有一块台地，被辟为新体育场，400米标准跑道，即将竣工。由西往东，地势逐步降低，依次分布着新教学楼，旧教学楼和旧操场。

下午1点50分以后，午休过的住校生也纷纷从两栋宿舍楼里走出。一群人往南，走进临近的新教学楼，这其中就有陈淋富和他的室友刘继科，还有高一（1）班的姜栋怀。

高一（1）班的教室在旧楼五层，但当天下午的第一节是艺术欣赏课，姜栋怀便带着中午没做完的化学练习册和自动铅笔直奔新楼二层的多媒体教室。不在自己教室上课的还有高二（8）班和初二（3）班。前者去了另一间多媒体教室，旧楼第3层，L形夹角的最中间，后者临时离开了旧楼，来到了北川中学最老的一栋两层楼上信息课。

宿舍里出来的另一群人往东走，多数人到旧教学楼就停下了，当天，有16个班在这里上课。还有三个班的人继续往东，来到旧操场上，他们是初三（4）班、高一（6）班、高三（7）班。

在北川中学工作了27年的体育老师田强带初三（4）班，由于初三已经考完体育，他安排了自由活动。旧操场不算很大，除了200米的土场跑道外，还有两个半篮球场和两个排球场，这其中，又只有一个半篮球场是水泥地面。

“男孩子都打篮球，初三的抢不赢（水泥场）嘛，就打土场去了。”田强说。

## 04

2点10分，预备铃。高二（3）班的李旭坐在教室里闭目养神，他的同桌陈淋富走了进来，也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两人“哎”了一声，算是打了个招呼。

5分钟前，楼下高二（4）班传来周笔畅的奥运歌曲《梦想在望》，那是他们的唱歌时间。化学老师陈虎已经走到旧教学楼二层办公室外，就是在这里，去年暑假的一次大雨，从五楼一直漏到二楼，泡坏了很多教具。陈虎在办公室门口迎面碰上教导主任戴伟中，两人也打了个招呼，但发现都没带烟，陈虎决定下楼，回家拿烟。

住在学校附近任家坪的李阿姨，和另外三名工人登上新体育场，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校园。塑胶跑道已经铺好，草皮在青黑色的泥土中也长出齐整的新绿，李阿姨们的工作，就是在新操场交工之前，为这一大片草皮施肥。

2点15分，上课铃响。在新教学楼，陈淋富拿着一张物理试卷心事重重，五一前结束的期中考试，因为有选择题填错答案，他的排名跌到了班里的十几名。

陈淋富家住后山璇平镇，中考成绩很不好，但其后稳定在全班前六七名，全年级前50名。他曾经对李旭提起，想要考军校，而在家中，他总是对母亲说，要“考一个不要钱的大学”。因为长期务农，陈母的双手已变成难以洗去的黑黄色，这双手要负担的，是陈淋富一年3000块的学费住宿费。

在旧教学楼，年轻的张家春让初二（1）班的同学翻开了物理课本新的一章。他们刚刚学完了《电》这一章，要开始学《磁》了。

去年9月，张第一次走进这里，用拆字法自我介绍，逗得同学哈哈大笑，随后他在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下“接下来的两年，要由我来陪你们度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几个大字。

毕业于绵阳师专的张家春爱打篮球，“动作很帅，但总也投不进”。他总有办法在课堂上制造惊喜，连描绘水蒸气喷涌而出都能形声兼备，那一天，他掏出道具，想从指南针讲起，却发现指针在不停地打转。同学们以为是他捉弄人，教室又充满了笑声。

## 05

2点28分。陈虎取了烟，准备返回，刚刚走到里屋和外屋之间。李阿姨与她的工友，已经从新体育场的一侧看台下来，准备走向草坪。李佳萍的丈夫刘全，在老县城的家里，刚刚点下电脑的关机关，屏幕还未全黑。

先是一阵轻微的晃动。

初三（2）班的何老师，打开教室门，走到走廊往楼下看了一眼——他们在旧教学楼的二层，班里几个同学开始感到害怕，一个叫李邦裕的男孩干脆直接起身跟着何老师来到门外。有那么几秒钟的平静，何往教室走，李跟在后面，也准备返回。他们的楼下，徐梦涛所在的初二（2）班也出现了骚动，任课老师严厉地对老师说：坐好！不要动！但是几个不听话的孩子站了起来。而临近的初二（1）班和初二（4）班，张家春和李佳萍的共同动作，都是走下讲台，把前门打开。

新教学楼这一边，语文老师何金华正在三楼，给王玉所在的高二（1）班评讲语文试卷。他说了一句话，现在自己还记得非常清楚：“大家不要慌，我们这个楼是框架结构，而且是现浇。”然后他走下讲台，到外面查看情况。旧操场里，高一（6）班的钟丹听到了一种声响，好像是大型卡车驶过，而学校的马路上并没有汽车。

田强感觉到了晃动，他对旁边的两个同学说，怕是地震了吧？但是两位同学认为老师过敏。田强经历过松潘草原大地震，对晃动格外敏感。

#### 06

几秒钟后，从震中映秀镇传来的地震波抵达北川。

陈虎前脚刚跨出里屋的门，衣柜就砸了下来，压住了他的另一只脚，令他动弹不得，他趴在地上，一边颠簸，一遍大喊着让外屋的妻子快跑。刘全躲开了一头栽到地上的电脑和书柜，想往外跑，但是门已经变形，打不开，就在这当儿，他眼看着自家的冰箱，被巨大的震动从客厅一路甩到了阳台。

田强听见脚下的地面发出巨大的吼叫声，他想控制住自己的身体，但是不听使唤，地面上开始出现小的裂口，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的三个班的学生，几乎全数摔倒。高三（7）班的黄耀龙，看到旧教学楼四层，一个人爬出了窗户，顺着水管一路滑到了楼下，很快，二层窗户也被打开，一个人纵身一跃，跳了下来。旧教学楼这个巨大的 L，内角是一个面积不小的草坪，有形状各异的花坛点缀其间，外侧则是一排桂花树，据说每年八月，二楼的同学推开玻璃便可闻到扑鼻之香，更有初中女生，爱在树下徘徊，拾捡掉落的细碎花瓣，放入文具袋中。

紧邻桂花树的是北川中学的主席台，也是学校历次卡拉 OK 比赛的舞台，再出来一些，就是旧操场。操场与草坪之间有消防通道相连。对于仍在旧教学楼里的师生来说，跑到任何一处空地便意味着脱离险境，但这个巨大的 L 留给他们的时间是如此之短。初三（2）班的前门紧挨楼梯，跟着老师出门查看的李邦裕，在感到情形不妙时，一个箭步就冲下了楼梯，何老师在这个时候让出了前门，对着教室大喊让学生快跑，紧跟着跑出来的是母全鑫和王川，他们都在第一时间从二楼跑到了一楼。

一楼也是一片混乱，初二（4）班，李佳萍返回到讲台与前门之间，用手把住门，把一窝蜂涌过来的学生用力推出门去，初二（1）班，有些婴儿肥的傅丽颖记得自己被一个人半抱着甩到了草坪上，先跑出来的同学后来告诉她，那是张家春老师。

事后统计，初二（1）班 67 人，44 人幸存，初二（4）班 60 人，41 人幸存，而临近的初二（2）班 67 人，只有 15 人逃出生天，“很乖”的徐梦涛，不在这个名单上。西侧的新教学楼二楼，高二（3）班，坐在第三列第一二排的母东和陈素勇脚步最快，很快就下到了一层，而等到爱看 NBA 的王建冲到楼梯口，他发现楼梯已经开始断裂。李旭就更慢了一些，等他要跑时，同桌陈淋富已不见踪影，李旭坐第四排，他刚走了两步到讲台上，就被摔回了教室中间，同样被巨大的地波甩回来的，还有坐在他后面的吴全军。

没有人看到陈淋富。幸存下来的同学根据自己的位置推测说，他可能刚跑到一楼二楼之间的拐弯处——那时，楼梯已经像瓦片一样纷纷落下。

#### 07

剧烈的摇晃刚刚开始，田强就看见操场另一侧的三层老砖房开始掉瓦片，这栋建于 1970 年代的房子是最早的教学楼，1980 年代末就被诊断为危房，四周进行了加固，此后曾被改为教师宿舍，由于北川中学学生太多，教室太少，危楼的一部分还被用作初一学生的教室。

他以为这栋老楼保不住了，高喊“楼要垮了楼要垮了”，过了大约 20 秒钟，令他恐惧的景象却在旧教学楼这边出现了，那个巨大的 L，先是向左晃了一下，楼体脱落了一块，紧接着又向右晃了一下，楼体又被甩飞一块，最后，那个花了 5 年才修好的 L，那个容纳了上千师生的 L，粉碎性地坍塌了。“然后烟子一起来，我就看不到了。”回忆到这一段，田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出来，一直流到他浓密的胡子里。

初三（3）班的郑晨，从二楼到一楼，几乎每跑一步，后面的楼梯就断掉一节，等到他跑出旧楼，跑上主席台，一块巨大的水泥块就直接落在他右边不到一米的地方。本来跑在最前面的李邦裕，跑上主席台时回头看了一眼，刚才他还上课的楼此刻已经垮了一半，浓烟从地面升起，这个 15 岁的男生当时腿就软了，“怎么都跑不动了”，然后就是一股巨大的气浪，把他从主席台直接扫到了操场上。大楼垮塌时，初三的大多数女生只来得及跑到二楼走廊——按照防震常识，这是一个比室内更糟的位置，但鬼使神差的是，二楼走廊在整座大楼粉碎性的骨折中保持了完整，它载着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名初三学生落到地面，脱离了死亡——事后有人查看，只有那个走廊的钢筋还是彼此相连的。

三层以上则是高一的学生，他们除了跳楼，几乎没有可能顺着楼梯跑下来，这让这个年级伤亡格外惨重。

位于五层的高一（4）班本来应该去别的教学楼上信息课，但是因为微机室有限，便让给了其他年级，留在自己班里上课。这个班的任东东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几秒钟之间最后一个片段就是我的老师，她瞪大眼睛，张大了嘴，吓呆了，然后我就向下沉，失去了意识。”

高一（5）班在四层，地震之时，天花板上好像有无数石头滚动，发出巨大的声响，有人吓懵了，在教室里呆若木鸡，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卢冬玲记得，讲台的地面先垮了，她眼睁睁地看着老师从眼前消失。同班的吴传杰拼命抓着桌子不被甩飞，他的同桌被剧烈的震动弹开很远了，还一直在对同学喊：“赶快往桌子底下钻！赶快往桌子底下钻！”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同桌。景扬、熊丹和叶红坐头两排，她们只知道在蹲下以后，一条大梁砸在了她们的课桌上，然后，被课桌、椅子、石板，以及呛人的烟雾包裹着，一起跌入废墟之中。整个高一年级 10 个班，只有上体育课的高一（6）全数幸免，其他班一共有 265 人遇难或失踪，占到高一在籍学生的近 42%。以全校论，伤亡最为惨烈的则属高二（8）班，这个班教室本来在新教学楼一层，但那天下午恰巧在旧教学楼三层的多媒体教室上课。这间多媒体教室横跨教学楼一翼和办公楼一翼，是 L 拐角的最中间处，教室用的是铁质桌椅，无法移动，只有一个出口。据目击者描述，地震发生时，教学楼一翼向外垮塌，而办公楼一翼则在垮塌时较为向内，巨大的扭力瞬间把多媒体教室撕裂。校方的统计表上，该班 53 名在籍学生，全部失踪。其他年级的学生，口耳相传，都知道了这个不幸中的不幸。但是学生中流传的说法略有不同，有人说高二（8）班的一个女孩当天早晨生病，请假去绵阳看医生后便没有回来，更多的人说有一个叫张波的男孩子，紧抱立柱，顺势而下得以生还，有人还认真说看见他就在安置点附近做志愿者。这些受到惊吓的孩子，宁愿相信这两个不那么绝情的版本。

#### 08

等留在新操场的李阿姨回过神来，旧教学楼方向只剩下一团巨大的黄色浓烟，操场临山的一侧跑道，则落满了小汽车大小的石头，最大的一块，体积超过一辆越野车。她从地上爬起来，凑到靠近新教学楼的一侧，眼看着那栋五层的大楼，慢慢地倾斜，然后底下两层就突然从地面上消失了，原来高二（4）班的位置，留下一堆突然拱起的木料。

高三（10）班在新教学楼的五层，其时天旋地转，一顶日光灯，仅剩一根电线牵引着，在教室里摇摇欲坠，6 顶吊扇全部经受住了考验，没有砸落下来——在整个北川中学，只有新教学楼的教室才配有风扇。巨震略有平时时，李明突然发觉，窗外的树和山都在缓缓上升。

应该是在稍后，高二（1）班的王玉看见同学都往窗台和走廊上涌去，一些男生开始往下跳。她想冲过去劝阻：这是三楼啊！走到跟前才发现，楼下的两层消失了，她所在的三楼已经变成了一楼。

高三的 10 个班全部在新教学楼三层以上，所以他们成为了唯一一个没有伤亡的年级。李阿姨描述，这些高三的学生，有的从窗户上跳出来，有的从楼梯上走下来，聚在一起后就往低处跑。

王玉也在其中。当时余震不断，高三的师兄带着她们，要去老操场躲避，刚往前走几步，就看见了已成平地的老教学楼。那么多的高年级男生，就站成一排，呆在那里，然后齐声地放声大哭。

哭过之后，便是自救。此时，旧操场中，田老师已经吹响了集合哨，他把初三（4）班的学生聚拢起来，一声令下：“女生不动，男生跟我去救人！”

初二（3）班的学生从微机室里出来了，北川中学年纪最大的一所楼房也经受住了考验，只倒了门口一个砖砌的屏风，这块屏风白底红字，毛主席语录、“四个面向”都曾在上面驻足，在地震发生前，这里刷的是北川中学校训：正德惟和，实干创新。初一的孩子们也出来了，那栋 20 年前就被划为危房的老房，房顶全被掀掉，但楼体未垮，这也使得初一成为高三之后伤亡最少的年级。

#### 09

一根大梁支住了新教学楼东侧的楼体，在地下形成了保护空间，高二（3）班的母东、陈素勇、王建，以及高二（4）的很多同学陆续被救了出来；来不及跑出教室的李旭、吴全军与另外 8 个同学，被困在更深处，黑暗中，他们唱起了《最初的梦想》，这是他们的班歌，24 个小时后，他们也获救了。

仍然没有人看见陈淋富，几个好友对他的最后印象，就是物理课上他那写满压力的脸。高二（3）班的隔壁是新教学楼的多媒体教室，地震时，高一（1）班正在上音乐欣赏课。和旧教学楼的不规则断裂相反，王明芳记得，就在大家趴在桌下不久，整个天花板压了下来，砸在课桌上面。

后排的姜栋怀和徐波被困在一起，徐波醒来时，听见外面非常吵，姜栋怀的头顶在自己的大腿上，他用唯一能动的右手摸了一下姜栋怀的头，感觉他在颤抖——一块石板隔着一道防盗门压在他的身上。

过了不知道多久，姜栋怀醒了，他让徐波叫人救命，又对同学喊：我只能坚持 15 分钟了！徐波清掉了姜栋怀身上他够得着的碎石，不断地鼓励他，我们是兄弟，一定要活下去！姜栋怀是火箭队的球迷，“无兄弟不篮球”，有 NBA 直播的中午，他总拉着徐波一块在食堂边吃饭边看比赛，慢慢地，徐波也开始关注火箭的比赛来。姜栋怀的父母在外省打工，他和爷爷住在一起。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徐波听到姜栋怀的爷爷和小姨在外面叫他，徐波一边帮应着，一边不停地推他、喊他，让他别睡，但他已经没有声响了。

后来，学校的老师在姜栋怀遗体旁，看到一张白纸，姜栋怀在纸上划出了这样的字迹：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

#### 10

晚上 7 点，越来越多的家长和亲人聚集到现场，一边哭，一边往地下喊。徐梦涛的父母从北川老县城死里逃生，赶到旧教学楼的废墟上，找到了初二（2）班的位置。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还能说话，一个劲地喊：妈妈，我要出来，你喊我爸爸把我弄出来！



他们拼命地刨啊，刨啊，这里的红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粘合，一拿就散，但是徐梦涛埋得太深了，在专业救援队到来前，他们只能眼睁睁地听着自己唯一的孩子“活活痛死”。和李佳萍困在一起的有初二（4）班的邹红。借着手机灯光，邹红发现李佳萍左半边的头发和头被压住了，一直在流血。李佳萍让邹红扯她头发，但是没有剪子，扯不掉。余震不断，每震一次，底下的空间就小一分，邹红听见地面上不断有车子开过来，开过去，自己的心情也随之一次次地从谷峰跌入谷底，她说，要是再多听一次这种声音，她就会自杀。

大约是知道自己不行了，李佳萍把自己的两枚戒指和一个手镯取下来交给邹红，嘱咐她带给自己的丈夫刘全老师。这个顽强的女人，一直撑到 14 日上午。徐梦涛的父母在废墟外面等了三天，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孩子背上压了一块巨大的水泥板，除了嘴角流血，几乎看不见外伤。看完自己的孩子，他们拖着被雨打湿的衣裤，回到了两公里外的家——那栋白色的二层楼，是徐梦涛父亲几年前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在这场地震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有人问教语文的陈老师，高三最后一次诊断性考试的作文题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才记起，说是在暴风雪中，有一种牛背着风躲避，另一种牛迎着风前行，暴风雪过后，后一群牛生存的机会反而比较大。

但是他更愿意谈起 3 年前他给学生出一道作文题。那是 2005 年的春天，他在旧教学楼三楼给高一上课，当时北川刚刚下了一场雨，雨滴从顶层一直渗漏到三楼走廊上，在走廊上积了一大滩水。雨后初晴，这滩水又反射阳光到教室的天花板上，一时光影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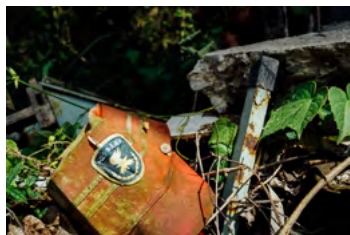
“同学都在看，你让他们停下来不看，也不见效，于是我就让他们立刻把这个情景写下来，写一两百字。”陈说，大多数的学生写得很美，但有一个淘气的学生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我记得：好一块豆腐渣。”

## 11

这场地震夺去了北川中学至少 696 位学生、40 位教师的生命。幸存者们原本一直低着头，甚至在高唱国歌的时候，但当 5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09 分，那块黑旧的木牌被北川中学校长高高举举起时，他们都抬起了头，眼眶里都噙满了泪水，一位女生哭得几乎昏厥。

木牌上书“四川省北川中学”，原本悬挂在学校的大门右侧，地震后，北川中学一位老师把它带到了绵阳。现在，它在长虹培训中心被重新挂起。同日，高三宣布复课。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 年 5 月。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重返北川中学 (地震半年后回访)

一种隐匿的情绪在北川中学的老师中蔓延。它在食堂里，操场上，在一字排开的板房办公室间，在“无私的奉献，是人性最美的光辉”的标语前，在学校附近外表艳丽内里简陋的川菜馆中被分享与交换，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出口。

## 01

进入 12 月份，冬天的样子越来越清晰，下午四点一过，学校的草坪上就准时刮起凉风，43 岁的刘宁，穿着略显肥大的外衣，考虑着秋衣秋裤的换洗问题。秋衣秋裤只有一套，已经穿了两个星期，外衣倒是有两件，都是老丈人的，身上那件还算是相对“合体”的，另一件更为肥大，穿着上课时，已经被学生们笑过一回。刘是初二的政治老师，地震前在北川中学新校区任教，5 月 12 日那天因为带着两个班的孩子去县委礼堂参加五四青年表彰大会而幸免于难。新校区整体为巨石所埋，只有三个老师跑出来。

刘的故事第一次被讲述，是在 5 月 14 日上午。当时，刘和妻子正在学校本部抱着独女的尸体痛哭，女儿刘怡，初三（1）班班长，在五层楼塌成的废墟中活到了至少 13 日早晨，然后没了声响。刘的同事向旁边的新华社记者介绍了他，稿子很快发了出来。

6 月初，刘宁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问他认不认识一位山东志愿者，这位“志愿者”在背着东西离开北川县城时被特警拦住，他辩解说是为北川中学的刘宁老师取东西。刘宁这才知道，自己上报了。

故事成了事迹，生活仍得继续。6 月 8 日，唐家山堰塞湖开始泄水，刘拖着伤腿从医院回到学校所在的绵阳长虹培训中心。4 天后，震后一月，堰塞湖警报解除，但遇难学生家长的情绪难以排解，12 日，北川中学的废墟上，围了三四百位伤心欲绝

而情绪激动的家长。

刘也想去祭奠女儿，但负责“帮扶”他的老大姐劝他，作为教师，不能参与这件事——在震后，绵阳市教育局为每一位有子女遇难的老师都配备了帮扶干部。“市里很紧张，连夜打电话到学校里来。”一位知情者说。校方紧急动员，要求老师以大局为重，不要前往。

6 月中旬以后，情势稍缓，学校派老师分批前往旧址，看护剩余的一些财产。在那个“最伤心的地方”，刘宁待了四天，中间回了一次老县城的家，“都泡在稀泥巴里了”。墙壁上有泄洪留下的水线，距天花板不到两寸高。他只从泥巴里挖出了女儿的相册。

## 02

7 月份，媒体的关注渐渐衰减，但对于刘宁来说，最艰难的工作才刚开始。放暑假了，遇难学生家长安抚工作也随之启动，“能安排出去的老师都去了。”校长刘亚春回忆。刘宁“不幸”被分到了曲山镇片区，这里受灾最严重，刘宁两周走了 70 多户，没少挨骂，“有一家人，房子垮了，读中学的两个子女都走了……骂政府救援不及时，骂学校教学质量问题，骂你老师怎么现在才来，来了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刘宁说，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流着泪，红肿着眼睛听家长骂，再说一些“安慰和稳定的话”。而老师们能给家长带去的唯一好消息，就是一张承诺书：遇难学生若有弟弟妹妹，以后读北川中学可以免去一切费用。

北川中学原有学生 2793 名，“原本认定 750 多人遇难，后来老师下乡安抚，发现有生还的，最后确定为 731 名学生遇难，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校党委书记张定文说。

对于这些遇难学生的家庭，救助内容包括两项：一次性救助金，每户家庭给予不超过 6 万元；一次性为无养老保障的遇难学生父母代缴 15 年基本养老保险费。张定文告诉记者，最后每户家庭都是按照 6 万的上限给的。

一份《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彻落实四川“5.12”地震遇难学生家庭救助实施方案的办法》表明了救助的资金来源和“民间”性质：由四川省青少年基金会、省教育基金会和省儿童基金会联合向社会各界募集救助地震遇难学生家庭专项资金。

刘宁也拿到了这笔“赔命钱”，基本都用在了还债上，前些年买房和开小卖部，一共向人借了 8 万多元，校门口的小卖部，在地震当天抢的抢，分的分，什么也没留下，位于老县城的家，很快也将在“9.24”泥石流中被彻底冲毁。

然而生活不会总让人绝望，9 月 10 日教师节，刘宁获得“全国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奖是同获殊荣的校长刘亚春上北京代领的，一张奖状两枚奖章，比这更具实际意义的是，妻子怀孕了。

妻子已年满四十，他们本打算调整好情绪，转年再要一个的，但 10 月初妻子检查出身孕后，两个人还是高兴了一阵子，刘宁觉得，这是女儿急着来投胎了。

只是，有了孩子，才发现自己真是“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地震让北川中学失去了 1/4 左右的教师，幸存者几乎每个人都要超负荷上课，在过去，周末补课和晚自习坐班分别可以获得 25 元 / 节和 6 元 / 节的收入，这补贴来自高中生缴纳的辅导费、补课费等杂费，现在，学生不必再交钱，老师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补贴，事实上，“5.12”以后，北川中学的老师还没有获得一分钱的补贴。

妻子没有工作，除去长虹集团给老师发的 2000 元补助，和不知何时发的数百元杂费，刘宁可以期待的，就只有每月 1400 元左右的工资。债仍未还清，每月每家还 100 块，剩下的钱刚够吃饭。10 月 6 日起学校食堂不再免费，早餐刘宁吃个馒头，喝点稀饭，妻子吃两个馒头，再到校门口买一袋 1 元的核桃花生奶，算是补充营养，中餐晚餐 3.5 元或 5.5 元，能吃到一些肉。

10 月底，妻子感冒了，“这里的风大。”刘宁说。怀了孕，不敢吃西药，就到外面去抓中药，也是一块钱一副，住处没有煎药的条件，就在药店煎好，矿泉水瓶子灌了，回来用开水烫烫喝。总也不见好，弄了 20 多天，11 月的绵阳已经很有些冷，晚上睡觉把所有衣服都压在被子上面。单职工家庭，学校发棉絮，只发一个人。妻子找社区，社区说，你丈夫有单位，找单位要吧。

11 月底，他记得是一个星期三，妻子下身突然来血，“打电话给么爸，他说怀孕期间来血是早产儿，我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胎儿心跳已经很微弱了，住院住到周一，医生说不行了，得做手术取出来……”

医生告诉刘宁，孕妇年龄偏大，营养跟不上，心情又没调整过来。

## 03

校党委书记张定文记得北川中学收到的第一笔捐款，那时他还在负责总务。“一个绵阳人，好像是下岗工人，自己做点小生意，送来一袋大米和 100 块钱，我记得是一大把，有 5 元的，10 元的，还有 1 元的。”

地震后一周左右，北川中学建立了一个用于接受捐款的指定账户，为了做到“收支两条线”，所有进入指定账户的捐款须转入县财政局账号，再由北川中学打报告、写申请，最后转回学校的一个私人账户，还要根据捐赠者的要求方可使用。

“总务处负责接收捐款，而我是最终责任人，每一笔钱如何花，这个责任都得我来承担，所以我对程序要求很严格。”校长刘亚春说。

总务主任肖志敏告诉记者，县财政局领导说了三点：捐款者指名捐给老师，用在了学生身上，是对的；捐款者指名捐给学生，用在了老师身上，是绝对错误的；捐款者未指明捐给谁，用在学生身上有余时再给老师用，是对的。“我只有把握这三句话啊。”肖志敏说，从“5.12”到年底，北川中学收到的捐款约有 1200 万元——这和之前一些网上流传的版本相去甚远，张定文则告诉记者，现在北川中学仅学生生活费的支出每月就有 40 万元。

整个暑假，学校都在做招生的准备，“按照往年的经验，高一每年入学的大概是六七百人，结果 8 月 20 日、21 日两天报名的有 998 人，”张定文说，初一入学的也比往年多几十人，加上陈家坝中学过来的 300 多学生，北川中学现有学生达到 3076 名。

这使得原来按 2400 名学生规划的板房宿舍捉襟见肘，只好再请老师们把板房让出来，这才勉强住下。好在长虹很快腾空了培训人员，不少被迫去校外租房的老师又住了回来。

一位老师自嘲说，社会上对我们老师的关心主要是精神上的。另一位老师本有机会去绵阳其他中学教书，为他牵线的朋友看到北川中学的高曝光率，又力劝他留下，“应该不会亏待你们吧”。

与刘宁相似，多数老师在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从“非常”向“正常”的过渡期，但当生活日益步上正轨，或者突然需要一笔大的开销，再或者，当某个模糊的期望突然变得越来越远时，种种日常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

并且，他们还要承受外校同行不明真相的询问，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你们北川中学什么都没有，就有钱。”一位老师记得，在一次会上，一位上级领导甚至对他们开玩笑：以后你们学校的老师上街，要把钱揣好了。

04

总理温家宝曾五次来到北川中学，5 月 14 日，他在学校废墟上指示全力营救被埋师生；5 月 22 日，回到正在清理场地的学校，为遇难者默哀；5 月 23 日，来到长虹培训中心，鼓励大家“面向光明的未来”，在高三（1）班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9 月 1 日，参加学校开学典礼；11 月 15 日，与北川中学师生共度周末，在高一（8）班的教室，他说，“北川中学靠什么保持声誉，真正成为一所培养优秀人才的中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校长和好的教师，要有优秀的学生；要永远保持和发扬在抗震中凝聚起来的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这样北川中学才会名副其实地屹立在四川，屹立在中国，屹立在世界。”

一些人的命运已被改变，比如被保送进北大和清华的申龙和王佳明，当他们作为抗震小英雄被选拔出来赴京参加活动时，他们都很不愿意——“还要高考复习呢”。甚至连学校领导也不知道，北大清华已经向他们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5 月 13 日，温总理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看望灾民，其间曾与北川中学的三名学生交谈，后来，央视委托绵阳市委宣传部，找到这三个孩子，5 月 18 日晚，央视赈灾晚会，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上泣不成声。

只是，央视可以接他们到北京，让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但并不负责改变他们的命运，三个孩子中的其中一位，便来自高三（1）班，“他的心态没有调整好，自己也错误估计了形势，”一位老师当时曾提醒班上的同学，要清醒，“只有高考分数才是真”。

“他本来可以考到一所更好一点的学校的。”老师感叹。

视察、慰问、捐助纷至沓来。有的自带宣传横幅，在操场前、旗杆旁一挂就是几天，有的要求全体学生出席，有的还喜欢把残疾学生推到最前台，握手、拍照、感恩，也有不搞活动的，悄悄运了东西来，签收，看一看学校，就走了。

对于北川中学的学生来说，这半年多看到的大人物和明星之多，以及世相种种，是他们过去无法想象的，一个孩子在 5 月份后重新见到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是不是好复杂？

其实眼下生活已渐趋平静，铃响，上课，铃响，打饭，照例会有一溜烟往食堂跑的学生，也照例有要多看半小时书才离开的学生。作息时间表基本延续了地震前的状态，唯一的差别是，增加了晚上 7 点集体观看新闻联播的时间段——其实这一条的执行，也随着期末的临近渐渐放松。比较麻烦的倒是打扫卫生，从大扫除的时间可以看出前来视察者的级别，最长的要提前一天半就开始——当然，这通常是市里的要求。教室的地板要一桶水接一桶水地冲，好在板房都建在山坡上，排水方便，教室太挤，有时候还要临时去除一些座椅，“多出来”的学生去参加晚会。

对于愤世嫉俗者而言，北川中学更像是一个名利场，一些人来到这里，走走猫步，换回资本，而更多的人相信北川中学仍是一个爱和美好的符号，如一位支教者所言，这所学校回报给了全国人民千金难买的“软件”。也许，事实就存在于两者之间。

11 月下旬，北川中学实施近两个月的“课改”悄然中止。知情人说，“课改”源于《中国教师报》山东站记者李炳亭向校长刘亚春的推介，简言之，就是借鉴山东杜郎口中学的成功经验，教师改变授课习惯，每节课至多只讲 10 分钟，其余时间“闭嘴”，由学生分成小组讨论。

北川中学的老师们对这场实验评价两极化，有人觉得在折腾，耽误进度，也有教师认为权力下放是好事，至少提高了课堂的参与度，学生中亦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无论如何，在 11 月下旬绵阳市决定加快北川中学发展、把北川中学打造成真正的名校后，这场“课改”告一段落。11 月 26 日，绵阳市教育局王和金局长兼任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任常务副校长。同时，36 名中青年教师和管理人员被充实到北川中学。

把这次变局简单理解为“应试教育的回潮”显然是不够恰当的，在网上，对所谓“杜郎口模式”的质疑并不鲜见，有人直斥它“虚假作秀”，而李炳亭的个人博客，则夸赞杜郎口中学是自己推出的典型之一，是“山东教育三面红旗”之一。

根据绵阳市教育局的吹风，如无意外，2009 年初中升高中考试，市区会保证一定数量的高分学生来北川中学就读。

05

也许无论多久，这都会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就好像板房区，有台阶处皆有残疾人便道，时刻提醒你，它的那些过去。有必要记下两位老师、也是两位父亲的两个“白日之梦”——“梦”的开关是时间，一闲下来，坐在床上，那些画面就开始闪回。

A：家里多年不开的君子兰开得好艳。办公桌上两株草长得茂盛。2008 年的好兆头。高考结束就是暑假。带女儿坐坐飞机、看看大海、看看繁华的城市。早就计划好了。

B：衣服。一柜子的衣服。女儿穿衣服。一件一件换着穿。好像拍照一样。拍一张，换一套衣服。穿给爸爸看。

但他们的女儿都没了。

“心灵花园”是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建立的心理辅导工作站，5 月 18 日入驻北

川中学，在志愿者的支援下坚守至今。华南师大心理分析专业硕士生陈灿锐说话很轻，“这里仍然到处都是雷区。”

看起来安全的问题，譬如“你周末怎么没回家啊”，也可能诱发学生的悲伤，“他的父母也许已经遇难，没有家可以回了。”

教师亦不例外。一位家在北川漩坪的老师去绵阳商场购物，办理会员卡时被告知不能只写“长虹培训中心”，而要填写“详细地址”，他立刻火了，冲着服务员吼：哪里还有详细地址！详细地址就是唐家山堰塞湖！

“有问题的，只会隐藏得更深，因为周围多数人已没事了，人都会从众，你也要装出没事的样子，”陈灿锐。“心灵花园”有两个沙盘和数百个小模型，可以在上面自由摆放各种物品，孩子们用得最多的模型有四样：天使、房屋、骷髅头和棺材，“有些孩子摆着摆着就开始流泪。”

在某些捐赠的场合，陈灿锐会看到捐赠者慷慨激昂地发言，而学生们在底下嘲笑发言者普通话不标准，“这是他们对不平等关系的一种对抗，学生们需要的是聊天，而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是灾民，是受难者。”

除此之外，还有焦虑与迷茫，这听起来更像是青春期的通病，当然，有的家长不迷茫，一位老师在高一新生报到时听到一位家长的闲聊：地震能活下来都是万幸，读书无所谓，这三年是重建最关键的时期，三年他读完书，正好回去。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 年 12 月。



杨潇

记者，作家，哈佛尼曼学者。特稿写作从业十余年，获奖若干，出版有作品集《子弟》，非虚构新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2010 年 4 月 7 日，北京，即将整体改造的唐家岭村中，一个老旧的公交车站。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非虚构

# 蚁居

## 杨潇 | 非虚构图书馆

“如果真是这样，  
也许我接下来要搬到一些真正应该拆的地方。”

### 01

从西直门出发的运通 205 路在往北行驶了 23 站后，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弯。前一分钟还在整洁的双向六车道上，百度、联想依次从眼前掠过，下一分钟已经进入起先尘土飞扬继而污水横流的窄路，需要在随意垒高的筒子楼下躲避行人了。在北京市的行政规划中，这道拐弯还具有分隔城乡的象征意义——拐弯以前，你属于上地街道，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部分，租附近的一居要花上 2000 元 / 月，拐弯以后，你进入了西北旺镇唐家岭村的地界，房租陡降，因为，“进村了”。有人惊讶于“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有人想起老家的农村，“还不如我们那儿呢！”去年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毕业的两个男生，向星和于成，在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因为房租太贵，他们刚刚搬离西三环的六里桥，坐在搬家公司的车里，他们似乎对未来的住处比较满意——上地科技园的草坪修剪得真是平整啊。然后面包车方向盘一转，驶入窄路，向星傻了，他冲司机喊：“哎！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开啊？”司机回他：“不是要去唐家岭吗？”

唐家岭在网上有个别称：大唐，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盛世同名。不过大唐并不大，一条中街由南到北贯穿全村，并连接起南站和北站两个公交站点。中街是属于外地人的，这里的餐馆、理发店、饰品店、手机店几乎都为外地人所开，本地人不需要操心商业，他们几乎个个都是房东。村党支部书记董建华说，90% 以上的村民都向外租房。统计显示，唐家岭本地人口不足 3000，外来人口超过 5 万，其中大学毕业生约占三分之一。他们被北大博士后廉思称为“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根本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它和大学脱离了干系，又没有中产阶级社区里常见的业主维权与婚变情杀，且缺乏众多不明真相的县城群众，于是常年与社会新闻无缘。现在，关于唐家岭，可供回忆的就只剩下两年前的北京当地媒体的一个豆腐块报道：“打工青年树林内虐羊泄愤”。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大批学生模样的人涌向唐家岭租房，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年份。廉思和他的调研团队相信，2003 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1999 年，中国开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扩招，是年招生增幅 42%，当年入学的大学生，多是 1980、1981 年出生，是最早认识英语课本上 Lilei 与 Hanmeimei 的那一届，也是第一届真正意义上“全 80 后”的大学生，2003 年，这一届大学生毕业，国家开始感到沉重的就业压力。1981 年出生的陈德自 9 年前上大学起就住在唐家岭，他记得自己每一年房租的变化，那是一条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线：90 元（月）、120 元、150 元、180 元、220 元、260 元、300 元、340 元、400 元。现在，这里最便宜的房子大约在 200–260 元 / 月上下，10 平米左右的房间够放一床、

一桌、一简单衣柜，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你得跑到楼道尽头，甚至中街——那里的公厕，被网友形容为“十年发酵，气味芬芳”。中等价位的房子在 400–600 元之间，十余平米，配独立卫生间甚至厨房——也有的屋子卫生间属于“半隔断”，和床头仅仅一帘相隔，屋内气味挥之不去。高价位的房子则首推董家大院，他们拥有一栋投资 1500 万建成的七层大楼（唐家岭的最高建筑），338 个房间，最便宜的一间也要租 800 元 / 月，“卖点”是中央空调和免费班车，这种“酒店式公寓”锁定的人群则是“上地那边收入高的、不愿意合租、但是又想省点钱的人”。

### 02

清晨 6 点 15 分，唐家岭南站。二三十个黑影双手插袋，冻得直跺脚，伸长了脖子望着远处开来的公交车，此刻车不算太挤，一些短程的线路，譬如开往上地城铁的 447 路，还有座位。这是起得最早的一批上班族。比他们起得更早的，大概只有早点铺子。豆浆 1 元一杯，包子 5 毛一个，各种口味，卖得最快的是香辣豆芽，两到三元，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有时候是“过热”了，豆浆把塑料杯烫得都变了形，赶路者想用它暖手，却不得不左右手换来换去。大半个唐家岭还在黑暗中睡着，商铺门口未被清扫干净的垃圾正在燃烧，居然发出甜丝丝的气味，中街的那些“口子”边也有一些火堆，有人在烤火。7 点过后，天色渐亮，在中街的西侧，由北往南开始涌动人潮，传说中“世界上最壮观的挤车场景”即将形成。至少有运通 205、运通 112、447、509、642、365 六路公交车经过唐家岭，其中的 365 路，别名是“一年有 365 天非常非常拥挤的公交”。高峰时，半分钟就有一趟车进站，但是对于庞大的等车人群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按照通常的标准，每一辆车在抵达唐家岭南站前就已经算得上“爆满”。车没进站，速度已经降了下来，但车门迟迟不开，人群就会自动分成两拨，跟着车跑动——这时候前后两扇门就像两块巨大的磁石，甩出两条舞动的人龙。一位在唐家岭住了两年的女孩说，想挤上车，秘诀在判断车门开启的位置，“有时候它非要进站才开，有时候前面的车太多，它也会像垃圾似的，一边挪一边一点一点地放人上来。”时针指向 8 点，留给上班族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但车站还是乌泱泱的一片，有人形容这场景，“就像快要下雨时，在窝口求雨的蚂蚁一样”。一些人决定步行前往最近的西二旗地铁站，这要花上至少半小时，而且在那里同样要排起长队。破旧不堪的中巴车和公交争夺马路，中巴售票员永远在喊“城铁了！城铁了！马上就走！马上就走！”不过从来没有马上就走过。公交车车门开了。车外的人开始往上冲锋，一个小伙子，左举着一杯粥，右手提着电脑包，在上车的人流中被挤得转了 180 度，变成背靠车门，然后在一片黑压压的脑袋中，他不用看台阶也直直地上了车，好像坐电梯。车站安排了几位穿蓝大衣的交通协管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推人上车。如果车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办法就是不讲办法，站在队伍的末尾，一个劲儿地推，推，推。可是车门总要关吧，往往是先关一边，但另一边总会有一两个人的身体还在外面，这时协管员就会喊口号似的，“一二三，收肚子！一二三，头！一二三，脚！”，“收肚子”总是有力的武器，“肚子收一下，还能上去三个！”然后再加把劲地推，这个人的身体就缩进去了，另一扇车门才能吃力地合上。有时候，车门硬是关不上，协管员这时候就要隔着玻璃门踹上一阵……蓝大衣们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甚至处在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一个热情的小伙子，跑前跑后，女同事推不动了，他赶紧驰援，“靠！还得我来！”推的多是乘客的背，有时是臀部，有一次，他一边拍一个男生的脑袋，一边问：脑袋在哪里？进去一点！门总算合上，车子开始启动。但还有人的帽子夹在外面，他却也并不着急，车缓缓地开，他也从人堆中抽出一只手，慢慢地把帽子往里抽，车离开南站时，帽子也终于进去啦。和城里吵吵闹闹的挤车者不同，这里的乘客，无论别人怎么推，挤，吼，他们都惊人地沉默着。

**03**

小马暂时不用去挤车，他还没找到工作。他是新疆米泉人，今年 21 岁，2007 年参加高考，后来上了中国管理软件学院，这所民办高校有好几个校区，小马上的是最北边那个，在昌平区，几乎到了六环。学校是四年制，但他只读了一年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班 68 人，第一个学期完了，剩下 53 个，第一年结束，剩下 47 个，到大二，班上还剩下 35 个……”他不知从哪个网站看到，说“在国外，你要是对自己的大学不满意，你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学分有效”，可是在中国，“你进了一个大学，你四年就得一直呆在这里”。今年 4 月 18 日，他决定不呆了。“学校呆着是一种活法，出来是另一个活法，你看前面的师哥师姐也混得不咋样……”有一次，他在海淀黄庄附近看到一个奇怪的游行：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枚纸制火箭弹在路上飞奔，宣称要“炮轰饭桶教育”，“还写了点别的，大概就是说，学得太多了，就成饭桶了”。他住的是唐家岭南站附近的一栋新楼，瓷砖铺地，大门对大门，除了房间小点，和学校寝室几乎一模一样。现在楼里的空气好多了，刚进来的时候装修的气味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离开学校后，他报了一个培训班，学软件开发，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室友，一个湖北的 90 后男生。小马属于“蚁族”调查中暂时失业的 18.6%，廉思团队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在被问及影响就业方面的困难时，“人际沟通能力差”“学历不高”“英语能力差”是回答最多的三大原因。小马现在蜗在出租房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游戏，就是上网投简历，倒是有一些公司给他电话，结果过去以后才发现上当了，人家就是想骗你进去，然后让你“转行”做销售。

“前两天中国人寿又给我电话了……”隔壁屋的卢旭说，说罢大家开始大笑。因为每年招聘大量编外人员做业务，这家公司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为“骚扰型雇主”的代表。小马的床上有一个本厚厚的研究马云的书，当然，是盗版的。他喜欢读成功学，自认为大学一年半最大的收获就是每个学期都读了几本人物传记。这让他对找工作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觉得“时间有点紧，心有余力不足”，一方面又认为“工作就是负债”——这来源于他学到的成功学理念，“有人说了，有时候，你工作就是浪费机会，因为你在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机会，你挤公交的人就不知道开小车的人在想什么工作。他们说工作其实是负债，说不定还是赔钱，本来你有时间去赚更多的钱，但你因为工作丢掉了这些钱……”还有人说，一天不光要务实，还要务虚。”不久前他玩了一款类似虚拟人生的游戏，“用两个小时把你这一生提前过了一遍，你的思想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不会想着，哎呀，我这个月还要生活，还要发工资，你就会想点其他的，你应该让人生过得更有效一点。”他扮演了一个医生，在那个游戏中，医生不是容易玩的角色，挣钱很多，但花钱也很多，40 多岁时他失业了，“然后就发现很严重，你收入没了，但是高支出是没法压缩的”，好在他很快又重新找到了工作，“也是运气好，一般人玩医生，最后都破产了”。两个小时过完一生时，他有现金 40 多万，两套房子，三家公司，“确实挺爽的”。

#### 04

上午 9 点，唐家岭中街上的彩票店开门了，昨夜的烟味还未散去，任智一边打扫满地的烟头、桔皮、瓜子壳，一边打开机器，然后出一张 3D 彩票，为南站卖报的邓老爷子留着。三十出头的任智以前在农业部下面的一家行业报工作，非在编人员，有“野战部队”的那种精明和自成逻辑。尽管来唐家岭干彩票才半年多，他已自诩能洞察底层社会的秘密；“我这就是新龙门客栈，在天远地远的地方开一个店，没人看好，结果你的生意比别人都好。你想想呀，唐家岭这条中街都是让你花钱的店，只有我这个店能够给他们带来发财的机遇。”

在任智看来，唐家岭有两个地方最能见出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是车站，一个就是他这儿。不过，来彩票店最多的倒不是上班族，而是在这里做生意的小老板、店员和民工。他们总是穿着老气的黑色夹克，老手成天趴在桌子上研究曲线图，每个月要吃掉上百根铅笔，新手则带着兴奋而腼腆的笑容，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即开型彩票中挑花了眼，是“点石成金”呢，还是“红樱桃”？是“甜蜜蜜”呢？还是“财神到”？

一个留小胡子的矮胖男人一直在气鼓鼓地刮 3 元钱的“红樱桃”，一次只买一张，发现没中就把它一扔，再回柜台去买一张，如此循环往复了七八次，还是没中，他又捡回刚刚扔掉的一张，仔细查看，摇了摇头，突然起身，两三秒后就消失在门帘外。

另一个鸡窝头的男孩子，只花了 28 元就中了 118 元，他让任智兑给他 100 元，剩下了 18 元又买了几张彩票，又中了个 10 元的，他添了些钱，买了更多的彩票，几趟来回后，他倒亏了 100 块。他在附近一家餐馆打工，上个月开始买彩票，已经花了八九百，中奖收回的钱占其中的两成。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输完了口袋里的钱就走，“等中了 10 万元，我就不打工了！”

彩票店一角高挂着一台小电视，上面滚动播放着摇奖信息，和中国福利彩票的宣传语“扶老，济困，救孤，助残”，与之相对的，则是一尊面容可亲的财神爷。这家店上个月出了一个 10 万元的大奖，中奖的是村里的一个小老板，“当时他真是惊慌失措啊！”任智说，后来他还是不停地来买，结果又中了一个 1 万的奖。

在一个人均收入偏低，“都没什么人打车”（一的哥语）的地方，彩票店多少能够满足一下人们对于财富的幻想，每周二、四、日的晚上就尤其如此。唐家岭玩双色球的人最多，这三天是开奖的日子，虽然白天一样可以买，但彩民总愿意在 20 点 50 分开奖前一个小时排起长队，好像买得越晚中奖几率越大似的。在这样一个烟雾缭绕的晚上，小老板们热烈地讨论可能出现的数字，农民工带着一身白灰观察着红蓝球的走势，上班族也忍不住要花掉手上的零钱来“刮一个”，手里还提着隔壁旺家超市的购物袋。

任智觉得，虽然自己和小老板们要为上班族提供服务，但上班族们活得不如自己滋润；“他们平时接触的是白领，要和上层的人去比”而他自己则可以把自己放平；和底层打成一片。“我这儿海纳百川，喝醉酒的人也来我这里玩儿，舌头还没得直呢，你只要把他哄好了，他就高兴了。有一来趴桌上睡一天的，也有把兜里的钱花完了第二天后悔的。来者都是客，我也不能不卖给他呀。而且你不让他买，他会认为你是挡他财路，所以我只能把嘴巴闭上，希望他能中奖。”

“被骗过一回，在你超忙的时候，他给你一张没中奖的，你给兑了 80 块钱。这种事情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他比你懂，你容易露怯。”

“还有一个人，经常过来翻看被刮过的彩票，有时候还真能给他捡到。大老爷们，三十多岁，啥也不干，都认识他。每个行业都有寄生虫嘛，他就专门干这个。后来我就不给他兑奖了，我说，你真要兑奖咱们对半分，这毕竟是我租的房子。”

“有花钱特别疯狂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有些就是来穷人里头炫富的北京有钱的人多得是，你算什么呢？有一个人，手上戴着很粗很粗的金戒指，和金链子，晚上我指给你看。”

说了那么多，任智又开始抱怨自己消息封闭，“现在整天在唐家岭不出去，不看报纸不听新闻，小奥来北京也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 05

接近中午的时候，邓老爷子来取自己的头注彩票，不出意料，他又小小地失望了一回。这是一位 68 岁的“北漂”，十几年前就来了北京，但依旧一口浓重的武汉普通话。他一个人住在唐家岭 6 年了，从没回过湖北，没人知道他有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在哪里。他总是戴一顶 NBA 的帽子，待人友善，但没有什么人去和他闲聊。他的报摊是唐家岭仅有的一家，以前北站附近也有一家，奥运会前被拆了架子，国庆前后，连报带人都消失不见了。老爷子的说法是，“那个人卖盗版书，被抓了撒！”虽然卖报，但老爷子自己并不怎么看报，“只看天气预报，”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也看杀人的新闻，杀一两个还不看，杀多了才看！”

老爷子说自己以前在武汉当过正局级干部，刚来北京时做生意，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

买彩票赔了 23 万最高中奖纪录是 500 元现在还欠朋友的钱冬天报纸不如夏天好卖，夏天每天能赚 40 块，冬天只能赚个 25 块。

这里最畅销的四份报纸是《京华时报》《新京报》《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两者再次证明了它们的发行量和渗透力，虽然有人每次都说“老板，来一份参政消息！”而前两者则体现了唐家岭本地人与外地人口味的差异，“本地人买京华多一点，上班的、关心形势的就买新京报。”老爷子说。

唐家岭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数量对比接近 17: 1，但外地人对这个村子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几乎每周唐家岭都会召开村民代表会，但从没邀请外地人参加过，“上级也没要求……”村党支部副书记董建华说。

11 月北京接连下了三场大雪，许多小巷成了泥水沟，不往脚上绑一个塑料袋就没法出行，24 岁的诗人杨海明在一个雨夜几乎毁掉了一双鞋子，他写道：

在一个黑漆漆的雨夜

我终于一脚踩进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违了的情人

在我鞋里缠绵

“操他妈的！”

我不知道那些灯光去了哪儿

只好一路抱怨着回到家

打开电视

调到凤凰卫视

可只看见一个油光满面的胖子在作报告

说要彻底响应国家号召做好国庆期间唐家岭镇的安保工作

杨海明去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卖过“人民大会堂指定用品”，干过央视广告代理，当过书店里的小伙计、图书编辑，推销过炒股软件，一年多来最大的改变是，“以前是很傻很天真的小盆友，现在初步了解了国家机器是怎么神秘而崎岖地运转着的。”

对于村里的问题，外地人习惯在百度贴吧上抱怨，本地人则有更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我们就跑到北边的村委会骂去了！”一位大妈说。后来，村里运来一些碎石子儿，铺在路上，总算救了急。

廉思告诉我，“蚁族”高度关注时事，包括近年一系列网络事件，他们租房时可以不不要厨房、不要厕所，但是不能没有宽带。

调研报告则显示，“蚁族”的网络使用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9.61% 的人相信，网络行为可以对现实产生影响。百度唐家岭吧里，经常有房客抱怨房东“黑心”，比如房间供暖不足啊，比如网速慢得连 QQ 都上不去还照收每月 40 元的上网费啊，比如想提前搬走押金不退啊，还有人发起倡议，要搞房东黑名单与白名单。而房东也会责怪一些房客的“素质”：往楼道里吐痰啊，招呼狐朋狗友来住处闹翻了天啊，而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本地人还会说，以前唐家岭清静，不是这么脏乱差的。这自然会被外地人视作得了便宜不卖乖，“没有我们这些外来人，你们哪来的退休金，你们的年轻人哪来的工作，你们的别墅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给的！如果我们都不在唐家岭了，你们指着什么活，种地活？种什么能让你们月薪几十万？等我们全部走了，唐家岭除了虫子，还有什么？”

本地人与外地人最大的矛盾集中在每月一次的“收水费”上。村委会对“收水费”的解释是，唐家岭的水源是村里自己打的深井，因为租房者众多，逐户安装水表并不现实，所以便统一强制收取每人每月 10 元的水费（小卖部等则至少收取 40 元）。收水费的执行者是村里 70 名左右的联防队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充满战斗力的队伍，早几年，唐家岭治安不好，联防队员通过威慑和巡逻，赶跑了盘踞京郊向商家收保护费的社会人。这两年，他们又因为“执法”严格、敢于出手而闻名网络——联防队员身着“综治”制服，会在某一天清晨守住唐家岭各条胡同的大小出口，留下 10 元换取一张“水票”即可走人，否则，不论你是“忘记带了”，还是“不住这儿，看朋友来了”，都无法蒙混过关，上班族们说，因与联防队员起口角而被打的情况并不鲜见，有人总结说，在唐家岭，“水票”比身份证更重要。

#### 06

工作日的白天，唐家岭暂时消减了喧嚣和人气，村西的张老汉，得以闲下来听一听电视里的豫剧。他是河南漯河人，三年来来唐家岭开小卖店，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里开了“分店”，小儿子找到了一个替房东收房租的工作，现在，他们一大家子 11 口都住在唐家岭，过年没有回老家的打算，“那边都没人了，回去做啥？”老汉对经济危机这个词没什么概念，但明显地觉得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去年，十五六块的烟一星期能卖好几条，今年，只要是 10 块以上的烟，一星期也走不了一条。”1986 年出生的小林也感到了“外贸转内销”的压力，他在一家毛绒玩具厂工作，订单下滑已经见怪不怪，几个月前，他从酒仙桥搬过来，那边的房租，对于月薪 2000 元的他来说，即便合租，还是贵了。



水票。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 06

工作日的白天，唐家岭暂时消减了喧嚣和人气，村西的张老汉，得以闲下来听一听电视里的豫剧。他是河南漯河人，三年来来唐家岭开小卖店，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村里开了“分店”，小儿子找到了一个替房东收房租的工作，现在，他们一大家子 11 口都住在唐家岭，过年没有回老家的打算，“那边都没人了，回去做啥？”

老汉对经济危机这个词没什么概念，但明显地觉得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去年，十五六块的烟一星期能卖好几条，今年，只要是 10 块以上的烟，一星期也走不了一条。”

1986 年出生的小林也感到了“外贸转内销”的压力，他在一家毛绒玩具厂工作，订单下滑已经见怪不怪，几个月前，他从酒仙桥搬过来，那边的房租，对于月薪 2000 元的他来说，即便合租，还是贵了。

这位邓玉娇的老乡、恩施土家族小伙子热情又外向，这一天被迫请假，在出租屋里宅着。



头天晚上，他穿着拖鞋一路小跑去邻近超市买烟，结果右脚大拇指重重砸在超市门口的石头上，流了很多血，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拖着长长一条血迹，进超市买了创可贴，自己包扎上了，“没事，不用看医生，我们农村出来的，这点伤算什么。”

可是在其他方面，他已经不再是个农村孩子了，他每天都上鲜果网，关心 Twitter 为什么上不去，韩寒的博客更是他的最爱，他认为郭敬明“很 4”，“就是 2 上加 2 呀”，他能飞快地背出韩寒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郭敬明输出的是一种很贱的价值观……好像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富二代，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钱，他没有告诉读者这些东西的获取要靠个人努力。”

他有时要教训隔壁同龄的小赵，“简历不能马虎，要写得有针对性一点，可以夸张一点，用人单位说要求两年经验，你就写，先面试进去再说，进去以后能不能留下，就看你能力了嘛。”

小赵因为迟迟找不到工作，多少有些垂头丧气，总是在网吧打游戏到很晚才回来。他是石家庄人，来到北京有点“逃婚”的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和 85 年以前出生的“80 后”是两代人，“你们更成功，更传统”，其实他说的是他 80 年和 82 年的姐姐，她们都有孩子啦，而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在我们村里，24 岁都应该有小孩了才对，”他的母亲急得不行，摆出了跳楼价大甩卖的架势，“她的意思是，只要是个女的，你就给我娶过来！”小林和小赵周围住的多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晚上 11 点以后，“那个声音真是此起彼伏啊！”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小林感觉心驰神往，“毕竟我们是这个年纪嘛！”但很快，他们就对这种带着压抑的“低音炮”感到了厌烦。

在唐家岭，那些无处不在的小店常常有一种奇特的“混搭”气质：话吧提供保健服务，照相馆内可以免费测手诊观健康，而去 5 元一次的大众洗浴则需要穿过一家药店。这样看来，英子那兼售保健品的小卖店就不仅仅是小卖店，而是一个多少能否抚慰人心的去处。1985 年出生的英子，甚至成了一些人的知心姐姐。一个女孩子，丈夫很想要孩子，但她不想要，就偷偷来吃一种叫毓婷的避孕药；另一个更小一些的女孩，有一阵子两三天就买一次药，她一个人住，街坊传闻说她是被村里一个小老板包了，“我就劝她，说女孩子最后还是要有孩子，能用避孕套尽量用避孕套吧！”

只消在唐家岭车站站上半小时，就能发现这里男女比例之不协调，实在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康思团调查了“蚁族”的性与爱情婚姻状况，与异性同居者占被调查对象的 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却占了 33%。

从 2007 年到现在，26 岁的王劲一共和朋友去过两次洗浴中心，“吃顿饭喝点酒，然后就过去玩一玩”，当然去的不是北站那家 24 小时按摩店，而是市郊那些“比较正规、有档次的”，因此也比较放心，一次要花四五百块钱，“安全措施很好”。不过他同时也认为，“现在观念比较开放，你也不是没有这个就不能活——一年没有也很正常啊！”

在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的地方，私密空间会被最大程度地压缩，除了被窝——这也不说，有时候，两个男生得挤一张单人床，大概只剩下那台设置了密码的电脑。“荆州小哥是这里为数不多的‘90 后’，不忌讳当着朋友的面看 A 片，‘我们 90 后脑残嘛！’他一副看破了无所谓的表情。他重复最多的，就是学校性教育的失败，然后吹嘘自己启蒙得早，按他自己的说法，初一时，一切就都发生了。他和小马上了同一个软件培训班，上课时老师找他借 U 盘用，结果不小心点开了少儿不宜的画面，那个 70 后的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开玩笑：英语的啊？有没有德语的？

我问他：“你的 U 盘多大？”

“8 个 G。”

“有多少片儿啊？”

“电脑里要多少有多少啊！”

“谈过几个女朋友？”

“我哪知道？靠，我还数一下啊？”

## 07

王燕 24 岁了，从没谈过恋爱，实际情况是，她很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如果能在晚上 10 点前回到唐家岭，就已算幸运，接着还得到乌烟瘴气的网吧查一个小时资料，“每次回来我都要崩溃了”。

毕业不过半年，她已经在北京换了四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当球童，只干了 7 天，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她的一位同伴被空中落下的球砸中头部，看伤花了 200 多块钱，“客人还不说正经的，不给医药费”。第二份工作是朋友的公司，结果发现他对自己比对别的下属严苛多了，“苛刻到一般人都受不了，包括发福利，别人都给了，就是不给我，他的理由是，我给你你也都花了……”第三份工作是在一个物流公司，这次老板挺好，但是碰到一个该死的女主管，“86 年的，比我还小，就是参加工作早”，处处压着她，不教她东西。

她现在是一家知名网络公司的商务代表，这是她心仪的公司，但更令她感到残酷，“底薪 800 块，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周末加班没有加班费。”最难熬的是月末，没有出单，没法往上报，“压力太大，我们公司很多人一到月末就生病，头疼，吐。”

公司那么多做销售的，只有极少数赚钱，“我们上个月，做了一百多万，只有两个人赚钱，一个人做了 50 万，一个人做了 20 多万，其他人呢？那么多人，100 多个员工，做了 20 多万，就都拿 800 块。”

前几天她生病回承德家里调养了两天，公司规定请病假可以补贴，但她还是请了扣钱更多的事假，“不敢请病假，怕公司知道你身体不好，然后想着办法把你逼走。”

在家时，经理还不停地给她电话，在电话里冲她吼，她妈妈看不下去，说实在不行咱不干了，回老家！她知道，自己是不会回去的，“我哥当初回老家找工作，母亲到处托关系为他铺路，什么都经历过了，我看到那些亲戚的脸色，不想再让我妈经历那样的事儿。”

王燕不喜欢唐家岭，总谋划着要搬走，但是取暖费已经交够了 4 个月的，她决定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她住中街，一个好朋友住南站，但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到了这家公司后，我一个新朋友都没认识。”

她现在的盼头是明年公司上市，自己能拿到期权。

## 08

下午 5 点，天色渐渐昏暗，空气中的煤烟味变得浓重起来。纵横交错的小巷里，村民纷纷拉开铁闸门，往自家的土锅炉里添加直接从门头沟和房山拉来的煤块。出租屋内的供暖一般在 6 点以后开始，到凌晨 1 点结束，供暖费要交 4 个月，平均每月 100—120 元。并非所有的出租屋都温暖如春，因为土地有限，村民不断在原来的房子上加盖新的楼层，唐家岭有太多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如果房东再节约一些（“煤贵了”），让锅炉里的水温再低一点，那么坐在屋子里就也得全副武装。有人为了防风，在窗户上贴了封条，立刻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万一再来一把火，就没那么幸运了……

8 月 2 日，东南三街真的发生过一次火灾，目击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说，晚上 10 时多，我听到有一男子喊：“救命啊，救命啊”。刚开始我以为有人打架，往外一看才发现，竟然是着火了，不一会儿就见大批人冲了出来，并喊着让楼里的人赶紧出来。混乱中，一个女孩儿从 2 楼的窗户翻了出来。更多人选择往天台上躲，但去天台只有很窄的一个楼梯，有很多人的拖鞋都被踩掉了。之后有人拿盆端水往火上泼，但不起什么作用，有个人拿着灭火器进去去喷了一阵，火势才得到控制。

“火没烧起来，也没往上报，消防车来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打 119 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消防车来了也进不去，只能干瞪眼，这次灭火全亏村里发给每户的两个灭火器。”董建华说。

从下午 6 点到晚上 11 点，公交开始不断地把人们从北京的各个角落带回唐家岭，中街再次开始涌动人潮，和早晨相反，现在是在街西侧，方向是由南往北。

小林坐 13 号线在西二旗站下，然后走到软件园广场，准备搭车回家，正是晚高峰，公交车上拥挤异常，他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往上挤的时候被车上的一个胖子一脚踢了下去。瘦子爬起后马上冲上车把胖子拽了下来，两个人从车旁一直打到路边的草坪上，最后两个人都累了，瘦子在草地上绕着圈子找手机，胖子耳朵被抓破了，跟着小林上了下一趟车。目睹了这场殴斗的乘客都不敢看他，只有售票员依旧用噤里啪啦的京腔嚷着：“刷卡了吗？没刷卡买票！胖子说：刚才出了点事儿，上一趟车买过票了。现在身上没钱了。”那不行！”“那我就下一站下车吧。”

唐家岭南站，邓老爷子收了报摊，准备去彩票店碰当天最后一次运气。公交站牌边，车门打开，下来的上班族有人带着轻松的笑，有人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多数则面无表情。陈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月薪 5000 元，但仍然选择和女友住在唐家岭，现在迫切的问题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来自家里的压力也是买比租好。”“那你买房有计划吗？”“有，正等着崩盘呢。”

王劲开着他那辆两万元的二手车，尾随一辆 205 路，也进了村。他在这里住了六年，对这里越来越有感情，他说，那是一种大家一起奋斗的感觉。

张老汉的小店又开始顾客盈门，他准备了热水，“那些学生玩电脑玩到 12 点才会想起肚子饿，要吃泡面。”不少人来小店里打 1 毛 5 一分钟的长途电话，有些女孩子，讲着听不懂的方言，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

向星和于成不但找到了工作，还找到另一个合租者。这个男孩子，“平时挺坚强的”，有一天晚上在床上上网，玩着玩着就睡着了，于成过来轻轻地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挪到床边的小桌上，这时他突然张口：我想家了。于成吓了一跳，再一看，他还是睡着的啊。

2009 年临近岁末的时候，一首《Lilei 和 Hanmeimei 之歌》复活了“80 后”的集体记忆，过了这一年，“80 后”就要陆续迈入而立之年，“再过 10 年 15 年，他们就是社会的准精英，而这段（蚁居）时期的经历，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社会观和政治观。”廉思说。

《Lilei 和 Hanmeimei 之歌》中不乏对命运的感慨：“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而关于唐家岭的命运，被人们猜测了很久，这些天似乎也要尘埃落定了，《北京日报》12 月 10 日的报道说，北京将推广北坞等试点村拆迁改造的成功经验，从明年起整体启动 50 个难点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工作。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榜上有名。

杨海明之前就住在北坞村，因为拆迁改造被迫往唐家岭迁徙，“现在唐家岭又要拆了，我搬到哪儿就拆到哪儿，这点比较诡异，如果真是这样，也许我接下来要搬到一些真正应该拆的地方。”他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 年 12 月。

### 杨潇

记者，作家，哈佛尼曼学者。特稿写作从业十余年，获奖若干，出版有作品集《子弟》，非虚构新作《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Tianhao Zhang](#)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高松

##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唯一惦记的事情，是如何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即便它的灯是暗的。

### 01

高松在小个子云南仔 Bingo 面前试图扮演稳重大哥的样子。正襟危坐，开场就亮出自己的人生哲学，“忍人所不能忍”，但是口音太重，我只听到了一串“人人人人”，一旁的 Bingo 轻轻地、准确地复述了出来，于是高松又放慢语速说了一次，愈发显得稳重。

他们俩各自坐在一张户外折叠椅子上。刚刚解封的那几周，户外折叠椅成了各种咖啡或者酒吧的标配，因为不许堂食。那种四条钢架兜着一块软帆布的小商品，很快成了热销货。不过四把围一圈在人行道上摆开来的时候，很有点聚集的意思，紧张兮兮的城管随即出现，挥舞着手臂穿过马路，让我们都回到室内。

室内有点闷热。我们在不锈钢面板包裹的啤酒吧台旁边打开折叠椅，重新坐下来。高松有点紧张。他在揣摩应该在采访的时候展示什么形象。我们本来应该约在后者在巨鹿路开的门窗店。但是解封之后，渴望酒精和自由的年轻人占领街头，据说在解封时间刚过 5 分钟，也就是 6 月 1 日的午夜，就铺开垫子躺在巨富长的马路中间喝得稀里哗啦，翌日早晨台阶上摆满横七竖八的酒瓶。街道立即拉响红色警戒，先是所有酒吧围上铁马，下午五点之后不许开业，没几天就宣布整个街区封闭 14 天，居民商户再次进入静默期。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见到了高松。他那家叫做“为民铝合金”的门窗店自然也在封控区域内。但他招呼我说，可以去威海路他和朋友新开的酒吧。在见到高松之前，我以为这是中年男人抵抗人生危机感的玩票创业，毕竟一个叫做“为民”的门窗店的老板，就是给人一种 90 年代苦干至今的沧桑感。他还做房屋中介生意，在“为民”的招牌下，有一个“富巨长”的灯箱。我就是在这个灯箱下的有机玻璃小盒里取了一张名片，加上了他的微信。说明来意，寒暄了几个来回，从头到尾我脑中都只有一个大叔的样子。

威海路上几乎没有人，那天刚下过雨，雨水把悬铃木和人行道刷得很饱和，店门口站着两个年轻人，高松有啤酒肚，宽面大耳，但和他的主业名称放在一起还是年轻得难以想象。旁边的 Bingo 扎一小把马尾，不作声却看着很机灵。

他们认识才半年。在此之前高松不喝酒也不抽烟，下班时间准时回家。Bingo 在长乐路上上了四年班，想开家店来把自己从没有灵魂的公司人人生里挖出来。半年前 Bingo 走进了高松的店里。他们一起开了一家精酿酒吧。

虽然觊觎巨富长的氛围，但无奈租金太高，他们最后在威海路找了个地方。威海路和巨富长硬算步行距离只不过三五百米，但是隔着一个天堑延安高架，气氛一下子断开。高松觉得知道自己开酒吧的中介同行都在等着看笑话，这是他后来说的。以当时上海市中心那种三个人扎堆说话就有巡逻员闻声而来的架势，谁都不好说谁能做好生意。

巨富长的戒严给高松带来一点运气。Bingo 脑子好用，就在年轻人扎堆巨富长的那几天，他和高松骑着小电动车穿梭在那几条街，往兴致勃勃又心慌意乱的人手里塞小卡片，上面是威海路酒吧的地址，小卡片就是优惠券。

小卡片是 Bingo 按照行程码 P 出来的精酿大数据行程卡，其中一行写道：抱住绿马，祝你日饮夜饮，前程似锦。酒吧叫做“串门”，但口彩更好的“绿码咖啡”比店名更有人气，Bingo 把照片发上小红书，不断有人来打卡。上门的人不买喝的，端起相机先拍照。采访后那几天，高松好像对生意好起来很意外，给我发微信，配合店门口排队的小视频，满足得有点不好意思：“最近生意有点看不懂，火的不行。”

### 02

高松来上海那年是 12 岁。父母 1999 年在上海开了家门窗加工店，做饭、睡觉、加工门窗，都在这十几平方里完成。高松和大两岁的姐姐是留守儿童，11 岁以后他就独自在暑假坐火车从南昌来上海，睡在铝合金门窗加工床上，空下来就帮父母干活。那时候“为民铝合金”还是普通门窗加工店的样子，材料堆在门口，用钢锯手工切割，后来上了切割机，噪声尖利，亮光耀眼，巨鹿路方圆几公里没有类似的店铺，得以积累不少邻舍生意。

这十几平方让高松成了老家同龄人眼里的小开。父母缺席，虽然在各种亲戚家轮流吃住，但很有一些零花钱。姐姐初中毕业之后就出去打工，后来在重庆嫁人，高松念完高中来了上海。

关于来上海的具体时间，高松说他是 19 岁那年，又说是 2010 或者 2011 年。后来他又说 2013 年的时候就拿钱给姐姐在重庆开了一个门窗加工厂，大约五年之后，也就是 2016 年，高松把爸爸的门窗店升级换代，让爸爸退休在家打牌钓鱼，自己开始一边接门窗业务一边开了一家地产中介公司，可惜这个生意遭到挫折，就被打回到一穷二白的阶段……

等一下。我打住高松快速的人生复盘。我们再来理一下时间，这其中好像有一点跳跃。为什么高中毕业的穷小子可以在短短两年之后就出钱给人开厂？为什么不仅可以给人开厂还有多余的钱去创业？这可不是小型创业，起码启动资金多到可以去盘上海市中心街铺的地步。先别管后面失败这一茬事，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

回想起来，我倒是见过高松改造过的那家门窗店。说它是士绅化的典型也不为过。当时赶上对面的巨鹿 758 开业，装修风格也是清水混凝土，在门口宽台阶上喝酒抽烟的人，可以看到夹在烟酒店和洗衣房之间的一家小铺面，水磨石，黑钢窗，用细细的仿宋字竖排各种服务项目，如今看起来是做作了一点，但在 2016 年大家还没缓过神来要捋飧自己的时候，它和一个做铝合金门窗的身份在一起，显得很高级。

这种效果就是高松追求的。他一心一意要改变父亲那代人做门窗店苦哈哈埋头干活的脏乱差形象。“轻松一点，自在一点”。他不想再留在“底层”。

不过高松“从零到一”的秘诀，是倒卖色情碟片。当时他还在给父亲店里干活，晚上就在店门口支起小摊，放几张样品，做老客人生意，见好就收。每晚如是，卖了一年多。

“那时候我们碟片是软壳的，就一张塑料纸……感觉全是利润，没有成本。我自己弄的，我只买了一张光碟，然后刻录机。那时候一张碟成本只要几毛钱，然后我们卖 10 块，一个盒子里面 10 张，就是 100 块。很快你就可以挣 1000 块，可能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放在那里卖。”

“一开始有人问，问了四五次之后，就会打电话给他们……其实旁边也有小摊的，做一些当地邻居的生意，可能六七十岁以上的人，或者就是开豪车的，年轻姑娘也有。要同性恋片。”

“他们不讲价格。一路过全部拿。那时候辉哥火锅也是最鼎盛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老板都到那里去吃，走过小摊就跟司机说，你全部拿好了，一拿就是三四千这样。”“后来我卖碟赚到钱，就五十万十万给我姐，把厂做起来。如果没有开，她可能就是小店的小老板吧。”

到这里为止，我还没看到高松“忍人所不能忍”的人生哲学如何诞生，不过他很快就说到自己那次失败的创业。

“我们一开始启动，就是 4 个年轻的，90 后小伙子。一起搞了个投资公司，在法租界这一块好一点的门面就拿下，再装修，再租给比较有潜质的客户，然后再帮他设计装修，一开始是这样——通过法租界所有的中介来推广我的店铺，然后再把房子租出去，我们又是设计公司，就可以继续帮你装修。”

“后来就是失败了，2016 年的时候行情不好。那时候不已经开始整治什么开墙打洞的吗，我们拿了很多部队的房子，全部收走了，就我们想要回来这个官司也打不赢。就卡在这个点上，那么就失败了。”

“我爸做门窗，我肯定要有地方待着，我一般就在店里。我接生意，就和他们认识了。”“合伙人都是有钱孩子……设计公司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我单独的想法，跟他们没有关系，就是凑了笔钱，单独做点生意。只不过失败了。其实我们几个小伙子把事情想简单了，觉得 8000 元进来的房子，一万五就可以出去了，他们想得简单我也想得简单，我被他们带动了，其实我是个谨慎的人，对吧？一开始我跟他们讲我是做居民房子，那么 2016 年开始做市场可以很大，而不是选择去做门面。他们没有听我的，我也拗不动，他们是有钱小伙子。”

“投资比例是一样的，坚持了差不多 9 个月，（相当于杠杆？）对，手里压了 20 套房子吧，都没出手。一套房子都是几十万，如果你不要违约金，什么押金都拿不到，租不掉。”

“我们当时就天天吃，玩，开着一个大 G，380 万的大 G，天天这样，还有一个玛莎拉蒂。都是他们的车。”

“（那你开什么？）电动车。”

“我觉得他们三个都不做事，就我一个做事。我不委屈，万一这个东西成功呢？但当时就很年轻，我手上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感觉还满潇洒，吃 400 多块钱一碗面，天天这样，就海鲜面，有，上海永远不缺这种。有点膨胀，对。”



“（你连生活方式一起扛杆了？）这就是我唯一糊涂的一件事。”

高松每每谈及自己的失败总是带上悲壮的语气。尤其是为了挽救重创后的自己，他不得不给洗衣店邻居做了三个月的送衣小工。与此同时，他把老乡叫到上海来，重新做回他看不上的门窗加工生意。大丈夫能屈能伸，“忍人所不能忍”，此时现身说法。但悲壮只是铺垫，毕竟是在社会摸爬滚打的大哥人设里，高松开始讲述他如何翻身。“我在 2016 年之后心态上有个变化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知识以内的钱我赚不到，上海不缺文化人，不缺知识，那么我说我底层总可以过吧，我就选择做门窗了。没想到这个东西虽然赚不到钱，但是可以养活自己，如果再拓展一下，让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03

有点讽刺的是，让高松“拓展一下”得以翻身的机会，和之前让他内心膨胀最终落寞收场的肇因，都来自同一项政策。

“2018 年，我 28 岁，正好遇到违章搭建整治，我就想如何把这些店全部拯救过来，让这些原本房东失去的店可继续把店做下去。那些房主，比如那些店原本有个院子，房子可能就十几个平方，院子有三十平方，他们以前违章搭建就变成了一家店，没有这部分，店面就租几千块，有了这个部分，就租上万块。”

高松说到这里顿一顿，“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然后停住不响。我们看着他，Bingo 也看着他。

大约两秒之后，他自己往下说：“就是这样，比如有一个小吃店，在弄堂里，也是带院子的，我就提出我给你做个东西，看看能不能通关。这个人是长乐路小吃店的老板。我蛮感谢他的。在长乐新村。就叫弄堂小吃。他是老上海人，关系比较好，我做了这个东西，他帮我去一层层往上申报，没想到领导说这是擦边球，就把我叫过去，他负责拆，我负责装。”

“都是我想出来的。天井带玻璃，而且是全部智能化的。展开还是一个院子，必要的时候可以封起来。而且我比较科学，比如下面饭店可以坐几十个人，也不会漏雨。我就把思路告诉一个厂，在安徽，我拯救了这个厂，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打开了市场。这个厂现在业务还在源源不断地做，做的很大。没有专利，有人模仿，中国生意就是这样恶性竞争对吧。”

十几平方米的院子坐不了几十个人。高松说话常会夸大一点，我把它看作中介职业习惯的一部分。

“我当时对接的是甲方，一个圆桌，坐十几个人，房东签字，我安排代加工制作。我能赚多少钱？除掉成本之外我就赚。我不代表政府，都是老百姓跟我打交道。黄先生帮我去问这个东西行不行，一个平方几千块钱吧。”

这个声势浩大的生意高松做了一个月，效果是“把自己救活了”。我问了好几次他赚了多少钱。他不肯细讲。

“多少家店呢？”

“三五十家吧。”

“几百万有吗？”

不响。

“一百万肯定有吧？”

“不止一百万。”

在高松的世界里，一直有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比如他本能地信任底层的人，但是并不愿意让自己也停留在底层的生活方式里；比如他向往赚大钱，但始终敌视资本。事实上资本是个额外复杂的概念，在巨鹿路上囤积高额转让费开店的人算是资本，那些雇佣他爸爸做门窗的上海本地人也叫做资本。

“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资本的感觉。”

“很资本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他就是有一种我是资本家的感觉。不管你多有钱，我就是雇人，我把你雇来了，我可以选择你，也可以不选择你，我条件好，价格高一点帮你做，做了以后大不了我不理你。他们眼睛里必须要公平，得不到公平的时候，我就疏远你，你是一个不可交的坏人。就这种东西很明显。”

与此同时，他赞美上海商业的宽容度和。

“（前女友）叫我回南昌发展，我在那里待了 11 个月，去跑了各种各样的批发市场，还有地方，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我觉得这里好像不太适合我。”

“哪里不对呢？”

“都是一些很不起眼的东西，也赚不到钱的感觉。比如说我想开个烧烤店，旁边就十几家；比如说我就想卖家纺卖床垫，到处都是这生意。没法做，而且我看不出哪些是我自己想要的客户群，大家都一样的，你知道吗？……挨家挨户都是门面，都是重复的，你也说不出来哪家可以赚钱，就房租便宜，几百块，一年下来赚不赚钱也看不出来，不像上海，你待得下来就是待得下来，肯定是说得过去的。”

“所以上海反而要简单。”

“对，包容性比较大，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在做，就能赚到钱。就算你冲马桶也能赚到钱。杀蟑螂也能赚到钱。很奇怪的一件事。”

“活过来”的高松开始做一种杂烩生意，他在五金店的门上安上了“富巨长”的牌子，把之前一直断断续续捎带脚做的中介生意正式挂牌，设计公司是做不了了，但他开始承接大一点的店铺装修之类的活。我拿的那张名片，正面是“为民铝合金”和铝合金的英文，还有高松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他的职位是总经理 Project Mannager，用的是 foxmail 的邮箱）。

名片的反面用一副日式家居做底图，上面和店铺一样，竖排着仿宋体业务项目：断桥铝门窗、不锈钢加工、雨棚定制、纱窗定制、金属道具、百叶窗定制、上门维修、室内装修。光看这张名片，除了店面的样子，高松好像没有比他爸爸升级到哪里去。我问他中介和门窗设计两个业务的收入大致是怎样的比例。他露出天机不可泄露的神色。

“我觉得是看不到的地方挣钱稍微多一点，只要反而是正常做生意，感觉挣不到什么钱。”

04

开精酿酒吧，高松没有什么太大的话语权，他不喝酒，也不懂卖酒，这件事也根本不在他的人生筹划范围之内。但遇到了 Bingo，他自然有他的优势：知道如何找性价比高的铺子，知道应该打点什么人，知道这方圆几里之内都是怎么回事。

不过高松有自己的阐释，他把这次合伙定性成一次基于利他主义的援助。

“他（指 bingo）可能不知道，我很遗憾自己没有读大学，当时他来找店的时候，我想起自己 25 岁的时候，觉得他在体制内很稳定，上班很稳定，然后选择去做一件事，而我是摸爬滚打很多年，辛辛苦苦挣钱去做一件事还失败了，而他竟然在我那个年纪，在这个城市也想做（一样的尝试），我不想看到他失败，就来帮他。”

高松大 Bingo 6 岁，说的话却好像已经活过了两辈子，并且是在中央电视台那种一边讲述一边抹泪的访谈节目里才会说的话。

他好像也并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Bingo 稳定没错，但并不在体制内。他的主业是做电商营销，在亿滋国际上班，这家公司旗下有著名的饼干品牌奥利奥。这也是 Bingo 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他在上海大学读了四年书，除了社团活动基本对上海是怎样一个城市一无所知。而毕业之后在长乐路那个著名的十字路口上了四年班，唯一的感受就是“这里人多”。

如果他甘于做一个公司人，他可能考虑的是自己职业路径里下一个晋升机会。毕竟和他一届进公司的人都已经跳槽了，他是最后一个还没为自己规划什么的人。Bingo 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精酿酒吧。这个爱好还得拜公司所赐，以前他从不喝酒，但入职之后在成都外派 8 个月，那里的酒吧文化让他从此踏上了一边旅游一边到各地去找精酿的习惯。在踏进高松的店里之前，他见了一些市面，决定自己也做做看，而选择的城市必须在上海，只有在上海成功，他才有信心去别的地方继续成功。

这家威海路上的店，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Bingo 叫李正斌，瘦脸，小个，在脑后扎一束马尾。一边听高松接受采访一边在笔记本上敲敲打打什么，然后起身，带回一包迷你装的巧乐兹。原来他一直在一边在酒吧看店，一边在线干活。我们见面的那天是星期五，时间已经临近下班，但他手上还有事没干完。

“我觉得开店之前我跟上海没有建立真正的联系，可有可无，就，我可以待在上海，也可以不待在上海，没有任何归属感。但当你真正开了一家店，它就像磁铁一样，有不断各种各样的东西吸引来跟你谈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客人，只要站在这里就会有故事，自然而然在店里发生。然后才真正觉得我和这个城市有联系，然后你用你的行为，你的价值观，你的整体和这个城市做一些沟通。对，不然一份工作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Bingo 2019 年春天结束成都外派回到上海，直到他开出自己的酒吧，刚好经历“巨富长”酒吧人气渐旺到鼎盛的阶段。

他还认识一品香的老板莫先生，后者不知道如何听说他要开酒吧，提出跨界合作，把茶叶和精酿结合。

Bingo 和高松都不喜欢莫先生。Bingo 说：“这个老板也是要的东西很多那种，我觉得他不太好。”

“他的提议是什么？”

“茶叶加啤酒，茶叶要卖酒也要卖，而且店铺的所有权也属于他，话语权也属于他。这样不好，我说你还是卖茶叶，茶叶有你自己的客户，有你懂的东西。”

05

因为不喝酒，每次要和客人一起说说笑笑的时候，高松会准备一杯黄色果汁拿在手里。店年头上开的，高松还在熟悉自己的新角色，即如何当一个酒吧老板。他和 Bingo 有不一样的目的，至少眼下看起来是这样。Bingo 可能希望在公司人的生活之外寻找新的人生价值，而高松想的是如何证明给中介同行们看，自己贸然在威海路这种地方开酒吧不是头脑发热的玩票笑话。

这也不是高松第一次证明自己，只不过之前他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他提起某一年来上海的暑假，因为抗拒读书，父亲给了他一个考验，让他在“不准上班，不准偷盗，不依靠亲戚朋友的情况下，自己一天赚到 5 块钱”。如果成功，高松就可以得到父亲的认可。

他选择去停车场给人擦车。

“最关键的是说服停车场的人。人家觉得小屁孩你什么都不懂，你要擦坏了怎么办。第一天什么钱都没赚到，第二天也没有，第五天也没有。那时候有很多畏惧，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初中，十三四岁。我听得懂上海话，只会说一点点。就在附近找，常德路，华山路。我选了好多地方。”

“我自己带毛巾和洗衣液。洗衣液也是借的。我要说服停车场门卫，买烟给他们。一开始说要让我进去，赚了钱再回馈给他们。我爸天天发烟给别人，我都看在眼里。”父亲的认可到底意味着什么，高松没有说。虽然高松总是说父亲这代人思想传统——不想把生意做大，不敢借贷在上海买房，也从来没考虑过把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但他在提到父亲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用他能想到的最高级词汇。

比如说把门窗店店交给自己，高松说这个叫“传承”；而来上海开铝合金门窗店，这个是“引进”；跟着舅舅研究如何加工铝合金材料——父亲原来是农村的养殖户，据说很成功——用的也是“开辟了做门窗的道路”这样的字眼。高松的郑重其事后面有他对父亲的尊重。

但是说到父亲的退休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变成对自己的肯定。“我让他退休，然后他就退休了”。那是 2016 年，高松即将面临创业滑铁卢。父亲是否批评过他的冒进，他没有说。但父亲在这之后的确又替他解决了另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结婚。2018 年，高松刚刚从之前创业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在初中同学微信群里跟现在的太太说上了话，约会吃饭，但从没想过结婚。按照他的说法，当时缺乏自信。

“是我爸点破的，他说你现在这个年纪差不多了，就这么回事，一开始我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然后过了三个月时间就结婚了。”

“为什么没想法？”

“我想我挣了钱之后，我就有信心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姑娘，就不会很自卑。如果我没钱，在上海这个地方你当然很自卑。我的标准是，律师，医生，文艺一点的，或者还有会计。为什么，这些都是我缺的东西，我摸不着的东西。我感觉随便只要一个就行。”

恰好他的交往对象符合，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弹古筝。就这样，2018 年，有了靠给人做合规顶棚赚回的钱、一个文艺的女朋友和来自父亲的鼓励，高松万事俱备，结婚了。

## 06

高松有一个偶像，是做超市的胖东来。胖东来和他的生意符合高松的自我定位：

“你像马云，我不知道他，我也不了解他，因为我的店叫为民，我尽量心善一点去做事情，你不一定要挣多少钱，老百姓能接受，能做完之后还说‘死鬼，还干得不错’，就行了。”

“死鬼”据说是相熟的老阿姨对高松的昵称，尤其是和他做点小生意，找他帮点忙的时候。这个称呼不太上海市井，倒是有点像香港电影，按照上海话的说法，她们应该叫高松“小鬼头”，鬼和巨同一个发音。但是高松坚持说，就是“死鬼”。

高松熟悉店铺周边的底层故事，也乐于拿出来佐证这一代商业更迭的残忍。得到他肯定的商户，无不是克制自己的贪欲，体恤底层劳动者的那种店铺。比如和他一个街角之隔的顾师傅炒菜，顾师傅本人早已去世，接手的女婿倒是承接了经营理念，还是以平民价格卖盒饭炒菜。

我们问起往东 100 米的“小食堂”，高松换上讳莫如深的口气，说这位安徽老板是本地隐形富豪，退役军人，租的也是军队的房子，百年老店，一本万利，在附近环贸和香格里拉施工的时候，一天可以卖掉 400 斤大米的盒饭。店铺从来没有扩张升级过，早上租给早餐铺子，其余时间都卖盒饭，看起来不思进取，简陋程度和日益土绅化的整个街区格格不入，反倒经常有电影剧组来取景，要的就是那种市井烟火气。如果没有资本，或者不懂得搞好各种关系，就没有办法在巨富长生存下来。在高松的眼里，这里的烟火气已经被贪欲驱逐殆尽。

“要进巨富长，必须带 50 万，还有转会费 150 万的。”他挥舞手臂：“你看看我们这家店，60 万，单门槛就要六七十万。刨掉装修，转让费，中介费，还有乱七八糟的。我们当时的转让费报价是 22 万。每个地方都有进场费。你不给，我就给愿意花钱的人，除非两三个平方无所谓，如果是正经做生意门面必须大的，就很贵。”

“我感觉我们来这里做生意的人，就是房东的一个杀猪盘而已”。

此时我们的身边已经完全暗下来。其实被城管赶进店里不久，就又来了一批城管，让酒吧把灯关掉。没有亮光的店铺看起来就是没有营业，符合防止聚集的管理精神。高松和 Bingo 脸上毫无波澜，他们每天都要经历好几轮这样的管理。

我跟高松说起和巨鹿路那些特保那些不愉快的冲突，他劝我不必计较。

“我不喜欢跟他们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喜欢跟他们去争吵，我觉得没必要，他们的理论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不是他自己想的，我跟你去聊这个东西——”他说到一半停下来，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站在那里，看他们把菜从一个冷链车里拿出来，我站在那里看，他会无缘无故地说，你在这里干嘛！‘我凭什么不能站在这里？’我说。‘你别想了，这里所有的店月底都开不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好像没说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一个答案。我站在这里怎么样？我电动车往那一起，我说看一下有什么关系？他说‘赶紧走’，感觉我隔了差不多十几米，已经妨碍到他了。我就正好站在那里，他就跟我说了刚才那些。我说‘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跟我灌输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能不能开也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我都无所谓了，你这么较真干嘛？’他就被我说的话一下子蒙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我不会跟他打架，我都不会跟他发脾气，我觉得他太低端了，不想跟他说，没多大的意义你知道吧。我觉得他没有激情，他激不起我的愤怒你知道吗？”

此时要求关灯的城管退到了马路对面，举起手机拍照，证明已经按照规定管理了店铺。我还是无法不感叹这套掩耳盗铃的官僚主义。

高松连厌倦都懒得厌倦：“待会儿换个人来，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觉得他舒服能交差就行。”他和 Bingo 唯一惦记的事情，是如何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即便它的灯是暗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 [Nobel Prize Museum](#)

## 非虚构

# 赫塔·米勒： 我们的沉默也 一样具有毁灭性

### 巴黎评论 | 发现经典

所谓彻底的无知，就是一种默认倾向，  
一种预先的立场。

二〇〇九年，瑞典学院授予赫塔·米勒诺贝尔文学奖时，赞扬这位作家“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

这是一个她至今都还十分熟悉的场景。米勒于一九五三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子，尼茨基多夫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之后，罗马尼亚王国扩大疆土，该地区并入罗马尼亚。一九四〇年，扬·安东内斯库法西斯政府和德意志第三帝国形成正式联盟，许多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包括米勒的父亲——都报名参加了德国军队。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苏联红军挺进罗马尼亚腹地：安东内斯库政府被推翻，新政权倒向了苏联的怀抱。一九四五年一月，所有年龄在十七至四十五岁、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都被驱逐到了苏联的劳改集中营。米勒的母亲就在这批被驱逐者之列。

在苏联治下，罗马尼亚的农场都集体化了，土地和企业都划归国有。七十年代末，当局找到米勒，但是米勒拒绝合作当告密者。

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米勒转向了写作。她的第一部作品《低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于一九八二年以审查本的形式问世；第一个完整版于两年后在柏林出版。一九八七年，她终于获准和母亲离开罗马尼亚，最终定居柏林。接下来她出版了其他作品，主要有：《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和《呼吸秋千》（2009）——被翻译成英文出版时，作品名分别为《青李之地》（1996）、《约会》（2001）和《饥饿天使》（2012）。

作为《饥饿天使》这本书推广活动的一部分，米勒来到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作品朗读活动。她读德文原文，我则读我的英文译文。这次访谈就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华盛顿这几次阅读的间隙用德语进行。

文如其人，米勒就像是释放高压电能那样放出巨大的精力，在她登台朗读前聚精会神时精力达到了顶峰。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与其说是镇定自己的习惯，倒不如说是一种必要的管道，吸收额外电能的管道。尽管她的作品多年来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频频获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给她带来了名人的地位，这种地位放大了她代表某些事业的声音，然而对于这种地位，她根本就感觉不到舒服自在。

——菲利普·贝姆，二〇一四年

《巴黎评论》：您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讲见证文学，您曾写到等火车通过的情节。

赫塔·米勒：我那时候没有手表啊，所以我就要等到第四列火车经过山谷，才能领着母牛回家。到那时候就八点钟了——我一整天就在山谷里度过。我需要看管那些牛，可是那些牛却根本不需要我。它们有它们的日常生活，啃着草，对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它们确切地知道它们是谁——可是我呢？我常常看我的手和脚，搞不明白我究竟是什么。我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很显然是和牛以及植物不同的东西。而不同本身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的。我常常看着那些植物和动物，暗自思忖，它们过的生活很好，它们懂得如何生活。于是我就设法靠得更近一些。我和植物说话，我尝植物，于是就知道每一种植物是什么味道，我能发现的每一种草我都吃。我想，一旦尝了那种草，我就能靠它更近一点儿，我就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我就会把我的肌肉、皮肤变成某种更像那种植物的东西，这样它就会接纳我。当然了，那实在只是我的孤独而已，和我照看那几头牛所有的重重忧虑混合在一起。于是我就研究那些植物，我摘一些花，把它们配对，这样它们就能够结婚了。我以为人能做什么，植物也能做什么。我坚信植物是有眼睛的，它们夜里会到处游荡。我知道我们家附近的那棵菩提树会去看村子里的那棵菩提树。

《巴黎评论》：您在城里会感觉舒服些吗？还是城市的风景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压抑感？

赫塔·米勒：城市有不同的恐惧。那里也有植物，我经常说某些植物跟那些大权在握的人都串通好了——它们已经叛变，倒向了国家那一方。像金钟柏、冷杉树以及所有的常青植物，就是种在政府机构周围的常青树，所谓的活篱笆墙。还有社会主义的花。

《巴黎评论》：我住在波兰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买红色康乃馨，因为这种花总是用于国家重大集会上。

赫塔·米勒：我现在看到它们还是受不了。还有剑兰。每当举行一场葬礼或者某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埋葬仪式时，他们总是用同样的花，因为那些花开放的时间最长。但我一直喜欢很快就会凋谢的花，比如像三色紫罗兰或者是山谷里的百合花，或者大丽花、草夹竹桃花。这些花不会让自己用错了地方。人也是一样——让自己用错地方的人，他们的性格适合那一点。没有那种性格的人一开始是不会那样子被用错地方的。正像是假如康乃馨和剑兰凋谢得更快一些的话，那它们就不会落得个被塞到刚刚去世的党的领导人的花园里的下场。然而，小花园里的花，那些只开放很短时间的花——那些都是无权无势的人的植物。

《巴黎评论》：什么东西都开始有了注解。

我觉得这在有关压迫的作品里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比方说在豪尔赫·塞姆普伦的作品中，处境最糟的人搞不明白，他们周遭的环境怎么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人们怎么对人类所有的苦难都如此漠不关心。如果压迫就在外面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那么整个景色似乎就都成了同谋者。

这跟您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您觉得各种物体到了夜里就到处乱飞。可是您没有想象植物和植物结婚的事，您现在的倾向是给周围的环境安上了更加黑暗的动机。

赫塔·米勒：每一个东西都变得充满含义。然而这些含义会随着观察者的经历变化而变化。

《巴黎评论》：而且很少有这种时候啊，自然界的一部分提供安慰。比如说像《饥饿天使》里送给莱奥的冷杉树树枝。

赫塔·米勒：有一次我跟奥斯卡·帕斯蒂奥尔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州，我开始对所有的冷杉树大发牢骚，说这些树什么都做不了，说它们乏味、孤傲，人们究竟干吗要在圣诞节这天把这种树带到家里。然而他看看我说，你不能说冷杉树的任何坏话。接着他就给我讲，他当年在集中营里，实际上都要饿死了，绝望到了极点。他用电线头和绿色的毛线拼凑成一棵圣诞树，而那棵树就成了他跟文明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你不一定要相信圣诞节，他说，但是你依然能相信冷杉树。实际上你一定要相信。

《巴黎评论》：这件事在《饥饿天使》里也发生了。不过，刚开始，他偶然碰到一棵真正的冷杉树，就设法偷偷把那些树枝弄到集中营里去。只是卫兵们没收了树枝，用那些树枝做了一把扫帚，莱奥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您用他的声音写道：“三天以后就是圣诞节了——一个在房间里摆放青青的冷杉树的词语。”这是一个迷人的句子，因为您有实物——冷杉树树枝——还有“圣诞节”这个词语，然后用电线和纱线重新做一棵圣诞树，这棵树营造出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现实。而这恰恰就是您在您好几部作品中的写作手法。从某个角度讲，它是您小时候就有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您编造词语并把它们安到您正在经历的世界。不过即使是您编造的词语，也不总是能安得上去。

赫塔·米勒：这就使得我和事物之间的鸿沟更加清晰了。

《巴黎评论》：还有语言以及语言想要描写的事物之间的鸿沟。

赫塔·米勒：词语有其自身的真理，而这种真理来自词语的发音。然而词语和事物本身是不一样的，从来都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搭配。

《巴黎评论》：您也写到过语言的不恰当性。您写道，我们并不总是以词语思考，语言并不能涵盖我们内心最隐秘的世界。所以，也许这样说更准确：您寻找种种方法描写潜藏在后面的东西，描写字里行间的东西，而且这常常仅是沉默而已。《饥饿天使》里还有一个场景，莱奥的祖父盯着一头牛犊在看，用他的眼睛吞噬着这头

牛犊，书里有这个词：Augenhunger——“眼饥饿”。是不是还有“词语饥饿”这样一个东西呢？

**赫塔·米勒：**饥饿的是词语。我对词语并不感到饥饿，但是词语有着其自身的饥饿。它们想消耗掉我所经历的事情，而我必须确保词语能做到这一点。

**《巴黎评论》：**您一旦开始写那些句子，您是不是让那些句子牵着您走？

**赫塔·米勒：**它们自己知道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语言知道打哪儿起，打哪儿落。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但那些句子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到达那里。即便如此，还一定要牢牢抓紧语言的缰绳。我创作总是很慢。我需要很多时间，因为我用很多方法。每本书我都写二十遍的样子。刚开始，我需要所有这些拐杖，我写出很多多余的东西。之后，我走得足够远了——在我内心，我依然在探寻——我会把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删掉大约三分之一，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了。不过，然后我就会回到第一稿，因为很显然，那才是最真实的一稿，而别的一切都证明是不令人满意的。我常常觉得我无法把它拉开。语言和生活是那么的不同的。我怎么就必须把一个安到另一个身上去？我怎么能把它们拉到一块儿呢？是没有一一对应这样的事情的。首先，我得把一切东西都拆开。我一开始就照现实写，但我必须把这个现实完全打碎。然后我用语言创造出某个全然不同的东西。如果我运气不错的话，它就会一起回来，而新的语言就又和现实走得很近了。但话又说回来，这完全是一个人造的过程。

**《巴黎评论》：**就像莱奥的圣诞树。还有您在斯德哥尔摩说过的话，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它不是一个信赖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诚实欺骗的过程——一个充满着巨大能量的过程。

**赫塔·米勒：**没错，而且那能使你像着了魔一样。当人们谈到某篇文章之美的时候，它的美就是从那儿来的——事实就是，语言把我拽了进去，这样我就想写出它来。但是，这样做也痛，所以我就很害怕写作。而且我常常搞不清楚我是否胜任这项任务。不过，它也是你以前提到的——其中的一半是沉默。说出来的是一回事，但没有说出来的也必须在那儿，它必须游离于你正在写的东西之中。你也必须感受到这一点。

**《巴黎评论》：**而这种沉默不仅存在于人物的内心，也存在于人物之间，存在于作品本身。在《青李之地》中，您写道：“我们嘴里的话跟我们的脚踩到草上一样，有着同样的毁灭性。而我们的沉默也一样具有毁灭性。”

**赫塔·米勒：**沉默也是一种讲话的方式。它们是很相像的。它是语言的一个基本成分。我们总是在选择什么话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不说。我们为什么说一件事而不说另一件事？而且我们这么做凭的是直觉，因为不管我们在说什么，没有说的总是比说的多。这也并不总是要隐藏东西——它只是我们说话当中凭直觉选择的一部分。这种选择因人而异，因此，同样的东西不管有多少人描写过，描写总是不一样的，视角不同嘛。即使有着相似的视角，说什么，不说什么，人们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从村子里来，这一点我就很清楚。因为那里的人说话，从来不会超出他们绝对需要说的量。我十五岁进城的时候，很惊讶于人们的话那么多，而那些话有那么多都毫无意义。还有就是人们谈自己谈得那么多——那之于我完全是陌生的。

在我看来，沉默一直都是另外一种交流方式。你只是看着一个人，就能看出那么多东西。在家里，我们哪怕不是一直谈论自己，彼此之间也非常了解。在别的地方我也遇到过很多的沉默。有那种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沉默，因为你真正想的东西你永远也不能说。

**《巴黎评论》：**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以语言的方式冒出来的，您写过这样的话。

**赫塔·米勒：**很多思想都是没有语言的，甚至语言也无法到达我们思想的最深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若不是生活在罗马尼亚，一切都会很不相同，三十四年不管在哪儿住，都是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而语言就会把这一点反映出来。

**《巴黎评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两方面都会反映出来。

**赫塔·米勒：**是的，很奇怪吧。一方面，罗马尼亚语有这种巨大的感性和魔力。因为你有那种不可预测性，这种浮夸的倾向，机会主义，那巨大的机会主义。我总是相信这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罗马尼亚人有一句谚语——玉米粥是不会爆炸的。罗马尼亚人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一点——他们非常有忍耐力，非常容易堕落。我经常有这种印象：其他的东欧国家就不一样。我想到了波兰，想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是俄罗斯。然而我对此始终心存疑虑。你有这种华美的语言，然后又有彻底的无知和残忍。所谓彻底的无知，就是一种默认倾向，一种预先的立场。然而恰恰是这种无知，这种对政治事务的兴趣缺乏，才是问题之所在。因为缺乏兴趣的人对艰难的时代毫无准备，所以他们很快就屈服，很快就顺从，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对他人采取残忍的行动，为的是不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想理解它，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理解了它，它总是如此假设。我认为我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你越是思考它，它就变得越发令人困惑不解，也就越难被完全领会了。

**《巴黎评论》：**我们可以在罗马尼亚历史中发现这种同样的顺从性，到了战争尾声，罗马尼亚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效忠对象。

**赫塔·米勒：**是的。问题是，哪怕在一个特定的灾难时期结束后，罗马尼亚人也从不承认刚开始灾难有那么严重，也从不承认他们——至少是某些人——在这场灾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而要负一些责任。

**《巴黎评论》：**在文学作品中也不调查？

**赫塔·米勒：**也许有一些学术著作会探讨某些特定的主题，但是没有更广泛地和过去

角力。可是到了现在，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人们是能够处理、也需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罗马尼亚之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动静，是因为无论对于哪一个独裁统治，人们都还没有解决。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澄清，而且大家谁也不想对此有任何了解。

**《巴黎评论》：** 还能正确对待历史。

**赫塔·米勒：**于是事情就重复自身。比如，就在现在，在罗马尼亚，反犹太主义甚嚣尘上。有一种民族主义咄咄逼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这一点也跟没有人谈论过这些事情这一事实有关。

译者：杨振同  
(原载《巴黎评论》第二百一十期，二〇一四年秋季号)



本文摘选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7》，注释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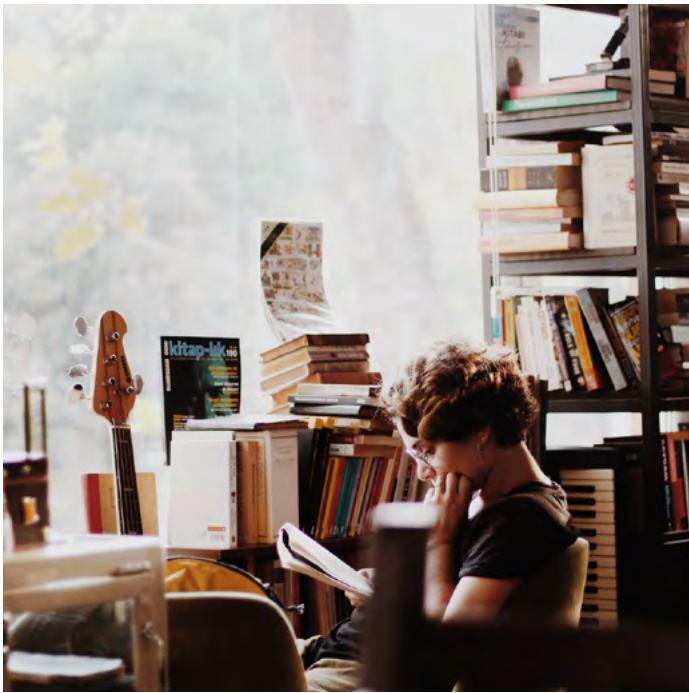
巴黎评论

美国老牌文学季刊，1953 年由美国作家乔治普林顿、彼得·马修森等人创刊于法国巴黎，后编辑部迁回美国纽约，并持续出版至今。自创刊之日起，六十多年来，《巴黎评论》一直坚持刊发世界顶级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并成功发掘推介了众多文学新人，著名作家如诺曼·梅勒、菲利普·罗斯等人的写作生涯正是从这里起步。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Hatice Yardim](#) on Unsplash

## 档案

# 为终结“经期贫困”， 苏格兰通过里程碑式立法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现在，苏格兰将向任何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包括卫生棉条和卫生巾在内的经期用品。这是该国结束“经期贫困”行动的一部分。

什么是“经期贫困”？世界卫生组织将“经期贫困”定义为“无法获得经期卫生工具和教育，包括但不限于卫生产品、洗涤设施和废物处理”。这个词还指妇女和女童由于经期用品带来的经济负担而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脆弱性。

提出该法案的苏格兰工党议员 [Monica Lennon](#) 说道，鉴于官方不平等统计数据显示，苏格兰有近 20% 的女性生活在相对贫困中。

从八月开始，苏格兰居民将可以在药店和社区中心等地方免费领取经期用品，且无需说明为什么需要经期产品或需要多少经期产品，除邮递外，任何机构不应要求任何人提供个人信息。需要的人可以在手机 APP 中找到附近的发放点，这款 APP 由一家名为 Hey Girls 的社会企业推出的。

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提供女性卫生产品的国家，这是苏格兰政府多年努力的结果。早在 2018 年，苏格兰政府就投资 520 万英镑，为中小学生、大学生免费提供卫生产品。2019 年，政府又拨款 400 万美元，在图书馆及娱乐中心免费提供卫生产品。

社会司法部长 Shona Robison 在一份声明中说：“提供免费的产品是平等和尊严的根本，并消除了获得这些产品的经济障碍。”她称，在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时代，此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经期贫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印度女权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印度，许多农村妇女仍然依赖破布、干草和沙子等材料，作为更安全但昂贵的经期用品的替代品。[《柳叶刀》](#) 的文章称，自制的替代品包括抹布和纸巾等，可能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健康危害。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的数据，除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经期贫困也影响富裕国家的妇女。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约 14% 的美国大学生买不起经期用品，这一比例在黑人 and 拉丁裔女性中更高。英国国际计划 2017 年的一项调查则表明，在整个英国，14-21 岁的女孩中，十分之一的人表示买不起经期用品。调查还发现，近一半的人对自己的生理期感到尴尬，约有一半的人因此翘了一整天的课。

除了经期贫困，还有月经羞耻。通过该法案，苏格兰希望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经期产品，反过来，这将使社区的经期话题正常化。政府表示，为了在苏格兰成功地开展反污名运动，它将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教育网站，并在学校提供更好的经期健康资源。

令人期待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开始借鉴苏格兰的做法。截至目前，新西兰、肯尼亚、纽约等地已经免费在公立学校提供经期用品，英国则自去年开始取消了月经产品 5% 的增值税，捷克议员也在推动类似的立法。

正如 Monica Lennon 在给《[纽约时报](#)》的电子邮件中所说的，“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巨大的文化变革，经期耻感不再被容忍”，“人们更加强调生理期的健康，并重新关注解决医学上的厌女症。”

##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在福利院内被殴打

在沙特阿拉伯，妇女也经常被迫送到孤儿院或收容所，以逃避家庭暴力。人权组织称，住在这些机构中的女性经常抱怨受到虐待。

沙特阿拉伯当局近期正在调查一段在社交网络流传的视频。视频显示，一群男子——其中一些人穿着安保制服——在该国西南部的一个社会福利院殴打数位女性。目前还不清楚这段视频是何时拍摄的，也不清楚这些女性的具体年龄和身份。欧洲沙特人权组织认为这起事件不会得到适当的调查，理由是“司法系统存在缺陷”，而且在针对女性的罪行方面普遍缺乏问责机制。

英国人权组织 ALQST 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根据第一个发布该视频的人的说法，这起暴力事件是对女性抗议该福利院生活条件恶劣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复。ALQST 监控和通信主管 Lina al-Hathloul 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没有男性监护、住在孤儿院的年轻女性，因为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会遭到国家的暴力攻击”。

## 一位俄克拉荷马州的老师让她的学生接触禁书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教育部长呼吁教育委员会撤销一名教师的资格证书，因为她试图让学生接触到禁书。

上个月，这位名为 Summer Boismier 的教师已经向学校辞职，原因是一名家长投诉她在课堂上发表政治言论。据 NPR 的报道，Boismier 在教室书架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州政府不想让你读的书”。她还在墙上贴了一个二维码，引导学生前往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参与“图书不被禁”项目，该项目试图让全美国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在学校里可能被禁止阅读的书籍。这些行动是对 HB 1775 的回应。HB 1775 是于 5 月颁布的州法律，限制公立学校教育者对种族和性别等议题的言论。

目前，Boismier 还在接受审查。该学区的一份声明称，Boismier 发表了“个人政治声明”，并在课堂上进行了“政治表演”。而这位教师此前曾告诉 [Gothamist 网站](#)，“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故事被隐藏起来”，她说，“指令中没有一条说我们不能在墙上贴二维码。”

## 干旱侵袭索马里，儿童死于营养不良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称，索马里正在经历 40 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至少有 730 名儿童因此死亡，至少有 33 万名儿童需要治疗严重消瘦。医生们表示，死在家中或路上的儿童数倍于此。

持续已久的干旱导致人们不能种植粮食，也很难买到粮食，乌克兰战争使已经很高的物价进一步上涨。索马里全境已有 17 个地区面临饥荒，数十万人离开农村家园，到城市寻求人道主义援助。

干旱迫使大量儿童在街头乞讨，还有一些儿童七岁就开始擦鞋养家糊口。

女性权利活动家 Zeynab Omar 表达了对女童的担忧。“不道德的男人可以利用这些女孩的处境，对她们进行性虐待。这就是干旱造成的影响。”截至目前，[联合国](#)已开始向索马里派遣特派团，会见受影响的社区及当地政府官员，以支持应对行动。

## 加州快餐工人正在争取更好的薪资福利

上周，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 AB 257 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在于成立一个快餐委员会，为加州的快餐工人制定全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与健康和安全有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该法案称，在疫情期间，快餐公司快速复苏并盈利，而加州的 50 万快餐工人却处于不利地位。

这项法案目前正在等待州长的批准。一旦获批，快餐工人的最低工资将有望提高到每小时 22 美元。它还将允许不同品牌的员工一起工作，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倡导权利。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行业领袖们，包括麦当劳美国公司总裁 Joe Erlinger，他在上周三公开反对该法案。他说，他欢迎所有提高工人工资的立法，但“加州的做法针对的是工作场所，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种不平衡、虚伪和考虑不周的立法伤害了所有人。”国际特许经营协会也对该法案提出了异议，认为该法案将损害体量较小的特许经营商。但经济政策研究院、公平工资等数十个团体均在敦促通过该法案。

加州服务员国际工会 (SEIU) 主席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加州快餐业的大多数员工是黑人或拉丁裔，因此该法案的通过“是解决加州持续存在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危机的关键一步”。

## 日本一家养老院招募婴儿来鼓励老年人

日本南部的一家养老院正在“雇佣”婴儿来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陪伴老人并让他们微笑。到目前为止，已有 30 多名婴儿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他们的任务是让 100 多名老人振作起来，这些老人大多都超过了 80 岁。

养老院为新员工们提供了丰厚的福利，包括灵活的工作时间、婴儿配方奶粉和尿布。“新员工”必须不满四岁，监护人可以签署一份合同，婴儿“只要愿意”就可以来上班。这一招聘活动是该养老院负责人 Kimie Gondo 的想法，她表示，“只要看到婴儿，我们的居民就会笑”。

## 马来西亚前第一夫人因贪污被判 10 年监禁

马来西亚法院上周四裁定，前总理 Najib Razak 的妻子 Rosmah Mansor 寻求和

收受贿赂的罪名成立，将被判处 10 年监禁。就在几天前，她的丈夫因腐败入狱，需服刑 12 年。

现年 70 岁的罗斯玛对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的三项指控拒不认罪，她辩称自己是被她的前助手以及几名政府和公司官员陷害的。她说，“没有人看到我拿钱，没有人看到我数钱。”

自 2018 年 Najib 在选举中落败，这对夫妇一直是多项腐败调查的焦点，当时选民对另一起数十亿美元的腐败丑闻的愤怒终结了他九年的执政生涯。警方在与这对夫妇有关的房产中发现了 1.2 万件珠宝、567 个奢侈手袋（其中包括大量爱马仕）、423 块手表和 2600 万美元现金。

### 澳大利亚警方查获价值 11 亿美元的冰毒

本月初，澳大利亚当局在从中东运往悉尼的大理石瓷砖中发现了藏匿于其中的近两吨冰毒，并逮捕了三名男子，警方称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查获的最大规模的非法毒品。这些毒品的黑市价格为预计高达 11 亿美元。

警察局长 John Watson 称冰毒的数量“惊人”，并表示“未来数周，许多高、中、低端供应商都将感受到此次冻结的影响。”自上周查获以后，警方没有进一步逮捕任何人。调查人员已将注意力转向查明海外供应商，中东地区将是重点。

### 新加坡不再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但仍然禁止同性婚姻

八月下旬，新加坡宣布将结束殖民时代将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这似乎是该国同性恋权利倡导者的一个重大胜利。但在废除这项法律的同时，新加坡政府重申了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希望保留该法律的宗教团体默许了这一妥协。活动人士则表达了他们的失望，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又后退了两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演讲中表示，他的政府将“维护婚姻制度”，而宪法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结合。他说道，“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政治和解，一种平衡新加坡人的合法观点和愿望的和解”，“但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随心所欲。”

对 LGBTQ 权利活动人士来说，继续禁止同性婚姻是一个重大打击。在新加坡，登记结婚的夫妇比单身人士获得更多的住房补贴和收养权。

### 一名沙特女子因使用 Twitter 被判 34 年监禁

一名沙特阿拉伯妇女被判 34 年监禁，原因是她拥有一个 Twitter 账户，并关注和转发了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的发言。

34 岁的沙特公民 Salma al-Shehab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此前曾在英国利兹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Salma 的 Twitter 主页显示她有 2597 名粉丝，有时会转发流亡的沙特异见人士的发文，这些帖子呼吁释放沙特的政治犯。

她于 2021 年在沙特境内度假时被捕，最初被判处三年监禁，罪名是利用互联网站引发公众骚乱，破坏国内和国家安全稳定”。但是，在一名检察官要求法院考虑其他被指控的罪行后，8 月 9 日，上诉法院宣布了新的判决——34 年监禁，以及 34 年旅行禁令。

截至目前，Twitter 拒绝就此事置评，也没有回应有关沙特阿拉伯对该公司是否有影响的具体问题。据《卫报》，Twitter 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是沙特亿万富翁、沙特王室成员 Alwaleed bin Talal，他通过他的投资公司 Kingdom Holdings 拥有 Twitter 超过 5% 的股份。

### 尼日利亚正式禁止白人模特出现在广告中

尼日利亚联邦信息和文化部 8 月 23 日发表声明，宣布尼日利亚广告管理委员会（ARCON）禁止在尼日利亚媒体上使用所有外国模特和配音演员。

许多人以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回应了这一声明，指责尼日利亚歧视白人模特，并称该国的新政策是“仇外”。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此举表示赞同，他们称赞这是“一个小胜利”和“早该如此”的措施。

据 ARCON，这项禁令将于 10 月 1 日生效，它将使尼日利亚成为第一个禁止非本土模特和配音演员的国家。尼日利亚广告公司协会成员 Steve Babaeko 在《泰晤士报》的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禁令的真实性。他表示：“十几二十年前，如果你去看广告，其中几乎一半是外国面孔，所有的配音都是英国口音。我认为这项法律只是顺应了民族情绪。”

### 白宫将向全美的大型同性骄傲活动提供猴痘疫苗

白宫周二宣布了抗击猴痘传播的新行动，包括提供疫苗和支持全国各地的 LGBT 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白宫将为亚特兰大、新奥尔良和奥克兰的骄傲活动提供猴痘疫苗。

声明还说，鉴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的数据显示，这种病毒在黑人 and 拉丁裔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其他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中传播的比例过高，白宫还宣布了一项新的试点，增加对有色人种社区的疫苗供应和其他预防资源。

今年 5 月 18 日，美国首次出现了猴痘病例。截至 8 月 22 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记录了 18101 例病例，其中，约 98% 的病例是男性，约 93% 的病例是最近与其他男性发生性接触的男性。

### 乐队成员被怀疑是新纳粹，比利时音乐节取消

比利时伊普尔地方当局撤销了原定于 8 月 27 日至 28 日周末举办的 Frontnacht 音乐节的许可，原因是该音乐节的演出阵容与新纳粹和法西斯组织存在联系。此前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当局禁止这一活动，同时欧洲安全部门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这一活动原本是弗拉芒民族主义节日 IJzerwake 的一部分，该节日在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举行，由一群激进的比利时弗拉芒人组织。尽管 IJzerwake 的主席 Wim De

Wit 坚称“我们不是新纳粹”，这一活动还是受到了比利时反种族主义犹太团体等组织的反对。

据《布鲁塞尔时报》，此次音乐节阵容包括意大利乐队 Bronson，该乐队成员与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运动 CasaPound 有关，经常赞扬已故法西斯独裁者 Benito Mussolini。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  
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  
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  
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  
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Marjan Blau](#) | @marjanblau on Unsplash

## 档案

# 当只有仇恨和指控 是被记住的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作家萨曼·鲁西迪遇刺后，在西方世界掀起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和近些年“取消文化”的背景相呼应。比如英国作家凯南·马利克 (Kenan Malik) [称](#)，某种程度上，许多社会已经内化迫害，并在我们谈论彼此的方式中引入某种自我审查。美国作家大卫·里夫 (David Rieff) [认为](#)，如果《撒旦诗篇》是在今天提交出版，将会与“敏感读者”发生冲突。作者会被告知——就像教令所说的那样——语言即暴力。

大卫·里夫等人实际上是在批评欧美当前的“取消文化”风潮，希望借此让人们看到语言和暴力的界限。正如《纽约时报》所**概括**：“随着年轻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地**批评言论自由原则**，经常为仇恨言论提供掩护，攻击性言论属于‘暴力’的概念越来越流行。‘言论自由’成为保守派的战斗口号，他们把它作为反对自由派的武器，指责自由派想要审查异议。”这在 2015 年美国笔会决定向法国杂志《查理周刊》颁发勇气奖、2020 年鲁西迪参与联署的《[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等事件中都可看到其争议。

不过，将原教旨主义或神权主义的暗杀与当代西方左翼言论联系起来的看法也遭到一些**批评**。批评者同意必须要尊重言论和暴力之间的明确界限，因为冒犯你而试图杀死某人是可怕的，但认为这不能等同用来批评“取消文化”。“言论自由”不是独白，恰恰是有人反对的自由，而任何言论都会遭遇社会制裁的风险。

和反对《哈泼斯》那封公开信[人士](#)的角度类似，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关注的是刺杀背后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他在文章《[仇恨从何而来？](#)》(Where the Hatred Comes From) 中，讲述自己因为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评论遭遇威胁，十多年来被保护性监视，感到窒息和厌烦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他经常想起那些制造威胁的人，觉得我们要关注基于阶级的文化差异和民族主义怨恨等。

帕慕克称，如果我们希望看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社会中蓬勃发展，只有像鲁西迪这样的作家的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勇敢地思考他们遭受强烈仇恨的根源。事实上，刺杀鲁西迪的嫌疑人哈迪·马塔尔只读过几页《撒旦诗篇》，在一家折扣店当店员。这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帕慕克的敏锐，也符合米兰·昆德拉曾在[文章](#)中讽刺人们纵情谈论《撒旦诗篇》攻击伊斯兰教，但几乎没多少人读过这本书的窘境。

“他们在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却风度优雅地、带着花花公子般的微笑说：‘他的书？噢，不！噢，不！我没读过。’……没有人还在怀疑鲁西迪攻击了伊斯兰教，因为满世界只有指控是真实的，而小说的文本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再存在了。”昆德拉写道。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8 月 30 日，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逝世，享年 91 岁。4 天后，他

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但俄罗斯没有宣布全国哀悼日，也没有为其举行国葬，只是遗体告别仪式有国葬的部分元素。普京缺席了葬礼，由于俄罗斯回应西方制裁实施入境禁令，所以也没有西方领导人出席。某种程度上，这场葬礼的“低调”暗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复杂与争议，以及一些人对他的选择性遗忘。

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不太受许多人待见。虽然普京在声明中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他深深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力求为紧迫问题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普京是戈尔巴乔夫的严厉批评者，曾将苏联解体称为“该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许多怀念“帝国”的俄罗斯人也对戈尔巴乔夫持批判态度，认为他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要为苏联解体及随后的经济危机等问题负责。另一边，像《新报》总编[穆拉托夫](#)等人会向其致敬，认为戈尔巴乔夫“鄙视战争”，更喜欢“和平”，而非“个人权力”。

在西方，戈尔巴乔夫广受赞誉，认为其和平终结冷战。比如美国总统拜登赞扬他具有非凡远见，接受民主改革，使世界更加安全，也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享有更大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他是和平主义者，为俄罗斯人民开辟自由之路，对欧洲和平的承诺改变了我们的共同历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扬他是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不懈的和平倡导者。

美国学者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 曾花 11 年写作传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时代》(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认为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但这些改变都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大。回想起来，他的最终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已故俄罗斯学者德米特里·弗曼 (Dmitry Furman) 所说，他有资格被誉为“俄国史上唯一掌握绝对权力却坚守道德情操，自愿限制权力甚至冒险失去权力的政治家”。

“当戈尔巴乔夫 1985 年上任时，他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他本可以无限期地维持现状。然而，他彻底摧毁了苏联体制，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思想自由带给了不识这些权利为何物的人们，他还引入了自由选举和真正的议会制度。是他而非别人结束了冷战，降低了人类因核战争而毁灭的风险。他默许了苏联帝国的解体，在解体时没有出现其它帝国崩溃时常有的暴力。他梦想建立一个禁绝武力的新世界秩序，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东西方不再有分歧。”[陶伯曼写道](#)。

在苏联的前加盟国和卫星国，乃至更远的非洲等地，戈尔巴乔夫的**面貌**更加多元复杂，其评价和当地的历史与影响紧密相关。比如在德国，因为戈尔巴乔夫促成两德统一，所以很受人们欢迎，像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近年还制作过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



《会见戈尔巴乔夫》(2018) 剧照

但在高加索地区，如阿塞拜疆，戈尔巴乔夫 1990 年曾派兵镇压其独立运动，造成 100 多人死亡，所以该地区的民众至今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屠夫。类似的，在波罗的海地区，如立陶宛、拉脱维亚，戈尔巴乔夫血腥镇压过它们的独立运动，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被长期谴责。

乌克兰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切尔诺贝利事故给乌克兰造成至今无法弥补的创伤，人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需对其负责；另一方面，他确实为乌克兰的独立开辟道路，受到民众赞扬。

至于非洲，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得安哥拉、南非等地迎来和平转型，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比较高。

回顾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内政和外交是两个核心。内政，主要是备受争议的改革部分。历史学者沈志华[认为](#)，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也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已经走进死胡同。就像一个人已病入膏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陶伯曼则将改革失败的原因追溯得更长：“改革的障碍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沙皇专制主义演变成苏联体制，民众盲目服从权威却又不时以血腥的暴力运动反抗权威，仇视妥协妥协这个词在俄语中有负面含义），没有自我组织的民主传统，缺乏运行自由市场的经验，没有真正的法治。”

在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戈尔巴乔夫说自己坚信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有错误和过失，我们却把国家带出了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给了它自由的初步经验，解放了人们，使它们有可能凭自己的智慧生活。我们给“冷战”、核武器竞赛画上了句号。”

关于外交，一大争议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在促成两德统一，保留其在北约内的成员国地位时，条件是结束冷战后的解决方案将会考虑苏联的安全利益。那时，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向他**口头承诺**，北约“向东不进一步”，但他没有将口头承诺正式写入文件签署，使得多年后北约东扩，双方出现巨大争论。

他的另外两大**遗产**，与西方对话和推进核裁军，逐渐烟消云散。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谷底，核威胁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上空。戈尔巴乔夫的母亲和岳父都是乌克兰人，但他逝世前没有公开评论俄乌战争。不过，曾为他当翻译 37 年的帕拉日琴科 (Pavel Palazhchenko) 数周前与其通过电话。

帕拉日琴科[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戈尔巴乔夫“震惊和困惑”。“不只是 2 月 24 日开始的军事行动，而是过去几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整个演变，对他是很大打击，真的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彻底摧毁了他。”

据财新统计，最近疫情波及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近百座城市，其中有 33 座城市处于部分或者全部“静态管理”，超过 6500 万居民受到影响。一些防疫政策也受到争议，比如四川泸定地震发生时，一些居民被阻止逃离住所和小区，消防通道也被封锁；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在“静态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就医难、采购物资难、防控措施不够精准等，当地政府在发布会上向市民道歉；

国务院批评多地过度防疫、层层加码，包括河南的商丘、三门峡、开封，河北的邯郸市邱县，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台州、湖州市德清县，宁夏的吴忠市盐池县。此前，河北、辽宁、青海等地也被国务院批评过度防疫、违反防疫“九不准”；烘焙品牌“巴黎贝甜”在上海封控期间让无法返回住处的工人前往培训中心过渡住宿，烤制面包自食自用，后向周边急缺食物的居民平价出售，但被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罚款 58.5 万，引发争议。

9 月 7 日，电影《隐入尘烟》票房过亿，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此前该片的票房预测只有 200 万。电影以诗化语言呈现乡村现实，讲述在西北农村，两个被各自家庭抛弃的孤独个体，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的故事。导演、编剧李睿珪称：“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一千、有五亿农民，但在八万块银幕上很少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形象和生活，有责任让更多人看到他们。”

面对《隐入尘烟》美化苦难等争议，李睿珪解释道，自己作为高中学了三年美术的美术生，可能没有办法放弃对构图影调的处理方式，但乡村和里面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劳动既有残酷，也有美。

他还说：“每次都会有很多观众说，我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说，怎么能是边缘人群？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那么高，是谁在把谁边缘化？我拍《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其实都是在讲述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这也是《隐入尘烟》里出现的问题。在乡村，没有退休金，还没有家人和子女，它是精神和物质上好几重的困境。我们在今天去改善现在老人的困境，那就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未来。”

景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养老问题。在《我们该如何面对“老去”》一文，他也指出出现在中国养老形势面临的挑战，比如 70% 大中城市的老年家庭属于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有 1600 万，另外全国还有 4000 多万失能老人，研究了当前四种积极应对的模式，包括幸福守门人、时间银行、老人会、病友会。在“老去”的问题之后，紧接着是“离去”的问题。景军介绍了安宁疗护的历史、现状和国内几种模式，称安宁疗护也称为临终关怀、末期关怀或者姑息治疗。它不同于“安乐死”，是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离去。据国家卫健委 2018 年的数据，中国只有 28.3 万人接受安宁疗护，尚在起步阶段。

9 月 8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君主制”成为争论焦点。在一些英联邦国家，“脱离君主制”、“成立共和制”的讨论兴起。去年 11 月，东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就正式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最近，一些活动人士借机再次呼吁取消英国君主在这些国家的国家元首地位，并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贸易支付赔偿。

英国白金汉大学教授格雷（Anthony Glee）认为，21 世纪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赞成君主制，主要取决于君主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伊丽莎白二世对此驾轻就熟。她履行其义务，严肃认真地为国家效力，特别是严格避免对政治的任何干预。因此，女王逝世后的情况将很难说。而且，英国正陷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新任首相特拉斯才刚上台，情况加剧。

8 月底，一篇署名“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的论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引发争论。该文称，“闭关锁国”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殖民势力，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政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以“自主限关”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政策。这一政策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但造成了消极防御和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埋下了伏笔。

一些批评者认为，该文是在为“闭关锁国”翻案，也是中国政策发展动向的反映，还引用或转发历史学者戴逸 1979 年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批驳。也有人觉得，上述批评有点过度，中国目前强调的还是开放。但是，人们说明清两朝“闭关锁国”，是在表达明清限制对外交流的荒唐程度，不能把它机械理解成完全关闭国门，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贸易和来往。需要反思的是，明清统治者既自大又封闭的心态通过实施政策传染给民众，导致整个社会和民众心态和精神的闭关锁国。

支持该论文的，代表如梅新育（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称，“经过 40 多年发展，明清闭关锁国论在国内外学界中都遭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明代及清代前期、中期白银通过贸易顺差渠道持续大量流入中国已成为学界常识，在社会大众中也日益广为人知，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进步很大。我从小被灌输明清闭关锁国论，到武大读世界经济系研究生之后，读到国内外那么多明清对外贸易、白银内流的专著、论文，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现在还有人几乎没有读相关文章，也不了解相关学术研究进步，就随着别人的片言只语人云亦云掀起舆情浪潮，要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强拖倒退回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那不仅可笑，更是可悲。”

9 月 29 日是中日建交五十周年，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中日关系：回顾与前瞻”专题，邀请四位中日问题专家撰文探讨。比如林晓光认为，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路径上，两国在“政治解决”（中方）和“法律解决”（日方）之间博弈。最终双方通过“政治解决”模式，就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责任赔偿等问题达成共识，《中日联合声明》

的签订为日后两国解决争议提供了良好先例；

张望则觉得，中日关系长期以来跌宕起伏，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密切相关。这种战略互疑正是源于 1972 年未完成的和解，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在当时求同存异的氛围下被搁置，为日后冲突埋下伏笔；林泉忠聚焦 21 世纪中日国力变化后，两国未作出合宜的心理调适，归泳涛关注 2009 年以来，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变迁。

几条文化新闻值得一看。在美国一项艺术比赛中，一幅获得数码艺术门类一等奖的作品引起争议因为它完全由一款软件生成波兰执政党向德国提 1.3 万亿欧元二战罪责赔偿，但德国外交部回应称，德国联邦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款问题早已解决；作家王朔时隔 14 年的小说《起初·纪年》备受争议，反响不一；

美国政府公布 2021 年高校毕业生数据，除哲学外，所有人文类学科毕业生都在大幅减少，而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人文类学科毕业生增幅可观。彭博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Noah Smith）据此认为，彼得·图尔钦的“精英过剩”（Elite Overproduction）理论在 2000 年代到 2010 年代与现实高度契合。

图尔钦觉得，2010 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费暴涨，生产出大量高学历人口，但却没有提供符合这些学费支出和学位预期的工作岗位，那么根据历史动力学的“结构人口理论”（Structural-demographic Theory），这些“过剩精英”就变成社会不满的活性因子，转向激进甚至破坏性的政治立场。这可以用来解释过去近十年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潮变化。

几部英文世界的新作可以留意。J.K. 罗琳的新书《墨黑之心》（*The Ink Black Heart*）讲述漫画创作者伊迪·莱德威尔（Edie Ledwell）的漫画被批评为种族主义、对残障人士和跨性别的恐惧症。一些评论认为，罗琳在小说中代入自我，但她本人予以否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将出版首部小说《万寿菊与玫瑰》（*Marigold and Rose*）；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私人日记及部分尚未发表的作品将结集为《荒凉峰》（*Desolation Peak*）出版；

伊恩·麦克尤恩出版新小说《课》（*Lessons*），通过讲述罗兰·贝恩斯（Roland Baines）的故事，串联起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撒切尔主义、伊拉克战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他想探讨，我们无法控制的全球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和记忆？我们能从过去的创伤中真正学到什么？

8 月 15 日，法学家亨利·梅因诞辰 200 周年，他被看作近代法律史、比较法学科的开路先锋，著有《古代法》等；8 月 22 日，作曲家阿希尔-克洛德·德彪西诞辰 160 周年，他被认为是西方现代音乐的开山鼻祖；8 月 24 日，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诞辰 120 周年，他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代表作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

8 月 29 日，哲学家约翰·洛克诞辰 390 周年，他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被广泛形容为自由主义之父，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9 月 9 日，顾毓琇逝世 20 周年，他文理兼修，在科学、诗歌、戏剧、音乐、佛学、教育等方面均有贡献，被称为“现代中国的达·芬奇”。

8 月 17 日，作家张北海（1936—2022）逝世，他被侄女张艾嘉说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陈丹青称其为“纽约蛀虫”，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改编自他的小说《侠隐》；8 月 20 日，鄂温克族老人玛丽亚·索（1921—2022）逝世，回到了森林和驯鹿身边，她被誉为“中国最后女酋长”，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主角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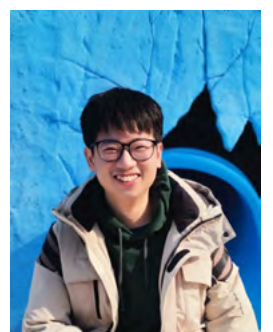
8 月 24 日，企业家稻盛和夫（1932—2022）逝世，他曾创办京瓷、KDDI 两家世界级公司，挽救日本航空于破产边缘，并以其管理学思想和人生哲学影响了许多人；9 月 1 日，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1941—2022）逝世，她是活跃的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长期关注美国底层社会，著有《我在底层的生活》等；9 月 4 日，作家彼得·斯陶伯（Peter Straub，1943—2022）逝世，他以恐怖小说闻名，探索人类未知，曾与斯蒂芬·金合著作品。

####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Brandon Lopez](#) on Unsplash

## 档案

# 遥远的星光， 和试图拦住邪恶的手

杨樱 | Newsletter

可能是一栏关于书的 Newsletter，  
也会谈谈别的。

美国调查记者 Max Fisher 在 9 月 6 日出版了一本新书，《混乱机器：关于社交媒体如何重塑我们思维和世界的内幕》(The Chaos Machine: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Social Media Rewired Our Minds And Our World)，向社交网络这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本身?)再一次作出诠释的努力。Max Fisher 是个国际新闻记者，嗯，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对对口国家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大型国际政治专有名词都了若指掌的人，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被嘲笑在当地星级酒店大堂里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专家级水准，但总的来说，是对实体 / 虚拟炮火、鲜血和复杂人性都不陌生的一种人。不过在分析社交网络最新观点这一点上，国际新闻记者一般来说出境不多，这个角色通常都属于科技和商业报道记者，以及学者们，后者不擅长讲故事，但列举数据和模型都是有条不紊的。Max Fisher 的切入点有点不同。



《混乱机器》

他的书以电影《2001：太空漫游》开场，劈头就提出了一个浓缩了这本书的类比：人类和社交网络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和库布里克镜头里面宇航员和那台超级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技术已然失控，人类能否将其掌控其中？带着这样一个类比，Fisher 展示了一个绝望的 Facebook 员工如何因为道德忧虑把机密文件交给他，这些文件都是 Facebook 如何鼓励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的记录。你继而会发现，Fisher 把缅甸、斯里兰卡的可怕暴力事件和 Facebook、

WhatsApp、YouTube 在煽动种族灭绝仇恨方面的作用联合起来，给出非常具体的论述和引证，试图说明一个简单的问题：社交媒体的技术设置和演变是否真正导致了大众的恐惧和愤怒？

Fisher 认为，对社交网络公司来说，愤怒和恐惧是一种货币，他们背后代表的分歧可以吸引用户参与，进而推动广告收入。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是核心运营者惊人的无知，同时还有惊人的傲慢——比如扎克伯格说的那句“人类社会关系背后有一个基本定律，它负责支配我们所关心的各种人和事”。算法鼓励人类依循本能和欲望，而非更理性的判断力。这可以解释为，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社交网络用户都会沦陷在阴谋论和假新闻之中，因为包括教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在内的种种因素依然会敲响警钟：看看你都在为什么而花费时间！

在众多探讨社交网络的书里，这本书足够新鲜、具体和细节化。新鲜不仅仅是因为 Fisher 的视角(以国际政治和社会科学双线并行的角度去探讨技术的道德和权力边界)，更在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是最新出版的书。

除非你是一个有英语阅读习惯的读者，否则对于 Chaos Machine 这样一本书，你最快读到它大概也需要在两年以后，这包括书号报批、翻译和上市的所有时间。虽然《乔布斯传》这样的书曾经做到了全球同步发行，但一个没有放在台面上的事实是，自从中美贸易战以来，来自美国的众多种类的书都进入了无限推迟的审批状态——不是全部，但比例相当可观。美国一贯在科技和商业非虚构出版上著作颇丰(也质量最佳)，仅仅就这个领域而言，说中文图书市场出现空洞并不为过。

即便在万事顺利的情况下，两年，以社交网络及其研究的演化速度，也足以让我们需要带着某种考古的眼光去看待手中拿到的书。就好像夜空的星光，可能来自早就消失的某颗小行星燃烧过程中发出的光芒，光一路旅行，刚刚抵达我们的虹膜。

最近颇有热度《炒作机器》大抵就是这样。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于 2020 年，但在中国是一本刚刚上市的新书。对于热衷思考社交网络的读者来说，它依托于详尽数据的结论有点过于简陋了。豆瓣 id“心远地自偏”说，“揭示了很多现象，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对我而言，相对简单了。为什么炒作越来越容易？因为大数据算法统治了信息推送，我们每个都处于信息的茧房之中。为什么炒作越来越难？因为每个人注意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炒作机器》

《炒作机器》的作者 Sinan Aral 是数据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分析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和阐释不能说不本源：“炒作机器”，是由社交网络、机器智能和智能手机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全球性的信息交流网络。问题只是在于，对于最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读者来说，这样的阐释来得太晚。

“晚但依然有价值还是要好过晚且毫无价值”比《炒作机器》更新鲜上市的一本翻译书，是美国传播学教授 Robert W. McChesney 的《数字断联》，但这本书在美国的出版时间是 2012 年。10 年，意味着 McChesney 教授的许多分析都已经作为日常基础事实被了解了，并且他所担忧的世界变得更复杂。当然，你可以抱着一种反观的心态来看待这本书——这就是我发现它写于 2012 年时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必定会发现一些不会过时的东西。比如说“对我们当前的媒体和民主危机做出更强有力的制度反应”——但是这本书的左派立场会让你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上，换句话说，把一个复杂的问题与某个单一概念直接挂钩。



《数字断联》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这本书在这个时候被引进的原因——是不是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其政治立场——就变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另一种制度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相当于“别人递的刀子”，而且他们往往会忘记，这个漏洞百出的制度本身具有某种纠错机制，也就是 McChesney 这样的书出现在美国人乃至中国人面前的原因。说到纠错机制，Chaos Machine，《炒作机器》和《数字断联》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底色：尽管社交网络的罪恶人人得以描述，但人人都得承认，关于如何制止这样的恶，目前尚且没有最佳解决方案，可以既将其容纳在制度本身的框架内，又不破坏制度本身。这有一点像，或者说其实正是指向人类的内心缺陷本身，当我们试图去控制那双

不断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手的时候，却发现这双手就长在自己身上。  
左派作者 McChesney 在 10 年前的那本书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倡议，不妨罗列如下：

- 在学校建立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使人们对数字传播有批判性的理解；
- 严格规管广告；
- 取消针对 12 岁以下儿童的广告；
- 取消候选人广播电视广告；
- 取消或大幅减少广告支出作为营业费用的税收冲销；
- 严格限制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所有权；
- 扩大非营利广播部门；
- 将电磁频道作为公共资源进行管理；
-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免费向所有人提供宽带；
- 严格限制版权，回归前公司 (precorporate) 标准，扩大公有领域 (public domain)，保护公平使用；
- 严格规管数字“自然垄断”，或将其转变为非营利服务；
- 向公共媒体、社区媒体和学生媒体提供大量资金；
- 采取措施使合作性的、非营利性的媒体和新闻业更加可行；
- 对新闻业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包括公民新闻券；
- 网络中立：不审查或不歧视合法的数字活动；
- 严格的网上隐私规定，使网上活动被视同为私人信件；
- 设置强大的法律障碍，防止互联网军事化并将其用于未经授权的监控。

罗列这些的原因，也类似于仰望天空中遥远的星光，低下头来你会发现，事情从未解决，一直在变得更糟。每个人尽量多地建立内心防火墙，可能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  
关于书，还有一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

在美国很多学校和私立图书馆下架了一系列书（超过 1500 种）之后，[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发了 5100 张免费图书卡](#)，让全美国的青少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借书。原本不让他们看的主要是一系列和 LGBTQ、色情和种族相关的书，比如已故作家 Toni Morrison 的处女作 The Bluest Eye，可能把以上所有话题都集于一身。活动的发起人认为，任何对抗图书审查的措施都是有必要的，看到那些因为书而跨州交流的人们在线上聚集到一起，“才是活动发起的真正目的所在”。

与此同时，从 9 月 18 日到 9 月 24 日，美国有个叫做“禁书纪念周”的活动，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每年被列为或者可能会被列为禁书的书籍并将之公布于众。  
[该协会提到了一个现象](#)，“在以往，如果家长或者社区里的什么人发现孩子在读他们认为不该读的书，可能就会向社区图书馆或者相关机构提出异议，大家就会讨论这件事，最终就变成某个机构的议题；但是现在是资金充足、组织完备的大型营销式游说在扮演这个角色，组织者针对的也不再是一两本书，而是某一类书。”这意味着，有很多书会误入其中，并且，青少年对于种族、色情和 LGBTQ 等等概念会进一步模糊，科学取代恐惧，分歧和立场取代讨论和交流。

以及，10 月 17 日，布克奖最终得主将会问世，这一届布克奖短名单的评选标准是，“书中涉及重大事件发生”，且“作者需充分展现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Twitter](#)

## 档案

# “是时候让你们 与我们站到一起， 成为我们的声音。”

张依依 | Newsletter

## 全球新近发生的 13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伊朗断网了。

[同时流传的还有这样一张图片](#)，写着：致我所有的非伊朗朋友。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与阿富汗人站在一起，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站在一起，我们回应并起身反抗世间的残酷。如今是时候让你们与我们站到一起。扩散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声音。

“正在发生的事情”，指的是伊朗国内由 [Mahsa Amini 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9 月 13 日，22 岁的 Amini 因头巾没有完全遮住头发，被道德警察拘留，三天后去世。据报道，[生前她的头部遭到多次重击](#)，但警方对此拒不承认。

此事点燃了人民愤怒的火种。[Amini 的面孔登上各大报纸头条](#)，伊朗全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政府动用武力、催泪弹进行暴力镇压，数十名抗议者被射杀身亡，多人被抓。

但愤怒无法被阻断，在街头被冲散，也会在网络上重新集结。社交网络上发起接力，在 #mahsaamini 的话题下，来自全球的女性[公开剪掉自己的头发](#)；现场视频也展现出震撼人心的画面，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摘下头巾，于空中挥舞，火堆中焚烧；她们[站在燃烧的警车顶部](#)，她们高喊“生命、自由和女性”。

这些视频被广泛传播，形成一条“虚拟的街道”，为这场运动积蓄势能，使其愈演愈烈。而现实中的镇压也很快延伸到虚拟空间。[根据 Netblocks、Kentik 在内的多个网络监测平台](#)，自 9 月 16 日，人们走上街头的同时，伊朗的互联网数次中断；21 日起，硕果仅存的两个国际社交软件 Instagram 和 WhatsApp（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等已被禁用数年）也被切断。

对伊朗而言，上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断网还是在 2019 年 11 月，当时大量公民上街，抗议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此次还出现了对通讯的审查，[数字安全倡导组织 AccessNow.org](#) 发现，短信中如果出现 Amini 的名字，将无法顺利被接收到。

近年来，通过切断或干扰网络接入来压制抗议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惯用手段。[《连线》统计](#)，2021 年，古巴、孟加拉国在内的 23 个国家共切断互联网 182 次。限制带宽也变得越发常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名义上仍保持了网络接入，但信息的流通效率被大大削弱，视频、图片的上传与播放都受到极大阻碍。

[联合国在今年六月的一份报告中](#)详述了这类手段的升级。报告提及，随着 5G 网络的采用，网络细分和差异化程度提高，还可能出现针对特定地理位置的、新的断网

手段。这些微妙的干预时常与网络故障混淆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接入受阻的后果，首当其冲的是会减弱抗议活动的可见度，让人们无法有效动员。这背后也意味着极高的经济代价，尤其是对于那些[宣扬数字化变革的国家](#)——近期的断网[导致伊朗城市诸多设施瘫痪](#)，ATM、在线支付和共享汽车应用都出现问题。联合国引用的一项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至 12 月，缅甸因政变导致的互联网关停，造成了近 28 亿美元的损失，逆转了过去十年取得的经济进步。

频繁的打击下，人们开始寻求更多技术手段，想尽办法保持连接。[2018 年 WSJ 曾报道](#)，当时伊朗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打压攻势，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规避软件的使用，以绕开审查和屏蔽。

[缅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网络被切断后，缅甸民众开始大范围使用 Bridgefy，一种基于蓝牙连接而不是互联网来发送消息的通讯软件；以及 Tor，一个原本被广泛用于浏览“地下暗网”的匿名浏览器；电台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里，未经审查机关批准的“海盗电台”开始涌现。

“成为我们的声音。”这句话会成为口号，也正包含了这层寓意：帮助那些通讯不畅的人们，传递信息，保持联络。

支持网络连接被视为提供援助的重要手段。正是因此，如今每次有类似事件发生，人们就会第一时间涌向 Twitter 疯狂 @ 马斯克，请求他为事件中的国家提供 Starlink（通过近地轨道卫星提供的网络接入服务）。

这个呼声得到了回应。9 月 23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向伊朗发放通用许可证 D-2](#)，授权科技公司提供更多平台服务，允许包括 Starlink（星链）在内的卫星互联网服务，以及基于 VPN 的反审查工具等被出口到伊朗——在此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带来种种限制](#)，导致美国的信息服务很难在该国开展业务。

## 技术离开中国

今年八月，[美国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这是一项近 530 亿美元的补贴计划，旨在扩大国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规模。[九月初，在对外解释该法案时](#)，拜登政府进一步表示，接受政府资助的美国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在中国建造“先进技术设施”，期限为 10 年。

几天前，这种技术限制已经初露端倪。[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和 AMD 对外表示，收到美国政府要求](#)，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 A100 和 H100 芯片（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开发的高性能 GPU）将需要申请新的许可证。两家公司股价应声大跌。

虽然日常生活中科技展现出丰富的形态，但最终它们都高度依赖于一些核心部件。

[半导体芯片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视为现代生活的“大脑”，从手机、汽车，到心脏起搏器、超级计算机，它是万物变“智能”的基础。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高计算能力，决定了依靠大数据处理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上限。但直到 2020 年，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芯片出现严重短缺，大部分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随着中美之间希望逐渐减少对彼此的依赖，争夺重心很快聚焦到芯片制造能力上。这是一场拉锯。过去几年，[中国向国内半导体产业注入了大量资金](#)，旨在提高自给自足程度，但距离尖端水平仍有差距；而在此之前，[美国只有极少一部分半导体是本土生产的](#)，让产业成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强项”，电子产品供应链正在向外转移。[《纽约时报》报道](#)，苹果最新款 iPhone14 小部分将在印度制造，谷歌最新款 Pixel 手机的部分生产也将在越南完成，而微软的 Xbox 游戏机则自今年开始从胡志明市发货……个中缘由，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受此影响，自 2019 年以来，越南的工业房地产价格飙升近三分之一，仓库成本上涨了 20%。

## AI 生成艺术的下一步：版权问题

关注这个领域与否，最近你的时间线上都很可能出现过这样的内容。“天哪！不敢相信下面这些竟然都是 AI 画出来的。”紧接着就是九宫格，甚至更多张图像，画面精美、元素众多、风格奇幻诡谲。

就算没有，或许你也听说，人们因为[一张 AI 生成作品在艺术比赛中获奖](#)而大吵了一架。

Text-to-image（文本生成图像）程序，算得上今年大家最热衷的大玩具。从 OpenAI 的 DALL-E-2 到谷歌的 Imagen，不断刷新大众对 AI“作画”能力的认知，但真正的搅局者，还是一位名为 Stable Diffusion 的“玩家”。[8 月 22 日](#)，这个强大的 text-to-image 程序正式开源，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且几乎没有任何学习门槛。[The Verge 评价](#)，这项技术可能来到了“真正起飞的时刻”。

随着大众接触到这个工具，可预见的是，越来越多 AI 生成的作品会走入公共领域，占据大量篇幅，最终产生文化影响。[一份新的报告预测](#)，到 2026 年，多达 90% 的在线内容可能是 AI 合成的。

对于这样的剧变，人们激烈地提出了诸多质问。一部分跟[围绕 Deepfake（AI 换脸）的争议](#)是相似的，比如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色情图像生产，以及对个人形象的性剥削。

还有版权的问题。跟其他深度学习的模型一样，Stable Diffusion 也是通过搜刮网络上的海量图片来训练自己，从而引发出关于版权、道德的问题。The Verge 粗略浏览就发现，训练集中有大量版权作品，却没有得到艺术家的许可和署名。

“这是人工智能‘艺术’中我不理解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自己推销为可以百分百重现他人的作品和风格，他会因为公然剽窃而被列入黑名单。为什么容忍机器这样做呢？”[一位 Twitter 网友如此质疑](#)。虽然这种形容并不完全准确，但的确道出许多人的内心想法，即对风格的窃取也是窃取。

对此，Stable Diffusion 所属公司的 CEO Emad Mostaque 用“开源”来为自己辩护，认为这更倾向于一个公共项目而不是私有服务，它只是工具，如果用户以侵犯版权的方式使用它，这是用户的问题。

争辩中，一些平台开始做出自己的选择。[Getty、Shutterstock](#) 等图片库网站先后

删除了平台上一些明显标注为 AI 生成的图像。前者更是直接在 9 月 21 日宣布，禁止上传和销售使用 AI 艺术工具生成的插图，为的是避免出现版权问题，损害用户权益。[福瑞（兽人）爱好者社区 Fur Affinity](#) 则是以保护人类创作者为由，禁止了 AI 作品在平台上出现，为人类和机器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这个月科学家做了什么：

[数了数全世界有多少只蚂蚁，答案是 2 亿亿只](#)。这是 2 后面跟着 16 个 0。就是说，如果蚂蚁跟人类干起架来，平摊下来，每个人要对付 250 万只蚂蚁。这还是保守估计。

[一项新的研究](#)展示了这个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当然不是一只只数出来的。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采用了[温克勒（Winkler）凋落物提取法](#)，也就是收集特定区域的落叶和表层土，筛晾后计算出一个单元面积内昆虫的数量作为采样数据；他们还在世界各地设下陷阱，通过掉入陷阱的蚂蚁数量，来判断一个地区的种群活跃情况；再结合来自全世界针对不同蚂蚁种群的 500 多项研究，最终得出了这一数字。蚂蚁虽然很小，却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有许多动物以蚂蚁为食，在气候干旱它们也帮助植物种子的传播扩散。但人们对这种生物的认知仍然十分缺乏。生物多样性研究者王润玺深度参与了这项最新的研究，[他这样写道](#)，在过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全世界蚂蚁加起来和人类一样重”。这个推断长久地占据了该话题的讨论，甚至被加入教科书，但实际却站不住脚。“这些知识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不经意间，也让我们戴上了一副叫‘经典’的枷锁。”当他们勇于推翻，亲身实践之后才发现，实际上，根据更新后的数据，蚂蚁生物量总和和大概只是人类的五分之一。

[把塑料变成钻石](#)💎。起初，科学家们是为了模拟海王星和天王星的内部环境。多年来，他们一直怀疑，这些冰巨行星内部在下一场“钻石雨”，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磁场。[为了验证这个过程](#)，科学家使用一片 PET 塑料，将其加热到 6000 摄氏度，施以地球大气压强几百万倍的压力，让塑料中的碳原子重新配置成为一种晶体结构。仅需几纳秒，纳米钻石就形成了。当下，这个天体实验也展现出额外的价值。不同于普通钻石的观赏价值，[纳米钻石也被称为“超级水”](#)，它比标准水更容易导电，未来可能被用作超小型的量子传感器，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人们期望这种技术的出现，可以给塑料提供更多的商业价值，以此激励更多的公司参与清除海洋中的塑料，更有效地对市面上的塑料进行回收。

[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将更多巴基斯坦人置于洪涝灾难下](#)。史无前例的季风降雨几乎要将这个南亚国家淹没了，截止 9 月 23 日，[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 1600 人](#)，其中包括 579 名儿童。洪水退却后，还出现了包括疟疾、登革热、急性腹泻在内的大规模传染，数百人因此死亡。[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了气候变化与极端降水之间的关联。具体来讲，全球变暖可能使巴基斯坦受灾最严重地区的五天降雨量增加了 50%。这也是今年的极端天气最显著的特征，巴基斯坦多个省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多雨的八月，降雨量达常规月份的七至八倍。[同时，新的分析还指出](#)，在洪水最严重的省份，数百万人生活在排水系统过时的洪水易发地区，这也让洪水变得尤其致命。改善排水系统、搬迁房屋、加固桥梁和道路，都有助于防止今后发生这种灾难性破坏。

技术又在做什么：

[用 AI 来识别“影子泳池”](#)。法国政府根据房地产的租金价值来进行征税，因此当业主建造了游泳池，租金也会相应上涨。在过去，未申报的泳池更多的是一个避税的问题。但随着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欧洲，人们开始兴建泳池，另一方面，巨大的用水量也让它陷入争议。去年十月，法国税务局开始与 IT 公司 Capgemini 合作。借由 AI 视觉识别系统，自动识别航拍图像中的泳池，也就是那个蓝色的长方形。再与税务局数据库中的信息比对，确认这个泳池是否进行了登记。一开始，软件还常常将泳池与太阳能电池混淆，后来准确率逐步提升。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经识别出 20356 个未申报的泳池，为法国政府增加了 1000 万欧元的税收收入。

[Make 搜索引擎 Great Again](#)。搜索引擎正在腐烂，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比起二十年前，如今它充斥着广告、重复或无关的页面。臃肿、无效，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这样，以至于许多转向了 Reddit 作为搜索工具。近期，欧盟宣布[欧洲开放网络索引（OWI）](#)项目正式启动，将在接下来三年开发一个网络搜索工具，目标是帮助人们自由、开放和公正地获取信息。“我们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搜索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减少广告对搜索的影响，总的来说，使搜索更加合乎道德。”[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表示](#)。

[给你的截图添加盲水印](#)。近日，有人在知乎 APP 和网页端的截图中发现了盲水印——一种常规效果下无法发现，但放在检测工具下，会显示出一层新信息的技术。知乎截图中，盲水印的部分显示的是一串疑似用户 UID 的字符。这个功能常见于一些公司系统中，当有人在系统中截屏并传播，通过盲水印就很容易能够追溯到当事人。但近来，盲水印的应用已经突破公司业务保密的场景，被一些社交平台使用。今年二月，豆瓣小组也推出了这个功能。豆瓣表示，此举目的是防止原创内容被搬运，但仍然引发了很多用户对隐私的担忧。事件发酵后，知乎回应媒体，盲水印为站内的小范围测试，目前该功能已经下线。

[拍下你拍下 Instagram 照片的时刻](#)。《断章》里这样写：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

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在监控社会，这句话变得更加适用：你看镜头的时候，另一个镜头也在看着你。

[比利时艺术家 Dries Depoorter](#) 用一个名为“The Follower”的项目完美诠释了这一点。他连续录制了几周公共摄像头记录的影像（这些通常为私人公司设立，并在网络上进行 24 小时直播），并搜集了 Instagram 上所有标记了该位置的照片，再用开源的面部识别软件将两者进行比对。很快，他就在录像里找到了人们定格下那些社交媒体照片的瞬间。两者并列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视角。在镜头前，人们不断调整角度，切换动作，有选择地去在公共平台展示自己；但监控摄像头将人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位置，你不知道它拍摄了什么，也不知道谁在看，甚至绝大多数时候，对于正在被拍摄都毫不知情。

本月有一则好消息：

[针对企业气候责任，Patagonia 给出了一个似乎最让人信服的答案：捐出整个企业](#)。“地球现在我们唯一的股东。”[如今点开官网](#)，会显示这样一句话。这家知名户外服饰企业的创始人 Yvon Chouinard 写了一封长信来解释这个决定。他将把这家公司 98% 的股权转移给一家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 Holdfast Collective，并由该组织将这些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剩余 2% 拥有表决权的股票将转让给一个信托基金，以监督企业运作，保证其对利润的全数捐赠。为了拯救地球，每个人都需要竭尽所能，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方法，Chouinard 在文中写道。这是一场价值超 30 亿的捐赠。虽然，30 亿仍不足以扭转当前全球升温的危机局面，[但人们普遍希望，这能起到一种领袖示范作用](#)，激励更多的、坐拥最多财富的一批人为当前的气候问题作出类似反应。

一些有趣的讨论：

[章鱼🐙就不配有动物权益了么？](#)《纽约时报》讨论了这个有趣的问题。科学实验室里，从老鼠、猴子到鸟类、小白鼠，都有联邦法规来保证它们会得到人道的安置和处理。但章鱼、蠕虫、蜜蜂却没有，它们之间差了一样东西：一条脊椎。人们很早就发现这类软体动物的奇妙之处——还记得“预测帝”章鱼保罗么？研究里，生物学家发现，面对经典的棉花糖测试（延迟满足实验），乌贼可以足足忍耐长达两分钟。它们聪颖、神秘、充满知觉，但却迟迟没有得到保护。文章指出，欧洲和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把人道对待章鱼写进法律，在美国，一些人也试图推进这项措施的进程，“但尚未得到实质性的回应”。

[气候变化会改变一天的长度么？](#)乍一听这是个十分刁钻的角度，但在物理学家 Rhett Allain 看来，这个顾虑非常合理。地球的转速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受到其自身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它一直在加速，[今年 6 月 29 日是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比 24 小时短了 1.59 毫秒。Allain 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融化，改变了地表的质量分布。如果把地球比作一个正在参加疯狂办公椅旋转竞速赛的人，手臂的收缩和伸展都会影响他的速度。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计算，他得出结论，假设所有在赤道和两极之间，海拔 5000 米的冰都融化，一天会缩短 0.67 微秒。“虽然不是很大的区别，但仍然有区别。”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 Newsletter

四种新闻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

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Cloris Ying on Unsplash](#)

## 档案

# 罗新和他的新书： 何为普通人的历史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历史学家的最终关心应该回到人，  
而不是任何政权、文化、人群。”

9月6日下午，我在北京的圆明园南门见到了罗新。他身穿浅灰色徒步服，戴着遮阳帽和墨镜，背着双肩包，装备看起来非常专业。

一个多月前，他跑到四川，和美国记者、作家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一起徒步三周，参与其跨越大陆的“走出伊甸园”之旅。这段时间前后，他的新书《漫长的余生》恰好出版，受到许多媒体关注，在线上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当我8月底联系他时，他说最近采访接受得比较多，严重影响表达欲望，建议在外面边走边聊，这样可能放松些。

《漫长的余生》讲述了北魏宫女王钟儿86年的人生，并以她的视角看她身处的时代。“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我们还应看到，对普通人的遮蔽或无视，是传统历史学系统性缺陷的一部分，是古代社会强烈而僵硬的不平等体制决定的。……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罗新在书中写道。

罗新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1963年生于湖北随县，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田余庆，专研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著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王化与山险》《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专业著作，以及为一般读者更熟知的旅行文学《从大都到上都》、学术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碰头以后，我们开走。他回忆道，自己本来对圆明园不熟悉，熟悉这里是在40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没有院墙、门票，这里就是农民的稻田。下午四点左右，他经常会从北大东门出来，走到这里，转一两圈。那是当时的生活方式。不过，上研究生之后，他就不来这里了，直到今年。

“我整个半年没有离开过北京，在北京也不能随便逛人多的地方。那阵朝阳也不能去，听起来像魔鬼一样，所以就哪儿也不去。最惨的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进学校。那我怎么办？人又不能不动，不动不知道哪一天要出什么状况，所以就跑到圆明园来。那是我好多年之后再次进圆明园，开始摸索圆明园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太新了，当年是到乡下，现在是个公园。我就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现在基本上搞清楚，大概是想在结构上像清代。”罗新说。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梭在圆明园不同的景观之中，路上还碰到了长得像灵芝的菌类，被狂风刮倒的树木，嘴里咬着核桃、蹦蹦跳跳跑过的黑熊[1]，话题也从《漫长的余生》出发，涵盖普通人与历史的关系、权贵们被皇权的裹挟、早期佛教提供

的自由、历史学如何介入不平等、计划写的崔宾媛和她家人的故事，以及从1980年代至今，罗新从文学到历史、从中心到边缘、从为学术而学术到关心和参与现实的转变过程，等等。

相比视频中呈现的腼腆，徒步过程中的罗新放松许多，表达也更为铿锵有力，有时他还辅以手势或者拿周边事物（如围墙、建筑）加以说明，生动有趣。绕圆明园一圈后，我们走到北京大学东门分别。他最后说：“我去做一个核酸。”全程大概十一公里，耗时两小时十五分钟。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罗新教授的访谈节录，因内容过多，分两篇发布，这是第一篇。他觉得，“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不过，这里的普通人不再仅仅是政治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通，更是人格意义上的普通。即使是皇帝，七情六欲也使他普通，在人格意义上跟我们一样，也会悲哀、畏惧、胆怯、愤怒……归根结底，普通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学家的最终关心应该回到人，而不是任何政权、文化、人群。”罗新说。

## 01

### 以普通人的视角看世界

**小鸟文学：**在《漫长的余生》中，你希望通过讲述北魏宫女王钟儿的一生和她的时代，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不过，一些读者看完全书后，有点心理落差，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王钟儿，而是她身处时代中的各种权力斗争和杀戮。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现有材料所限，你以历史学家的技艺已经让我们极大程度上接近王钟儿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命运，常常身不由己，没有什么选择。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你倡导的普通人视角，它有什么特点？你又怎么看普通人和时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比如同样是关注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历史学者会强调普通人的能动性，写他们同样参与和塑造了历史，比如霍布斯鲍姆的《非凡小人物》；也有一些社会学家，比如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根源。

**罗新：**我对任何关于普通人与历史关系的说法都没有反对，包括说任何人都是能动的，弱者也有自己的武器，弱者也有塑造历史的强大力量，像詹姆斯·C. 斯科特那种讨论，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可是呢，涉及到这个写作，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多说违反（历史）学科规矩（的话），说我找到王钟儿在做各种努力，发挥能动，没有的。但是，我想任何人都在能动之中，她选择屈服，选择在屈服之中仍然努力，这是可能的，但我们不知道。从历史学意义来说，不知道的最好不要说，讨论这个是有危险的，所以我就说不说这些。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我希望能够站在她的角度来看，如果她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她自己，决定她命运的外部因素是哪些？这些有一定史料，可以大致上描画一个轮廓。事实上，我的工作就是描画这个轮廓。我认为只要改变视角，事物就呈现新的面貌。

就跟我今天上午上课所讲的问题（一样），我们谈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是垂直结构，朝廷的权力可以一直插到县、乡，甚至到个体。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站在朝廷的意义上在说中国的结构，看到的是上下、垂直。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换成在统治下层的老百姓视角，他固然有仰望的一面，但见不到上面，那他看到的是谁呢？他看到的是他身边这些人，基层官吏和他的街坊邻居，同县以及隔壁县。

你可能会想，隔壁的县跟我是什么关系？如果你想到这个，发现结构变了。为什么？你能不能跟隔壁县的人来往呢？你发现不能，制度上不允许。那这算什么统一国家呢？对他来说，是统一的吗？对谁来说，是统一国家呢？大一统对谁来说是大一统？甚至对一个普通官员来说，我到县里做官，我跟隔壁县里人想一块吃个饭，我能去吗？不能。他不能有境外之交，不能够到那边去。好了，你看这是个统一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在北京做了核酸，到上海不算，到上海做了核酸，到江苏不算，这是个统一国家吗？是不是你换了视角之后就变了？

它是内部的制度性隔离。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你出门到哪儿，就要扫个码一样，你看到处都竖几个栏杆，那几个栏杆你敢跨越吗？你不能跨越。它在物理上没有多大能量，但是它把我们几千、几万人都可以挡得死死的，所以这就叫制度性隔离。这可不是一个国家的设计上出现缺陷，这国家是靠这个维持。大一统靠什么维持？靠内部的不统一。所以你换了视角，就看到不同的世界。



《漫长的余生》

如果站在皇帝的角度，简直井然有序。权力下达的速度多快，我们的驿站制度多么发达，你看到的是这一套东西，可是换个视角看，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互相之间都不能来往，甚至连道路都不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换成王钟儿的视角，让她去

看这个宫廷，她看到的宫廷跟皇帝坐在他的位置上看到的宫廷，不是一个宫廷。另外从讲故事角度，跟写作有关系，我是让她带出这个世界、整个故事，所以我关注的东西都发生改变，不再是传统史书以及教科书里边对于北魏宫廷几十年间的历史描述。但我觉得，不成功的地方在于，你宣称要写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没什么材料可写，所以写着写着这个人就消失了。

**小鸟文学：但是每一章最后，她又神奇地回来了。**

**罗新：**回来是想说，我们是设身处地，通过她那个角度在看这个世界，但她是不是看见了？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努力，但不成功。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换了视角之后，讲述的故事和传统讲同样的故事，想法不同了。

**小鸟文学：我读《漫长的余生》受触动的一点是，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下，你写出了一些人的心理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虽说像同样关注小人物的《活在洪武时代》，批判与帝王共情的观念，但说实话，我在读这本书时，无论是对权力集团——皇帝、后妃、外戚、朝臣等，还是法律地位低于普通农民的宦官、宫女，都产生了共情。比如在权力集团内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之间，有时都不愿互相残杀，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专制的牺牲品，丧失了某些人性。我很好奇，相比普通人，你在写这些权贵的历史时，是什么感受？怎么看他们不同的命运？**

**罗新：**从王钟儿的眼光看出去，这些人固然都是令人仰慕、有权势、有教养、有光环的一帮人。但另一方面，因为王钟儿跟他们一起生活，所以这些人看上去又有可怜的一面。像孝文帝，雄才大略、自视甚高、手握重兵、力量无边感觉，但他的命运却自己不能控制。他企图控制自己的命运，所以才会废太子、杀太子、换皇后。冯太后是他人生成长过程中最大的阴影，他试图跟阴影搏斗，搏斗结果发现自己仍然栽在这上面。所以最后时刻，他没有在实质上废掉皇后，然后不久他就死了。我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你看他重病，一切表现都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想最后时刻，他的人生非常灰暗。我早年读《资治通鉴》时就在想，他到最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废太子、立太子的过程中，并非真正自主在做这个事呢？我一直到写这本书时，更加坚信这中间他不是完全自主，他也意识到这中间任何事情不是表面上所说的那个样子，比如说太子是反改革的，太子反改革干嘛？跟他的利益相违背。做太子的人，有什么可反的？等着就完了。他要是反，一定是有一帮人要他反或者说他反。

**小鸟文学：有点悲悯的感觉？**

**罗新：**对，我就想从一个见过那么多人事沉浮的王钟儿的眼光去看，太子也好，皇后也好，皇妃也好，这些大的不得了，跟她身份有那么大差别，对她来说都是主人的人，可是他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不把这些人看作高高在上、有权势，而是看作人。当你看到他是人的时候，甚至看到他作为边缘人的一面，他在权力中心，同时也被权力所左右、所裹挟，所以变成边缘，变成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跟王钟儿一样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小鸟文学：那你觉得最后是什么决定他们的命运呢？**

**罗新：**绝对的权力。皇权太过于绝对，这种权力俯视一切、伤害一切、裹挟一切，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你处在权力正中心，（也会）被裹进去，比如孝文帝照说真正控制了权力，特别是在老冯太后死后，他（理应）没那个阴影。可是他内心深处阴影还在，不知道怎么反抗。他的反抗最后就搞成，你给我安排的婚姻，我不要，我自己搞一个。他又不愿意找别人，只能找大冯。为什么？因为他也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不孝顺，他自视甚高，我不能够影响我的道德形象，所以他到最后也不敢反对这个老太太。他跟别人说了，不要再折腾，显得我形象不好。因为他很清楚，母亲被杀，自己长期被冯太后折腾。你想，他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多强。

## 02

**佛教带给人们自由空间**

**小鸟文学：**在《漫长的余生》中，你对佛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认为中古时期佛教在东亚大陆的广泛传播，给许多女性带来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但你在采访中提到，后来佛教在中国变成规训工具或邪恶价值的帮凶。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僧人意识到自己受到女尼的挑战。因为这些女性有着优势，比如讲经很好、信众更多、香火更旺、地位更高，财富往她们那里流动。结果，这些男性僧人跑到官府诬陷这些女人，说她们不正经之类，一直持续到唐代。因为你说之前没有读到中国学者注意这些材料，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能不能再具体讲讲整个过程和问题？

**罗新：**从佛教的眼光去看，世界上没有不平等，应该是平等的。不仅佛教，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性宗教都这样。在它们看来，人都一样，没有区别。所以你是胡人还是汉人，男人还是女人，士族出身还是寒人出身，都没有区别。在我这儿，都是一样的。对那个时代来说，这恰好解决了最大的不平等问题。

那个时代出现大量民族差异、士庶差异、阶级差异……差别那么大，在佛教这儿，好像突然打平。对于维护体制的人来说，这很可怕。但我又想说，所有在不平等体制里的人，就像在皇权体制里那些看起来掌握权力的人一样，他们也深受体制之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欢迎某种程度的解放。如果这对我有用，让我获得某种空间，我当然要利用佛教，比如你读了佛经，觉得想法太有意思，对大脑训练太好，比读孔子那套东西好千倍万倍。突然，想说五经没意思，但不敢说的人，就读佛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所以我想各种人都获得了自由，那些最低贱的人，他如果信仰佛教，内心深处相信平等，我跟你是一样的。你现在高高在上，下一辈子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下一辈子是什么，你知道吗？那种内心深处的解放感很强，至少在佛教刚进来的几百年间，人们真的快乐。它就是一种新的武器，而且它有组织。它还不是个体的，像玄学，只能够在受过很好教育的那几个人当中。佛教不一样，它有组织，有寺庙，不管怎样，我至少可以一起活动，特别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最底层的人来说，突然获得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

不仅这个道理听起来挺好玩，而且生活方式也变了，我们在一起可以念念经、说说话，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力量，佛教不可能那么快，在几百年间就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于政权来说，经常把它当敌人，动不动就要灭它一下，但是最终灭不掉。灭不掉，也意味着政权跟它之间不得不发生各种碰撞，最后想办法要改造它。

**小鸟文学：关于改造，你讲得很特别，有性别视角在里面，男的举报女尼，而且你还说很多学者都不关注这个问题。**

**罗新：**研究佛教社会史的专业学者读的材料比我多得多，各种专业视角当然是我不具备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觉得这不太要紧，没有意识到这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里，女性在佛教的保护下，获得一定空间。所以我没有看到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挺遗憾。

后来到了唐宋，佛教跟国家达成和解，佛教屈服了。屈服是在多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你不能挑战世俗权力，不能挑战世俗主导的价值观，也就是儒家价值观，但是国家和儒家价值观容忍你这种异端存在，容忍你这种异常社会组织存在。你還有一套佛教体系，这套体系当然很早就被纳入到国家体制，封一些官、搞个度牒[2]、对人员管理，等等。宗教要存在下去，必须做出让步。

**小鸟文学：所以早期最有活力。**

**罗新：**对，表现在这些信仰者们试图从国家那儿夺取什么东西，比如“沙门不敬王者”，我一个僧人，敬你皇帝干嘛？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的，我们俩是两个世界。有的皇帝很生气，有的皇帝也信佛教，觉得有道理，所以这是个复杂的事情，很有趣，但总的表现为世俗权力最终占了上峰。斗争过程很美好，我们看到新的力量出现，因而提供新的机会，给许多过去无法获得这些机会的人提供了自由。

**小鸟文学：像无政府主义早期传入中国，也有这种感觉，一些年轻人获得解放。**

**罗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特别有魅力，具有极大批判力，它对权力的批判、对组织的批判、对所有建制的批判，比什么都有力。所以巴金他们当年一帮人都崇拜、喜欢，太有道理了！事实上，（早期）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先信仰无政府主义，只是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发现一个人搞不了什么事儿，需要有（组织），最后觉得共产主义反正也是批判，就信那个去了，结果就跟无政府主义走了相反的路。

## 03

**形式如何被权力所利用**

**小鸟文学：**你的导师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对“子贵母死”[3]制度的解析最早启发了你深挖王钟儿的故事。在今年出的修订版《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你也提到田先生的这些研究将“内亚拓跋政治体发育、提高和稳定的历史，呈现出惊涛骇浪的面相”，“对于理解内亚游牧社会政治体从部落向酋邦、从酋邦向国家的演进过程中，政治权力如何集中、如何凝固、如何传承，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而在《耶律阿保机之死》这篇，你还提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可能是自杀（或让夫人杀死自己），因为“他要把草原传统的兄终弟及制改造为中原政治传统下的嫡长子继承制”。

它们都体现了你提倡的内亚（Inner Asia）视角。我很好奇，《漫长的余生》里面讲述的历史，是否也可以用内亚视角来理解？能不能具体讲讲？比如你提到的“手铸金人”[4]的测试肯定是，那期间这么多的残杀，尤其兄弟之间，是否得用内亚视角解释，还是说这就是皇权专制的必然？

**罗新：**到了孝文帝出生成长的那些年份里面，内亚因素已经很少了，形式还在。孝文帝当皇帝时，可能也得经过举毡那些仪式，虽然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但我们相信那是所谓时代都旧制[5]，在代北他还是搞这一套。问题在于，这些只是形式的东西，如何被权力所利用？比如投票，过去只需要大家一起山呼万岁就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既然投票被全世界认为（更好），那我们也投票。

我们不要被形式本身所迷惑，要看到它如何利用形式？怎么包装？比如按照内亚传统，立可贺敦（可汗的正妻）一定要经过所谓手铸金人的测试，带有强烈萨满色彩的仪式。但我们看到，在常太后掌权时期，她已经确定要立冯氏做文成帝的妻子，所以冯氏一定能够顺利通过这项测试，而不会像道武帝时期，自己所钟爱的女性并没有通过这个测试。因为在那时，人们还比较忠诚于这个仪式，仪式还比较能按照应有意义举行。就像阿保机刚立时，他要说出个年份，还真被人勒了脖子，勒个七荤八素，说错了。他要说 100 年，不就完了吗？结果说少了，所以后来很倒霉。这是我的猜测，不一定是历史[6]。

但在这个意义上，当冯太后被立，通过皇后测试时，那个仪式一定被严格控制。正像绝大多数内亚可汗在立时，那个仪式被严格控制一样，我不会让你真勒死，样子勒勒（就行），快说，40 年、50 年，反正就往大了说，不会让你说三年、五年。所以有价值的问题在于，我们考虑谁在控制这个仪式？仪式包装的是什么内容？包装的是什么权力构造？“子贵母死”一模一样，完全成了一种包装，我想杀掉谁，我希望把谁的妈妈干掉，我希望这个孩子谁来养，就变成这样一种仪式。

**小鸟文学：**与此相关，你在书中引用了田先生富有哲思的一段话：“在拓跋部向文明攀登的过程中，残酷的暴力是催化剂。暴力铸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恶。……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我很好奇，你怎么看田先生这些疑问？像我看这段话，首先浮现脑海里的英国光荣革命，但转念一想，好多学者会说光荣革命是特例，和英国的传统相关，对于中国而言，很难复制。

**罗新：**田先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历史时常用的语言。破坏是历史新生的机会，暴力是文明发生的必要条件，社会重大牺牲是重要进步的前奏，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里面常见的话，特别是马克思在叙述历史时，常常



有这种高屋建瓴、视野囊括千年万年的表述。这种表述有很多激动人心的部分，有很多让人充满乐观的部分，让你一下子对眼前的黑暗、短期的挫折，都不放在心上，有克服所有困难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一种历史的表述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今天学历史、读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话还有多少安慰的力量？也许新一代的史学家不大容易体会，像田先生他们那一代人脑子里经常转的这些话。我就没有这个东西。而且我认为，暴力之后的进步，对于那些在暴力之下摧残的人民意味着什么？难道意味着补偿吗？牺牲就是牺牲。为什么还要用未来的人的幸福生活去补偿他们？看不见的补偿，那还叫补偿吗？

不同代受教育、从事学术研究的思想背景不一样，所以田先生有这个强烈的感慨。我之所以还喜欢用这个感慨，这意味着田先生在自我怀疑。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最终会怀疑自己所学的那些前提、基础，本来那些东西牢不可破，但他现在觉得，是这么回事吗？过去他会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一天一天变好。1989 年之后，他那种乐观消失了。

04

《崔宾媛和她的家人》

**小鸟文学：**你曾提及，做魏晋南北朝研究的人，学科上最大的焦虑就是史料太少了，读研期间就可以全部读完，所以拓宽史料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新出土的墓志。而且相比官修正史，由于墓志没有被纳入到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里，所以更贴近时代。像你在《漫长的余生》中就释读了许多宫女的墓志，也批判性阅读官修正史，看到文字背后的含义，展现获得历史结论的途径。这也是你一直强调的，学历史重要的不是学习观点，而是过程。能不能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再讲讲一些你印象深刻或者打动你的墓志？蕴涵了哪些故事和意义？我看资料，其实除了王钟儿，另一个你想写书的是崔宾媛。

**罗新：**对，我有强烈的热情想为崔宾媛写一点东西，为了催自己，我已经试探性地写过一篇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其实就想把这个材料先拿出来，让自己反复思考，打算好好写一下。崔宾媛不是普通人，是一个上等社会的家庭主妇，但是我想，高等级的女性也好、低等级的女性也好，最重要的我们把她看作人。把她看作人时，我们看见什么？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她对家人的爱以什么方式表达？她对社会当前那些现象的恐惧和担忧是什么？她如何表达？我想写的这本书叫《崔宾媛和她的家人》，任何人都面临家人问题。正好她的材料足够，因为她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家人都有材料，我们甚至详细知道她家有多少个人，有多少孩子，孩子都怎么样……所以我想把她家人的材料以及跟她有姻亲关系的脉络，都给理出来。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就那点人，那些人都有文献和墓志，两者可以互补。

从学科意义上，崔宾媛跟王钟儿不一样。我不知道讲王钟儿的学科意义是什么，但是讲崔宾媛，我觉得好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先写她，因为我觉得容易处理，先搞个难的。它容易处理在哪里？我把它一下子就放在北方士家大族研究的学术框架，只不过采用不同角度。过去 100 多年间，士家大族研究虽然是中国史研究里面最重要的热点之一，但到了现在，说不出新鲜话题，还是那几句话，比如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我们现在能够加进去的话很少。为什么这样？我觉得是因为视角，视角是不够的。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以前是什么视角？自上向下，从国家角度看，这是什么构造，画出网络。我现在这个视角回到人的家庭，所以我提出这个研究方法，叫家庭视角的家族式研究。因为家族有许多家庭构成，我们不能从家族去看家庭，反过来，我们要从家庭去看家族。家族无非就是父母、夫妻、孩子，等等，我们就看一下，孩子是什么样，父母跟孩子是什么关系，夫妻之间是什么关系，兄弟之间是什么关系……正好崔宾媛提供这样的事例。我就从她这个小家庭出发，膨胀到越来越大的家族，然后社会等级、社会阶级，膨胀到整个社会。

换了这个视角之后，我发现这个题目值得讨论，是有趣的，而且普通人也愿意看。比如虽然是贵族家庭，它有好多难处，像生老病死是不能控制的。崔宾媛是老大，但她是女的，家庭职责就是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人。这个人最好身体健康，活得很长，生好多孩子，对这个家庭有用。可是对家庭直接有用的是他们家长子，但很不幸，长子死了，所以这对她家是个很大伤害。

长子死了、父亲死了，都死得早，所以她后来很大责任和努力是抚养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侄子，这涉及自己的家庭。不久，她的丈夫也死了，很不幸。所以这样一个人，她怎么养孩子？比如长弟的女儿瞎了眼睛，但她让儿子娶到家来。她要维护家庭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她这么做时，老公死了，所以给了这个权力，没人能拦住她。如

果她老公活着，就不会同意。可是现在儿子也不敢反对妈妈，所以就只好娶了瞎子老婆。她这一系列的决定很有意思，她的家人都是这种特别复杂的关系。我写崔宾媛，想脱离政治权力，就讲社会生活。她的爱有很特别的地方，她死了以后，女儿到棺材前面，哭了一声，就死了。这一家人很吓人，让人觉得感情太强烈了。

05

历史学如何介入不平等

**小鸟文学：**最近几年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关注不平等和人的历史。在去年一篇采访中，你清晰地表明：“我这些年比较痴迷的一个史学问题，是历史学如何介入对不平等宣战的当代议题。……现在我们研究不平等，就要采用下层视角、边缘视角和弱者视角，在意的是社会阶层的非流动性、义务与权利的非对称性，以及经济关系的非正义性。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探究这种减弱的深层机制，看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我比较好奇的是，不平等在最近这些年的确受到许多关注，国际上很多知识分子也写了相关作品，但不平等议题的具体表现在不同国家可能是有区别的，比如中国、英美和北欧。能不能具体讲讲你对不平等作为当代议题（尤其中国）的看法，历史学又该如何介入？

**罗新：**对，西方更多是种族主义、经济问题，中国很强大的是制度问题、政治问题。一说到不平等，有时是一个微观题目，比如奴隶制的取消，这是世界议题。在中国古代经济生活当中，奴隶制至少在我们印象中，不那么重要。这个不重要如何发生？为什么没有变得重要起来？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制度里边，对于奴隶、奴婢这种依附性人口的规定，跟一直到 19 世纪美国的那些制度比起来，显得更合理、更人道，更符合现代价值观？

有时是宏观的，长达几百年甚至近千年，比如人口的自由流动性问题、阶级之间的流动性问题。你把这些问题放在微观，比如九品中正制、士族制，看不太出来，但你放在宏观，像过去做官是必须有资格才能做官，后来，特别到了宋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改变身份、家庭等问题。这些显然符合人性，使得更多人口能够参与历史，跟几百年之前，制度上规定，一部分人参与历史，另一部分人只能是历史的承受者（不太一样）。

如果这些都纳入到不平等的视野，中国历史总的走向是越来越减轻不平等。比如过去对农民的控制多么可怕，但到了“一条鞭法”[7]、“摊丁入亩”[8]时，你看到对人身控制在放松，人们的流动增加，在那种情况下，社会的活力真正开始呈现，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没有跟西方历史发生深入接触时，中国社会内在也在发生今天我们认为应该予以肯定的一些变化，那些变化是令人高兴，应该歌颂的东西。好了，如果我们放在反不平等的历史框架下，我们就要提出问题，这些变化何以能够发生，以及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什么动力？是谁突然这么慈悲，给人民开放了一条路，还是说有一种内在力量，弱者的力量也在朝这个方向走，因为这符合更多人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和权利的向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参与到这个议题里面，我们会看到哪些变化是必须的、必然的，而且是受欢迎的，是和我们今天价值观相符合的。

因此，今天在我们身边，觉得应该变的，比如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就该铲除。这些是反人性的，硬把一部分人从历史当中撇开，所以如果我们把那些（历史）摆在面前，我们眼前的问题不就摆在你面前，看得更清楚了？让人觉得多么荒谬，还在说中国国情，非得搞出户籍制度、城乡差别。

我想强调，我们研究历史的时间尺度要经常灵活变化，有时微观，有时宏观，才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看到中国历史那些令人欣喜的变化，那些变化对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那些东西居然也没什么人讨论，所以我说我们有条件参与这场对不平等的战争。不能只有现代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好像显得只有这些左派们在跟不平等做斗争，我们就置身事外，跟我们没关系。其实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特别是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更有这责任，更应该做这个事。

**小鸟文学：**如果一般读者想加深对历史上普通人的了解，你有一些推荐阅读的著作吗？如何注意历史和我们普通人的关联，变成更有意义和反思性的历史？

**罗新：**法国、美国和意大利那几本微观史的著作，《蒙塔尤》《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都是真棒。我特别希望有一天中国人写出那样的东西来。材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把材料当作挡箭牌。因为材料最重要的是塑造我们写成什么样子，不是决定我们写不写。我写王钟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挑战，我知道这个材料远远不足以写成我理想中的作品，但我想，做多少是多少，做比不做好。

[1] 罗新教授说是黑鼬，但我搜索图片后，感觉不像，猜想也有可能是黑魔王松鼠，但因没来得及拍照，所以无法确定。

[2] 度牒，佛教和道教术语，指古代中国为了管理僧道，允许他们出家所颁发的证明文书。最早始于南北朝，到了唐朝，度牒因由尚书省祠部司所发放，所以又称“祠部牒”。

[3] 子贵母死，北魏时，当某位皇子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时，其生母要被处死。此制度原本是为了预防强大母族干预国政进而威胁皇权，但后来却被未生皇子的后妃利用，以消除潜在势力，藉以控制储君，待储君登位后，以皇太后身份专权之用。

[4] 手铸金人，拓跋可敦的传统选立程序，也是中古内亚文化共同传统。北魏时，贵人能否成为皇后，取决于天意，得通过手铸金人的占卜休咎。但在后期，该仪式已被掌权者控制，不再具有早期意涵。

[5] 代都旧制，拓跋鲜卑部建立的北魏皇帝在迁都洛阳前的即位仪式，让即位的皇帝、皇后坐于黑毡上，由七人承负，西向拜天的仪式。具体可参见《黑毡上的北魏皇帝》。

[6] 详情可参见《耶律阿保机之死》一文，收录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

[7] 一条鞭法，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即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

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8] 摊丁入亩,清代雍正时期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这一制度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人口增长。劳动者有了较大人身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片来自 [Avery Cocozziello](#) on Unsplash

## 档案

# 罗新：我的“反叛”历程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

2008 年前后，由于受到一些事情的刺激，罗新开始转变 1990 年代以来自己秉持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觉得不能再做闭门造车的研究，要更多参与现实，或者说精神上关注现实，才能够理解历史。

“长期以来，我看到的都是别人教我看到的过去，现在我想看到一个我自己理解的过去。为了现实、为了我现在所相信的东西，重新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他说。发愤之下，他写了学术论文《王化与山险》，迈出关心弱者和边缘人的第一步。他觉得，我们不能把中古时代中原王朝向南的发展看作浪漫的江南开发进行曲，而应该看作一场复杂的历史运动，里面包含着征服、压迫和同化。

到了 2017 年，罗新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的《从大都到上都》，进一步实践自己对弱者和边缘人的关怀。在书中，他花了很大笔墨书写生活在长城地带的边缘人。他们被称为“流夷”，身处明朝和蒙古两个敌对政权的夹缝中，往复于北奔与南归，艰难求生。

2022 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弱者和边缘人的著作《漫长的余生》，聚焦在法律地位远比普通农民低下，但更靠近权力中心的宫女王钟儿，讲述她的人生和时代。罗新觉得，我们对那些虽为正史所排斥，却凭借墓志而幸存至今的北魏宫女史料，一定要格外珍惜。

9 月 6 日下午，我在北京的圆明园见到了罗新。从这里出发，我们边走边聊，绕圆明园一圈后，我们走到北京大学东门分别。他最后说：“我去做一个核酸。”全程大概十一公里，耗时两小时十五分钟。

当天上午，罗新给研究生上了民族史的开学第一课。此前，他给本科生上开学第一课时，都会讲“黄种人”是一个伪概念，破除学生的种族思维。相比之下，他给研究生会讲更深的理论问题。

“我们这课主要是读书，一个学期围绕哪个问题来读各种各样的材料。这个学期我们围绕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构造？传统所谓天下观是什么样子？它的实质是什么？它是等级制的构造，是个什么样的等级？怎么确定别人的等级？不同等级之间怎么联系交往，相互的权利义务是什么？等等，讨论这些问题。”罗新说。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罗新教授访谈的第二篇。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和他聊了聊人生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你会发现，他一方面具有反叛精神，学术上总和主流保持一点距离；另一方面，他为人非常谦虚，善于自我批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

自我反叛，总在批评和怀疑，自己也不放过。

正如他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所写：“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 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 01

### 从文学到历史

**小鸟文学：你最早是有文学梦，想当作家，所以去了北大中文系就读。1985 年本科毕业后，先在湖北工作 4 年，然后 1989 年去了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当初为什么会改学历史呢？有没有什么故事？**

**罗新：**相对来说，我不像很多人比较敏感，在 1980 年代初就接受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很多影响。大概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我不是那种很好的家庭条件，没有那样的氛围，所以一心想当作家。小时候也没有读过太多书，到了北大，补课要花很多精力。

我那时不意识到这是补课，我以为这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整天读小说，非常愉快，所以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我没有感受到。等我感受到时，已经毕业之后好多年，是工作以后才意识到，开始补上大学时期出的那些东西，包括“走向未来”丛书等，觉得 1980 年代还真是好多东西没有注意到。

我到湖北工作时，我的作家梦想越来越趋于不能实现，我能看到这个结果。我上大学时就试着写了好多东西，但编不了好的故事。编故事对我最难，抒情最容易。文字要想写得漂亮一点，难度很小，只需要自我训练，读点书、背点文字就好，可是你要想把故事写好，需要天分。

有的人天生会说事，说得很好玩，有的人说什么事，都枯燥得很，我发现我是后者，是那个不会编故事的人。发现这个之后，有一个较长接受它的过程。在接受过程中，人也有自救的地方，特爱读历史书，所以读了好多，觉得挺好玩，最后就想学历史，想回北大读书。

**小鸟文学：你之前也说：“我虽然经历过 1980 年代，但是那时我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兴趣。我真正开始理解 1980 年代是到了 1990 年代。”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是政治创伤的影响吗？**

**罗新：**政治创伤对我有巨大影响。说得难听一点，我之所以回来读研究生，也不是为了做学问。我其实是对北京正在热烈发生的事情有兴趣，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但我就想回来，被这个东西吸引。说实话，读什么研究生，对我来说不重要，但我不想回中文系。因为我毕竟中文系毕业，我的同学都是老师，我不想回来跟他们搞在一起。我怕他们开玩笑，喊老师什么的，这个玩笑如果老开，受不了。我想我干嘛去你们中文系，去历史系就完了，所以考了历史系。

这真的是意外。等我 1988 年 12 月考完，结果不久就发生那天翻地覆的事情，对我打击非常之大。我没有选择，回到北京干不了什么，只能读书。那时没有想到，读书就读下去了。换一种时代，很难说我现在什么状况。

**小鸟文学：你说自己常思考文学和历史的区别，但我发现你不同阶段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比如你早期会说：“我中文系毕业的，原来也读历史书，但自从跟祝先生读了制度史，我才真的领悟了，哦，这才叫读得懂历史。”后来则会说：“也许我们写的历史跟那些文学作品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游戏规则不一样。历史和文学最大的不同是，文学从构想开始，就是有主人公，而历史没有，是一团混沌。”看你能不能集中讲讲你对历史和文学的感受？**

**罗新：**我想，在我刚读研究生时，为了在老师、同学们面前表现我是真的学历史的，我就一定要跟文学切割得干净、彻底。不能一般性切割，一定要表现出文学对我没有意义，我也不想做文学，所以那时不仅是在学业上不读文学的东西，而且在写作上，一定要显得自己特别学术。所以那些文学性的话，在我早期写作里边，一点都没有，如果有，我也主动删改掉。反正我早期有一个过程，一定要让别人看不出来我读过文学。逆反得很厉害，以至于故意要在各种谈话当中，显得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不要跟我谈文学。

等到一定时候，我被学历史的人接纳，没人再怀疑，觉得这家伙真是学历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敢修辞上放松一点。有时为了求生动，会有那么几句话，含有一些文学成分。这时会有人说，这人文笔好，学过文学就是不一样。其实文笔好跟学没学过文学关系不大，像田余庆先生、翦伯赞没有学过文学，文笔那么好，还是每个人的天性。

现在我觉得（文学和历史）在形式上的差异，不必强调太多，更多要看学科性。比如文学关心文学形式，历史不关心形式，关心思想、理解深度，所以这两者差别还是很大。只是从写故事那个角度，差不多，但不同学科的关怀不一样。

## 02

### 从中原中心到学究厥后

**小鸟文学：在学术生涯初期，你做的研究是传统以中原史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史，但自觉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写得很失败。**

**罗新：**我博士论文试图写十六国，但我不知道失败原因在哪里，这是很糟糕的事儿。最初选这个题目时，田先生就说，十六国现在普遍做得不好，虽然有的学者写了好多书，但总的来说，大家评价就是那样，深度没有。也许那时田先生对我看得有点高，觉得我身上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鼓励我试一下。我就去写了这个论文，但论文显然让他非常失望。虽然他后来还允许我留校，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的博士论

文，他可能觉得我还有改造的可能。

就论文本身来说，不只我失望，是所有人失望。他怎么写这样？平平无奇。我长期反思我失败在什么地方，如果按照这个写法，谁可能成功？我觉得没有人能成功，就田先生来写，他也成功不了。怎么办？原因在哪里？我觉得是，你写了这么多内亚人群，但对他们的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毫无了解。张广达先生和我说，你写这些人，得对阿尔泰学（注：主要指研究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的学问）有了解。这句话对我推动非常大，我以后就用很大精力做这件事。

**小鸟文学：**在张广达先生的启发下，你明白得具备和前辈学人不一样的能力和视野才行，开始读中亚、蒙古、突厥等研究，发现由于语言资料的宽阔，视野就变了，对北方的感受不同，发现中文史料也有很多问题。这时，你意识到要学习语言，所以在 40 岁时开始学突厥语，想问问当初学语言的决心和过程是怎么样的？很让人敬佩。

**罗新：**我学历史比较晚，在我之前的一代人，也有同样的经历。我的生理年龄已经不小，可是我在学科里的心理年龄，应该往前提个 10 年，甚至更多。我 40 岁开始做这个事，但当时自我认识可能不到 30 岁，认为自己完全有时间做一切事情，不像现在，我还没有做什么，突然意识到自己快退休了。这说出来把自己吓住，把周围的人也吓住，你怎么就要退休了？感觉你没干什么事。那真是没有做什么，但在那个时刻，没有觉得来不及学习。

2006 年我去奥地利开会，跟复旦几个老师（一起）。姚大力先生和我在飞机上坐一块儿，他看我一路都在看一本英文的土耳其语法书。一直到酒店，他们出去玩，我还在那儿看。他就跟我说：“罗新，学习是学习不完的。你到了这里，就要看看这里。”我觉得他在规劝我，你这个年龄还这么拼命，已经来不及了（笑）。

最初是自学，后来我到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访学），上了 4 个月左右的语言学校。在土耳其，一边我在学校用英语讲课，另一边，我在外面找了一个教外国人土耳其语的语言学校，每周去三次，回来做作业。另外，我又去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选了给本科生、研究生开的土耳其语基础课。我那时都 40 多岁了，学得还挺热闹。我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太大进步，快 50 岁了，终于停下。

**小鸟文学：**这十年学语言的经历让你写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好像最近要出版版？

**罗新：**它是一本文论文集，论文都是在我学习这些语言的基础上，对那些看起来是用汉字写，包括汉唐之间所有正史或者正史之外史料里面提到的非汉人、非汉语语言人群的名字或者官号、官称等，以及有些地名，总之都是一些专名，proper names。我发现用阿尔泰语言的知识就能够把这些专名（还原）。就像写“华盛顿”，我就把它还原为“Washington”。每一个还原之后，再看它们摆在那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排列？就像成吉思汗（Chingiz Khan）为什么这么摆？Khan 是什么？Chingiz 是什么？在结构上发现一点点门道之后，非常兴奋，写了好多东西。

（这本书）要修订出版，因为后来在这个主题之下，我又写了 10 来篇论文，就把它们编在一起。这些都是讨论来自内亚的名号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叫《内亚渊源：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我现在也不做这个题目，就把这块集中起来，算告别这个事情，差不多整整 10 年，也蛮有意思。

### 03

#### 边疆、同学和斯科特

**小鸟文学：**另一个转折点是 2008 年左右。当时，消失多年的大学同学对历史的误解刺激了你。后来，你读到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刚出版不久的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中译为《逃避统治的艺术》），对你很有启发。从这时起，你开始更关心现实问题，反思国家视角，关心边缘人处境。能不能再具体讲讲这个转折点给你带来的冲击和改变？

**罗新：**（2008 年、2009 年，中国边疆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同学录里边，大学同学一起讨论问题……这对我刺激很大，觉得我们搞这些学科的人，最后让这样的观念占据社会，这怎么了得？简直比殖民主义更邪恶，这都是什么想法？我教民族史的课好多年，最后在我面前发生这些事情，我感觉我这人真没用啊，不能说服谁，连身边的人也说服不了，所以对我刺激很大。

我过去都是做制度，后来我就真的放下，我要做的是能解决我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写《王化与山险》。要反思的问题是，今日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南中国，它是如何变成中国？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你不能认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把这个历史过程给描述出来，这是我当时写文章的目标所在。（但我现在不太满意这篇文章，因为当时）做的准备不够，处理话题很匆忙，纯粹是抽象描述，所以我很希望有人能够做得更具体，我自己大概很难了。

我写完《王化与山险》之后，2010 年突然读到斯科特，特别兴奋。我记得那天兴奋程度很高，以至于我决定让自己的同事都读。那时胡鸿（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在读博士后，我专门让胡鸿把斯科特的书读一遍。有一天，我带着一个十来人的研究团队去越南，要求大家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在机场，我们找了一个餐厅，就让胡鸿介绍整本书的内容，相当于一边翻译，一边介绍。

我当时太喜欢，说这个思想观念一定要传播，但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也不能接受。这是有趣的问题，你觉得对你来说好像巨大冲击，可能在另一个人看来，没什么说服力。归根结底，你原来在想什么？如果你原来想法里有这套东西，接受起来太容易。我接受斯科特，是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类似东西，只是没有找到思想武器。我全身心都在搞这一套，突然一下，哇，太好了！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很有趣的一个人。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

**小鸟文学：**在这之后，你出版了《王化与山险》《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从大都到上都》等作品，实践你的现实关怀。比如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你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文章里没有完全回答：“为什么传统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在北方寸步难进，和南方形成了强烈反差？……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许先天就具有某种致命的缺陷。”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存在这种南北方差异？感觉是被删了一些。

**罗新：**对，有一部分可能容易产生歧义，他们编辑部就删掉了，后来我再收进来时，也没有加进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权力很极端，不像别的国家也都是君主制国家，但权力相当松散，结构不那么紧密，可是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把权力搞得非常紧密。只要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对外扩张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它能够扩张到谁头上？一些小型的、力量不够的政治体，比如南方民族，很容易搞定。小土司、小部落怎么能跟大国家来比呢？打不过。

可是他们要想跟草原对抗，就很容易失败。因为草原上那些人，你要想打它，国家动员能力得非常大。哪怕强大如唐朝，国家强大时间是有限的，它在一定时候内耗一点，运输交通等方面的结构稍微有点松散，就会失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最重要的是，你没法真正控制它。你控制它不能只靠武力，都靠同化，但那个地区没办法同化，只能对南方同化，让他们说汉语，最后认同为汉族，但对北方做不到。

这种权力结构追求有利于绝对皇权的成果，比如我并不在乎经济收获，我在乎政治成果。什么政治成果？就是服从。而且，你要参与到对我权力装饰的体系当中，比如你到朝廷来，显示我好伟大，我好让本国人民对我产生更高崇敬感。只要服从这个仪式，我愿意付出巨大经济代价，比如你表面上送我一匹马，我回头送你无数好东西。你只要跟我来往，在政治上服从我，经济上会有大大的好处，绝不会有损失。殖民主义是反过来的，它追求经济好处，不在乎服不服从。

这才是专制皇权的本质特点。那一点经济利益对他没什么损失，千万人只供奉他一人，他还在乎那点钱吗？你们这些人饿肚子，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不会饿的，过得很好，所以他不在于乎。它不追求经济利益，也就是不追求理性；只追求政治利益，最终要搞成非理性，所以一定会失败。

**小鸟文学：**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你提出“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富有启发。但后来你對自己造出来的“内亚性”这个词现在有些不满，怀疑它是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分析工具，觉得过于模糊而笼统了。为什么？能不能进一步讲讲你的思考？

**罗新：**当时我搞这一块，在很大程度上想调和对分割中国的反感。很多人反对新清史，认为新清史的目标最终是在理论上分割中国，把中国分成内亚和非内亚。我想说，中国里边含有内亚，内亚里边含有中国，分了也没关系，不用担心它分。但我后来想，这种说法本身是非历史的，因为历史本身不在乎谁是中国，谁是内亚，两者有差别，但跟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没关系。我那时居然迎合抚慰这种焦虑的需要。

**小鸟文学：**你那时说中国历史许多时期都有内亚性，只是存在强弱轻重的差别，比如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内亚性最为强烈，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重要。

**罗新：**对，这种说法让反对新清史的人高兴，新清史的人也高兴。我记得欧立德（Mark C. Elliott）在给别人介绍这本书时，说“it’s a small book but powerful.”（虽是小册子，但非常有力量。）我想他获得了安慰。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学术，如果是讨论学术，我们何必在乎这些东西呢？

历史学家的最终关心应该回到人，而不是任何政权、文化、人群。那些东西重要，因为我们在那里面生存，但是对于未来重要吗？不重要。我们现在只知道爱因斯坦、伽利略厉害就行了，管他们是哪个国家。

### 04

#### 跟帕特里克·格里学习

**小鸟文学：**2008 年后，你将现实关怀纳入自己的研究当中。到了 2014 年，你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受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影响，开始愿意做面向公众的写作和活动。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个变化的心路历程？

**罗新：**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共同促成这个，一个是当时我为《上海书评》《文汇报人》写过一些文章，主要是陆灏催我，如果没有陆灏，我不会写那么多东西。我去普林斯顿只有一年，却写了十来篇，因为他老催我，我就老写，而且一篇万把字以内的文章，正好一个月写一篇，也不太难，所以就写了好些。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在普林斯顿碰到了 Patrick J. Geary。无论是读他的文章，还是跟他的日常交流，谈不上交流，我跟他学习。虽然他年龄并没有比我大那么多，但我觉得他在学术上比我高得多，成就也大得多，所以我跟他真有那种学习的感觉。经常一句话就把你点醒，醍醐灌顶。有时你模模糊糊知道墙外有什么东西



（注：当时我们旁边正好有一堵红墙），他突然把这墙推倒。

我举个例子，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冰岛的年轻学者用基因研究历史上的人口移动。因为冰岛基本上是移民，他说我们对人口抽样做基因分析，看他们都来自什么地方，然后跟历史上的记录以及过去的人口史研究对比，看看这些结论能不能互相匹配？结果他说，完全匹配。我们得到多少人口是哪里，多少人口是哪里。

别人批评说，这个研究提出一个非常陈旧的问题，然后用一个崭新的技术回答，回答的结论跟过去的回答一模一样，有什么意义？年轻人不高兴，反驳说，旧的问题难道就不是问题吗？question is question，学术问题永远是问题。

这时，主持人 Patrick 介入，他说，question is not innocent，没有任何问题天然就是个问题。又来了一句，they have their own genetics，它们有它们自己的生物遗传系统。你提的这个问题，过去人提有他们的道理。他们为什么提？你要搞清楚。他们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站在旧的思想方法里面，对人口做那样的区分。

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研究没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批评人家。他一下子开通了我，我们所有的历史疑问、历史关怀，看起来像是学问，其实每一个学术问题都有它自己的 genetics，遗传系统。这对我冲击非常之大，一下就明白了好多，比如我们国内好多人在讨论谁是哪个民族，你以为这个问题问的好像是个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是不久前某种因素形成的一个问题。

（面向公众写作）也跟他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见到他时，他到处做演讲，（那时）我觉得一个学院派的学者，到处做什么演讲呢？说实话，我到那时对出去跟公众见面，为公众写东西，是觉得不好意思的。陆瀚逼着我写东西，但我不好意思，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可能我长期生长在学院派的背景里面，所以就容易产生骄傲、自负这套东西。

1990 年代的时候，做学问被人怀疑，我觉得我是个很有叛逆思想的人。大家都经商，我特别生气，我不挣钱怎么了，我就要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不想要那个东西，所以 1990 年代这个情绪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纯学术就是纯学术。但是，见到他之后真的变了，我觉得你不能不关心时代、社会，你做的这一套东西，别人接不接受，其实是有意义的。你不要只想 outcomes，写出来，还有责任去让别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写什么。

他参加好多种活动，有时候跟我聊，说这些是有价值的。我就跟他说，我最近在《上海书评》《文汇报》发了这些东西，他还要求去看。他的精神也对我有很大鼓励，愿意看你写的东西。他看不懂中文，就用 Google Translate 看，看完之后，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回应我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好棒啊，这个人。所以我从他那儿也学到，要认真对待别人写的东西。我以前有时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了，后来别人让我看，我就比较认真地看，也跟这个有关。他这样对待别人，我也应该这样对待别人。

在我回来之后一年，我就跟北大有关部门报告，有这么一个学者，应该请来做一些讲座（注：后来罗新主编了帕特里克·格里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一书）。现在我们还有好多联系，他退休住到美国西海岸，给我介绍他们家情况，邀请我去玩。我跟他说，我最近 hiking（徒步）。他说，我也去买了这些东西，你来了我们一起 hiking。这人特好，特有意思。

## 05 历史显示了未来方向吗？

**小鸟文学：你曾说：“我现在读旅行文学，主要给自己框定在 19 世纪的中亚旅行记。即便这样也是读不完的，只能够选一些好玩的，或者是对我关注的话题有意义的来读。”为什么是 19 世纪这段的中亚旅行记？**

**罗新：**虽然我也学过一点突厥语，但让我去读突厥那些东西，难度很大，要靠一些翻译。另外，我对中亚史有兴趣，但让我去读俄文，也有难度。所以我就只能读中亚旅行记，要么是英帝国出来的人，因为出于对沙俄向南方发展的担忧，对印度威胁的担忧，所谓大博弈；另一方面，有一帮人不是英国人，但最后也以英语来写作，写了好多东西，特别有趣。

这就有点像外国人在中国早期写的旅行记，你不能说他准确理解中国，但他注意到了你没有注意到的现象。很多事你不说的，他很来劲，比如我们读清末西方人到中国，他们特别关注中国怎么到处都是人力车夫？他觉得这个太有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拉人力车，人又不是畜生，怎么在车前面？他觉得在前面应该是牛或者马。这就是不同观念。当时的中国人从来没想过这是个问题。

**小鸟文学：**未来你还有什么想写的书吗？好像有一本即将出版的《月亮照在阿姆河上》，讲的是你十年间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亚的游历与考察？也有采访提及你想把全世界长城都走一遍后，写一本书。

**罗新：**《月亮照在阿姆河上》是过去写的文章结集。长城研究是我的一个计划，它有点像我们刚才说的话题，我想讨论是什么力量把人群阻隔开来，阻隔开这个东西的命运是什么？最终人类又如何通过历史的发展，把这些阻隔再一点一点拿掉？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打掉了还会再建。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长城，我都想把它拿出来（写）。

**小鸟文学：**之前我访谈过万圣书园的刘苏里老师，他谈了谈自己对中国历史阅读热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这个话题你在一些采访中偶有提及，但我想补充的是，一方面你是读者和作者，另一方面，你也是许多好评评选的评委。能不能结合这些多元的身份，讲讲你对当下中国历史阅读和写作的一些观察或看法？

**罗新：**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几天，我都不这样想。我以为这是一个中国现象，很想在中国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想说是因为没书可读、现实不让说话，所以人们就读历史。但我前两天在读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讨论美国的历史写作热和历史阅读热，他说的还不是现在，是 2010 年到 2019 年。他说，这 10 年出了多少书，怎么会比过去几十年还多？而且话题涉及那么多，全都是讨论历史。

他又举了报纸上的那些文章，每个讨论时政的文章，都有一半在说历史。他说，这种历史热是怎么回事？

给我乐坏了，原来美国也一样，我没有想到是个普遍现象。是不是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因为看不清明天，对现实更是混乱，所以就宁愿说一说过去、看一看过去，人们在寻找一种安定感、稳定感？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但他也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他也觉得惊奇。

**小鸟文学：**你曾说，你这代人都受到进步史观或者普遍历史观的影响，你也认同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在《第五次开始》中的说法：“未来我们将见证作为神圣认同的民族国家的终结、战争的消弭、资本主义的消亡，以及全球合作新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年中国和世界发生许多变化，如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但你还是相信未来会朝上述方向演进，只是说我们这几代人等不等得到的问题？

**罗新：**我坚信不移，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步，我们现有的国际秩序、民族国家形式，一定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怎么变，我们不知道。

我觉得是历史的逻辑，人类历史就昭示这个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凯利会说“第五次开始”。当然，开始跟结束这中间，隔得不知有多远，我们等不等到没有关系，历史学家的好处就是它不是以个人作为时间尺度。

**小鸟文学：**所以现在重要的考验还是你之前说的那句“一生所学、只为此刻”？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我看你的一个解释说，这句话是有等待的含义。

**罗新：**坚持。危险的时刻出现了，你还信不信你自己？你说过的话会不会放弃？我觉得那是一个大的考验。

**小鸟文学：**刚才聊到这几年你的关注凝聚点是对“人”的思考，还有什么补充或者展开的吗？

**罗新：**我一直想表达清楚，但是难度好大，我不知道难度出在哪里，为什么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此刻我所有的乐观信心，都来自于这方面的思考。我终于明白，人很有特点。我不能说是上帝有目的在搞什么事情，但是好像人类的历史，几百万年的历史塑造出来的人，以及几十万年来智人历史塑造的我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如果说过去没有目的、方向，但是几十万年的试错、彷徨，各种可能的摇摆之后，游走的范围越来越窄，不是漫无边际，因此前方越来越明确，是有目标的。我们过去说历史没有方向，这样说当然合理，但是我们又可以说，已有的历史显示了方向。什么方向？就是我现在说的，第五次开始，人类最后要汇到一个方向去。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历，大学辍学，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片来自 [Küllü Kittus](#) on Unsplash

## 专栏

# 要是能这样该有多好

伊险峰 |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你能记得住的，  
和你当时记录下来的是两回事。

“逝去之物的长长列表”，这是从路易斯·塞普尔维达那里抄来的。《边缘故事集》里的一篇文章。

塞普尔维达是个作家，写童话，写旅行文学，也写小说。同时他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左派，阿连德的兄弟。我对左派人士的语言有一种偏爱，虽然我对他们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人生选择也总是有些困惑——平等是人类数一数二的最伟大的情怀和理想，但需要为此让渡给一个利维坦，这事儿从道理上来说有点说不过去啊。这事儿说来话长，不多说了。喜欢他们的语言的重要原因还是源于他们的生活通常被搞得够跌宕，不落中产阶级俗套；语言饱满，快意恩仇，还有懵懂不谙世事的纯真，出人意表，往往还有戏精体质。有力量，天然就有好感，跟前面说的元气满满，一样诱人。

今年的六月十八日，市场餐厅奉上了它最后的晚餐。罗塞丽娅穿上了节日的盛装，请所有宾客一起为鲜蔬和起泡酒画上一个体面的句号。她准备了十几斤她最得意的意大利面，几大锅美味的茄子烤肉，好多盘难忘的松露蛋糕。我们吃，我们唱，我们笑。我们喝到天亮，直到卖早点的来了，送报纸的来了，早起的鸟儿也加入了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一位操着天鹅绒般拿波里口音的女士就会为那首歌起调，而后所有人将齐声高唱起它的副歌，“罗塞丽娅，世上最美的女郎”，是为了驱逐宿命的邪魔，是为了让失败显得不那么令人感伤。如今的我晓得，我再也无法去罗塞丽娅那儿用餐了。而市场餐厅也已加入我失去之物的长长列表。

这篇文章叫《罗塞丽娅，世上最美的女郎》，中文里最后那句话，翻译成塞普尔维达“失去之物的长长列表”，我以为时间有时更主导一些，所以就改了一个字。

\*\*\*

我想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逝去或者失去之物的长长列表，先要把那些物定位成是好看的，因为好看所以它有了善的本质。实际上好看不好看，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总有人以“好看”之名来把不好看的、他认为不好看的東西给铲除掉。比如，静谧。我跟某人在大多数问题上持相反意见，但我也觉得静谧很好。有些东西值得纪念，但消逝难免，盛景不再，也就这样了。去北京平安里的满恒记吃涮羊肉，排了一个号，我以为是世界上为了吃饭排的最长的一个号，估算了一下要等四个小时。技术进步，不用傻站在那里等，每隔十几分钟会有短信通知进度条又前进了十个人。您前面只有三百桌了——大意就是这样。那是 2019 年初冬，正来一次寒潮，降温，四下里乱走，胡同拆得七零八落，并没有多少念古思古之情怀，不小心，走进一胡同，胡同里有高墙，高墙里有要仰视才得见的白塔。这是白塔寺。然后，

有风吹过，就听到了风铃声。

静谧这东西，俗人们要靠声音来感受。有人借黄寺大街的鸽哨，也有人靠着白塔寺的风铃。不远处，是阜成门内大街，钠灯高调，流过来与深蓝夜空合在一起像是给塔加了滤镜，更白了。当然也更静。

这当然是值得纪念的好时刻，有慧根的人没准都要顿悟。但你说为了听这风铃声，每天等满恒记排队叫号，忍着寒意只为等待静谧一刻袭来。这事不能做。

此后不久，没隔几个月，人生开挂，我还听到了上海静安寺的风铃声，而且是在下午六点。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留意静安寺的风铃，这里即使深夜也是车水马龙，市井之声不绝于耳，没有机会听到静谧声音。真的有。那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封城之后，春节过了，假期延长，每个人都在家中自我隔离，街上空无一人，静安寺的风铃声瞅准时机传出来了。那些天大家对人生况味都有特别感受，在南京西路上，连我都感受到了慈悲心，而且它不管不顾随时都存在世间，只是你不知道或者没办法感受而已。

说远了。静谧虽然很好，但如果只为你顿悟慈悲，或者回忆少年放飞自己的时光，还是算了吧。如果代价还要几十万人重新规划命运，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

襄阳南路上有一个烟纸店，店主据说是一对老夫妻，他们那烟纸店可能有些年头了，跟所有烟纸店一样，与便利店比起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老主顾会搬走会离世，新主顾培养不如便利店那么明亮而且温暖而且随处可见，又不能像人家可以 24 小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希望，算是一个营生，可以让人不闲下来。这对老夫妻还有些额外的趣味，就是把所有的货品都拿毛笔写在纸上，一条一条，蔚为壮观。有很多事，以规模来建立壁垒，你看写上我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种类，这都是寻常店家做的寻常事。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如果你把所有商品都罗列在此，就是一种艺术。

“定制锦旗，横幅，名片，国旗，旗绳，DVD.CD 盘片，保暖桶，保暖杯，热水袋，浴桶，雨帽，洗澡巾……洗洁精，洗衣液，水垫，马夹袋，龙虎花露水，龙虎清凉油，龙虎风油精，84 消毒液，雷达杀虫剂……保鲜袋，保鲜膜，盆架，电饭锅，邦迪，打火机，烧水壶石碱，地毯门垫，热水瓶胆，暖壶除垢灵，雨披，雨伞，袜子，一次性雨衣，手套……钥匙扣，钥匙板，红绸带，面纸，尘掸，鸡毛掸，连裤袜，尘推，玻璃清洁剂，S 钩，水斗塞，樟脑丸，药皂，温度计，硫磺皂，蚊香，蜡烛……棉签，牙签，人体磅秤，不锈钢被夹，不锈钢衣架，垃圾袋，托盘，水勺，玻璃杯，漏勺，汤勺……蒸架，碗夹，刨刀，锅铲，铁锅，碗，菜罩，菜板，菜刀，水果刀，筷笼，筷子，条更，菜刀……”

有些品牌用红色字打火机的火字也特意红色高亮，错字并不多。调羹两个字显然是写错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是太原路上最有创意的一个烟纸店。而且，从 DVD 那里可以判断得出，它的历时性更新体系——随时增加新的东西，不会删掉旧东西，某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个烟纸店的销售史。

这个历史据说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城管认为它……难看，然后，就撕掉了。媒体还有去采访，女店主费阿姨很委屈，有照片里看到她在重新写，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重新挂了上去。你看，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家觉得好看的时候还好办，如果有人觉得它难看，麻烦就来了，我和费阿姨觉得好看是没有用的。有权力的人才能决定谁好看谁不好看。因为他可以判令不好看的東西消失。

难看的人。

难听或者不愿意听的话。

大意就是这样。

对了，还有一条，城管还认为这是店招。只能有一个店招。这是硬性规定。我对它是不是店招也是存疑的，但有权力的人认为是，所以它就得了。为什么只能有一个店招？有权力的人认为只可以有一个，就只能有一个了。

\*\*\*

一段历史，一个景色，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能就因此记录下来。伊莎贝拉·韦廉臣，传教士夫人，1881 年走了一路从烟台到北京，然后写出了在我看来 19 世纪有关中国最好的游记，她在大连店里看到一排男人睡在炕上，早上他们一行要赶路，别人还都没有起来，她看到炕沿上齐刷刷地耷拉下来一排辫子，说不出的诡异——看到这东西，作为趣事记录下来，是一种能耐。还是在大连店里，看到南来北往货物，龙口粉丝要销往全国各地，曼彻斯特的布匹正在往内地转运，山东的草辫是准备发往英国和美国的……一段话，就把第一次全球化——在一个大车店，我们把它说成是物流转运中心也在情理之中——写出来了，虽然她未必这么看。



《中国古道：1881 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记》

“上次我们抵达济南府的时候，太阳正好即将落入西山，高耸巍峨的城门和雉堞状的城墙就在我们眼前，落山之前太阳的余晖从城门和城墙的背后照射过来，而我们是迎着落日的方向，这让城门和城墙笼罩在一片紫色与金色的光芒之中”。这是伊莎贝拉·韦廉臣留给我们对济南最好的记忆——她所说的景色，与每年冬至颐和园十七洞桥的“金



光穿洞'异曲同工。同样几笔,为我们描摹出来,现在这种景色,恐怕只能用照片来表达了。

在看到过太多中国城市的衰败之后,在我看来,济南府简直就像是中国的巴黎。街道整齐干净,非常的宽阔,比绝大多数中国南方城市中的街道要更宽阔一些,并且在路面都铺设了石条,而不是土路。在城市的商业区,商铺也都干净敞亮,装饰华丽。每家商铺的门面都是完全向外敞开的,没有门窗之类的东西阻隔。白天的时候,商铺的货架全部直接向外敞开,到了晚上,商铺的整个门面则用大块的木板遮挡起来。商铺的房檐都用整块的木板铺就,在上面还刷着鲜艳的油漆。似乎商铺之间,特别是相邻的商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此每家商铺都尽其所能地在门面装饰、色彩搭配、货物摆放等上面下了功夫,以期能吸引到更多的顾客。还有大量红色、绿争、黑色、金色的彩条也被用来装饰店面,这些花花绿绿的彩条晃来晃去,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让人感觉到晃眼的光芒。在每家商铺里,正对面都是一个大柜台,茶叶店和丝绸店没有把他们的货物直接暴露 in 柜台外面,但在柜台上面也毫不吝惜地用插在花瓶中的鲜花来装饰,店铺里面还摆放着正盛开着鲜花的盆景。

这说的是 1881 年的济南?我们所了解的 19 世纪晚期,更像阿城写的,整个国家丢了魂一样的落魄而且全无章法。他讲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崇拜中国文化的学者组了个团到北京旅游观光,以偿景仰。不料到了北京,大清国的帝都,路边有尿,苍蝇撞头,脏水出门就泼到街上,垃圾沿墙越堆越高,这些日本汉学者受的打击实在是大,有的人回去后不再弄汉学,有的则是自杀,真正做到眼不见为净”。如果有人直接说济南在 19 世纪末景色堪比巴黎,我难以想象,只会当成笑话。前些年看网上有人看八十年代老日剧观感,大惊失色,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遛狗拣屎了!有人看老 TVB,他们三十年前就有微波炉了!看老电影,六十年代美国人上车就知道系安全带了!人容易坐井观天,不是落难或者窘迫之时,这毛病更容易犯在洋洋得意之时。没有韦廉臣夫人,我们难免也会盲人摸象,挂一漏万。

\*\*\*

阿城说的崇尚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卫生状况大失所望,与韦廉臣夫人所看到的济南府不可同日而语——这可能还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不认为当年济南府的卫生情况会好过北京,实际上那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让人难以忍受,如果以现代的卫生眼光看。“没有什么比 1858 年的‘大恶臭’(Great Stink)更能恰当地象征 1850 年代的英国了”,本·威尔逊在《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中说,那些年是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政府不干预公共健康、劳工关系、工厂环境、教育、议会改革等领域以及其他大量的国内问题”,当然,卫生环境真的好起来,也并不能全怪在大政府时代来临,更多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资源足够把改善环境的能力调动起来。等到维多利亚时期结束的时候,到了 20 世纪初,韦廉臣夫人走过中国古道二十来年后,英国和整个欧洲都文明了许多,进入到第一次全球化开花结果的好时期。细究起来,中国在 19 世纪的脏乱与全球领先的文明世界之间的差异差不多隔了一个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其后因为几场战争和不务正业的继续革命三十年,中国卫生状况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好转,又多耽搁了几十年,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跟好景色再寻不到或者不知珍惜一样,是另外一个话题。有一个是有趣的,万物轮回,每个时代都有人喜欢发出灵魂拷问。在 1850 年代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说:“我们可以在世界最偏远的地方建立殖民地,我们可以征服印度,我们可以支付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债务利息,我们可以散播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富饶财产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却无力清理泰晤士河。”是不是现在同样的句式也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出现?

\*\*\*

只可惜韦廉臣夫人这景色不见了,自然早就不见了。有韦廉臣夫人的记录是一次意外。1994 年,我从镇江坐了轮渡过江,上岸,往北走,进扬州城。公路边,破败的瓦房,充作门市,与公路边城乡结合部在 1990 年代的其他地方无异,不同的是扬州这地方跟伊莎贝拉的东方巴黎一样,门面房还是以木板条来防护。板条编了号,123 排下去,如果还另有一扇窗,那就排一二三四,早上的时候顺着轨道把板条卸下来,叫“开板”,晚上再按顺序排回去,叫“关板”。小时候我在东北,商店开门关门就这么叫“今天商店开板吗?”“今天关板,礼拜二,点货。”就是这样的。这开板关板就是从济南府一脉传承下来的。扬州那时候看起来还没来得及开发,至少这城乡结合部是这样,所以进城大巴上,看到的就是古风。我对扬州的好印象全赖于此,你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说不上来。不见到很难说什么东西会打动人,伊莎贝拉·韦廉臣,或许会说得太直白,可能那节点正好让她想到巴黎,余晖,城门,马蹄声,有仪式感,那就是值得留住的瞬间。扬州于我就是窗板瓦房门市,低矮的,在街边,其后什么郑板桥瘦西湖之类都不过是扬州的注脚。

\*\*\*

我们无疑会错过很多东西。你能记得住的,和你当时记录下来的是两回事。一直有个场景存在于记忆中,也是光从桥洞里穿过。那是在三好街和文化路的一个简易立交桥的桥底。我记得它可能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但高中的时候有那个桥吗?那个桥在沈阳被叫作“新加坡”,这是沈阳人对城市交通理解的创造力,和沈阳人解构能力共同促成的一个结果。沈阳开始有堵车之患,问题解决者认为需要人车分离,于是有了一个方案,沿路各修两道土坡,土坡交汇之处依旧有红绿灯,但好在只有机动车,影响通行流畅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在桥下四个桥洞里穿行——反正他们也不怎么遵守交通规则,下面这个没有红绿灯的小型环岛正好供他们挥霍。它就被叫作新加坡。有天晚上,冬天,我记得是下自习课回家,钠灯暖光钻入桥洞,桥洞背风处,卖烤地瓜的一家人,一对夫妻,并不是太老,以高中生的眼光看也不那么老,三十多岁,只是穿得笨重,军大衣棉帽子和哈出来的白气会让人丧失年龄特征,他们的孩子趴在人力车的边上,

可能是看画册也可能是写作业,不记得了。那孩子不会超过小学三年级。天冷,温度是烤地瓜的香气会冻结在空气里的那种低温。路灯光钻进桥洞。一家三口。那个场景对一个高中生来说算得上懂事的开始。那时还没有大规模下岗,不景气的工厂越来越多,做小生意的待业青年已经稳定下来,发大财或者维持一个生计心里也有数了,家里挣工资的人是不是能支撑一个家,不好说。努一把力,没准能好起来的憧憬还在。罗塞丽娅,市场餐厅,这些名字因为塞普尔维达而被记录下来。一个名字普通的姑娘,一种普普通通的酒,一个普通的餐厅,一个司空见惯的夜晚,被记录下来之后就成了永恒。那个简易的立交桥下面,炉桶里可能还剩下最后几只地瓜,他们已经准备回家了。冷肯定是很冷的,但回到家可能会暖和起来。旁边新开的电影院,南湖剧场的最晚场电影还没有散场。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猜测,基于零乱的碎片一样的记忆。

\*\*\*

在这个街角有一个报摊。那是什么时候呢?在这里我买过佛洛伊德,竖版繁体,直接从台版书盗印。也有正版的,尼采《瞧!这个人》《快乐的科学》,还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房龙的《宽容》一类。偶尔也会买一些武侠小说,梁羽生或者金庸古龙,有的是印在杂志开本上,取个名字类似于《今古传奇》增刊,也不知道真假。如果光看尼采萨特弗洛伊德之类,这报摊就很有点散装万圣书园的感觉。实际上,八〇年代乱糟糟的,世界名著和学术书都有成为畅销书的可能。那摊主自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买手,守着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东北大学(那时候还叫东北工学院),卖些潮流学术也正常。八〇年代管理还松散,社会控制力弱,政府的有关部门也不是很强大,卖什么报纸、卖什么书也没有什么限制,主渠道(新华书店)崩溃,二渠道(民营出版)正在兴起,三渠道(盗版)没有人管。你尽可以随便进货,从挂历到盗版武侠,什么赚钱快就可以买什么。如今回忆有点“小政府大社会”的味道,当然不能这么理解,只是力有不逮,管理的触角没有能力适应突然多出来的这么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现象——理解成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就好了。有人回忆八〇年代,如果是回忆青春,那跟五〇后回忆知青下乡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从中得出清明的一片天空的的结论,那可能是缺乏对前现代社会的理解。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买《海南纪实》。这杂志存在时间极短,印象里也就出了不到十期,从 1989 年的 1 月号开始,火爆异常。几个湖南人到海南热土去闯天下,韩少功等人下海之作,有文人气,有湖南气,有太多好文章,简直是八〇年代绝唱——后来看访谈知道他们还要搞乌托邦,惊为天人。始作俑者韩少功,我觉得是中国最会做媒体的人之一,不光小说写得好,也不光是最早看到米兰·昆德拉的智慧与中国式犬儒社会的精准对接,光是捎带着隔几年做几本让人耳目一新的杂志出来就很让人羡慕了。《海南纪实》之后还带来一本《金岛》,看名字也是借着海南岛开发热而来,用的是香港刊号——同样是那时候没有人去深究香港刊号杂志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内地发行,没有人管,所以随意——内容和体例与《海南纪实》像,但从刊名到感觉都透着一种商业化的感觉,你能揣测得出这是后世最多的那种变形记:人文的创造力在前,商业化紧跟其后,略打折扣,但商业自有调动各种社会元素的方法,结果上看也不输于人文的创造力,但商业与人文之不同在于后劲,一个经济周期下来,商业如果略有闪失,多半心虚或者退却,人文有时不管不顾,如果笃定倒能躲过周期,成就一点大事;当然了,没有商业目的支撑,人文更容易率性而为,往往周期还远,自己先了无趣味起来。这两本杂志,来势汹汹,各自造出单期发行量上百万的奇迹,然后停刊于当年 8 月。最后一期《海南纪实》封面,是清场之后污水垃圾遍地的照片,破败而心酸,一个时代的索然落暮。里面文章不痛不痒,没有告知读者,此后就悄无声迹了。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

一个街角的报摊,面目模糊,谁知道它会装下这么多的东西?《海南纪实》应该是 1989 年,那时候我不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吗?为什么会每天呆在家里?我记得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报摊,看新一期杂志是不是到了,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大家会记得更容易记得的那些信息,然后多个人叠加在一起,最后成了一种 meme。在另一个版本的记忆中,沈阳的报刊销售圣殿在太原街邮局,是奉天邮便所的旧址,有日本明治时期红砖墙风格的建筑,有白色装饰腰线,个子不高,庄重有节制,是好看的建筑。那个邮局报刊销售门市守着太原街和中山路的街角,占地排场,是个书店一样的存在。那时候,像《读者文摘》《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都是在父母单位订的,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小期刊,也能买到一些市面上看不到的杂志,早一点的比如有《青年一代》,那是来自上海的一本青年杂志,现在各种青年杂志都有人回忆,但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一本,作为东北青年,对上海花花大世界有特别的想象,所以这本简直是洋气的启蒙。后来还有一本《街道》,真的是一个街道办的杂志,深圳南山区,它出世时已经九十年代了。后来做杂志访谈,记者还真的找到了当年的话事者,他们对于有人记得也有些意外,那杂志我感觉发行量大约不会超过一万,一期里有那么几册流落到沈阳,无处安放,只能在首善之区的报刊亭里供人瞻仰,不巧被我看见,成了我的心头好。后来这杂志也犯了错误,也是莫名其妙消失了。这错误和停刊原因至今语焉不详,也没有多少人在意。沈阳人对太原街报刊门市部的记忆得以留存,一是这建筑还在,二是文艺青年们会回忆打口碟和打口磁带——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这样一群人爱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它也最容易形成一种 meme。在上海是大自鸣钟在北京是五道口或者和平里,沈阳是这个门市部,确切地说,是这个店的玄关。我后来路过这里,觉得这可能连玄关都不能算,北方天冷,门造两层,外层门推开,掀开脏兮兮的棉帘门,挤到中间一层过道,再推开一扇门才真正进入室内,就这两道门之间,有一个柜台,一堆人挤在那里翻垃圾一样拣打口带。回忆这东西的人多。你可以理解成是欧美文化的渗透力,或者说是欧美地下青年文化的渗透力,这对于全世界无缘消受于此的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远的有林立奥听披头士的传说,到八十年代,年轻人多,反正都要反叛,反正都得叛逆,音乐代表一切。安东尼·马拉写俄罗斯的小说,《我们一无所有》,饶舌,写苏俄当年的青年文化,与我们这里一样,牛仔裤(我们是喇叭裤)打先锋,音乐和唱片是号角,最后真正动员起来所有人的是麦当劳和可口可乐。音乐,他们不是走私唱片,而是 DIY 了一种肋骨唱片。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交换陈旧的 ryobra——也就是所谓的肋骨唱片、白骨音乐、骨头单曲——首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禁歌，从黑胶唱片压印到 X 光片上，然后放在留声机上播放，音效闷沉。断裂的肋骨，脱臼的肩膀，恶性肿瘤，挤压的脊椎骨，一张又一张 X 光片被裁剪成粗略的圆形，歌曲被蚀刻在片子上，中间被香烟的微火烧出一个小洞，这些 X 光片象征人类的种种病痛，隐匿在一道道凹沟之间的却是布莱恩·威尔森纯净、喜悦的歌声，想来真是心旷神怡。我们的爸妈说这些音乐是西方的污染物，难不成一首在世界另一端灌制的歌曲导致 X 光片上那一团恶性肿瘤？难不成癌症的元凶不是那些从窗外的烟囱飘进屋内、人人免费吸取的尘污。

相对而言，肋骨唱片看起来更硬核一些。

\*\*\*

新康花园北门对面的报刊亭黄了。淮海中路上，靠近华亭路，守着地铁口和美美百货楼下的肯德基，它们都有自认为辉煌的时代，现在也都没有了往昔荣光。号称徐汇区最后一个报刊亭。那是 2018 年。报刊杂志火的时候，每个街角都会盘踞着一个，有的时候甚至不止一个报刊亭。下午晚报来了，分成几堆——印刷厂和邮局投递员来不及把报纸都插好，一份是一份的样子，送来堆在那里，亭主插插好，等着主顾上门。亭主那时候也有门槛，一些下了岗的本地 4050 人员才有资格拿到这样的机会，把报纸捆捆好，该留给老主顾的留好，一份一份地卖出去。这时日当然也早就过了。杂志报纸不好卖了，有一阵漫画书好卖，但一年里总有两个多月学生放假，再说也不是所有亭子都守着学校；电话卡卖过几年，但后来都在电话里在网上直接买了；后来只好卖烟卖水，卖烟是偷着卖，没有证，卖水简单——那些亭主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刚需”。还有修地铁，一修四五年过去，把着那些最重要的路口，报刊亭被围在工地里，早年可以等——那是黄金时代，大不了等五年，这个徐汇区最后报刊亭，修一号线的时候不一样等了好久。地铁修好之后又过了十几年……其它的报刊亭可没有这样机会了。一个没有什么未来指望的报刊亭，撤掉也正常。现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有一个街心小花园，后面是西班牙式的洋房——比以前更突出一些，报刊亭会抢去很多风头。

\*\*\*

在石门一路过马路，就是有个四层楼高硕大星巴克的那个路口。一个等待时间有点久的红绿灯，积下来好多人，好不容易绿灯亮起，黑压压的人迎面走来，各个步履匆匆……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整齐划一的姿势：抬左手，颈椎略侧向左侧，头略低，目光放在举起的左手的手机上。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手机上的时候，传说中的虚拟世界其实已经到来了。因为你看不到真实世界了。说是真实世界正在消逝，会有人相信吗？小熊英二说 1968 年的东京，经济腾飞，到东京去的年轻人非常多，一半人口在 15~34 岁，36% 的就业人口住在人均不到 3 叠的空间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没有游戏厅，当年调查消磨时间的方式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的是“读书”和“缝纫”。街上是免费的，广场是免费的，小熊英二说，“可要是游行，出去看个热闹却是免费的，所以当时围观起哄的人那么多也毫不奇怪。”1969 年，在新宿车站西口地下广场掀起了反越战民谣运动，围观者多时会超过 5000 人，其中似乎很多都是从地方赴京，没有娱乐活动的年轻劳动者。”那个时候的广场是一个娱乐品，是用来休闲的工具。在日本，到了 1970 年代，电视兴起了，广场还是广场，娱乐性却一点点消失了。如果是现在，广场依旧是过去的广场（可能还更大更气派了），广场上还是上人来人往，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手机里，就跟他们经过闸机，走出地铁，上到地面，穿过吴江路，魂一样走到太古里……所有这些因为缺乏一个主体，而丧失了存在的可能。那个主体活在自己的虚拟空间。没有报刊亭，没有广场，没有停下来的热闹，没有对迎面走来的人的想象，没有所有。宇宙大爆炸一样，所有恒星、星系、星云都在加速远离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暇顾及都有什么东西在消逝，直到它真的没有了，然后，哦。办《好奇心日报》的时候，我们找香港的社论去记录香港市井。比我们想象中要迅猛得多。你都来不及去想正在发生的、正在变化的都是什么。更不要提回味，甚至 Mark 一下，就快速地过了。再想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

1957 年，王鼎钧走在台北街头，中华路，进入西门町的地方，他看到路边树起一座大型的霓虹广告，布满各色灯管，“夜晚雨后，灯光把满街照成彩霞”。王鼎钧大为感慨：“这得耗费多少瓦电！”他猜测这大约是台湾第一个商用的户外霓虹，对于当时每个房间只

有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每个开关旁边都贴着“随手关灯”的时代来说，王鼎钧说，“这一片霓虹是一个划时代的讯号”。

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回台北述职，他在三军球场对三千听众演说：“这个国家曾经由军人管理，由学人管理，都没有管好，现在让商人试试吧。”建设台湾优于收复大陆，政策大转弯，总统，行政院长，经济部长都没露过口风，蒋大使算是替他们升起“重商”的灯球。国民党抛弃计划经济，比彼岸提前三十年。

大部分逝去之物，平平淡淡就消失了，这样那样的时刻稍纵即逝，最后湮没无闻。没有人会太在意那个门市部拐角处的玄关，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些扒堆儿卖的打口磁带，没有谁去想突然亮起的霓虹广告意味着什么，就像没有人想到那些低头看手机的人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远离了真实世界……无意当中，所谓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变化了。如果有能力，那真的应该多记录一些东西下来。像塞普尔维达。

\*\*\*

多少要有一些敏锐的感受。朱天心看到父辈照片里“努力的笑”。“奇瓦士威士忌的广告你一定看过，台湾版用的是一张黑白泛黄的老照片：三十年前，一个高中男生单车载着一个高中女生骑在乡间小路上，脸上是腼腆快乐的笑容。我们父母那一代的相簿里总有类似味道的那么几张，大多时候他们都因为难得拍照，所以努力笑得很开心……”这是我在最近捕捉“逝去之物”过程当中最有趣的一个。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最伤心的故事来自于理查德·道金斯，他说：“这个世界极度复杂，丰富而又古怪，奇妙至极。我的意思是，这种想法，即如此极致的复杂不仅可以从如此极致的简单的中产生，而且很可能完全是从无到有，这是最美妙非凡的。一旦你对这一切可能是怎样发生的有了某种模糊的概念——那简直太棒了。并且……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宇宙中度过了七八十年的人生，对我来说这是值得度过的美好时光。七八十年？要是能这样该有多好。”这是他为《消逝世界漫游指南》写的序。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是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一本对即将消逝的动物的全球采访，那本身就是一个逝去之物的长长列表，整体上你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告别。道格拉斯·亚当斯，这个文字向来很“屁”的作家尽最大努力让读者能轻松一点，但这又怎么能完全置身事外呢？难免会写得让人悲伤：“鸚鵡鵒是一种跟不上节拍的鸟。如果你正看着一只鸚鵡鵒那又大又圆、棕绿色的脸，还有脸上那副安详无辜、懵懂无知的表情，你禁不住想抱住它，告诉它一切会好起来，虽然你知道可能并不会。”一切会好起来？“你知道可能并不会”。道格拉斯·亚当斯这个大个子，在他 49 岁晨练的时候死掉了。“七八十年，要是能这样该有多好。”所以，理查德·道金斯会这么说。

###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是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一本对即将消逝的动物的全球采访，整体上你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告别。但你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要告别的、已经告别的又何必这些。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一，2022.09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